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Yangtze IDEI

2018

长江产经圆桌会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南京大学）

简介

“长江产经圆桌会”是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根据网络信息时代学术交流和信息传播的特点，在全国首创的线上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学术、政策研讨活动。它由院长刘志彪教授牵头，定期围绕政府重视、企业关注、民众涉及的重大经济事件和热点话题，以电子问卷的形式广邀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官员和企业家独立发表真知灼见。该圆桌会近年来在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下，以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为出发点，以服务中国政府战略决策为宗旨，以引导社会舆情为己任，秉持“热情·专业·理性”的理念，寻求理论分析、政策阐释和应对策略。

收录本集的这些文章，经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官方公众号“长江产经智库”推送，共获得了数十万点击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及良好的舆论效应。我们将以往的研讨内容按年度汇编成册，作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成果之一，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以飨读者。

目录

1 顾维军案再审的意义	1
2 从毛振华事件看东北政商关系	7
3 如何看待地方主动挤出 GDP 水分	15
4 人口出生率降低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	23
5 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解读刘鹤达沃斯演讲	34
6 如何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	42
7 股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58
8 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山东引发新一轮地区竞争？	64
9 如何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	74
10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专家热议 江苏高铁建设与乡村振兴	86
11 中美贸易战，中国如何理性应对？	91
12 进入新时代为什么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00
1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	107
14 中美贸易纠纷进入微观冲突阶段和中国的应对	113
15 如何理解“大保护下”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19
16 如何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126
17 中美联合声明对我国经济影响及如何应对	134
18 对当前各大城市“抢人大战”的思考和讨论	139
19 去杠杆化解金融风险：怎么看、怎么干	147
20 构建江苏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152

21	中国经济：如何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165
22	经济学角度的中国疫苗监管问题讨论	173
23	经济学人视野下的疫苗事件	179
24	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如何稳？	184
25	中美贸易战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影响	199
26	关于中国科教资源与实体创新分离现象的讨论	207
27	上海如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16
28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224
29	“错峰生产机制”下的博弈：倒逼地方政府职能转换	243

顾维军案再审的意义

2018 年 01 月 04 日

编者按：2017 年 12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人民法院依法再审三起重大涉产权案件，其中备受关注的顾维军案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提审。这一事件在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以更好地发挥企业家重要作用的关键时期，让人们切实感受到党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坚定决心，也让人民群众在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中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经济主体财产权的有效保障和实现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只有进一步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有效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公民财产权，才能形成良好预期，增强各类经济主体创新创业动力，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国家长治久安。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产权保护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顾维军案的再审，进一步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依法保护产权的高度重视。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第一时间针对“顾维军案再审的意义”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1）稳定社会预期，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心理预期。给予民营企业家必要的产权保护，是发展中国经济的内在要求。

（2）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民营企业的积极参与。对重大涉及民营企业财产诉讼案的纠偏，也是调动民营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根本措施。

（3）向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坚定不移走市场化、法治化道路的决心。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顾维军案的再审，说明了社会开始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的相关精神。

希望以此为起点：

（1）让依法治国从依法行政真正起步，以上率下；

（2）抓住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契机，系统梳理经济领域法律法规，与时俱进予以废改立；

- (3) 依法纠错与依法惩治相结合，真正建立法治市场；
- (4) 抓住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契机，正面宣传优秀企业和企业家。

孙国民（南京大学）：

(1) 只有具备“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革故鼎新”的勇气，国家和人民事业才会无往不胜，这也是国家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

(2) 重振投资信心之举。政府投资当主力不可持续，激发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是培育新动能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对当前发展实体经济具有提振作用。

(3) 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之举。企业家精神的培育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从制度上保护企业家，就是为激发企业家精神撑腰，就是为“双创”护航。

踪家峰（南开大学）：

(1) 1840 年以来，国、民、国、民、国循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需要理清楚，国即国有民即民营；

- (2) 急需破除所有制崇拜；
- (3) 全民所有制与公民选择，两者不能偏废；
- (4) 对冤枉的民营企业给予正名赔偿；
- (5) 最急迫的是，要给民营企业大幅度减税。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1)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需要重新厘清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的地位，最重要的仍然是产权制度。

(2) 抓紧推进甄别民营产权不规范管理问题，抓住一批纠偏典型，让民营企业家放心安心。

(3) 在资本市场中民营经济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一批高成长、高盈利、高分配的中小企业，给中国经济带来新的活力，不能任意打压。

(4) 民营企业也要自我改革，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与政府保持好亲清关系，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守住底线。

(5) 发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两个积极性，支持民营企业牵头去混合国有企业，在大健康大消费等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不仅对国家长治久安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能否取得完美胜利，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才有共同富裕、精准扶贫的经济基础；只有民营企业长久地发展了，企业才会更加从内心关心环境，减少和降低竭泽而渔现象，增加长期行为。尤其是对于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具有基础性意义和作用。

一旦建立起对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信心，高货币存量风险、房地产市场风险、外汇市场稳定、资本流动风险等，都会建立起彻底化解的基础条件。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平反冤假错案，是偿还历史欠账；平反，是治标，关键在于全面落实对各类产权的一律平等保护。

平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体现平等保护各类产权的宪法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切实做好平等保护，尽最大努力，减少增量法人冤假错案，以稳民心，兴民利，振实体。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1）真正来一次为民企错案纠偏活动，影响力大且恶劣的历史大问题要解决，面广量大的民营中小企业小问题也要解决。当然，方法也要艺术化，一方面纠偏要让民企感到心暖，同时也要考虑历史环境。可以成立一个纠偏小组专门负责此事，让民营企业真正感觉到一种春风扑来的感觉。

（2）真正减轻企业负担。现在民营企业负担已经是全方位的，但关键是要一视同仁，降低民营企业成本，税费合并，把冰山下的成本全部摆到台面上来。

（3）有些政府职能部门要合并，不然有人的部门一定会做事，如果事多，必然会扰乱企业正常发展。针对“服务”特别多的部门，要合并；没啥职能的部门，坚决合并减人。

（4）大力加强行业中介组织建设。社会中介组织是二元管理向三元管理转化的重要途径，针对中国现状，可以先从经济类中介组织放开放心放手，政府应该把重要工作放在规范中介组织服务上。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 30 论坛华东组委会）：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依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这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切实抓手，建议下狠决心，给经济真信心：

（1）公民产权是天赋人权，没有任何组织、个人可以非法侵占，是国家根本大法和物权法等相关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体现。

（2）保护产权，是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内生创新和活力的基础。民营经济是更有保障的纳税人，更可信赖的市场信心与活力的源泉，鉴于其弱势地位，应优先享受产权保护。

(3) 党和政府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优良的政策、制度、商事服务，是应尽职分，是为人民服务、为纳税人提供低价质优公共产品的基本体现，在纪律监察、媒体监督、法律约束下如履薄冰才是常态。

(4) 爱惜传统媒体中的新闻调查工作人才，保护民间意见领袖，让他们成为舆论的主导力量。

邵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从基本经济制度的高度认识纠正民企错案。不要把维护国企战略地位与民法层面的平等保护对立起来。现在更重要的，是在混改中的股权平等。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个案对恢复信心有帮助，但效果有限；要在制度和法制上推进，彻底扭转民间投资下滑。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社会需要企业家精神：创造和冒险。把企业家精神压抑了，经济也很难发展；保护民营企业，对经济进一步扩张，打破中等收入陷阱很重要。

支持民营企业，除了在法制层面保护民企，更要回到货币政策面，对货币政策的资源错配作深入了解。保护民企，但是没有资源，民企也很难发展起来。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十九大报告指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我国经济最活跃的长三角地区，非公有经济比重，浙江省超过 80%，江苏省达到 67.7%，上海市超过 52%。从数量上看，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板块。

最高法院依法再审顾雏军案，无论再审的结果如何，这一举措对于营造发展环境、对于稳定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对于下一步的国家经济发展、对于避免塔西佗陷阱都具有重大意义。

崔卫东（蓝鲸咨询）：

在 1997—2003 年左右的小型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改制过程中，存在股东较多、股权分散等现象。这批企业改制后，得到迅速发展，有的成为行业领军企业，有的成为上市公司中的佼佼者。但是，改制遗留的小股东股权纠纷，时不时困扰着企业的发展决策，甚至诉诸报端。改制企业遗留产权纠纷，影响改制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当时的改制是依据政策文件改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处理改制遗留产权纠纷依然需要出台政策，划分具有普遍性的政策界限。

建议尊重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尊重民营企业的发展事实，尊重当时的政策和改制环境，研

究制定处理改制遗留产权纠纷的政策。对一些纠缠不清的事项，提出政策意见，让民营企业卸下包袱，消除顾虑，轻装上阵，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保护产权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 （1）混改中，国资和民资在政治上和经济要平等，从制度上保证民资的话语权；
- （2）从制度上界定政府和市场边界，有形之手不能伸得太长；
- （3）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应在法律框架下开展，不能逾越法治底线。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1）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首先要解决民营企业企业家最关心的产权保护问题。把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到实处，完善并落实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制度，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及时依法甄别并落实政策，切实保障民营企业家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坚定企业家的信心。

（2）政商关系是目前民营企业普遍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以发展改革为导向，以法治为支撑，以制度为根本，构建健康、清廉、公开、透明的新型政商关系。

（3）不断完善并积极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壁垒障碍，切实营造公平、公正的生存经营环境，激发民营经济发展的潜力和活力。

史先诚（金融工作者）：

（1）依法区分民营企业企业家作为自然人和其控股企业作为企业法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自然人违法由自然人依法承担责任，法人违法由法人承担。

（2）依法在公司章程中建立应急顺位决策机制。企业法人能否撑过危机，取决于是否有顺位决策人，取决于顺位决策人是否有保护企业法人财产的动力和力挽狂澜的能力。

（3）依法建立新型政商关系，并要落到实处。新型政商关系要求官员，既理直气壮、真心实意为企业服务，又坚持原则、公私分明，做到政商交往有原则有规矩有底线。与此同时，也要求民营企业企业家致力于创新创业，有社会担当，别谋不义之财，别拉拢未腐官员下水，勇于举报腐败官吏。

（4）依法定程序审理民营企业企业家及有关法人涉嫌违法的行为。一些民营企业企业家被司法或行政调查后，司法及行政机关应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时间要求，不能久查不清、久审不判，否则严重影响企业法人信誉和正常运营。

林学军（暨南大学）：

产权十分重要：

- （1）市场经济下，产权明晰才能进行商品的交换，促进商品交换。

产权明晰才能够让企业家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才能够做好资源的配置，有效利用资源，发

挥资源最大效率。

(2) 产权明晰对民营企业是一种激励的作用，鼓励民营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创造最佳的经济效益。

(3) 政府是民营企业产权界定的外部力量，政府应该用这个公权力界定产权，保护产权，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确保市场经济平稳发展。

从毛振华事件看东北政商关系

2018年01月08日

编者按：在中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的时期，2018年1月2日，中诚信集团创始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布力阳光度假村董事长毛振华，声讨黑龙江亚布力滑雪旅游度假区管委会的一段视频，引发轩然大波。这一“亚布力之怼”，再一次引发“投资不过山海关”这一有关营商环境的讨论，并成为新年伊始的新热点。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改革加快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要振兴东北，不能少了民营经济，而发展民营经济，不能不优化营商环境。在“强政府”+“强市场”为主要特征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优化营商环境首先要进一步建立“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且投资不过山海关，更多的是对东北政商关系的恐惧。此外，廓清政商关系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相契合。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从毛振华事件看东北政商关系”这一主题展开讨论。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毛振华事件的症结是市场化不彻底下的地方政府企业化和企业政府化。营商环境恶化与否，不由政府说了算，由生产要素净流入是正数还是负数说了算。改善营商环境，应继续坚持市场导向的政府机构和职能改革，这个关口躲不过去的。

马健（上海鹿翔投资）：

毛振华事件反映了国内政商关系的不稳定性，导致民营企业缺乏安全感。

这一问题会带来两个结果：

- （1）影响民营企业投资实体的积极性；
- （2）民营企业投机心态加重。进而导致，民营企业只有轻资产、虚拟、投机，才能规避风险和活下来。

改善中国政商关系，要将观念和制度两者结合起来着手：

（1）改变政商地位不平等、以政压商的思想观念，不要总强调政府的管理职能，政府的职责和功能就是为企业、为企业家提供服务；

（2）推行制度硬约束，从根本上明晰法规和制度，并区分民营企业的经济问题和违法问题，多从经济制度上约束民营企业；

- (3) 保证针对民营企业制度的稳定性，优先保护企业经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 (4) 创造不同体制、国企民企都一视同仁，都能享受国民待遇的、公平的政商环境。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东北的问题还是政府解放思想不够，政府力量太大，阻碍了市场机制的作用。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把优化营商环境和改革促发展结合起来：

- (1) 简政放权，把政府越权、越位的手砍掉，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手强壮起来；
- (2) 开辟新的经济特区，探索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特区的路径、模式和政策激励机制，抓紧打造东北明珠；
- (3) 积极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尝试将产业集群和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东北经济体；
- (4) 树立标杆（建议将浙江或者深圳作为标杆），着力推进改革。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毛振华事件突出反映了产权保护的问题。

不能只靠政商关系，或者是一些特区或中央的大作为。还是要回到基础的问题，契约原则，大家照契约，照法律来遵守。这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毛振华事件说明：打造诚信政府是维持正常政商关系、营造健康营商环境的关键所在。

政商关系应该制度化、透明化。但是，一些地方的政商关系极不正常，主要表现为企业家与地方政府主管领导之间的私人关系，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来规范政商关系。以私人关系替代制度安排，必然导致政商关系的非稳定性以及利益重新分配的要求，导致地方政府的非诚信行为，其实质是人治之祸。这不仅会加大企业经营成本，侵害企业合法利益，更会破坏企业的稳定预期，制约企业的投资意愿。政商关系私人化的倾向也往往导致腐败现象出现概率大为增加，营商环境恶化，市场交易成本急剧上升，最终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1) 企业家与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一方面，企业家要对接国家战略，承担社会责任，为中国经济做贡献，尤其要做好社会责任，为社会提供合格的产品或服务，不主动行贿，不跑路，不跳楼。另一方面，政府要深化放管服改革，管好自己有形之手，敬畏并用好公权力，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总之建立一种亲清和谐关系。

(2) 毛振华事件应看成一个孤立的个案。如果解释成投资不过山海关、民营经济在东北没有存活的软环境等，这样会造成东北经济很坏的投资环境，会对整个东北三省的经济软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3) 发挥东北三省与南方几省结对的良好关系，如辽宁与江苏，发挥各自经济区位优势，规范政府投资审批行为，加强政策引导与战略规划。

陆慧琦（溧阳市政府）：

(1) 这首先是法治领域的问题。政府职能边界该怎么界定？对于政企间的协议在政策形势发生变化后当如何执行和看待？

(2) 政府应该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考虑长远和全局。不管哪个部门，服务企业要能放下身段当好“店小二”，而不是遇到难题绕着走，办份内事却总放不下“父母官”的架子。

(3) 在江苏，政府工作人员虽然服务能力水平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但是规矩意识、服务意识都已经是“潜意识”了。

所以，建议先立规矩，再谈态度，最后才是水平能力问题。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阳光透明是最好的防腐剂。很多政府的信息流程公开，是不是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不受监督的人治了？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毛振华事件三问：

(1) 国有企业的资产怎样三易其主，是决策问题还是经营管理问题？

(2) 民营企业的资产什么情况下可以被管委会轻易支配，是偶然事件还是环境问题？

(3) 各类监察的国家公权力怎样变成领导的私权力？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从某种程度讲当前政商关系中，企业已经到咬紧牙关撑的阶段，而政府某些部门觉得是企业吃撑了。这是当前民营企业最痛的事情。

孙军（淮海工学院）：

东北要减政、放权、国企改革。不违法的事情，中央到地方政府不许干预。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1) 借毛振华事件为契机，成立一个机构，在东北部分地区，或者整个东北地区，摸清这些有违诚信的事件，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进行一个纠偏行动，改善东北形象。

(2) 建立诚信档案，不仅对企业，更要对政府，对失信政府要真正的追责。

(3) 健全法律，加强法治，以法代政，政商二元关系变成政法商三元关系。

丁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东北的问题，是价值观的问题。长年的计划经济，长期的体制内工作，让大部分东北人都形成了严重的官本位思想。没有一场启蒙运动，恐怕很难从根本上解决东北的顽疾。

王相林（海峡银行）：

东北问题不仅是计划体制带来的。与长期形成的民众性格也有一定关系，且这种性格与契约社会是不相匹配的。

谭江涛（三峡大学）：

只需东北政府彻底简政放权即可。

张明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 南京）：

利益关系千丝万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利益均衡为边界。

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我认识的东北官员总体感觉都比较踏实苦干，其实做事不太容易。但是，现有政策让他们难以有更好的自主发挥空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边界比较模糊，有时候情感大于市场发挥作用。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营商环境不好说明市场经济发展不充分，政府有形之手伸得太长，资源没有得到有效配置，民营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张健（香港金融）：

毛振华在黑龙江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 40 年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答案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靠外部力量倒逼传统经济体制，政府行为和社会观念的市场化改革，包括限制国有垄断，鼓励民营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观念的改造。

今天东北遇到的难题，还得靠外部商业力量来倒逼，所以毛振华的投诉非常有意义。亲商富商观念对东北许多政府和百姓并不被广泛接受，但只有更开放，更市场化，更民营化的东

北才能让东北振兴。

苏 健（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毛振华事件的起因是管委会的一系列做法，这是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即地方政府为了攫取部门利益或个人利益，利用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瞒上欺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转型期，制度供给不足（政府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均缺乏）与制度权威匮乏（执法不严）。

解决思路在于限制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解决之道在于：

（1）一方面通过建立有效的司法制度以对地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范围作出明确的界定，使地方政府在法律范围内行事；

（2）严肃执法，维护法制权威，对地方政府的任何违法行为，执法必严。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东北营商环境，是计划经济基因遇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黑暗面（主要是一切讲关系的黑暗面），加上今天计划思维回潮和产业衰退加剧等因素造成的。以往中央试图用掺沙子的方法，派南方干部去改变面貌，结果发现要么搞独立王国，要么被同化。怎么破？只能是颠覆式创新的思路，搞大特区用根据地的方法来改变，中国唯一可能激发内在创造力的资源就是制度资源。

林学军（暨南大学）：

毛振华的事件，有两个事情。

（1）如何处理好政商关系：这实际上这是一个处理好市场与计划的关系，政府应该提供公共产品，为市场的运作提供一些基础的设施基础的条件；纠正市场的失灵，例如说，纠正市场负的外部性，纠正市场的信息不透明等等；维护市场公平公正的秩序，保证自由竞争，反对垄断。

（2）如何营造好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应该多用计划手段，经济的手段，法治的手段营造良好的环境，激发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积极性，不要用太多主观的行政命令，更不要干预企业的经营，对国有，私有企业公平对待，大小企业一律平等，政府应树立服务的观念，而非指挥者，这才是应有的政府作为。

苏 伟（苏丝股份）：

毛振华事件，我认为应属普遍现象，只不过是轻重问题。经济发达地区要好些，落后地区较为严重。如何改善政商关系？估计短期内很难。何不考虑在用人制度上进行改革？我认为可以选派一些优秀企业家（国企或民企均可，估计民企会更好）到政府任职。因为他们最了解实体企业，知道他们想什么盼什么。这样做的好处是：

- (1) 这群人不会贪腐；
- (2) 他们才是真正了解实体企业、懂得经济的人；
- (3) 他们在商界资源广泛便于当地招商引资；
- (4) 他们会珍惜机会真正替老百姓做些实事；
- (5) 他们的思维和工作方式会影响政府的一帮人。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 30 论坛华东组委会）：

毛振华事件不是东北专有，是全国性问题，表面看是政商关系、营商环境问题，实际是政企不分，是政绩考核体系、干部管理体制弊端的反映。

要防范此类事件，就要标本兼治：

- (1) 不忘初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让人民富起来，自由、幸福起来。
- (2) 下大狠心、真决心解决政府越位、政企不分、党政不分、政府铁饭碗、冗员过多、机构太多等问题，把市场能做的交给市场，专业机关部门能做的交给部门。
- (3) 壮大社会团体和行业组织，减少企业与政府直接冲突的可能和烈度。

改善东北的营商环境，最根本是不扰民、不添乱，给自由、给机遇、给时间，相信人民的创造力，削减预算支出部门，各级政府、各种部门主要负责人向全国、海外自由遴选，让央企不敢破坏经济秩序，地方国企尽快退出，对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从税收、技术、新金融、舆论方面给予扶持。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对政府诚信谈点想法：

- (1) 尽快建立一整套政府诚信的机制和措施，任何个人不能否决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约定，规范领导干部对前任承诺的悔约行为。
- (2) 对招商引资工作也要规范，涉及土地环境问题的重大项目决策必须集体决定。
- (3) 确实有改变需要时，除了集体决定外，还必须本着保护企业利益的原则，征得同意。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变相给予压力。
- (4) 建议由纪检监察部门亲自抓亲商行风建设工作，建立一整套问责制度。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毛振华敢于发声，对于东北经济环境的改善有益，符合党和政府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政策。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是否应该介入许多竞争性行业？党和政府可以领导一切，但不能包办一切，更不能忘记人民才是创业主力，企业家才是创新之源、创新的具体组织者。不管毛振华所说是否全部符合事实，鼓励企业家公开表达意见，有益于保护经济环境。改革开放需要呼呼万马奔腾，创业创新绝对不能万马齐喑。

改革开放是唯一办法。进行制度创新供给，重点保证资源流动，但绝不仅仅是东北内部的流动，而是形成国内、跨国同步流动：流动才会促进效率、改进东北经济环境与结构，才会促进发展，这才是事关东北前途的硬道理。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东北政商关系的解决至少有观念、环境和机制三个方面的困难要克服：

- （1）东北缺乏企业家是为社会创造财富，守法经营的企业家值得尊敬的观念；
- （2）东北社会环境仍然是围绕政府和国企为主体在运转，后计划经济大环境下，扶持市场经济环境殊为不易；
- （3）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去约束官员和各方的掠夺之手，去激励提供优质公共服务。

高传胜（南京大学）：

毛振华事件，起码反映了两个问题：

- （1）有些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不仅不知道自己的应有边界，甚至有时还有些任性。因此，在新时代仍然需要进行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功能与边界的社会大讨论，在此基础上凝聚共识、形成规矩，以防止政府越位、缺位和错位。
- （2）在现行国家治理体制下，民营企业、社会组织 and 民众都需要有畅通的发声通道，一方面反映他们的合理合法诉求，另一方面则通过社会舆论等巨大压力来监督与约束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类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政商关系处理得好坏关系到政府公信力的塑造，关系到政府能否很好地跨越“塔西佗陷阱”。政商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 （1）双方至少有一方缺乏基本的契约精神，唯利益驱使，故意破坏合作规则，甚至巧立名目，冲破法律规范；
- （2）双方或一方把合作当成自己隐形获取利益的渠道，一旦这个渠道被复杂因素影响，导致不畅，相应利益得不到满足，就会有“受损”方打破“利益”分配均衡，政商关系就会重构或崩溃；
- （3）权力过于任性，随意扩大市场管制的权力范围，或变异地扩大；
- （4）企业缺乏法律伦理，寻找政府依赖谋取不正当利益。

解决的路径：

- （1）增强法律意识，依法办事，用法律保障利益；
- （2）恪守双方利益分配或合作协议，勿以优势地位，巧取豪夺，突破共赢底线；
- （3）建立或畅通处理政商关系协调机制，引导和及时解决政商“纠纷”；

(4) 保护企业产权，分清企业家个人产权利益，科学界定各方产权利益主体。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发展东北，中央出台的政策一个接一个，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依然不见效果。原因是东北在地理上太封闭了：一边是荒无人烟的俄罗斯，一边是闭关锁国的朝鲜，对内又交通不便，当初改革开放的政策之风吹不到这个地方。

解决之道：

- (1) 在东北设 2-3 个自贸港，最大限度地开放；
- (2) 丰富基础设施，增加与关内交流；
- (3) 每个省拿出 2 个市，由发达省份代管。

黄端（福建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对于东北的投资环境，一直以来有不少说法。我认为毛振华事件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应该以此为契机，进行一次东北地区投资环境的大整治，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对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一是有利于促进政府和企业依法办事风气形成，这是确立东北地区良好投资环境的基础条件。依法办事说易行难，必须全力推进，应该明确任何机构、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例外。对目前存在的这类问题进行一次集中清理，并鼓励社会、媒体进行监督。

二是有利于促进多种所有制融合发展局面的形成，这是调整东北地区所有制结构的必由之路。东北地区发展不充分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所有制结构问题，如何吸引更多民营经济将是相当一段时间内必须坚持和努力的重点工作。既然是重点工作，建议应该由一把手重点抓、亲自抓，担当第一责任人，加快结构调整步伐。

三是有利于促进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形成，这是衡量东北地区市场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依法办事、多元市场主体，这是市场经济形成的重要条件。在此基础上，还必须使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能解决的应该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市场化水平不高是东北地区的一个短板，建议将分阶段市场化水平目标列入东北地区的考核指标。

如何看待地方主动挤出 GDP 水分

2018 年 01 月 15 日

编者按：科学健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于监测评价国家或地区经济总量、速度、结构、效益全貌以及各种重大比例关系和发展趋势意义重大，也是反映高质量发展统计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基础。地区经济数据存在水分，就无法反映地方真实客观的经济发展形势，从而传导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和民生措施的制定等各个方面。因此挤掉水分，也有利于更加准确判断各地发展态势，更好地因地施策。2018 年伊始，在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和不再唯 GDP 论英雄政策引导下，继辽宁、内蒙古之后，天津滨海新区也加入了大幅调减经济数据的队伍。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上表示，2018 年统计工作将紧紧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加强统计服务和数据分析解读，加快构建新时代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部分专家、学者、企业家们针对“如何看待地方主动挤出 GDP 水分”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圆桌讨论，从挤水分动机、GDP 高水分缘何存在、挤出 GDP 水分的影响和后果及今后如何防止 GDP 高水分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一、各地纷纷挤水分的背景和动机是什么？

陈 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挤 GDP 水分，我觉得：

（1）代表中央对新发展理念的一个引导，过去搞“两高一剩”的粗放式发展，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搞有水分的虚假数字，更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2）代表中央对干部要求和考核的引导，天津、辽宁等地区都是在主要领导出现腐败案件之后调减主要经济指标的，说明领导干部的腐败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问题上，“数字出官、官出数字”这种现象是中央认为的重要腐败现象。

关于动机问题，有两种观点：

（1）中央发展理念和意图，出现干部经济腐败、数字腐败的地区出现了主动挤水分的情况；

（2）挤 GDP 水分是出于地方现阶段和未来考核的原因，具有内生动力去做的，以后还会有一些地区主动挤出水分。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近半个月，内蒙古和天津陆续被曝财政收入和 GDP 挤水分，其背景主要有三个：

（1）统计改革使地方 GDP 造假不可持续。继 2016 年省以下统计实施垂直体制改革后，2017 年 6 月 26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了《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这将避免各市 GDP 加起来大于全省 GDP，以及各省 GDP 加起来大于全国 GDP 等“数字打架”问题。在具体时间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李晓超的介绍，将利用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契机，2019 年实施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也即，在 GDP 注水较多的地区，如果不立刻、果断对其纠偏，在明年的经济普查中被发现的概率将是板上钉钉。

（2）强化对统计造假问题的问责处理。同样是 2017 年 6 月 26 日的这次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了《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要对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发现、调查、行政处罚、案件移送提出程序性要求，明确对领导人员、统计机构及有关部门责任人员、统计调查对象、统计检查对象等违纪违法问题的认定。也即，如果在 GDP 注水较多的地区，如果不立刻、果断对其纠偏，在明年的经济普查中官员数据经济被发现的代价高昂。

（3）新时代统计数据继续造假不符合地方发展利益。纵观党的 19 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不难发现，中国宏观经济核心已经由唯 GDP 论英雄，转为淡化 GDP 增速目标，推动高质量增长和补民生短板。这一发展目标的转向，意味着我国欠发达地区继续统计数据造假无益而有害。因为继续吹大 GDP 数据将减少该地区获得的中央转移支付，减少欠发达地区的可用财力和民生保障能力。同样，继续吹大 GDP 数据对发达地区也没有更多的好处。

观察目前的辽宁省、天津市和内蒙古 GDP 挤水分，有两个细节应该予以关注：

（1）三个地方挤水分的理由不同。其中，内蒙古和辽宁明确承认是数据造假，而天津说是统计方法调整“注册改在地”。也即是，落后地方承认造假，发达地区对统计方法进行调整。

（2）GDP 注水 / 挤水分主要在工业领域。各地农业加总和全国数据基本相同，服务业本地供给导致问题也不严重。从以上可推论，落后地区 GDP 注水，主要是数字出官的政绩驱动，是数据造假。而发达地区 GDP 注水是统计制度标准造成，并非数据造假。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部分地方政府 GDP 挤水分，既有宏观背景，又有具体契机：宏观背景在于，高质量发展成为时代最强音，数据客观性与科学性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具体契机在于，地方政府的人事变动。但现阶段不可能有大规模挤水分现象，尽管有宏观背景，但并无具体契机。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

此次地方政府公开挤 GDP 水分，有两个大的背景：

（1）各级官员深入学习新发展理念的成果；

（2）GDP 核算体制下管一级改革的压力导致。基于这两大背景，可以预期未来一两年

内，各个地方政府将会普遍地挤出 GDP 等经济指标的水分。过去几年媒体公开报道过的各省 GDP 加总大大超过国家 GDP 的现象也将消失。总体上看，地方官员勇于担当，挤出各类经济指标的水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应当给予肯定。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大数据时代，大数据必须依托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否则大数据就没有意义；地方政府从原来的拼政绩转变到保安全上来，也就是高数量发展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基础。

邵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调整统计数据，如果趋于真实，应予正面评价。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1）挤压水分是我们开始实事求是对待曾经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值得肯定。

（2）挤水分是为了追求高质量发展，要和高质量发展，高速发展有机结合，高质量要以一定的速度为基础，挤水分后还是要寻求一定程度上真实的速度。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以前的造假，既有政绩考核体制影响，也有统计体系和统计技术以及数据公开发布机制上的缺陷。现在短期掀起的“挤水分”运动，政治上，政治生态发生变化；经济上，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统计上，核算方法发生改变，盖子迟早要被揭开，不如自己揭。

二. 地方 GDP 为什么有那么大水分？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一个数字虚的地区，同时也是一个发展模式粗犷的地区。官员如果愿意造假、敢于造假，一般也愿意举债搞面子工程、搞投资拉动，这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GDP 高水分这个前提或者说判断，要限定在各省各地上报的数据，全国数据是经过国家统一从各个角度扣减平滑处理的，还是有公信力的。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水分？

要分两块看：

(1) 落后地方的数据造假内生驱动；

(2) 过去工业化过程中，发达地区大量搞工业园区、开发开放区等，有很多优惠政策，导致企业注册地和生产地不一致，产生 GDP 重复统计。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为什么会有如此高的水分？问题简单一些：因为 GDP 与政绩和晋升挂钩的制度设计。GDP 信息内涵有个体传输者的利益，一定会按照有利于传输者的方向扭曲。内涵的利益越大，扭曲程度越高。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之所以出现水分数据，一方面在于晋升机制的导向问题，另一方面在于具体领导的职业道德出现偏差。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

分析 GDP 水分产生及当前挤水分等现象的体制原因，实际上也提示我们：在中国体制条件下，需要密切关注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将要面临的政绩考核困境。在中国历史上，对地方官员长期实施考成制，考核地方官的政绩。1980 年代中期，若干省份逐步发展出对下级政府的以 GDP 为核心指标的指标化考核制度。目前，对下级政府、政府部门的指标化考核已是全覆盖，由此也形成体系化的政绩考核制度。在这种体系化政绩考核制度的支撑下，地方政府积极追求经济发展，乃至有人说中国地方政府已公司化。客观上要承认，这种政绩考核制度，或者说新形势的数目字管理方式，是中国 40 年来快速增长的重要体制基础。

但从目前已揭示出的，若干省级政府已公开承认存在严重的 GDP 注水现象来看：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如何设计？由谁来考核？考核是否客观公正？在中央地方复杂博弈的背景下，并不容易解决。未来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需要激发地方政府，各级官员的发展积极性。而要激发这种积极性，需要客观、公正、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十九大报告以及 2017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均提出了要建立新的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但新的制度如何设计，能否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能否科学、客观、公正的运行，还有待观察。

国家统计局在十几年前就希望获取省级 GDP 的核算权，但在地方政府的反对下一直没有成功。2017 年解决了这一问题。十九大报告中，首次将统计部门视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统计部门获得向下核算一级 GDP 的体制下，统计部门实质上获取了考核下级政府的权力，这必然会面临下级政府公关的压力。如果若干经济指标影响职位晋升的话，统计部门能够排除压力，科学核算出若干发展指标吗？设计出的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合理吗？这两个问题如何解决，都有待观察。要知道，过去的政绩考核以 GDP 为核心，实质上是单目标考核体系，尚且存在诸多问题。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必然是多指标考核体系，且很

多指标是需要核算出来而非直接统计出来，其复杂程度将是指数化增长。要解决当前政绩考核体系存在的弊端，更是困难。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1）各地拼政绩，地方要面子。

（2）政府体制原因，比如税务部门给企业定的税负担率，意思就是不允许有亏损企业，否则就严查，这样造成即使企业亏损了，只要未到破产的地步，一般都还是做盈利数据。

（3）企业也有动机，银行与社会各界也依据企业的利润报表来看决定授信额度；最关键的一点，上市公司造假处罚力度太轻，企业上市套利的心态丛生，审核不严，造假水分太大。

数据造假引发的后遗症很多：

（1）高层不懂基层的真实情况，就会产生实体经济咬紧牙关在撑，而某些部门还以为实体企业是吃撑了；

（2）专家学者的判断依据是数据，本身数据来源就不实，给出的对策当然也不能产生效果；

（3）上市公司造假盛行，套利简单，造成资金投资脱实向虚现象严重。

邵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数据不实，主要问题是第一次数据采集不实。基层政府受考核压力直接要求企业报假数据，手法众多。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统计数据质量屡遭诟病的根本问题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不能怪统计部门和统计人员不坚持真理，每个人都要服从领导，这是官本位决定的。

林学军（暨南大学）：

GDP 造假，主要是因为政绩导向，造成了弄虚作假的形式和作风。

三．挤水分有何影响？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这种 GDP 挤水分会不会在中国其他省市大面积蔓延？后续可能还有被审计署点名数据有问题的云南、湖南、吉林、重庆等省市对 GDP 挤水分，但不会大面积蔓延。因为，《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改革方案》出台的背景是地方 GDP 加总和全国 GDP 出入太大。而这个差距，

在 2016 年大概不到 3 万亿。考虑合理的统计差异，目前天津下调了 3348 亿，内蒙古挤掉工业 GDP2900 亿，剩下的如果再爆三四个省市的 GDP 下调，数据就基本到位。

GDP 挤水分带来的多指标考核代替单目标考核，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也是很现实的问题。但从防范风险角度，我更关注另两个后果：

(1) 为了实现全面小康，或基本现代化等目标，落后地方可能重提投资驱动发展。

(2) 可能会形成勒紧裤腰过日子的经济悲观预期论。挤水分不能一挤了事，这些危机后果都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注意的问题。当然，GDP 挤水分也不是只有风险，同样也有好处。比如，GDP 造假竞赛导致“每年 GDP 公布之后，市场上大面积的我拖了后腿的自嘲”声，这恰恰反映过去注了水的高速增长的 GDP 和民生改善的不匹配，使得老百姓对政府公信力的质疑声可以说是“人声鼎沸”。挤出水分后，预期由经济数据无法带来相应民生改善的塔西佗陷阱危机将会大为缓解。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GDP 和地方政府债一样，一旦造假或隐瞒，在挂钩体制下就会具有累积性；但债务是真实的，而 GDP 数字是含有较大幅度的水分，进而导致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比例和风险明显增大许多。但现阶段，大面积挤水分的可能性并不高。

此外，挤掉水分后，政府债裸泳了；地方资产负债大幅增加。从会计恒等式看，等于说资产和所有者权益大幅下降了；债务是个存量概念，而 GDP 是个流量概念，这反映了经济体的政府杠杠率上升。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挤水分，只要做好期限错配，对地方影响可能大些，但是对国家影响甚微。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

在新的体制下，所有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会出现大面积挤水分的现象，但各省挤水分，对于全国 GDP 等数字的影响不大。

四．如何防止 GDP 高水份？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建议以后国家统计局在整体核算国家 GDP 数据之后，同时也核算公布各省 GDP 数据，并且公布与各省的数据差异。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提高数据科学性与客观性，建议以制度保障为根本，建立虚假数据终身责任制，并由相对独立的第三方来实施。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

（1）统计部门要勇于担当，切实履行好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角色。

（2）将新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的细节，及如何从基础数据核算出各地方政府经济指标结果的过程细节，都公开透明。在公开透明的压力之下，各级地方政府干扰统计核算的压力将会减弱，统计部门也会更高质量地进行经济核算和政绩考核。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国外对于造假者付出了代价是非常沉重的，这应该是发展趋势。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随着时间推移，制度的不断完善，造假将会越来越少。这需要一个过程。

（1）体制适当调整，税务部门不能再依据负担率来做查税预警，而应该依据实际情况；

（2）银行以及社会的评价信用机构要严格认真遵照审核，对于评价机构严加管制，出问题要担当责任；

（3）规范股市，对于上市公司造假不仅仅给予处罚，要按照套利金额没收。

邵 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解决统计问题，要将数字与政绩脱钩。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挤水分不是目的，是一个手段，需要避免选择性挤水分，个别地方挤水分，个别时期挤水分，短期运动式挤水分，而没有长效避免和追责机制。

孙国民（南京大学）：

建议重新审视重大战略的实现，在每一个重大战略收官阶段，要充分开展一次“巩固、充实、提高和补短板”工作，巩固发展基础，破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发展魔咒。

（1）挤出 GDP、产值（包括销售收入）以及利润的水分，便于决策层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便于决策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2）强化统计的依法性。三是统计数据列入年度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一票否决项目。

孙映祥（南京机场）：

个人感觉，水分有二种：

- （1）现行指标体系下收集汇总的数据与经济运行真实情况不一致；
- （2）主观而为。解决前者需要构建全社会基础帐薄体系，调整统计指标。后者则是解决诚信缺失，永远在路上。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只要让几个挤水分地方政府公布怎么挤，挤了那些，看一下其他地方存不存在这些这些问题，并可以制定针对性制度，否则不解决任何问题。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抓数据质量，最关键的要从各级党政领导抓起。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希望以此为契机，大兴“实事求是”之风：

- （1）依法科学压实所有统计数据并及时全面准确公开。
- （2）真正改变政绩考核体系，将高质量发展、民生指标、人民满意度等指标的权重提到决定性的程度。

何军（南京信息中心）：

将各类政府数据的统计报送发布行为列入政务诚信体系建设内容，实行信用承诺制和失信惩戒制。

林学军（暨南大学）：

- （1）改变以 GDP 论英雄的单独考核方法，考核应该多种形式，多个角度，多个指标，多听民意，看基层民众是否真正得到实惠。
- （2）加强统计的立法和执法，对于那些敢于浮夸造假的地方官员进行处罚。
- （3）改进 GDP 的统计方法，首先，可以这个基层直接上报，其次，用多种核算方式来进行矫正，例如 GDP 应该等于，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购买，加上净出口，最后，可用经济调查的方法来进行矫正，这样避免，GDP 的统计出现一些偏差。

人口出生率降低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

2018 年 01 月 22 日

编者按：人口增长与经济的关系，长期以来便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二者的关系存在差异化认识，但总体上多数学者认为人口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变量。从我国发展实践看，不同的发展阶段中国实施了差异的人口政策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如 20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有计划地控制人口以加快经济发展；2013 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决定适时出台完善生育政策调整方案，并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全面开放二孩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等问题。

2017 年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根据此前有关方面的判断，全面两孩的政策效果体现有滞后性，应该在 2017 年之后逐步显现，因此 2017 年出生人口数量会明显高于 2016 年。但 2018 年 1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共出生人口 1723 万人，比 2016 年减少 63 万人；人口出生率从 2016 年的 12.95‰ 下降到 2017 年的 12.43‰；同时老龄化程度继续加大，60 岁以上及 65 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都有明显上升。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人口出生率降低对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次小范围的圆桌讨论，从人口出生数量减少原因、对未来经济可能的影响及相关对策等方面进行深入讨论。

一、全面二孩政策为何无法有效提高人口出生率？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

个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等；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并没有预想的大。

张炳（南京大学）：

很多国家生孩子都免一部分税，中国只是放开二孩，制度没跟上。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政策只是放宽了生育限制，但并未降低生育成本，未能改善生育预期，导致潜在的生育意愿与现实的生育约束矛盾。

从当前三个主力生育群体看：70后生理上过了黄金生育期；80后主要受生育和养育以及就业养老等成本所限；90后可能在观念意识上有了变化，这也是最令人担心的。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近些出生率相对降低，但总人口仍在增长，只是增速降低。而这样的良好态势的形成恰恰是被国际诟病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及众多城市60、70、80后严格执行政策、作出巨大牺牲的结果，也才有了并不太大的鼓励二孩生育的政策空间。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经济发展导致人口出生率降低。当经济发展过了一个拐点后，刺激政策估计就没用了。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根据1月18日统计局的相关数据，2017年我国二孩出生占比比上年提高5个百分点，但仍低于预期；一孩出生占比比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可见，我国人口出生率低，主要低在一孩出生率上。

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两三年，我国第二次人口高峰期育龄妇女将全部退出育龄期，中国提振二孩生育率的机会已失。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即使不实行计划生育，人类最终也会走向晚育少子。因为一旦一个国家进入城市化进程，各种非药物的避孕药就渗入每个家庭：

- （1）教育，特别是女性教育；
- （2）女性就业；
- （3）城市生活成本。

中国的生育减少带来的最大问题，其实并非劳动力资源短缺。重要的是生育一旦进入萎缩通道，人口就会断崖式下跌，难以逆转。按中国目前的下跌趋势，人口不可能最终稳定在一个所谓的理想规模上，而是会一路下跌。

王宇（南京大学）：

人口的变动一旦形成趋势是很难通过国家政策在短期内扭转的。现在，要提高生育率，估计比当年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更难。

生育率会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升不断下降。我国当前的核心问题是未富先老，经济发展水平还未到富裕的时候，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增长出现了拐点。

刘学军（国家发改委改革内参）：

人类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尤其是经济高速增长、交通高速发达后，生育率就会下降到一个相对低的水平。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现象，也是无法阻挡的趋势。

二．人口出生率降低对未来经济社会的影响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人口规模、结构、密度等，对产业的发展有直接的决定性作用。从供给面看，人口的数量决定人口红利，人口的质量决定人才红利。从汗水经济转向智慧经济，取决于劳动力转变为人力资本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口出生率下降为提高人口质量提供了契机。从需求面看，一定的人口基数是潜在市场容量的基础，也是产业取得国内规模经济的条件和前提。

中国经济之所以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与中国人口基数大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始终保持一定的人口基数，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盛文军（人行杭州）：

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人口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根本，对经济增长有影响。鉴于目前中国经济已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同时人口增长有停滞或下降趋势，在这两大因素制约下，全要素生产率呈下降趋势必不可免。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低生育率对经济的影响，个人认为利大于害。

（1）利在于：①为提高国民素质与人力资本质量提供机会。②符合智能化、自动化对人力替代，有利于新技术推广与普及。③是发达经济体的共通常态，是个体化、自我化的必然。④引导需求结构向高端化、服务化发展。⑤从长远看，也是中国人口的调结构，再经过三代人左右的时间，实现人口稳定在十亿左右。

（2）不利在于：①集中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担忧上，这一观点经不起检验。②只有多子化才能养老的担忧也经不起检验。技术进步与模式创新，会极大替代人力养老。③老人社会活力有问题，也有解决的可能。那就是安排好退出机制，为青年人提供空间与舞台。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1）人口出生总量下降，意味着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在未来会呈现下降趋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要素的短缺将制约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

（2）居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会受到人口结构的重大影响，老龄化可能制约总需求的

扩张，从而使中国经济面临总需求不足的长期制约。

(3) 年轻劳动力是社会创新的主要驱动力，也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年轻劳动力的短缺会导致社会整体创新能力下降。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中国的最大特征是人口基数大，人口红利快速消失。2017 年底 60 岁以上的老人数量超过了 2.3 亿，2020 年之后中国老龄化的速度还将持续加快，巨大的社养老负担将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

丁 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对企业家精神的抑制是毁灭性的。从日本的教训来看：

(1) 大部分企业里，中老年人的比重都在不断提升，年轻人很难有出头的机会。尤其在适合创业的 30 岁年龄段，很难在重要的岗位得到历练。

(2) 人口下降，国内市场萎缩，导致初创企业普遍缺乏投资和扩张的愿望，不愿做大。

(3) 老龄化导致整个社会心态消极，对新生事物，新兴产业缺乏兴趣。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

老龄化是个结构性问题，低生育率加速老龄化，深度老龄化凸显养老及劳动力短缺问题。抚养人口和劳动人口之间的平衡面临急速的挑战。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 2050 年前后达到峰值，然后随着人口总量的下降进入平缓期。老龄化的挑战主要在 2050 年之前的深度老龄化阶段。

(1) 人作为人力的角度看，人口红利已经成为过去式，人口负利及伴随而来的抚养人口激增，凸显劳动力短缺，用工成本上升，成本优势弱化会影响国际竞争力。

(2) 人作为消费人口的角度看，老龄化转折点前后会出现消费总量的断崖式下滑，对经济冲击明显。

苏 健（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和人口不断老化，将导致劳动力绝对与相对的减少、劳动力成本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储蓄率下降等问题，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沈晓杰（报人）：

分析人口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应该冲破传统人口红利思维的套路。在未来十多年就将出现 AI 和相对长生不老的时代，那种靠大规模低质量人口增长来推动经济的发展的思维，可画上句号。

张少军（厦门大学）：

- （1）人口数量是规模经济的基础，是中国以大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利器。
- （2）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属于供给侧，从需求侧来说年轻人口比老年人口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可能更大。
- （3）人多不是问题，关键是组织人进行生产和生活的方式，故应该改变对人口多的偏见。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 （1）大城市自然增长为负，主要为机械增长，可能导致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区域发展凋敝。
- （2）以年轻劳动力为主的传统产业的转移与调整，如纺织、服装、建筑、园林等传统产业。
- （3）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经济的市场前景依然很广阔，健康、医疗、养老、社区和终身教育产业向更广更深发展。

包 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 （1）随着我国的产业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和创新密集型升级，低人口增长很可能并不会带来未来产值增速的下降，反而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
- （2）低人口增速可能确实会在一些行业，特别是养老、医疗和家政服务业造成局部的劳动力缺口，但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补贴和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的待遇和职业技能，和鼓励企业研究人工智能以及机器人技术在其中的应用等方式未雨绸缪，化解潜在的供给不足的问题。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低出生率对应的是人口老龄化，低出生率对经济的影响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 （1）劳动力资源上。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社会负担率上升，劳动力会发生短缺，制造业用工成本会进一步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也将受拖累。
- （2）对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生产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增加，产业朝着服务化结构的调整和转型将加快。
- （3）城市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将进一步加深，将直接给目前正在加速推进的城镇化带来反思。总之，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楼稼平（宁波布衣）：

（1）2017年的人口出生数量“减少”，是比上年、比预计“少生”，但绝对数仍然是增加的，所以，至少对未来一二年间经济发展的影响，应该不大。

（2）随着二孩政策的持续，以及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出生人口与老龄人口都会快速增长，可预见在今后10年内，以前独生子女潮中出生的35-40岁年龄段的上下，极可能出现两头都大的年龄结构分布状态，这意味着这个年龄段就像一根扁担，一头是高位老年抚养比，另一头是高位少儿抚养比。这对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将构成极大的挑战。

（3）这种两头都大的人口年龄结构，最终会扭转人口老龄化趋势，这是二孩政策最为鼓舞人心之处，所以应当坚持不懈。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将导致农村、小城镇人口的减少，部分城镇和农村区域凋零，这就要求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时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在构建通达交通体系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布局时，应当考虑到中长期我国人口不足以支撑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城镇化，现在就要更加注意城镇集中和集聚，振兴乡村不是均衡用力，而是要将部分地区较早定位于生态保护区，减少开发，将生产力布局与人口集聚趋势相协调。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1）劳动力供给不足，导致中国工资水平进一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全球竞争力大幅下降，劳动密集型产业批量退出；

（2）抚养比大幅增加，导致中国未来社保基金不足，政府税收可能会加重，导致未来消费水平和创业创新动力不足。

三．对策与建议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

短期内经济能力、年龄、生育偏好等因素不太容易改变情况下，国家应该在真正解决其后顾之忧方面多做些工作，比如托儿所，小孩上学等。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在取消一孩政策限制的同时，更应降低生育成本，改善生育预期，让正常的生育观念逐步回归。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教育资源配置，就业和失业保障，降低家庭税负，健全养老保障，住房改革等，需要系统推进。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出生率下降背景下，推进城市化对经济持续增长以及应对老龄化更加重要，且必须要让新生代农民工能在城市定居。

盛文军（人行杭州）：

（1）研究加快推进实施开放政策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对内、对民资的开放要与对外开放一视同仁，同时文教体卫、重要能源资源性行业及金融也要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

（2）加快市场开放，打破区域间市场割裂和地方保护主义，促进各类要素资源在全国自由流动。

（3）为各类型企业和市场主体提供高质量服务，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把“最多跑一次”真正落到实处。

（4）择机出台奖励人口出生政策，完善初等、高等及职业教育体系，为形成高质量人力资本奠定坚实基础。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放弃数量目标导向型政策，由公民自主决定生育数量：①人口政策应有代际思维观，生育主力已经推进到95后，00后也即将登场，这一群体生育观的城乡差异急剧收敛，生育偏好大幅下降；②限制与鼓励都会导致人口波动过大，让生育权回归家庭，会形成自然态的生育曲线，长期看更好；③工艺与技术进步，将大幅减少生产对人力的依赖，智能化与自动化将会填补人口下降的空白。

（2）转向质量提升目标导向型政策。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取决于国民质量的高质量，人口政策应该向此聚焦。另外，为了保持人口不被扭曲与干预的自然态，应继续强化性别筛选，防止扭曲。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1）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政策，提高社会生育意愿；

（2）引进国际人才，注意吸收年轻的高素质国际劳动力；

（3）提高产业发展智能化水平，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

（4）发展老龄化社会所必须的各种服务业，从供给侧优化未来老龄化社会的服务供给水平。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

（1）降低生养成本，鼓励生育；

(2) 以自动化、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手段,实现机器人代人,让人回归到机器不可替代的创造性领域中去;

(3) 做好老龄化相关的医疗健康、养老康复等社会性服务环节。

苏 健 (南京市社会科学院):

(1) 扩大教育投入规模、提高教育投入水平,变人口红利为人力资本红利。

(2) 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提升劳动生产率,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

(3) 实施“积极老龄化”政策,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

(4) 全面放开生育,同时完善配套政策。除了对生育进行补贴外,更要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对生育家庭施行福利政策。

蒋青云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1)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适应当前的人口结构,可能更现实;

(2) 加强教育投资,提升人力资本,更有长期之功。

崔卫东 (蓝鲸咨询):

(1) 放开二孩以上的生育政策。

(2) 建立普惠制、具有质量标准、公办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3) 增加生产妇女的生育保险支付和补贴水平。

(4) 符合人才政策标准的产妇生产期间,继续享受人才工作期间的待遇;给予符合人才政策标准的育男3个月带薪假(政府补贴)加6个月在家上班补贴。

(5) 改善劳动报酬结构特别是民企劳动报酬结构,增加劳动人口收入,减免大龄劳动者税负,提高劳动人口素质,扩大劳动年龄人口基数,改进劳动年龄人口统计办法,促进劳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孙国民 (南京大学):

(1) 逐渐取消和淡化晚婚晚育的婚恋育儿观,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当将生育年龄提前。

(2) 增加幼儿园、中小学等基本义务教育及学前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教师供给,努力普及高标准的15-18年的教育(含3年幼儿教育)。

(3) 精准制定鼓励人口生产以及区域性人口导入的相关政策。

赵正宇 (南京市园林局):

(1) 充分重视农村建设;

- (2) 全面提高人口素质；
- (3) 在制度建设上进一步制定和放宽在医疗、养老、社区方面的有效政策。

邵 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社会管理不应该有生育干预政策。

陈 东（南京大学）：

立刻放开生育，以 5 年为期（5 年不会造成人口过快增长，可控，同时也可以有一定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观察）进行统计，为决策层提供精确的数据支撑。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对于中国人口减少，民众生育率降低这种情况不必太过担心。政府要做的事情就是遵从人口下降的经济规律，在政府能做的事情有所作为就可以了，例如为老龄化提供较完善的保障措施；为提高人口素质完善教育、医疗措施；为鼓励人们创新，完善税收等措施。

高传胜（南京大学）：

要走向富、强的今日中国，需要结合国内外竞争态势，重新审视当前涉及人的生、养、育和用等诸多环节的政策。

(1) 在生育方面，如果还不能全面放开生育政策，可以对生育政策作进一步的结构优化，让综合条件比较好的中等收入家庭可以生育三胎甚至四胎。

(2) 在抚养方面，如何将全民健康管理的政策真正实施起来并发挥效果则是头等大事。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业发展受到太多的体制机制阻碍，亟待解决。

(3) 在教育方面，将培养具有独立人格和创新精神的社会人、理性人作为教育要旨。改革现行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与方法，以适应现代社会对具有创造力、充满好奇心并能自我引导的终身学习者的需求。

(4) 在用人方面，切实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将“放管服”改革落到实处，让人有发挥其潜能与创造力的宽松便捷有利的宏观环境，则是积极应对中国人口社会风险、实现人才强国战略、培育创新驱动优势的最后一公里工程。

张 宸（南京大学 / 江苏电信）：

经济政策奖励生育：

(1) 对二孩家庭提供实质有效的经济补贴，如提供奶粉、医疗等补贴，并向二孩家庭定向减收个人所得税。

(2) 房价居高不下，特别是大城市房价高涨，是降低家庭的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只有增加土地供给，降低家庭购房的实际支出，才能降低生儿育女的成本，提高生育意愿。

思想意识形态调整：

(1) 纠正过去把人当负担的片面错误意识，形成人既是消费者更是生产者的科学人口观，关键是做好创新驱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 教育奢侈化是大城市家庭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坚决纠正教育奢侈化非理性消费的风气。

林学军（暨南大学）：

(1) 鼓励生育，政府就要给予生育补贴，降低个人所得税，或按家庭收入计所得税。

(2) 增加幼儿园和幼儿教师，解决托幼难，入学难。

(3) 加强女性的职业保护，对孕期、哺乳期女性给予补贴，对女性再就业或家庭主妇给予帮助和关怀。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未来，应将增加出生率的着力点放到努力提高一孩出生率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立即废除未婚先孕的限制制度。在全社会要营造未婚同居和未婚先孕的包容氛围。当然，从增加二孩出生率的出发点，根据人口结构与人口数量的变化，及时将某些发达地区的二孩政策由“放开”转为“鼓励”也是需要提上正式议事日程。

世界各个陷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也并没有对低生育率听之任之，而是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一些措施去应对。比如，日本政府在2015年10月27日公布的《厚生劳动白皮书》中表示，应对少子化问题是当务之急。再比如，德国政府的政策是引进移民。而在台湾地区，台北市政府在2011年推出“祝你好孕”催生政策，内容包括每胎2万元新台币的生育奖励，5岁以下每个月2500元的育儿津贴，以及学费补助、课后看护和孕前体检，等等。

楼稼平（宁波布衣）：

(1) 为扁担段的人口分担抚养负荷；

(2) 增强扁担的承受能力，比如提高这个年龄段的人的就业收入，尤其要为这个年龄段的人创业、持业提供宽松的经营环境。只有当这个年龄段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是所有就业人口中最高的，我们才能轻松地越过这个坎。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人口政策调整的核心，就是放开生育，自主生育，政策的重点是让想生孩子的家庭敢生。目前看来，政策的发力点有：

- (1) 合法婚龄再提前 2 岁；
- (2) 延长女性产假，延长到 6 个月；
- (3) 对男性放产假，可以 3 个月，并且可以选择休假时间；
- (4) 重点解决 0.5 到 3 周岁之间的幼托问题。

王 宇（南京大学）：

当前，长期的政策当然是应该鼓励生育，想方设法提高城市居民的生育意愿，这里的核心就在于降低养育成本，尤其是教育成本。但是，现在看来基本上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中央提出高质量的增长，其实高质量的人才为核心。当前，一方面固然要提高人口的生育意愿来解决增量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解决好当前存量的质量提升问题，加大教育和培训投入，加快技术水平的提升，才能在人口再次恢复增长的真空期，以生产效率的提升来对冲人口减低对经济的负面冲击，这个可能才是政府亟需要做的事情。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1) 转变思路重视人口质量。人口数量会对经济造成影响，而人口质量则会促进经济发展。

(2) 进一步提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技术水平，将劳动密集型转变成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3) 注重社会福利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福利体系应当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幼儿抚育补贴、教育补贴，还应该包括大幅提高 80 后独生子女父母的补贴。只有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减轻负担，适育年龄的人群才会增加生育意愿。

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解读刘鹤达沃斯演讲

2018年01月25日

编者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同时也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经济全球化影响深化的背景下，中国始终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政策在推动中国经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势必深刻影响着世界的发展。因此，中国的经济政策走向也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2018年1月23日至26日，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主题为“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北京时间1月24日18时左右，中财办主任刘鹤出席论坛并就“中国经济政策”发表演讲。1月24日晚，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第一时间邀请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刘鹤达沃斯演讲”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每位专家、学者就演讲传递的积极信号和个人关心的话题等进行了深入解读与展望。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刘鹤演讲，把过去4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为改革开放，指出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向世界说明中国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事实和决心。尤其是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到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没有过于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三个世界担心的突出矛盾上，强调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和努力：

- （1）在微观基础上，强调要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
- （2）在市场秩序上，提出鼓励竞争、反对垄断；

（3）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另外，也向世界宣布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这些都是落实十九大报告的具体行动。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刘鹤的演讲，把金融风险提得比较重，明确提到“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刚性兑付”、“隐性担保”等问题，十九大之后这些提法与以前官方提法有一些细微差别。以前最常见的提法是“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包括官方评价国外评价机构降低中国评级的答复，都是基于这一基础。

十九大之后包括杨伟民的解读以及这次刘鹤的讲话，都是强调归纳为政府隐性债务，没有再沿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的提法。这说明现在更加直面高杠杆的来源问题。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最大的亮点是两句话：

（1）中国 2016 年全要素生产率处于由降转升的拐点，有利于引导市场在经济增长由负转正是否表明了中国经济正在良好复苏问题上达成共识。

（2）明确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总量增长要让位于结构优化，解决了民间有关增长和结构重要性排序的争论。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对改革开放的论述，再次表明了扩大开放和深化改革的必然性及重大意义，值得肯定和期待：

（1）既有的发展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个群体意义重大。

（2）只有坚持并深化改革开放，才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只有坚持并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只要坚持扩大开放，国内深化改革的市场化大方向就不会逆转。国内依靠并做强做大中等收入群体，国外依托“一带一路”和多边体制打造命运共同体，新型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可期。

孙映祥（南京机场）：

实现高质量增长必须加快改革开放。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我们将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但是，无论国际市场环境怎么变幻，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这个 4 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更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稳定器。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刘鹤的演讲，向外界传递的信息为，中国怎么看待世界，以及中国怎么认识自己，表达的是中国决策层对当前国内外情况的认识论。总体基调对外部环境乐观，对内部挑战清醒。在提出中国式认识论的基础上，给出了中国式的方法论。即，一个总目标，一条主线，三大攻坚，向外方释放了未来几年中国市场的机遇点。三大攻坚战，重点在第一个，特别是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问题。

某种程度上，刘鹤的演讲，是要提振外方信心，为中国招商引资，聚力未来攻坚战。

朱建平（建行江苏省分行）：

中国会继续推进对外开放，包括金融业的开放，船舶、轨道交通、装备制造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进口力度。进一步降低外资门槛、给予国民待遇、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刘鹤的演讲打消了一大部分人对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顾虑。增速高低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不折腾、不犯大错误。刘鹤的演讲也传递了浓烈的信息，让我听了觉得很振奋。

赵顺群（丹阳市经信发改委）：

“一个总要求”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现在的解读都是重点放在高速和高质量的对比上，其实增长和发展是有不同内涵的两个概念。高质量发展应该是伴随着高质量增长的社会变化和进步。所以，在政策上不仅有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政策等，还会有新的改革政策、社会政策等。

他在问答部分特别提及，中国将利用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机会，推出新的、力度更大的改革开放举措。“至于是什么，中央政府正在研究。但可以非常负责地向大家报告，一些政策可能超出国际社会预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过去五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从约 1 亿人减少到 3000 万左右，这意味着已经脱贫 7000 万左右，平均每年脱贫 1400 万左右。而今年脱贫目标只有 1000 万，一方面是按计划三年完成脱贫任务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从脱贫速度的减缓和年脱贫人口总量的相对减少，说明脱贫工作已经进入更困难更艰巨的阶段，需要解决的都是更加难啃的硬骨头。这对各地财力物力也提出了巨大挑战。

脱贫攻坚战的顺利完成，必须也只能建立在国民经济保持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之上。希望未来三年，我国经济能够挑起这个重担。

高传胜（南京大学）：

刘鹤的演讲主要有三个方面内容：

- （1）介绍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
- （2）是表明中国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的明确态度；
- （3）结合论坛主题“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发表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担忧、希望以及中国持续推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发展与治理的承诺与努力方向。

其中，我比较看重他坚信的那句话，即“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经济

长期增长的必要条件”，我希望这里的包容性制度安排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制度，还应该包括政治制度，否则难以给民众和投资者安全稳定、民主文明的可信预期。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对下面这两段话印象深刻：

（1）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这些不仅为中国，而且为全球企业创造着新机会。

（2）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形成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相信这个4亿人左右而且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开放市场，将对全球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这两段话说明：

（1）中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有大量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潜力；

（2）中国已经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国内市场之一，这可以对全球最优质的资源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可以说是最具备优势条件利用全球优势资源加快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国家。中国利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机会，进一步扩大开放，对于中国和世界是双赢。

孙国民（南京大学）：

达沃斯论坛历年来发言都注重几件事：

（1）让世界看到中国的希望，中国仍然在发展，我们给你们提供的机遇很多，希望你们抓住中国发展机遇，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

（2）释放改革与发展的利好。一方面发展很不错，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我们不避讳，我们坦诚，同时我们也在直面问题的解决，打消外界的顾虑，并且释放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信号。这次发言比以往更坦诚，更显得自信。

（3）给世界提振信心。我们发展很好，并且在十九大以后更加注重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地位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跟着中国携手干，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光明而美好，人类命运共同体之路越走越宽阔。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

主要有以下三点体会：

（1）针对未来几年我国经济政策的顶层设计，提出了“一个总要求”、“一条主线”和“三大攻坚战”等经济高质量发展措施，是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内容。

（2）肯定了近四十年我国发展成就归功于改革开放，并表态今后将继续坚持开放性、包容性增长模式，并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并强调拥有强大国内市场的中国将对全球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这是给当前出现“逆全球化”潮流有力的回击，并明确表态我国将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到更多国家和地区。

(3) 全面阐释当前全球经济深层次矛盾，同时也明确了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起到的作用，即面对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问题时，中国将做出表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应对，充分展示中国主张和负责任大国形象。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刘鹤在演讲中提到，针对突出矛盾，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

关键是如何在现实中落到实处，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要给民营经济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张二震（南京大学）：

刘鹤的这一段话值得关注：当前，世界经济回暖上行，主要经济体自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首次实现同步增长，国际贸易和投资走出低谷，世界经济有望进入新的增长周期。

以前学界基本判断是，世界经济将陷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低迷，这个观点影响了政府领导人。现在看法变了，认为可能进入新的增长周期，这是个重大转变。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刘鹤的演讲可以说给外方吃了一个定心丸，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不但不会变而且将会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并且改革开放力度之大会超出外方预期。另外，针对外方关心的市场决定性作用，知识产权，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扩大金融业开放等方面都做了许诺。可以预计，随着种种政策的落实，我国将会形成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刘鹤达沃斯论坛演讲除了向外界传达了党的十九大总体部署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以外，还透露出中国经济调整逻辑以及中国为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经济繁荣所承担的大国责任：

(1) 围绕由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总要求，政策着力点已从需求侧总量扩张转向供给侧结构优化，全要素生产率的逆转表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开放的中国不仅探索新发展模式，还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

(2) 为实施总要求和适应政策转向，管控重大风险与扭转资金“脱实入虚”，是实施结构调整的重要保障。减贫和绿色低碳发展是对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

(3) 将依靠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经济繁荣。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

刘鹤的演讲重要特质是国际眼光，站在全球的高度判断国内外机遇和威胁，是中国经济近期的行动指南。

“强质量、高效率、增动能”是我国已定的对策。关键是落实以及改革发展的主体是企业家，当下也离不开政府有效指导和服务。

王美今（中山大学）：

刘鹤一开始就说明：“施瓦布主席希望我借这个机会介绍中共十九大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政策，我做一个简要回应。”可见这是命题作文。施瓦布的要求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为什么？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繁荣很重要是一种解读；另一方面，不排除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地区的有些做法，不免使外国人心生疑虑。

刘鹤的演讲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但更重要的是切实的行动。不仅外国人等着看，对我们自己而言也是迫在眉睫。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刘鹤的演讲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对外开放、深化改革和解决当前一些问题的决心和策略。但更重要的是，下一步如何在行动上加以落实，重新提振外资和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如何更好发挥市场作用，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刘鹤的演讲我关注三点：

(1) 对世界经济回暖趋势的判断是对的。在中国增长乏力的情况下，需要有更大的改革开放才能利用好这个有利的外部环境。

(2) 如果真的大幅度地开放，现有的设想可能会改变。双方或多方博弈的结果不会按照某一方的设想变化。除非有超强的谈判能力。

(3) 美国的战略已经转向了大国竞争，确定把中国作为全面的战略对手。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以退为进（表面上是逆全球化）是在为以后的发力打基础。如果我们沉溺于幻觉，必将长期陷于被动。

刘晓昶（华泰证券）：

中美之间积极的合作与竞争是有益的。刘鹤的演讲非常高瞻远瞩和鼓舞人心，但需要言出

必行，我期待超预期措施的出台。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 30 论坛华东组委会）：

这是一篇就新时代改革开放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演讲，一定重在落实，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公信力，这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

（1）“一条主线”，根本上是抓国有企业改革，抓市场效率低下的社会部门。

（2）“三大攻坚战”，重点抓各级政府、国企、国有及股份制银行、金融机构，从央企抓起。

（3）精准脱贫攻坚战，本质是振兴农村经济，彻底中断剥夺三农助城市、建工业的历史。

（4）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点是打赢蓝天保卫战，但前提是保民生，保障好人民基本衣食住行、家庭经济。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最初的初心是人民的生活幸福，国家富强。

董也琳（南京市委党校）：

刘鹤的演讲主要是向国外嘉宾介绍了中国十九大的施政纲领的思路和未来方案，特别是指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风险、目标和任务，特别是发展目标从总量增长转向了结构调整，而解决中国高质量发展目标仍然需要靠改革开放去推动，特别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么构建开放包容的制度安排和实现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是重要的对外开放策略和目标。这其中特别包括三大攻坚战的第一个，攻坚战是化解我国金融风险，这要靠开放金融市场解决，所以大胆猜测今年中国将推出改革开放超预期的政策应该是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这个领域。

刘昌伟（IT 业者）：

保护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充分发挥企业家的重要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我们要继续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加强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创造有吸引力的国内投资环境。

这对企业发展来说是利好，但是不是也意味着国内金融业压力来临了？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过去 40 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靠的是改革开放，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我们要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几天在深圳调研，处处感受到市场的力量。其中研祥科技的陈董事长说，他作为一个外地毕业的普通大学生，怀揣 500 元生活费来深圳找工作，受别人鼓动变成创业，几十年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深圳的小政府，如果他不去找政府，政府也不会来干扰他；但如果他有什么要求，政府会千方百计第一时间来解决。他预测，只要深圳的市场经济能继续保持，超过上海成中国第一大城市指日可待。

林学军（暨南大学）：

面对当今经济低迷的世界，刘鹤的演讲表明中国将坚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消除贫困，以及防止恐怖主义，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决心，这无疑给纷乱的世界注入强大信心。

一带一路的倡议源于中国，但一带一路的建设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这句话，体现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实质。中国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打造互联互通的物理条件，人文环境，就可以有效地扩大全球的总需求，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扩大经贸，增加投资，方便人员的往来，这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将有极大的推进作用。

朱晓煜（南京市市级机关）：

刘鹤在阐述“一个总要求”时指出，这是在开放状态下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将为诸多新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比如与消费升级相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与新型城市化相关的节能建筑、智能交通、新能源等诸多绿色低碳产业。

在“一条主线”的阐述中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重点是“三去一降一补”。补短板明确是补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制度性短板，全面提升供给体系的适应力和创新力。

在化解重大风险中，明确金融风险尤为突出，主要针对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突出问题。同时指出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意识正在强化，“刚性兑付”和“隐性担保”的市场预期正在改变，为防控金融风险创造了重要的心理条件。

如何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

2018 年 02 月 12 日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并在不同场合多次就实体经济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并指出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2018 年 1 月 30 日下午，政治局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的第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作为经济工作的四项重点任务之一；与此同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已经意识到实体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并纷纷推出振兴计划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再平衡。在实体经济发展面临虚实经济脱节、生产成本上升和盈利能力减弱等困境，以及国家对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紧迫性和重视程度提高到前所未有高度的背景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专家、学者就当下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深层次原因及相关对策建议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

一、中国实体经济存在哪些问题？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近日调研了两家企业，一家是创建了 15 年的印刷行业，另一家是生产经营了 20 年的食品行业。两个企业遇到的共同问题：

（1）2011 年上半年以来，营业额逐年下降，食品企业的门店数量年年减少，印刷企业的大额订单越来越少，并且货款拖欠严重；

（2）当产量减少时，两家企业也都设法创新经营方式，比如开办网上业务，但是对食品企业的业务贡献不大，而印刷企业的业务量明显增加；

（3）到 2016 年时，不仅从银行贷不来款，而且银行不停地催促还贷，迫使两家企业裁人，卖厂房，卖地，卖设备。印刷企业目前的员工人数是最多时候的 1/10，不到 30 人；食品企业的创始人想把企业卖掉，却找不到买家。

上述情况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普遍现象。近两年在印刷行业，不断地听到规模较大的企业倒闭和老板跑路，还有更严重的。

陈英武（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

就实体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造业来看，近年来也遭遇了发展瓶颈，虽然规模很大，门类很全，但低质低效越来越突出（毛利率在 10% 以下甚至 5% 以下的行业比比皆是）。就江苏制造业来说，传统优势逐步丧失，新的优势和动能尚未建立，创新的能力与资源并没有转化为实际的成果，发展质效较低（我省 31 个制造业大类 2016 年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除了药、烟、酒这 3 个行业，其它均低于 10%，其中 3 个还低于 5%），等等。

蔡汉东（伟机投资有限公司）：

实体经济的特征：

- （1）投资回报期长，退出成本高；
- （2）技术性强，产、学、研投资成本大；
- （3）管理要求高，尤其是劳工制度、税务、知识产权保护等；
- （4）普通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难。

高传胜（南京大学）：

相对于虚拟经济，实体经济不仅沉没成本高，而且投资回收期长，利润率低。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 （1）科技创新尚未成为制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
- （2）经济“脱实入虚”和实体经济低回报严重影响了资金和人才等要素向实体经济的聚集；
- （3）高成本和新经济模式冲击使得实体经济发展举步维艰。

施康（香港中文大学）：

要清醒地意识到，实体经济回报低是常态。

王以丹（南消股份）：

当产品供过于求时，围绕产品建立起来的实体经济，与过去相比，总体而言无论如何也好不了。生存下来的，只能是那些有特色的，并能依据其特色建立起自己专业围墙的企业。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受人口、

资源和环境等约束，尤其地方政府基于绿色发展的考量，许多污染企业不得已关闭或外迁；而这些污染企业往往是传统制造业产业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由此带来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破坏，导致部分制造业成本大幅上升。受人力成本和外协采购成本上升双重压力，传统制造业经营环境进一步恶化。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经过“去产能”以后，原材料的上游垄断程度有了一定幅度提高，很多下游民营企业面临上游垄断和产品市场激烈竞争的双重挤压，利润有所下降。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 （1）实体经济投资动力不足，尤其是民营的投资下滑严重。
- （2）实体经济回报率低、回报周期长，导致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核心竞争力严重不足。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实体经济压力过大，创新不足，利润减少，引力不强。

二．中国实体经济为何会出现问题？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实体经济为什么会衰退？直接原因，就是挣不到社会平均利润的报酬。为什么等量资本获得不了等量的利润？一是它自身出了问题，二是它依赖的环境出了问题。尤其是金融环境出了问题。在2016年我国3300余家A股上市公司中，虽然大小银行占比不足1%，但利润总额占比超过30%。商业银行能挣这么多利润，是因为进入的行政垄断；因此，打破商业银行的垄断，就成为发展壮大实体经济的一个重要措施。

陈琛（机工智库）：

（1）实体经济前期因为技术保密等原因，新技术和新产品很难获得外部资金支持，大量优秀人才脱实向虚。

（2）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发展到新阶段，压力大等表象的本质是转型期缺乏动力和轨道。比如制造业的数字化，需要新基础设施，需要把信息技术融入，但我们大量企业还在观望和犹豫，许多中小企业还处于懵懂之中。

（3）从微观角度，制造业表现出更多的网络化和平台化，所以有的企业看起来更虚了，但他的资源整合能力依托网络和平台反而有所提升。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 （1）实体经济缺乏核心竞争力是症结所在，且技术进步无法形成内在增长源泉。
- （2）人力资本是实体经济重要且长期的影响因素，但国内实体经济结构远远无法适应目前人力资本的变化。
- （3）金融资本市场本身的不完善，导致资本不进入实体经济。
- （4）实体经济衰退的本质是经济社会结构矛盾的反映，也是以往中央政策强干预的延迟与累积。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企业家精神不健全。自改革开放以来到 2010 年，中国经济一直是高速增长，企业家们都是以乐观的设想贷款和投资，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危机，措手不及。

这场金融危机，也暴露了政府金融管理能力的不成熟，表现之一是为防范金融风险而去杠杆，可能方向不对而且用力过猛，导致生产企业缺乏资金。

张程（江苏省证监局）：

交易成本太高是最大的问题。

林学军（暨南大学）：

当前，我国的货币供应比较充足，达到 GDP 的 200%，但是市场流动性仍然不足，企业融资的成本依然很高。主要的原因是资金都停留在金融业，投机炒作太多，流向实体经济太少。

朱建平（建行江苏省分行）：

目前，制造业和商业银行的互动尚未呈现良好格局：

- （1）2012 年以来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型制造企业较高的不良贷款率增大了银行的经营性风险；
- （2）制造业尤其是中小型客户依然觉得贷款难，融资利率高。在今年信贷资金紧张、银行盈利增长压力持续增大的局面下，这个矛盾愈发突出。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实体不振加速资金空转，资金空转加剧金融风险（也加剧了财富的畸形分配），金融风险恶化实体经济所需的金融环境，融资更难、融资更贵，实体经济更难发展。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

国家发改委产业导向目录执行太软；现代服务业的重点只顾眼前赚钱，不顾国家工业经济基础和长远目标；当下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无论是质量还是针对性都缺乏系统性社会化环境支撑。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中国实体经济困难，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经济在依赖投资尤其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轨道上已经走得太远，造成了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畸形，实体经济在各方面受到严重挤压，其中实体经济成本持续快速攀升成为扼杀实体经济生机的最主要因素。

唐德森（无锡环研中心）：

（1）实体经济受环境制约影响大，加之市场竞争不完全，导致退出相应产业市场的可能性增大。

（2）企业财产权不太清晰，导致企业短视行为。

（3）企业家精神几乎没有形成，严重挤压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4）实体寡头企业或寡头垄断企业的存在、市场占有“阶层”的固化和治理的僵化以及较高的投资门槛等，导致投资主体“望而却步”，无法进入相应实体领域。

查婷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企业融资成本高企、负债经营，稀释了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资金流动不畅又进一步引发恶性循环，带来需求与供给的长期失衡。

陈英武（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

实体经济比较收益日趋下降，企业创新激励不足：创新面临很大风险，不如代工安稳，更不如搞虚拟经济收益高、见效快；各类成本日益上升，侵蚀了本已微薄的利润；企业家失去了创新的动力。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

实体经济不振和衰退的原因除了税负重、成本高、融资难外，还有一重要原因为资源配置扭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据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为 6%，而证券、银行业的利润率在 30% 左右，导致资本、人才等大量生产资源涌向实体经济。资源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配置扭曲，将抬高实体经济生产成本，挤压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实体经济内部：制造业与房地产。当前房地产业已经占据经济的半壁江山，高额的出让金必然导致高房价，最终将由买房的工薪阶层承担，工薪阶层的消费水平大打折扣，必然会影响到制造业生产出来的产品销售。这将出现制造业企业纷纷倒闭，而房地产仍然火爆的这一反常现象。

三．如何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发展和壮大实体经济，必须按照十九大报告，实现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

（1）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我国科技创新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要小于我们的实体产业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原因可能是我们的科研指向与实体经济脱节，或鼓励科研成果转化的制度不够完善，如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科学家从事科研成果转化缺少支持等。解决这个问题的其中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要让应用型科研产业化、市场化。

（2）使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是现阶段的主要问题。现在不是金融体系在空转、资金进不到实体经济的问题，而是进入渠道过长、资金成本过高。同时，实体经济本身产能过剩、杠杆太高、生产率低，不能创造出投资者满意的回报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方面抑制金融虚火过旺的趋势，另一方面实体经济要提高供给质量。

（3）使人力资源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现在实体经济不能获得发展所需要的优秀人才，人们都喜欢去虚拟经济领域，或者去那些不能创造财富、只能分配财富的部门，如政府机构、事业单位。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是我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遇到的最大难题。解决这个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为吸引年轻人就业创造好的物质条件。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1）降低实体经济的结构调整成本。

（2）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资本市场的管制应建立在降低成本、信息安全与市场自由配置要素上。

（3）实体经济发展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政府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同样要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4）政府要构建能够发挥资本市场作用的最低成本制度安排，而不是直接干预结构调整本身，从而使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形成良性互动。

（5）建议中央组织进行一次对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专题研究，制定出台一系列

系统性与连续性的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配套措施。

邵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 （1）对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大幅度减税。
- （2）由开发区等区域性机构承担集中治理的环保责任，严格科学治理污染，解决企业在环保问题上的后顾之忧。
- （3）对海归人员创业鼓励较多，而对体制内人员和国内科技人员创业鼓励措施较少；调动各类人员创业的积极性，尤其要鼓励制造业从业者。

孙国民（南京大学）：

- （1）解决资金空转问题，让资金回归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 （2）解决与创新创业及企业家精神保护相关的政策空转问题，打通政策执行中的梗阻。
- （3）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导向，解决改革的难点和痛点，补齐改革的短板。

王以丹（南消股份）：

- （1）把真正保护企业知识产权落到实处。
- （2）降低实体企业的资产重组成本。
- （3）实体经济不能仅仅围绕产品经济来建设，而要把产品经济当成基石，在此基石上发展各种新的实体经济形态。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30论坛华东组委会）：

- （1）挤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中的水分、泡沫，实现真正的互联网+，在制造技术、部件提升的同时，实现逻辑、工业设计的提升，制造出更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
- （2）法制建设、教育文化、金融财税等多方面的引导，克服短期见效、政绩工程等简单、浮躁的倾向，目标笃定，坚持百年。

踪家峰（南开大学）：

- （1）不断开放国内市场，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开放土地市场，城乡土地市场合一；精简政府结构和人员，精干国有企业。
- （2）实施双一流职业技术学院战略，建设若干一流技术学院。
- （3）实体经济与金融、互联网等是动态演进的整体，不能割裂起来。

孙映祥（南京机场）：

（1）优化市场环境。为实体经济创造获取资源的公平环境；降低各类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工成本、税费负担和融资成本；加快信用体系、担保体系、风险分担体系建设，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优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为实体经济提供科技支撑。

（2）提升自身素质。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推动企业和行业转型升级，增强内生增长动力；通过互联网，跟踪“前端”研发、设计环节，力求技术领先；向“后端”服务延伸，引导产品升级；加强传统产业与信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等的融合发展，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建立健全高端人才集聚和作用发挥的激励机制，营造鼓励创新、支持实业发展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培育实干精神和“工匠精神”。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1）切实推进税收制度改革，尤其是与实体经济相关的税种。

（2）加快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3）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发挥国有企业振兴实体经济的主力军与中央军作用。

（4）整顿与规范金融市场，切实降低实业资金成本，降低实体经济金融风险。

（5）深化公务员改革，释放体制活力，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公务员充实经济建设中去。

（6）培养和甄别实体经济有用人才，发挥人力资源要素作用，充分涌现流动。

（7）改革职业技术教育，多培养产业工人。

（8）优化招商投资软环境，尊重契约精神，并发挥企业家精神。

（9）运用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加大技术研发强度与转化力度，发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用。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1）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运营成本，提高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回报率。

（2）鼓励实体企业走创新发展之路，通过产品创新、工艺流程改造等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3）改善政商关系，营造有利于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营商环境，引导全社会形成创业致富光荣的社会价值观念。

（4）加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发展壮大我国实体经济有关的理工类专业技术人才的教育与培训工作。

（5）切实解决实体经济领域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解决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降低企业用工成本，对小企业的税收政策更加宽容优惠，减免企业所得税等。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1）出台区域和产业规划，按照重点发展类、鼓励类、支持类、限制类、淘汰类进行分级，加强规划引领。

（2）加强政策扶持，积极运用财政金融土地人才等政策支持优质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3）采取强力措施特别是环保措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控制淘汰限制类以下企业。

（4）结合一带一路的实施推进，逐步形成发展的梯形结构或者雁行模式，强化政策性银行对产业结构转型特别是走出去的信贷支持。

（5）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强化发挥市场的竞争的作用。

（6）国有企业经营领域由全覆盖变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弥补市场竞争的缺陷。

蔡汉东（伟机投资有限公司）：

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运营成本，建立实体经济的比较优势，鼓励创业者投资实体经济，是发展实体经济的根本。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对污染企业提供必要的生存发展空间，补齐传统制造业产业链发展短板：

（1）科学规划园区，对污染企业集散入园，集中治理；

（2）设置专项基金，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和实施清洁生产管理。

林学军（暨南大学）：

（1）增加直接融资比例，降低融资成本。

（2）控制投机炒作，抑制过度的投机，减少金融泡沫。

（3）引导资金投向实体经济，如以政府的引导基金，鼓励发展高科技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扶持小微企业等。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民营实体经济是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行业发展的“集中”与“分散”，二是消费产品的“品牌化”与“大众化”，三是发展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就地取材”。

在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和品牌化流行的今天，市场愈益“低端”，在“一带一路”走向全球配置资源的今天，获取愈益艰难。对于当前中国大部分消费者来说，需要的是“物美价廉”的非品牌的“低端”小康型温暖的产品和服务，而面广量大的中小微型民营企业，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全球配置资源离自己还比较遥远，“家门口”的资源获取如果能降低一点门槛，降

低一点成本，或许就会创造出勃勃的发展生机。因此，发展实体经济，不能忽视中小型民营经济的发展。

朱建平（建行江苏省分行）：

（1）商业银行要讲担当，信贷资金积极投向实体经济、向制造业尤其先进制造业倾斜。

（2）降低信贷资金的风险偏好，如通过与股权投资资金结合，用股权类资金的高风险偏好来提高企业融入资金的风险偏好。

（3）政府在搭建联系、增信保障、损失补偿、担保措施等方面要加大投入，让有前途、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能够以较小的交易成本获得贷款资金，同时减小银行可能的潜在损失量。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要避免趋同化。

（2）坚持从规模导向向效益导向转变。

（3）提高产业准入的环境门槛。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

（1）减少政府不正当干预，以市场化方式而不是行政化的方式推动生产要素流向真正需要的地方。

（2）鼓励和支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的“+ 互联网”，而不是“互联网+”，让传统实体经济下的企业经营的更有效率、更有活力。

（3）中国已是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首要目标国，随着反倾销调查变得困难，欧美等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将发起更多的反补贴调查，因此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实体经济企业尤为关键。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1）加大企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转移的政策支持，如通过减税和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企业科技创新。

（2）放宽金融业市场准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3）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优化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加大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政策支持。

孙军（淮海工学院）：

短期：化解实体经济尤其是民营经济所面临的融资困境；摆脱当经济下滑时更多依赖房地产的困境；消除民营企业顾虑的相关问题；解决垄断行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民资进入问题；

在金融结构、财税体制改革、尊重企业家、精简政府职能、放开垄断等方面多下功夫；

长期：解决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协同发展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更好融合的问题，更多人才愿意参与制造业的问题。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破题，实现市场的规范、繁荣和内生发展。

（2）民生需求是实体经济之基，建议将企业的生产经营补贴转为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

（3）打造竞争有序的金融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鼓励面向实体经济、着眼服务效能的金融创新。

（4）以沿海发达地区及其强势企业为龙头，打破行政性的区域和产业壁垒，建构区域价值链、国家价值链。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

（1）国家产业政策要有刚性支撑和保障。

（2）实体经济必须转型升级并与高科技、现代金融业和有效率的虚拟经济互联互通融合发展。

张宸（南京大学 / 江苏电信）：

（1）保证实体经济的良好环境供给。

（2）实施更加积极的前瞻性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1）一方面通过反垄断竞争的相关法律规范上游行业，另一方面拓宽民营企业从国外采购原材料的渠道。

（2）“降成本”作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任重道远，尤其是在美国开启减税序幕以后，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一旦世界制造业格局改变，再扭转将会比较困难。

（3）在我国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背景下，人工智能对我国制造业的正向效应要显著大于其他国家，通过自主创新和“引进来”相结合方式尽快取得突破。

高传胜（南京大学）：

（1）切实了解实体经济的投资经营者的真正担心与忧虑，采取有针对性政策措施，让实体经济的投资经营者在政治上能够放心、有恒心。

(2) 降低经营成本的途径,如减轻税收负担、适当降低“五险一金”费率、降低土地成本、降低行政成本、大幅度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等。

朱晓煜(南京市市级机关):

(1) 通过科技创新和进步,优化工艺流程,降低材料成本,减少人工劳动,加强企业管理等。

(2) 价格的提高也来自科技创新和进步,还有员工素质的提高,名牌品牌的效应是明显的,美国德国日本甚至韩国的家用电器价格比国产同类产品高仍是不争的事实。

(3) 淘汰落后产能,降低库存,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企业资金使用效益。

徐宁(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度就是需求市场的培育。需求市场培育四个纬度看:

(1) 消费需求,核心逻辑是利用国内需求规模的虹吸效应逆向驱动生产端的发展。注重导向特别是高端市场需求培育,这有助于实体经济升级转型;补贴消费者等面向需求端的方式要优于对生产者的补贴,可避免诸如新能源车骗补等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 投资需求,这里指的是企业生产中对投资品的需求。政府应鼓励对实体企业转型升级有利的投资品的生产,这既有利于发展与壮大生产中间品的实体企业,又可鼓励面向市场终端的实体企业升级。

(3) 政府采购需求,包括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建设以及政府直接采购。需要关注运行程序的公开透明以及操作过程规范受监管,避免腐败的发生。

(4) 国际需求,特别要结合新时代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考虑美国等国家的新型发展战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路构建和谐的双边关系,进一步培育并开拓国际市场需求。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防止各项生产要素成本不正常的持续攀升,阻止金融资源持续向国有经济、政府平台集聚带来的不公平金融待遇造成民营实体经济的血液枯竭,建立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关系。

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以系统综合性的改革措施平衡各方面的经济利益,进一步释放激励各方活力动力。

张明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 南京):

(1) 注重要素投入、生产组织和财富分配的高效率,真正做到市场起决定性作用。

(2) 限制虚拟经济的自我膨胀,注重新型科技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价值提升功能,合理

运用金融资本的效能。

(3) 产业规划要与本地产业优势、市场环境对接,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形成实体经济与证券市场的良性互动。

(4) 注重海外投资的产业选择,严格控制非实体经济类的海外投资。

唐德森(无锡环研中心):

(1) 鼓励市场主体对实体经济投资。

(2) 通过补贴、减税等方式,支持和引导实体经济结合工业 4.0、中国制造 2025 进行技术创新、工艺创新。

(3) 严格执行统一的企业或产品环保标准。

(4) 企业的财产权要更加明晰,打击利用资本市场等杠杆手段伤害实体经济行为。

(5) 严管公务人员权力寻租违法行为,积极培育企业家精神,优化政商关系。

(6) 打破实体经济主体的身份限制,优化法人治理结构,充分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活力。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自 2012 年 3 月到 2016 年 8 月,中国 PPI 月度上连续 54 个月负增长,年度上连续 5 年负增长,实体经济陷入“生产领域通货紧缩”难以自拔。为了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防止经济继续滑坡,2014 年 11 月 - 2016 年 3 月,央行 6 次降息 6 次降准,并通过抵押补充贷款对政策性银行注资,但直到 2015 年 4 月份,我国一年期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仍然维持在 4.75% 的高位。此轮宽松货币政策不仅对振兴实体经济收效甚微,叠加 2015 年底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影响,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预期开始形成,中国资本外逃越发严重,外汇储备在 2017 年 1 月一度跌破 3 万亿大关,民间投资甚至在 2016 年初开启了“断崖式”下跌。其间,为了对抗“生产领域的通货紧缩”和建立货币资金蓄水池,中国政府做了三件事:一边将“三去一降一补”作为年度工作任务,一边对资本进行管制,一边尝试对政府部门和居民加杠杆,分别启动了一轮人造股市牛市和一轮人造楼市牛市。到 2016 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终于触底企稳,PPI 转负为正。但中国实体经济整体杠杆率又创了新高,而 CPI 却停留在 2% 以下,距离年度通胀 3% 的目标仍有一段距离。中国经济仍处在“债务 - 通缩”的长周期通道上。因此,当前,发展壮大中国实体经济的关键着力点应放到努力打破“债务 - 通缩”循环上。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1) 降低公司上市门槛,减少审批环节并对金融机构收取的相关服务费用规定上限,同时提出明确和严格的退市制度。

(2) 通过规制和指导改善金融机构不合理的激励机制,鼓励金融机构更多采用利润分享型收费,并严控“坐地收钱”型手续费的上限。

查婷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1）政府应当以规范市场、完善营商环境为己任，通过提高预期回报率强化实体经济自身对资金的虹吸作用。

（2）优化金融市场环境、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减少由于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脱节，带来的资金流动不畅。

盛文军（人行杭州）：

从宏观方面看：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着力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增强投资预期，降低投资成本尤其是资金成本，逐步放开垄断性行业；优化出口结构，加快贸易投资便利化步伐。

从中观层面看：明确产业政策的支持方向和重点，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要优先重点支持；对科技和金融结合较紧密的行业，由政府出资成立产业母基金，并吸纳社会资本给予重点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产业内企业充分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兼并重组。

从微观层面看：优化完善企业营商环境；降低企业各种经营运营成本，提高正常合理资金获得率和满足率；支持鼓励各类型中小企业发展，激发企业经营、投资热情和信心。

陈英武（江苏省经济和信息化研究院）：

（1）对脱离实体经济发展的部分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采取破除行业垄断、提升竞争水平等手段，削除其超额垄断利润率。

（2）采取一揽子方案，特别是减税降费，降低企业发展的综合成本，同时要对企业引进人才、研发创新及成果转化给予更大力度的奖补。

于晓华（哥廷根大学）：

实体经济扩容同时需要供给推动和需求侧拉动：

需求侧拉动则靠公平收入分配和抑制房价，穷人收入上升对需求拉动的边际效果更大，市场才能扩容。

供给侧的推动则需要“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依法治国”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和企业家的创造精神，“科教兴国”则是让科研人员有积极性，有突破性的创造。

周荣荣（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队）：

（1）提高供给质量，激发实体经济活力：推动实体经济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形成新动能；加快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企业由低端低质向产业链前端和高品质迈进；瞄准国际标准，加强主体培育、平台建设和项目建设，全面提升服务业发展质量

和效益。

(2) 加快创新发展, 培育实体经济动力: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 加强应用基础研究, 培育一批重大自主创新战略产品; 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进一步强化政策落实,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搭建优质平台。

(3) 优化发展环境, 夯实实体经济基础: 着力推进“放管服”改革, 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进一步消除各种隐性壁垒, 鼓励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革;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宋凌炎 (江苏精诚 & 精缁毛毯):

- (1) 鼓励支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
- (2) 把智能制造装备真正引导用到实体企业中服务于生产。
- (3) 规范金融市场监管制度, 使更多的投机资本转向投资实业。
- (4) 鼓励普及互联网信息化, 减少互联网应用成本。
- (5) 给实体经济减负, 适当地修改《劳动法》, 减轻企业社保和用工风险压力。

黄敦平 (安徽财经大学):

- (1) 正确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关系, 实现两者融合发展。
- (2) 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营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外部环境。
- (3) 强化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提升实体经济质量。

丁可 (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从日本经验来看, 高速经济增长结束后, 传统制造业, 尤其是中小企业, 就地转型升级成功的比例并不高。留下来的只有两类企业。一类是控制微笑曲线两端的 fAbless 型企业, 另一类是掌握核心技术, 小而精的加工配套型企业。大部分制造业企业, 则通过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 重新获得了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 利用一带一路战略机遇, 帮助传统制造业走出去, 也是重振实体经济的关键一环。

周景梅 (扬农化工):

- (1) 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鼓励技术创新。
- (2) 敞开国门充分竞争, 让国内企业走向全球参与全球竞争, 让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 (3) 认真研究实施反垄断法, 防止某一行业完全被跨国公司占领。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1）民营实体问题，表象是困难，根在大环境（体制）。主要从以下方面施策：放宽准入，对民营经济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并不断减少清单长度；清政商关系，明法规规章；轻徭薄负，提升平均利润率；强内在，结构优化升级，实施创新驱动。

（2）国有实体问题，表象是活力不够，根在范围过宽、数量过大。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施策：多退出、转领域、公益化；去产能，灭僵尸，轻装上阵；强肌肉，竞争对外，提升国力；搞活内部机制，重工匠精神激励。

单豪杰（证券公司）：

- （1）重新审视确定国企在经济发展中的定位。
- （2）建立法治化的资本市场，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鼓励行业兼并重组。
- （3）破除土地财政，挤压地产泡沫，让资金更多进入实业。
- （4）减税降费永远在路上。

股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2018年02月14日

编者按：高储蓄率是我国经济运行的显著特点之一。理论上，较高的储蓄率意味着实体企业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金融的支持；但现实中，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却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和新动能的培育。为解决这一难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股市作为重要的直接融资渠道，近年来我国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加快 IPO 速度等手段，缓解实体企业融资难题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并起到了较好的效果。

但与此同时，特别是 2018 年伊始，在近一年的“结构牛市”、监管部门排查金融“地雷”、美国股市暴跌等影响下，我国股市也出现了暴跌现象，严重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并迫使 IPO 减缓以缓解市场氛围。在此背景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第一时间邀请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股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

一、认识近期股市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2018 年股灾四步走：

（1）2016 年熔断股灾之后，新任证监会监管理念发生重大变化，有意引导价值投资和慢牛格局意图明显，叠加经济层面供给侧结构改革促进市场集中度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向一九分化加速演变。在估值和盈利双轮驱动下，上证 50 从 1891 点开启了近一年时间长度的大波段上涨，与此同时，其他指数，特别是创业板还依然在低位甚至比熔断时的位置更低。

（2）2018 年元旦以来，一方面，金融防风险政策信号频出，另一方面，在大盘股带动下，上证近乎完美的“18”连阳将指数拉到熔断股灾筹码密集成交区（上证 50 及沪深 300 指数已经实现了近 70% 的涨幅，其中很多个股都实现了至少 50% 的涨幅，有不少个股甚至走出了 2015 年股灾以来的翻倍行情），终于全面激发了市场的“牛市”预期，使很多不明就里的潜在投资者跃跃欲试。

（3）2018 年 1 月中旬，美国彭博社援引“中国部分高层官员”的话报道称，中国在对外汇储备投资评估后建议减缓或暂停增持美国国债。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及强烈反应（中国持有美债 1.2 万亿，占比 1/5），随后 1 月末，美债收益率就突破了 2.5% 关口，美债价格大幅走低，

实现下杀。此后，耶伦卸任，美国经济基本面强劲，联储官员发表讲话，释放 2018 年将加息三次鹰派信号，引发已经走了 9 年大牛市的道琼斯指数开始调整，近 10 天（20180129-20180208）出现大幅度的下跌（10%），美国市场出现“股债双杀”。

（4）美国“股债双杀”（20180129）崩盘前的三个交易日，沪指接连创近两年的新高但接连三天近乎 1% 的震荡幅度，而深成指并没有跟随，创业板、中小板还是比较弱势。2 月 2 日，美股崩盘，恰在此时，监管部门密集排查股权质押“要求 5 日内报告基本情况”，而央行也在《指导意见》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主要遵循原则中明确指出，重点针对资产管理业务的多层嵌套、杠杆不清、套利严重、投机频繁等问题，金融机构不得为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产品提供规避投资范围、杠杆约束等监管要求的通道服务。银行“去杠杆”造成机构投资者开始抛售，受 A 股全球化发展速度加快和跟跌不跟涨的惯性影响，银行的抛售行为除了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卖出压力以外，还产生了恐慌情绪。这种恐慌情绪诱发了市场中的所有投资者卖出行为，从而放大了对股市的负面影响，A 股新一轮股灾爆发。

二．股灾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汪 建（东南大学）：

股灾对实体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微乎其微。

缪放嵘（南京中诚石化集团）：

股灾对实体经济有影响但不致命。

（1）大多数做实体经济的龙头企业、企业家和团队基本都是围绕市场和订单的，很少围绕资本市场赚快钱，因此股灾不会对实体经济有根本影响。即便股权质押崩溃导致股东变更，也不至于对实体经济有多大冲击，目前中国市场竞争基本处于完全竞争、垄断竞争，还没有完全垄断的独霸企业。

（2）股民信息不对称和从众心理，导致股票资产缩水，会使购买力下降和市场萧条，但中国经济支柱除了消费，还有出口和房地产，影响还是相对有限。

杨继君（民生银行）：

（1）对国有控股股东而言，股灾造成国有资产损失；

（2）对散户而言，股灾造成资产缩水，无力消费，影响第三产业；

（3）对大股东而言，重者会造成质押盘爆仓，股权易主，严重影响企业经营；轻者迫使大股东从实体经济抽取资金用于补保证金，也影响实体经济；

（4）股灾使发行新股投鼠忌器，IPO 进度滞后，影响实体经济。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股市成立之初是为国有企业解困服务的，近年来也逐渐承担了一些为优质中小企业融资的功能。但是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是一个整体，如果二级市场股灾不断，就会影响一级市场的新股发行。

张学权（南京数弈众城私募）：

除了直接融资，股市也是流动性最好的金融资产，是社会财富的蓄水池，是金融质押的信用基准与基石，在经济数据向好社会财富增长的当下，指数长期低位徘徊与股民没有赚钱效应很不正常，股灾对实体经济与金融秩序造成明显冲击。

刘根荣（厦门大学）：

股灾的直接影响：

- （1）限制资本市场的发展，实体经济中的企业通过直接融资的渠道和融资规模会下降。
- （2）社会财富缩水，导致居民消费意愿下降，降低社会总需求，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 （3）资金可能重新进入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推高房地产价格，使中国经济转型困难加大；抽离股市的资金也可能成为某些商品市场或要素市场的炒作资金，导致部分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扭曲，异化资源配置效率。
- （4）股灾导致大规模的质押股权被强行平仓，从而出现股市非理性巨幅下挫的恶劣情形，引爆金融危机，最终实体经济也不能幸免。
- （5）国企的混改进程可能受阻，民营资本变得谨慎而降低投资意愿。

股灾的间接影响：

- （1）民心浮动，悲观漫溢，社会情绪低沉。
- （2）社会出现不稳定因素，民众对政府失去信心，抵触敌视心理普遍，陷入塔西陀陷阱。
- （3）股民家庭易出现悲剧，自杀倾向剧增。
- （4）民众的有效的理性投资渠道受阻，民众失去理性理财意识，出现各种非法理财产品替代股市投资。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近期的股灾或者说股灾 5.0 版本，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深远而沉重的。仅说其中重要一点，无论是国有控制，尤其是民营控制的上市公司，连续的暴跌，基本上达到或临近平仓线，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效果的基本无效。不仅动摇其控制权，迫使公司融资更高的资金成本，有的使用 P2P 资金，饮鸩止渴，无法把主要精力用在研发、生产、经营上，严重影响企业发展目标与价值实现。

徐宁（南京大学）：

股灾是市场失灵和监管不力并存的反映。偶发性股灾应该视为市场的正常现象，但常发性则不同。从长远来看，股灾经常性的发生会影响社会投资主体对资本市场的信心，进而影响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性，造成社会资金供给与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的错配，致使资本市场难以支撑甚至抑制实体经济发展。

王美今（中山大学）：

股灾对实体经济既有直接影响又有间接影响。金融行业本身就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股市大跌令金融行业萎靡，增长放缓；甚至降低其向实体经济提供融资的能力，在实体经济中形成信贷紧缩，从而影响整体经济增长，甚至导致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

间接影响更是多方面的。股市的暴跌将导致持有股票的居民或企业财富缩水，资产负债表受损。这可能产生三重后果：

（1）股市财富缩水带来的负财富效应——股票亏钱——导致居民或企业支出下降，从而压低实体经济总需求；

（2）由于资产负债表中负债方一般比较刚性，很难快速下降，股票财富的缩水还可能导致居民或企业陷入负资产的状况。如果不少经济主体都陷入这种状况，进而需要持续存钱还债还会出现更严重的总需求不足；

（3）如果经济中不少主体以股票质押融资，那么股灾会降低抵押物价值，直接影响相关主体的融资能力。

三．股灾发生的原因

李家全（南京赫斯特）：

我可以忍受被套，可是无法忍受监管者的麻木。

丁军喜（达飞金控）：

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东是公司的根本，公司要回馈股东；但实际上，上市公司、监管部门、政府都拿股民做为唐僧肉。尊重或信仰是中国股市最大的问题。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中国股灾形成的原因，股灾是人为干预太多、监管不力造成的；说到底，还是权力没有形成制约，证监会忽视股民的利益，长期下去，对市场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王美今（中山大学）：

纵观几次股灾：2015 年股灾是媒体不停地号召和鼓吹所谓国家牛市，然后监管机构又粗暴地出台降杠杆和清查配资导致的。2016 年股灾是熔断机制加剧恐慌形成的人为灾难，在有涨停幅限制下，熔断本身就是错误的机制，该政策执行四天也就草草收场。2018 年股灾大前提是指指数虚高，除权重股外，中小股票已经长期下跌了，指数一调整，又是中小股票领跌。

从这些股灾来看，人为导致的因素居多，投资者也一直对监管机构颇有怨言。人为制造牛市，不停拉升权重股以抬升指数，导致指数虚高。指数调整时，又极大地挫伤了本都已在低位的小股票。这才是原因所在。

四．未来如何应对

朱为家（人防）：

强制分红，且股息率不得低于银行同期理财产品利率。

缪放嵘（南京中诚石化集团）：

（1）教育股民理性投资，中国股市基本上是每 10 年才有一个大年，其他 9 年都是阴跌 + 暴跌，大多数股民很难赚钱，因此要教育股民理性投资，掌握好投资节奏。

（2）在市场机会面前，政府不要与民争利，让老百姓有比较好的谋生机会。

张学权（南京数弈众城私募）：

（1）恢复信心是当务之急。

（2）造假虚增必须刑责，切实维护小股东话语权。

郭进（复旦大学）：

严刑峻法，真正落地退市制度。

刘洁（地税）：

（1）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过多的计划更加不可能。

（2）加大违法成本，让造假者身败名裂；官员参与者，终身追责。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切实加强党对资本市场的领导，切实保护中小股东利益，需要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资本市场

问题，重要的是保持资本市场政策的连续性与有效性。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不乱干预资本市场自发运行，完善市场法规制度和监督制度，对于违反市场法规行为，要以重型法典。

对资本市场，允许在股市实行集体诉讼制度，加大对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和侵害小股东行为的惩罚力度，实行责任时间倒追制度，将股市的刑法和民法结合起来，重要的欺骗行为要加大在刑法上的适用范围。

徐宁（南京大学）：

确定资本市场的金融市场属性，即资本市场是市场，其参与主体是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决策，不应过度干预；资本市场还是金融市场，无杠杆非金融，用杠杆的乘数效应是金融的天性，不应过度抑制。

明确资本市场的发展目标是为实体经济融资、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而非资本之间的空对空循环，应鼓励资本市场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直接融资，一切偏离此方向的市场主体行为都应受到相应处罚。

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让高强度监管与自由高效运行的市场并行不悖，使市场和政府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王美今（中山大学）：

资本市场天生是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服务的，不宜掺杂太多非市场功能。证监会的职责就是切实保证资本市场能发挥好这一功能；具体而言是维护市场三公，严厉打击造假和操纵市场行为，彻底纠正市场处处扭曲的现象。

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山东引发新一轮地区竞争？

2018年03月01日

编者按：中国在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采取的是以追赶西方发达国家为特征的追赶型发展战略。这个战略在十九大以后，有了一些显著的变化。从追求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加之区域竞争依然是经济发展源动力之一，有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并塑造自身的动态竞争优势也成为各地区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近来，山东省针对自身的发展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如2018年2月22日，刘家义在山东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大会上直指山东的发展问题及官场现状，等等，这些都彰显了山东省敢于“自曝短板”的勇气和以积极态势迎接新一轮地区发展竞争的态度。在此背景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邀请长江产经智库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塑造动态竞争优势”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各位对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进行了深入解读，并进一步讨论了高质量经济发展阶段，各地区如何塑造自己的动态竞争优势？

一、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为何是山东？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中国的供给侧结构，以山东为典型的代表。无论是产业结构、产品质量、技术进步和生产率、企业组织、劳动力结构、金融体系等等，山东都具有高速度经济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国家把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放在山东，既体现了山东人民在新一轮地区发展竞争的态势下不甘于后退、敢想敢试的精神，也反映了中央在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建设高质量经济这个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巫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

山东之所以能成为国家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其现实背景是，旧动能创造了其过去辉煌的经济成就，但缺乏新动能导致其近年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山东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进一步体现国家对区域竞争转型方向的引导作用，推动各区域都从高速发展向高质

量发展转变。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山东虽为全国第三，但相对于自身过去十年，发展速度和规模已经大为落后江苏和广东，但山东又具有良好的基础，其在全国仍具有制造大省的地位，要继续保持在全国的一流大省地位，新旧动能转换对于山东可能更为重要，且在全国更有示范效应。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问题在内陆省份具有普遍性，基本上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缩影。

二.《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亮点是什么？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主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探索：

- （1）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和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并举的动能转换路径；
- （2）探索建立创新引领新旧动能转换的体制机制；
- （3）探索以全面开放促进新动能快速成长；
- （4）探索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共进。

核心的探索内容是“破”、“立”、“改”三个字：

- （1）破，就是运用结构性政策进行供给侧调整，通过存量调整，千方百计地化解产能过剩问题，促使资源通过竞争性市场机制流向高效率企业；
- （2）立，就是通过增量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 （3）改，就是利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部门，降低对过剩部门的资源投入。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十八大以来，“新动能”一词的出现和新旧动能转换在中国具有清晰的时间线索，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这是《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出台的历史背景：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提“新常态”；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提“新发展理念”；同年11月，习近平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提“新动能”；去年，党的十九大首提“高质量发展”。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通过顶层设计“淘汰旧动能、培育新动能”，推动经济发展

方式转换的做法，虽然大大缩短了新动能的孕育和发展时间，使得我国新兴产业经过短短几年的培育已经具备一定的产业规模，市场增长和投资增长速度较快。但是，由于新动能产业优先在具有人才和资金优势的发达地区集聚，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南北地区发展差距，加剧了我国已经转变了的社会主要矛盾。因此，《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赋予山东承担“带动北方地区协调发展，为促进南北发展格局优化提供重要支撑”的重任。

按照《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山东释放新旧动能转换发展活力主要发展十强（5 新兴 +5 传统提升）产业，发展模式与全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模式一致，也即选择了新兴产业发展培育与传统产业发展调整改造同时推进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其中五大新兴产业基本覆盖了山东“十三五”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提出的“四新一海一高”六大产业范畴，同时也是我国其他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重点产业。而根据我们的研究，由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延续传统产业的发展思路发展新兴产业导致的产业发展低端化和区域间产业同构”、“忽视新兴产业发展的生命周期和阶段，政府盲目干预和过度干预”、“过度投资”等问题，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的五大新兴产业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三大产业在某些发达地区已经出现或轻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因此，如何创新新兴产业的培育与扶持机制，吸引高端人才，解决新兴产业的融资问题，是摆在山东各级领导和全国经济学者面前的一道现实难题。

陈 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试验区对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意义，我主要关心以下几点：

（1）试验区试验什么？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动能本身是不需要试验，需要试验的是新的改革做法，山东的文件里面提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等问题，试验区能否有成效，要看改革推进的成效。

（2）现在推进新兴产业与 2008 年之后那段时间的做法有什么不同？这次提出山东提出的发展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与 2008 年之后各地培育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似成相识，尤其要注意以高端产业的名义发展低价值部分，要避免以新动能的名义搞数字游戏。

（3）微观层面的新动能企业从哪里来？是侧重培育本地民营企业还是注重引进来，现在能够引进来的搞大笔实业投资的目前只有央企、上市公司和少量外企，那么，山东各区域发展中如何有新招引进这些企业；培育本地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又会有怎样的变化，要经历怎样的过程。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从区域协调发展视角看，《方案》中“试验区布局”所提的“三核引领，区域融合互动”可以做全局放大。新旧动能转换具有系统性特征，需要各区域共同参与。就这个意义讲，近期热炒的苏粤之争、苏沪浙之争等论题，其实可以统筹到“以沪、苏、浙、粤、鲁为核，区域融

合互动携手引领高质量发展转型”这一大局中，即将“旧动能”时代各地以资源争夺为主的竞争模式，转化为“新动能”时代各地携手培育自主、内生的价值增值体系之合作竞争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合力。

从深化改革的制度创新视角看，核心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方案》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以及要素市场配置机制中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均有赖于政府高质量的制度供给，其前提则是政府自身的职能定位。所以，政府能否从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出发，认识并准确定位自身的行为规范，是制度创新和高质量制度供给的关键。对此，对市场主体实行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同样也适合政府，山东在此方面应该大胆尝试。

三．山东经济问题在哪里？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表面上看，山东过去这“失去的十年”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够：过去10年增长最快的金融业，山东没有一个中心城市能够成为大区的金融中心，使得山东经济缺乏一个强大的金融推动力，错失机遇；过去十年长三角与珠三角在新经济方面都有很亮眼表现，而山东在互联网领域黯然失色。

更根本的原因是，过去十年山东改革开放无所作为，开放的动力缺失是外部因素，山东对外开放的主要方向是日本韩国，而中日韩关系过去这些年陷入低潮；改革不力则是山东自身原因。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过去几十年，在传统产业大发展的时代，山东抓住了国民收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日常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的历史机遇；也抓住了整个国家产能扩张、运输量激增的历史机遇，全力以赴进行港口建设，“以港兴市”战略得以奏效。在此过程中，在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的民用消费品方面，优势十分突出。然而，山东没有能够及时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兴经济，金融等等现代服务业也没有充分发展；既没有江苏和浙江那样众多的草根型民营企业，更没有如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城市群网络。在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区域经济格局重组的当下，优势逐步式微。

闫浩（江苏经信委）：

中国的四个经济（制造业）大省，从南到北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从南到北有以下特点变化：

- （1）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低；

- (2) 在职业选择上,对公务员的偏好越来越高;
- (3) 三次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越来越低,制造业比重越来越高;
- (4) 制造业结构中,传统产业比重越来越高,新兴产业比重越来越低,互联网企业、独角兽企业越来越少;
- (5) 投资率越来越高,投资结构中,制造业投资比重越来越高;
- (6) 外贸依存度越来越低。

上述变化趋势既反映我国产业空间布局自南向北梯度演变的现状,反映四省经济发展阶段、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也反映各地生产地域分工和产业比较优势的差异。江苏、山东的制造业比较优势相对明显。2014年以前,资源禀赋占优的山东省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一直名列全国第一;近年来随着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加工能力占优的江苏省工业企业利润于2014年超过山东位居全国第一。可以预见,资源丰富、劳动力充沛、区位优势、制造业基础雄厚、拥有发展空间的山东,在解决了体制机制和新旧动能转换之后,在建设制造强国的过程中将发挥不可限量的作用。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山东过去十年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粗放型、外延型的发展。在外延的惯性减弱后,弊端逐渐显现,实体经济日渐困难,问题从企业端向银行端传递,并通过担保圈迅速向外扩散,不良贷款居全国前列。面对环保约束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强监管下的金融去杠杆,实体经济的发展动力渐趋减弱。

张二震(南京大学):

山东对外开放过多倚重与日韩的合作,对欧美开放不够,这是山东开放格局的重大缺陷。再加上地缘政治的影响,所谓东北亚经济圈事实上没有形成。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

当年要想富先修路形成的交通优势,以及国企基础构成的工业优势,沿海开放和走私造就的先富机会,都在弱化衰退。如今低成本洼地优势不比中西部凸出,创新引领高地优势不比北上广,政府社会资源动员能力不及江苏,经商走天下闯劲亦逊色东北,能驱动未来发展的核心资源是稀缺的,国内国际资源竞争更为激烈,竞争内容不断演化变迁。

朱新聪(海尔日日顺):

山东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政府影响力太强,官本位,市场经济不活跃,喜欢抓大放小,大企业多民营小企业活力不够。当政府不作为时,社会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氛围。

四．如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和培育竞争优势？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刺激或推动地区之间展开经济竞争或竞赛，是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有别于其他转轨国家发展的重要经验。在高速度经济发展阶段，中央要求竞争的是 GDP 和财政收入等目标参数。在建设高质量经济的条件下，中央要求竞争的是质量和效益、新旧动能转换等目标参数。前一竞争格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也显示了片面追求数量、粗放发展的不良倾向。现在锦标赛的目标或“指挥棒”已改，但如何建立具体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直接关系到找准转型方向、促进科学决策、凝聚发展共识。因此国家提出山东的试点，对于引领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探索价值。

需要把握好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1）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来实现这一过程，尽可能避免出现新一轮政府主导的投资和工程大赛；

（2）多通过市场化的手段去实现政策目标，尽可能避免用行政手段强制推动，多用收购兼并办法做活存量、发育民间力量、发展民营企业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

（3）尽可能避免出现用优惠政策手段创造“洼地”、进行新一轮优惠政策大比拼和大竞赛；

（4）进一步端正执政理念，克服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潮、官气笼罩经济社会的不良局面，防止可能发生的“东北化”；

（5）用进一步的开放倒逼改革，克服地区之间高度的开放和发展不平衡的格局。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解决山东困境的出路只能是改革开放！山东必须进一步与日韩高科技产业对接，同时也不能局限于日韩，而应该全方位开放，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

山东省应该放弃打造济南中心城市的计划，真正发挥青岛的作用，利用天津、大连萎靡不振的机会，推动青岛成为环渤海地区的服务业中心，以青岛带动烟台威海在全省率先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进而拉动全省。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无论是什么产业门类，最终能够支持其走强走旺的，无非来自于需求：国家的战略需求或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这也是诸多支柱性产业乃至诸多新兴产业得以形成的内在机理。换言之，如果传统产业的优势非常突出、且能够持续保持优势的话，就不应被视为“旧动能”。而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能否成为发展新动能，需要经过多大规模和多长时期的投入，才能成为实质性的发展新动能，并非一个已知的常数。唯一能够预测的是，当城市和区域具备不断吸

引优秀人才集聚的强势地位时，转化为以新兴产业为主动能就是可能的。

具体到山东这一轮搞的“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

(1) 厘清新旧动能的真正内涵和本质区别，而不是简单以“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为标尺。

(2) 实现新的发展动能，必须培育能够协同共进的城市群，没有城市群支持的区域，未来很难培育持久的创新能力，新兴产业的发展难以期待。

(3) 充分吸取之前全国各个地区类似试验区的经验教训。

孙 军（淮海工学院）：

新动能的形成一定是市场主导，政府背后服务，而不是反过来。转换一定要以市场为主导，以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尤其是政府职能转变、简政放权为根本，通过弘扬企业家精神，尊重市场为核心宗旨，充分迸发市场活力！

另外，要以青岛城市群的建立为支撑，抓住比较优势，驱动其对于山东经济的引领和新旧动能的转换。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新旧动能转换靠新技术和新产业引领。当前所面临的新技术和新产业，注定只能在极少数大城市实现，以山东的经济体量来讲，突出一个核心城市更合适。

综合改革实验区，并不是面面俱到，而是围绕重点，形成突破，综合更多体现在机制体制上的综合创新，在创新治理机制和营商环境的综合改善。

张二震（南京大学）：

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山东一定要加大向东开放力度，主要是加大向欧美开放力度，大规模引进来，大踏步走出去，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机遇与沿线发展中国家进行产能合作的同时，大力引进欧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把利用国际先进要素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让进口竞争成为重塑新动能的强大动力。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1) 中原渤海经济圈的打造：新一轮地区的发展已经开始，山东的危机迫在眉睫，但山东如何应对？山东完全可以围绕自身打造中原渤海经济圈，同时辐射日韩，但要素必须能够支撑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

(2) 智能制造核心枢纽的打造：山东立足自身制造业，完全可以打造全国乃至全球的智能制造的核心，尤其中国 2025 发展战略刚开始而且没有找到真正的支撑点，山东是全国最适合的地方。

(3) 互联网经济的创新创业环境其实跟地域无关，关键是营商环境、人才环境、政策等支持，山东要想在相对落后的情况弯道超车不翻车，需要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全国创新。

(4) 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软实力的打造，过程中的助力、动力很关键，需要更多考虑政策+、人才+、技术+、生态+、信息经济+等多种因素。

孙国民（南京大学）：

(1) 方案实施中要注重制度环境改善，比如最近发生的“民告官”现象折射的是官商环境、官民环境和营商环境都有很大的改善空间，这是稳定存量企业和人才以及吸引市场主体及高素质人才创业创新的基础条件。

(2)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山东在国际化和管理创新方面曾经作出了巨大的理论和实践贡献，这同山东的开放发展和创新发展关系密切，当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和支柱企业。新时代呼唤山东领跑新一轮的改革创新，迫切需要新时代的创新型企业如春笋般地涌现，带领山东经济创造出一个新 2.0 版本。

(3)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任务艰巨，需要通过科技+、品牌+、互联网+、智能+等，在发展智慧经济或者智能经济上发力，稳步提升新兴产业的比重。

(4) 着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和振兴实体经济，特别是按照十九大精神要求，在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有所作为。

(5) 注重试验中出机制、出模式、出队伍、出人才、出经验，注重总结提升和推广。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新旧动能转换，应该考虑转换成本。老动能有粘性，新动能有学习成本。老动能的粘性表现在，技术和管理上的适应性、政府管理上的方便性、以及思维和行为模式上的惯性。新动能的学习成本，包括知识和技术的吸纳和转换成本，新的经济模式的建立和运行过程中的适应成本，新的政府管理模式的探索成本等。方案中对这些都没提，忽视经济转换成本，其实是 1990 年代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成功的重要原因。

山东在管理方面的探索也有口皆碑，如海尔的人单合一和酷特云蓝的大规模定制化服装营销战略等是走在全国前列的，向管理要效率也应该是新动能。

山东是中国品牌经济基础最好的省份，如何发展品牌经济，发挥无形资源在经济发展新动能中的作用，也是山东应考虑的方向。

朱新聪（海尔日日顺）：

对于山东：

(1) 政府需要做好规划和引导，在大交通大基建方面加快，补上落下的功课，加快区域一体化；

(2) 政府放权分权，倡导创新，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真正建立起契约的市场经济氛围。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

山东省需根据趋势和可能先对“新”进行战略定位，奋力改革，再造“新”生根成长所需新优势新机制。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是形成资本、金融和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

- (1) 政府切实动狠心、出实招，理顺发展环境，助推新动能的形成。
- (2) 以严格的环保约束、金融控制、资本制约强力加速推进旧动能的出清。
- (3) 着力打造助推新动能发展的载体和平台，吸引资本和金融集聚。
- (4) 加大财政、土地、人才等方面政策倾斜，以政策高地助力资本和金融洼地的形成。
- (5) 以产经互动为主导，加速新动能的孵化、转换，发力。
- (6) 防止新瓶装旧酒，也避免“一刀切”，着力促进“老树开新花”。
- (7) 切实发挥好金融机构特别政策性银行的作用。

杜宇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在高质量发展目标下，新旧动能转换关键在于从要素投入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路径。如何形成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的试点试验，以下几个方面路径机制值得探索：

- (1) 依托实体经济大省优势，通过推动大规模技术改造和产品创新，实现产业高端化发展；
- (2) 依托区位战略节点优势，延伸和拓展国内价值链，立足内需市场培育自主品牌，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
- (3) 依托科教文化大省优势，推动科技、文化与经济融合发展，以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周荣荣（统计局）：

新旧动能转换，应从需求和供给侧及制度层面加以考虑：

- (1) 需求层面，主要是最终消费的贡献率提高及消费转型升级，新兴消费发展；投资结构的优化及效率提高；对外开放转型升级。
- (2)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产业结构升级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发展“三新”经济。
- (3) 制度层面，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政府简政放权。

林学军（暨南大学）：

当前，应当以科技创新，努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材料，新能源，智能 IT，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造传统产业，建立现代经济体系，这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点和关键。政府应当制订长远的规划，加强官产学研相结合，形成创新联盟，提高创新能力，给经济增长注入强大的动力。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 （1）仅仅依靠特殊政策和项目，新旧动能转换是难以实现的，关键在于体制创新。
- （2）尊重地方和群众首创精神，让地方、企业和群众从中获得实惠。
- （3）以山东为试点，以搞活微观激励为重点，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以知识、技术、信息、数据等新要素为支撑，形成转型发展的区域竞争新局面。

巫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

《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总体方案》对于江苏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江苏更应该积极思考的是，如何结合自身区域和产业发展特点，走出自身的新旧动能转换道路。

这其中可能包括的议题有：

- （1）考虑苏南、苏中和苏北的区域差异，分别探讨新旧动能转换道路；
- （2）抓住智能制造的浪潮，积极推动制造业的大规模技术改造和信息化改造，进一步提升制造业优势地位；
- （3）在各级政府经济工作绩效的考核中，增加新动能的权重，做好短期内 GDP 增速适度放缓的准备，积极改变政府经济工作的抓手和工作方式，使之与新动能的要求相符合。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因地制宜，抓住新旧动能转换中的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转型路径，更为重要。对于江苏来说，实体经济是自身的特色与优势所在。在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中，旧动能并非简单的一关了之。对于两高一低产能，应坚决淘汰；但是，对于非环境破坏性的旧动能，更应积极引导，促进升级。产能，在形态上可以有新旧，喜新不厌旧保持经济发展连续性的同时，推动条件允许的产业实现质的飞跃，才能让区域经济既有高度，又有深度与广度，增强区域经济的韧性与回旋空间。

如何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

2018年03月15日

编者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及中央一号文件，再到政府工作报告均明确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事，正在扎实推进，层层落实。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要统筹谋划，科学推进。近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针对乡村振兴五个方面（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特别是乡村产业振兴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重新定义乡村振兴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乡村振兴不是回归传统三农格局，而是三农现代化，即农民减少、农民变富；农业比较收益率上升，达到社会平均水平及以上；农村在工业化主导下开始享受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城市化生活方式，不是指把农村变成城市，而是生活方式跟城里人一样，如发达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社交，文化等等，农村与城市一样。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乡村振兴是城市文明向乡村渗透的过程，是传统乡村文化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避免被蚀灭，并在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完成自我复兴的过程。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500强企业研究中心）：

在新时代对中国三农问题与发展新的认知，对农村农民农业采用一系列振兴手段与措施，不断满足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地制宜，充分考虑不充分不平衡，归根到底乡村振兴的目标让农民富起来。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乡村振兴不是去乡村化。乡村振兴，是以城里人的需求为导向，通过满足城里人的需求来

提高农村人的收入，改善农村人的生活。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乡村振兴不是驱赶农民离开土地，而应强调如何让农民在土地上获得更大的收益；乡村振兴不是培育新型“地主”和“农业资本家”，而应强调全体农民集体参与。乡村振兴应当依据农村自身特征来发展，城郊区发展工业经济，农村发展农业经济。与以往的发展不同的是，农村的农业经济发展具有规模化、产业化的特征。

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乡村振兴是居住环境与生活内容的相一致。首先，从外在环境来看，小到厕所大到交通，应该是便捷的并且是舒适的。其次，从内在内容来看，乡村振兴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除了创意现代农业，文化旅游等项目外，也应该有依赖当地禀赋所支持的新兴产业。最后，两者的融合还在于配套设施和服务，解决教育、医疗和文化等困境。

二．乡村振兴的内涵及关键问题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从目前的三次产业就业格局看，服务业就业人口刚刚超过 40%，工业就业人口在 2013 年还低于农业，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

因此，“乡村振兴”是我国发展三农的一个长期任务，要分三步走：

- （1）到 2020 年消灭当前标准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
- （2）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
- （3）到 2050 年才是实现农业强。

可见，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难题和任务是减少“农民”，必须切实改革阻碍农民工完成市民化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此外，就三农本身的吸引力而言，有几个涉及生产生活的不方便，急需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补短板：交通不方便、上网不方便、上厕所不方便、洗热水澡不方便。

马野青（南京大学国贸系）：

（1）乡村是可以振兴的，但要以产业发展作为基础、以地区经济实力作为支撑。乡村振兴应该因时因地而异；

（2）乡村振兴并不一定就是要农村城市化、工业化，通过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特色化、现代农业组织同样可以实现农民富裕；

(3)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工业、农林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乡村工业一定要进园、绿色发展，保护好农村环境；

(4) 农村振兴要避免多年前运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振兴的目的应是增进农民福利。

高传胜（南京大学）：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问题。各地乡村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可能全国只有一种振兴模式、一条发展道路，只能因地制宜。当前最值得关注的，还是离大城市较远的偏远乡村。这样的乡村，往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商人才匮乏，发展机会较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薄弱，青壮年流出严重，而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土地资源与地域空间。因此，能否通过吸引人才、资本来盘活闲置低效的乡村资源，发展适合当地实际、又具有较好市场前景的产业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从各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和最终结果看，乡村振兴无非有三个基本目标：

(1) 农民的现代化，即让农民参与现代化实践，并从中获得切切实实的改善。

(2) 农村空间品质的改善，也可以说农村环境的改善。

(3) 农村的产业发展，获得新的产业发展动力、培育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形成新的产业空间布局和特色产业带。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

(1) 农业如何实现产业模式进步、逐步现代化；

(2) 农村如何保持生态文明、阻止进一步凋敝、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繁荣；

(3) 农民如何富裕、提升生活现代化水平、满足其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乡村振兴，应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差异化振兴路径，重点是释放农村基层政府活力、培植和发育农民企业家带头作用、解决好农民基本社会保障覆盖。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1) 乡村振兴必须放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背景下来考虑；

(2) 乡村振兴并不是要振兴每一个现有的农村村寨，而是振兴有条件的部分，另一部分不宜人居的村寨应该通过人口迁移逐步还林、修复生态。乡村振兴的关键是人口和产业，需要通过乡村生活现代化以吸引人口、通过城乡产业融合提升乡村就业的收入。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从社会分工演进看，振兴乡村的远景目标应该是让广大乡村融入并享受现代文明，本质上是广大农村、农民和农业以平等利益主体的角色，融入以现代文明为特征、以现代化城市为中心的社会分工体系。就经济体系而言，是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有机与内生融合。就社会发展而言，是现代城市与现代乡村、新时代城市居民与乡村村民的有机和内生融合。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农村发展困难重重：

- （1）优质劳动力流失严重，在家务农的多为 45 岁以上外出打工困难的中老年劳动力；
- （2）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导致经济风险高；
- （3）农村企业减少，能够提供就近就业的非农就业机会下降；

（4）种粮比较收益很低，甚至会亏本，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大量农田抛荒。偏远山区农村很难分享到城市化、工业化所带来的机会，特别是土地无法资本化。偏远山区农村是振兴农村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

梁凯（江苏省纪委）：

振兴乡村根本目的是推动资源利用效益最大化，包括优秀文化的发扬光大，扶贫致富只是这个过程中的结果。

纪明（广西师范学院）：

乡村振兴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何留得住人、生活垃圾处理、假冒伪劣产品在农村横行、如何享有高质量的医疗教育资源等。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

乡村振兴，本质上是把乡村的个性化本土化，和城市特色形成差异，突出以农为核心的旅游休闲。乡村振兴应该不是为了缓解贫富差距，而不是把乡村作为城市。

孙军（淮海工学院）：

- （1）要在城镇化基础上的振兴，这个是大趋势，任何个人意志不能违背客观趋势；
- （2）要在集聚基础上的振兴，很多村规模太小，区位差、配套不足，形成不了集群化所带来的各种好处；
- （3）要在互动基础上的振兴，缺乏城镇、城村互动，形成不了持续振兴；
- （4）要在资源交换的振兴，缺乏资源禀赋优势的村落，很难振兴；

(5) 要在产权交易的振兴, 住宅等吸引不了城市资金流入, 振兴不易。

陈心颖 (福建省委党校):

当前乡村遇到的主要问题是:

- (1) 可流动要素的流失, 导致农村空心化;
- (2) 农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落后, 对高端要素缺乏吸引力;
- (3) 农业是高风险的产业, 目前缺乏相应的风险规避机制和金融支持;
- (4) 城乡之间要素交换的壁垒仍然比较高 (如土地);
- (5) 部分偏远农村自然条件等各方面条件差, 不宜居。

包卿 (江阴发改委):

空间结构而言, 不是追求均衡化发展。昔日村村发展企业和工业园, 导致生态破坏与难于治理, 设施投入低效和维护成本高以及景观破碎等问题。

周斌 (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 南京大学):

乡村振兴战略困境及难点在于城市化进程吸附农村大学生及农村劳动力造成振兴人力资源不足、城镇化集中建设导致农村未形成良性有效投入与回报体系造成振兴开发动力不足、新生代农民大多转向城市建设造成专业农业产业发生逐步落后于其他产业, 农业的内涵和专业开发程度远远不够、除了 78 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政策以来, 政府层面尚未形成行之有效的农村可操作的振兴发展战略。

三. 推动乡村振兴的政策建议

刘志彪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依托发展连绵的城市群落, 来振兴乡村, 是中国未来三农发展的最重要的思路。如果说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是中国乡村振兴最成功的经验和典型的话, 那么它们也是未来中国三农发展的唯一可以选择的发展模式。离开城市化, 离开了城市群的发展, 孤零零地振兴乡村, 根本行不通走不远的。其中, 放开对农民的各种不合理的限制, 鼓励人口自由流动, 政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陈柳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振兴乡村的含义应当是合理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如果以珠三角为样板, 我们在深圳广州东莞等地郊区是看不到多少真正的农村和农业的, 比苏南的农村农业还要少得多,

其实珠三角和苏南是靠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实现乡村振兴的，也就是把农村变为城镇。所以，在保护耕地、发展农业的问题上中国要有区域分工，让适合工业化的地区少搞农业，加快提升工业化水平；对不太适合工业化的地区，通过土地集中发展现代农业，努力实现这些地区的交通通达，生活水平与工业发达地区大体相当，同时实现人口自由流动。一个地区以农业为主还是以工业为主，并不是区域的歧视，而是合理分工，关键是区域公共服务水平达到基本均等化，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乡村振兴必须基于城市化提质升级，需要城市物理边界（城市空间）和“无形边界”（现代文明）的扩张。在此过程中实现有机的、内生的分工融合。

当前乡村振兴的着力点：

- （1）乡村治理与基本公共服务；
- （2）乡村振兴的主体认知与培育；
- （3）农村市场开放与资源要素流动。

此外，乡村振兴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步推进。

梁凯（江苏省纪委）：

农村的衰败，是因为农村资源随着年轻人流失而枯竭。农村最大的优势资源就是土地，振兴农村，要允许城市人去农村置业，人去了自然就把包括文化、知识、资本、技术等各类资源一起带去了。

纪明（广西师范学院）：

关键是城乡融合发展，加强城乡之间的产业联系，依托相互联系的产业支撑体系，使人才能够在城乡之间相互流动，改变目前人才仅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现状。

梁君（广西师范大学）：

大部分农村还肩负粮食生产的重任，当前农地不断减少，抛荒现象严重，因而发展基于农地流转的现代化农业，促进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是重要路径之一；此外应依托现有城市群，大力促进农村就地、就近城镇化，促进农村人口适度向这些小城镇流动，同时避免大都市人口过度集聚。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

以育种科技加大农业优质品种的培育，简化种植难度并增加产量。另外就是以大的消费品

牌与农户的结合，让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更加顺畅，真正让农民从身份变成职业，成为农业产业工人。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乡村振兴要高质量地推动“市场下乡”，包括城市市场、区域市场、国内市场甚至全球市场。要发挥市场在乡村振兴中的决定性、引领性、整合性、效益性作用：所谓决定性，即乡村振兴需要政府扶持，但健全的市场机制必须是根本；所谓引领性，即发挥市场的需求导向对乡村供给端的市场化再造；所谓整合性，即通过市场把乡村资源要素从碎片化、离散化、低端化，变为集中化、规模化、品牌化；所谓效益性，即振兴乡村必须以效益为基础，形成自我造血、自我再生产能力。

王建青（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

我国仍处于传统城市化的中心化发展与信息化的去中心化发展并行阶段，在这两个效应的对冲与融合下，使得乡村与城市的发展表现为“融合、互通、集群化”特征。

（1）主动适应农村村落布局和农业经济业态所发生的变化，注重发挥市场对各要素的配置作用，充分挖掘互联网、物联网、移动互联的优势，依托乡土要素搞好食品加工、特色生产，发挥乡土优势开办休闲旅游、农业文化旅游，利用土地三权分置带来的盘活效应推动规模化农业生产。

（2）设立农村区域性小微民营企业特色产业园区，对其进行产业化孵化、助力，并提供科技、智力、金融等配套公共资源，对各企业进行产业链的对接、优化配置，形成整体产业集群优势。

朱菊萍（江苏社科院泰州分院）：

（1）农产品对政府财政贡献甚微，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采用差别化干部考核机制，激发基层干部积极性，切实帮助解决各类现实问题。

（2）鼓励种植业、养殖业、观光业等多业态融合发展，形成循环生态农业，降低经营风险。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调整农业的“为全国和全球而生产”理念，加入“为本地而生产”的理念，所谓本地，就是最近的那个城市；国家应提出“每个城市一个或足够个的小型或中型牧场计划”，鼓励“全民喝鲜奶”，建立肉禽蛋奶的“供需2f互动模式”。

孙 军（淮海工学院）：

- （1）乡村合并；
- （2）打通城村之间的互联的软硬件通道；
- （3）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发展禀赋产业；
- （4）发展城市群落，提升乡村与城市的网络化节点；
- （5）农村住宅对外开放；
- （6）集中改善农村的教育、医疗等公共基础。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

乡村振兴应当以乡村聚集为基础。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快速发展过程中部分乡村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从政策层面看，应当勇于接受乡村聚集的现实，应当尊重自然发展规律，否则公共服务的成本难以承受，也是巨大浪费。

对于一些自然形成的乡村聚集中心，一些有特色的乡村，应当在规划、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给予扶持，在保持乡村特点的基础上提升活力，适应现代生活，促进城乡融合。

对于一些难以避免会消失的乡村，可以以搬迁或扶持其居民融入城市的方式，支持原居民的发展；或者可以在这些区域试点资本下乡，看看市场力量是否可以探索出一些特色振兴之路。

毛丰付（浙江工商大学）：

- （1）大城市辐射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关键是破除二元分割的制度壁垒问题。
- （2）与大城市联系较弱以农业为主的乡村，要害之处是农业产业化，必须解决要素的反向流动问题。
- （3）老少边穷地区，以维持生态，人口转移和帮扶为主。

盛文军（人行杭州）：

- （1）发展现代农业，提升农业生产率和农业投资回报率。
- （2）着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水、电、路、网络等。
- （3）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包括文、教、卫、体等。
- （4）有序推进农村特色小镇建设，如民宿、养老、旅游等。
- （5）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逐步推进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并健全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人，财，地”是基础要素，也是手段性因素，乡村文明摆脱对城市文明的弱势、依附地

位才是根本。这既需要利用城市文明成果，如科技手段、开放视野、人文素养，又需要激发乡村文明的积极因素，如乡风家训、乡野闲趣、民俗传承。

林学军（暨南大学）：

振兴乡村，最主要在于农业的产业化发展，引入现代产业化经营方式。发展的重点在于将农村的土地、房产、经济作物、生产资料进行盘点，把生产经营进行股份制改造，实行专业化生产、股份制经营，用现代的生产经营方式振兴农村，发展农业。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乡村振兴肯定不能以留住农民为目标，而是以提升农民搏击市场、融入城市的能力为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必须将经历一个分化发展的阶段。因此，促进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也应在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的构建。

（1）人文层面，保障好不能离开的、服务好不愿离开的、为主动进入农村的创业者或养老养生扫除政策障碍。

（2）空间层面，引导乡村的空间再造，分类施策、一村一策。

（3）产业层面，尊重不同地域的产业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以要素的合理流动为主要机制，形成新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乡村振兴未来的方向包括：

规模化发展农村种植业、水产养殖业，地方政府需要建设农业协会协调村落经济发展，包括推进农产地品牌化管理；

鼓励农业资本进入农村，地方政府应当始终站在农民立场，保护本地农民切身利益，包括优先雇佣本地农村劳动力、农民以土地投入参股分红等；

完善农产品流通渠道，地方政府应当整合资源减少中间环节，包括加速农产品与城市农贸市场对接、深化菜篮子工程。

岳中刚（南京邮电大学）：

从振兴布局看，乡村振兴应先从大城市周边区域试点，发展生态农业、旅游农业、特色小镇等，然后向边远区域示范推进；从市场主体来看，大城市周边区域可以发展小农业，特别是旅游农业带动的农家乐等业态，但边远地区尤其是交通不便的农村区域，必须发展“大农业”，以规模经济和多元化经营解决市场风险问题；从市场方式来看，乡村振兴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方式以解决农产品的空间匹配和时间匹配，如采用电子商务或社群营销等方式扩大生态农产品的销售区域，提高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以团购、预售或众筹等方式对农产品以销量定产量。

晁先锋（南京市发改委）：

要有人，有人才有生机才有活力，现在乡村最大问题是人往城镇去，剩下的都是老人儿童，而留住人就需要有产业有就业。

要有平台，就是要有能发挥才能和潜力的载体，这样乡村发展才能自己造血，实现可持续发展，比如电商发展给新一代农民也带来了展示自己才华机会。

要有好的发展模式，中国农村状况千差万别，各自条件不一样，需要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路径，不能搞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

陈心颖（福建省委党校）：

- （1）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推动；
- （2）进一步打破城乡之间要素交换的市场壁垒，实现双向流动；
- （3）因地制宜探索农村保险和农村金融对农村产业的支持；
- （4）增强农村提供公共方面的服务的能力，缩小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
- （5）对基层的村干部，公务员，教师，医生的工资待遇要给予适当倾斜；
- （6）加强城市文明的渗透，让在乡村的人们既享受城市的便利生活方式，又能享受到农村的田园气息；
- （7）对于一些确实不宜居的地方，要予整村搬迁。

张立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 （1）城镇化，富裕农民关键还是要减少农民。
- （2）农产品质量溯源体系和信息化建设，前者是和农产品质量提升相匹配，否则当前的信任环境下价格无法覆盖品质提升的产量损失；后者则有助于农民做生产决策。
- （3）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价值链，促进三产融合延伸产业链。
- （4）产业发展目标是富农，完善利益链的关键还是统分合作，生产还是要靠大量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和合作社则解决单个经营主体难以应对的市场等方面的难题。
- （5）注重发挥村两委的带动作用，还要重视吸引乡贤回归。
- （6）做好土地文章，承包地和宅基地三权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和资金来源。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 30 论坛华东组委会）：

改革一直延续的价格、土地、医卫、教育、环保等领域各类变种的“工农业剪刀差”，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发展适合农村实际，有利于城乡资源就近互利的远郊经济、公路沿线经济，解放耕作业人口，把土地交给种粮能手，提高集约效益。

(3) 环境与人文综合整治。

(4)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整治，除了文化下乡，根本上是提振农村致富信心，创新城镇产业生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增加农村吸引力，减缓 90 后 00 后新人类流失速度。

司增焯（江苏师范大学）：

(1) 乡村振兴要依靠政府支持，组织引领，尤其是镇村组织要主动作为。

(2) 乡村振兴要依靠人才，村组织建设要把村里德才兼备的能人吸纳到组织中去。

(3) 利用组织力量克服农民个体力量的弱小，也要依靠能人带领，借助能人的经验寻找市场，发现需求。

(4) 整合开发乡村资源，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是一个重要抓手。

高传胜（南京大学）：

加大财政投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并在引导居民适度集聚居住的基础上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供给力度；针对仍然存在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制度有效供给，让人才、资本有保障、有激励地下乡，带动乡村发展。

包 卿（江阴发改委）：

(1) 减少行政层级化公共资源配置扭曲现象，增强县市与乡镇发展的自主性。

(2) 县乡发展，支持特色化发展，农业、旅游业、制造业向特色集群化发展方向培育。

(3) 现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乡村振兴的制度障碍，加快制度改革创新步伐。

周 斌（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

(1) 建议从国家、省、市、区县，每年区域所有投资中必须拿出一定的税收资金支撑乡村振兴战略。

(2) 通过信息高速智能基础设施和新交通快捷基础设施，缩小与城市圈、工业圈、产业圈的距离，形成新的城市 - 现代农村发展大都市融合发展圈。

(3) 实施全国若干个乡村振兴发展综合试验区，在政策、专业支持、产业扶持、资金等多方面支持，孵化成功后逐步推广全国。

(4) 全力解决农业粗放生产、供给侧不足、产品附加值不高、农村 60 岁及以下劳动力外流、60 岁及以上劳动力闲置等问题。

(5) 采用定期、不定期，规定与自发等多种形式解决农村高端人才严重不足问题。

(6) 在新农村规划、新农村建设、新农业发展、新农村技能培训、农村新的产业生态圈打造等方面形成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指导意见，与全国试点相互呼应，供全国推广指导实施。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1）严格控制乡村土地供给，提高宅基地等乡村土地的使用价格，落实三权分置，助力农民取得财产性资产。

（2）根据地方农业特色实施科技创新，发展乡村新兴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改造传统产业，建立乡村经济体系。

（3）政府应当制订长远的规划，加强产学研相结合，形成创新联盟，提高创新能力，给经济增长注入持续的动力。

（4）着力打造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载体和平台，吸引资本和金融集聚，进而吸引人才集聚。

（5）严防借机搭车搞变相的房地产开发，形成亮点纷呈的乡村特色经济模式。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乡村振兴主要还是靠产业的振兴，建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比如旅游观光、养殖业、农产品深加工等。乡村投资主要应投在产业上，可以成立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基金，发展特色产业，防止无效投入，真正以产业带动民生就业，带动农民致富，带动农村发展。

王海平（南京财经大学）：

（1）调整乡镇—县之间的财力匹配格局，释放乡镇级别活力；

（2）土地红利的释放；

（3）产业的增值；

（4）新一轮县乡级国有企业的振兴。

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专家热议 江苏高铁建设与乡村振兴

2018年03月23日

编者按：江苏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全国前列，但区域内部发展差距较为明显，特别是苏北与苏南城市相比较，无论在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城乡发展水平之间均存在明显差距。2018年两会期间，我国高铁建设的区域差距与乡村振兴，成为全国上下热议的话题。近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江苏高铁建设与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针对江苏省高铁建设存在问题、对策及乡村振兴的努力方向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江苏高铁建设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

高铁不仅是基础设施，也是生活方式，更是对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作用。

（1）高铁为生活和经济活动提供了更好的资源管理，资源包括时间和金钱。在出行方面准时可控，方便精准安排行程规划商务活动，提高了碎片时间的利用效率。

（2）高铁必须连成网，因为出行需求不仅是满足起点到终点的需求，更会派生出中间节点上的需求，并产生无限的组合可能性，半小时内可以从苏南到苏中，1小时可以从苏南到苏北，资源配置在更大范围内优化效率，是可期待。

（3）高铁覆盖有助于削平经济发展落差，大大加强江苏经济一体化的质量。

江苏加快高铁网络建设优点：

（1）苏南、苏中、苏北，各个城市的产业结构不同，有各自的优势，随着经济交流的增强，可以优势互补，加强苏南与苏北城市之间的协同，新的高铁站可以覆盖周边特色乡村，配合公交等其他出行手段，使周边乡镇能享受到地级市及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有助于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

（2）从苏南到苏中再到苏北（除徐州城区），经济发展程度存在一定的梯度落差，连接的区域在消费，生产效率，劳动力人口矛盾突出程度上，都存在很好的互补性和协同性。

（3）有助于进一步加强苏北和苏中地区对外部资源的吸附能力。因为不通高铁，我们大多数投资人总是把苏北的项目放到第二类，去一次苏北太不方便。如果高铁半小时可达，江北八

市被资本关注的程度会更高，优质企业获得资本更为方便；同样的科技辐射，创业人才的吸纳也面临的类似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4）有助于产业转移和缩小贫富差距。目前苏南的制造业，随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减少，用工成本上升，需要向苏北及其他地域转移，高铁带动的 1 小时出行圈，降低了沟通成本，增强了企业管理的快速响应能力，承接苏南产业转移的效果会更好；此外，产业转移为当地居民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有助于缩小江苏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增加当地人口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政策建议：

（1）站在大格局下通盘考虑，借助长三角大湾区东风，在长江南北形成多通道的高铁体系，不仅是有利江苏一省，更是造福全国，整个沿海经济的纵向连接与搞活，将大幅度降低沟通成本，大幅度增强经济效率。

（2）要不囿于当前的城市分布和铁路干线布局，铁路带动新的城市的发展，在历史上数见不鲜，郑州、石家庄，莫不如此。高铁规划可能带来的区域产业发展新契机，需要进行专题研究。

（3）关注高铁带来的民生问题。核心是高铁出行产品的定价问题，需要考虑江苏南北中多地的经济水平差异，可以按照不同的速度进行差异化定价，提供多种价格及体验的出行产品；不同价格对应不同出行速度，需要有高速，中高速，中速等不同速度的产品，满足不同的时间需求，既满足支付能力较强的商务需求，也要兼顾支付能力较弱，对速度不敏感的出行。

孙 军（淮海工学院）：

存在问题：

（1）江苏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虽然苏北经济相对落后，但以连云港为例，其经济总量与甘肃的最大城市兰州相当，虽然几条高铁在建设中，但至今仍未通高铁，变成了天涯海角；

（2）苏南、苏中、苏北之间高铁不畅通，使得三大地区之间的要素流动、人文交流等甚至不如与其他省市之间便捷；

（3）苏北实际上具备很多的禀赋优势、大企业以及创新实力，但高铁的欠缺，使得其发展受阻，人才引进受限；

（4）沿海高铁，连云港段设计时速仅 250 公里；

（5）以连云港为例，高铁站以老火车站为基础建设，人口稠密、道路拥挤，无法适应快速交通需求。

建议：

（1）全力打通江苏各地市之间的高铁链接通道，加快江苏一体化进程；

（2）苏北经济实力远超中西部绝大多数城市，建议给予足够重视；

（3）建议将连云港高铁站想办法向猴嘴延伸，托起连云港整体发展框架；

（4）南京要想办法增强与苏中、苏北的链接；

(5) 提高高铁建设标准和时速，否则最终会变成鸡肋。

徐震中（银河证券）：

江苏铁路的硬伤恰恰是过分强调以南京为中心，而忽视广阔的省域发展空间，因为省内两大铁路中心，无论是南京还是徐州，都是偏居西南、西北一角，与外省相邻，对省内带动作用有限。加之种种原因形成的江苏城市特别是省会的首位度不高，无法形成资源高度聚集的一线城市，所以无论是南京还是苏锡常，均辐射能力有限。因此，在目前格局下苏锡常地级市的资源只能被上海虹吸，百强县不断凋敝；同理，偏于一隅的南京也无法很好让广阔腹地城市受益。

建议：打通中路南北大通道，推进中轴战略，利用五峰山大桥谋划淮扬常宜杭高铁，也就是京沪二高铁或京杭高铁的最重要核心区段，也符合国家战略规划。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高铁已有和正在规划，包括：京沪（含沪宁）、徐盐、连盐、宁淮、盐通等。现有高铁体系困难和不足：

(1) 江苏经济重心（苏州、南京）和交通要塞（徐州）都是在省份边缘，难以发挥带动作用。除京沪线外，没有大动脉贯穿。

(2) 江苏省内城市网络体系不足，导致高铁网络无从建起。中心位置没有经济重心城市，高铁体系也就无从构建。

政策建议：

(1) 利用沿海高铁、京沪二线机会，率先将连云港、盐城、淮安、泰州、南通、宿迁连起来，形成“井”字形体系；

(2) 省内在苏北中心区域建成中心建设中心城市，省内自筹资金建设“米”字形体系。

踪家峰（南开大学）：

(1) 建设重点在苏北，形成沿江、沿海贯通所有地级市的网络；

(2) 形成苏北两大超级枢纽：徐州和南通高铁建设与机场建设相结合，与城际铁路相结合。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1) 江苏的高铁平行线太多，如沪宁一线，南京到南通，南京到徐州，连云港到南通，徐州到连云港，所以网状线是当务之急。

(2) 高铁的中心不要拘泥地级市，如沭阳，100多万人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变成一个高铁重要节点。

(3) 从新沂南下，到扬州或泰州过长江，应该借助京沪二线，或者自己规划，需要一个

南北平行线。

建议：

- (1) 重点以淮安为中心打造苏中（尽管淮安不属苏中）高铁米字中心；
- (2) 苏北选沭阳等大县打造高铁米字中心；
- (3) 新沂南下取直过长江打造一条大动脉。

黄志军（江苏省农行）：

江苏高铁，南北分布不平衡很严重，长江以北，高铁很稀疏，长江以南，高铁分布也有问题。新修的铁路标准也不高，规划也有问题，以连淮扬镇为例，现在还 250 公里的标准，还没建好就落后，根本不具备京沪二线的技术条件，而且还连接到镇江，地方博弈到了这种程度，镇江在苏中地区都已经靠后了，没有辐射能力，而且镇江本身就在京沪线上，没必要非连不可。

孙国民（南京大学）：

(1) 补齐短板，以南京、苏州、徐州、淮安等为中心，打造高铁一小时经济圈，实现互联互通，比如南京至盐城的高铁项目要加快推进。

(2) 打通断头路，要在全域一体化互联互通上下功夫，规划好跨区域、接壤县市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林学军（暨南大学）：

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非常的大。路通财通，通过修路，修桥，尤其是区域大城市，中心城市的高铁，城轨的互联互通，建设区域一小时生活圈，有利于加速区域内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整合区域内的生产要素，形成区域发展的合力、驱动力。因此，长三角经济圈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先行。

二．江苏乡村振兴

踪家峰（南开大学）：

乡村只有在农村人口少的情况下才能振兴。乡村振兴不能羁绊农民而得继续放开农民，农民不是身份而是职业。乡村振兴主要是生态恢复，回归田园风光，而不是看到数不清的农民和农村。此外，提乡村振兴不如提小城镇建设好，在小城镇基础上建设现代文明和城镇精神，现在搞村村通户户通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 （1）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培育一些新兴产业，积极对接新经济；
- （2）管好用好集体资产，尝试建立集体资产交易中心，规范集体资产产权制度；
- （3）探索建立农业国有平台公司，如粮食蔬菜等，用好支农基金及财政补贴，发挥国有经济带动动力作用，成为国有经济带动集体经济的一面旗帜。

黄志军（江苏省农行）：

- （1）核心还是要搞苏北苏中城市群，搞几个龙头城市（当然不是每个地级市都是），大带小、链条传动才是根本。
- （2）打破苏北行政体系的落后观念，要破除落后的制度惯性、文化惯性，比学赶超、科学发展。
- （3）乡村的振兴在于得人，没有人苏北搞不起来，但是高铁贯通后，如果产业没发展起来，苏北的人力资本会加速流失，既没人进，也留不住人，抽血效应会加剧。
- （4）当务之急要先把南京搞好，做大南京规模，做强经济规模，让南京真正留得住人才，提高南京的辐射能力；目前的江苏留不住高端人才，跟浙江、广东、上海的差距在不断拉大。
- （5）打黑除恶在少数苏北地区还是要好好搞的，反腐败也要多打苍蝇，塑造苏北苏中良好发展环境。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村庄是否消亡，不需要担心；需要担心的是，村民去了哪里？生活比在村里改善了还是变差了？

中美贸易战，中国如何理性应对？

2018 年 03 月 24 日

编者按：美国总统特朗普自胜选以来，频频对美国贸易保护强硬表态，其内阁团队也多次发表类似言论。北京时间 2018 年 3 月 23 日凌晨，美国宣布将很快公布 301 调查结论，可能会进一步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和收购交易，并对中国价值 500 亿美元左右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这表明了中美之间发生较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又更进一步，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中国必须沉着冷静、积极谋划。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第一时间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中美贸易战，中国如何理性应对？”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针对中国将如何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捍卫自身合法的权益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学者观点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美国本次制裁中国的出口商品领域主要涉及智能制造和通信产品。中国反制美国的领域初步不外乎飞机、汽车和农产品三类，后续随着贸易战升温还能扩展到其他服务贸易领域（比如教育、旅游）。可以说中美贸易战必然使两国经济两败俱伤。其影响后果之大之广之深目前无法预计。

不搞贸易战影响扩大化，单纯从经济角度而言，中国下半年的制造业出口增长将会受挫。解决思路无非两条腿走路：

- （1）继续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扩大内需。
- （2）继续扩大开放，拓展其他出口市场。

安礼伟（南京大学国贸系）：

特朗普执政后貌似“逆经济全球化”政策原因在于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都与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相关：①由于美国低端环节向外转移，导致美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和低技能劳动的收入差距扩大，“民粹主义”逐步盛行，特朗普当选是这种情形发展的结果；②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下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培育了美国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是全球生产网络发展的最大受益者。

特朗普一系列政策的目标是试图重塑和增强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特朗普执政后采取退出 TPP 之类的政策，目标不是要实施贸易保护，而是认为原来的贸易规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从而要重新谈判，制定符合美国利益的新贸易投资规则。中国贸易摩擦的背后反映了对于贸易投资规则制定权的博弈。

中国的对策：（1）属于自身的问题要认真解决，比如是否已经很好履行了加入 WTO 的承诺，自身制度是否满足新阶段融入全球经济的需要；（2）对于美国贸易政策中违反 WTO 规则的诉诸于 WTO 争端解决机制；（3）准备好贸易报复手段。事实上，特朗普对华贸易政策并不是突然事件，而似乎我们准备的反而不足且仓促；（4）务实推进中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说的太多过于高调可能强化“中国威胁论”的国际认知。

巫 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

对于中美经济冲突，中国应当合理把握应对尺度，制定分步骤的应对措施，例如按照美国对华出口的贸易规模和对我国国内行业的影响程度进行排序：

（1）先挑选对华出口规模和对我国国内行业负面影响较大的产品，按照 WTO 规则，发起相应的贸易调查；

（2）积极利用 WTO 框架下的磋商机制，证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不符合 WTO 框架；

（3）积极采取措施，促进美国国内力量加大游说，改变其贸易政策。

代中强（集美大学）：

特朗普政府以长期以来中国未能保护好美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为理由对中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制裁，其争论焦点仍然在知识产权保护上。我们得点对点拆招，在采取反制报复措施时，可以指出这些年来我们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在趋于严格，这可以在世界经济论坛（Wef）每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中得到证实。同时指出，单方面的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带来的垄断对发展中国家相关产业带来巨大威胁和挑战，我们也是从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对美国相关产业实施反报复手段。近期，可以针对美国出口优势产品在中国的垄断问题发起反击。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1）根据对等原则，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实行报复性关税措施及投资限制措施，规模、力度相当。

（2）利用 WTO 规则进行维权，申请国际仲裁。

（3）加大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开放，减轻对美依赖。

（4）完善国内市场，减税减负，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美国对贸易顺差的贸易伙伴制裁，历史上很多。对日本对韩国对台湾以前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结果只是让这些国家加速产业升级。也不必过度惊慌。短期会有阵痛。

（1）对于企业的升级，给予政策性的支持，例如税收、金融支持。

（2）扩大内需，减少因出口美国市场带来的冲击。

（3）继续加大推进一带一路，开发其他的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加大对外国投资的开放力度，对本国产业升级可以带来促进的作用，也可以对投资国双边贸易有促进的作用。

（5）降低对国外金融机构资金进出的管制。资本市场的多样化服务可以增加对国内实体经济的支持。

（6）评估我方与美国，甚至和他的联盟国双边的进出口贸易，包含质量与数量。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在态度上坚持降温处理，在应对上坚决还击。

（2）理性认识冲突程度。美国每年都会对中国细分行业、产品施加关税压力，现在不过是把以前的零售加税，变成打包加税。

（3）在报复品种上可以选择农产品和大飞机。选择农产品，让美国农民对政府施压，同时也为国内农业供给侧改革提供机会。选择大飞机在于，象征意义强烈、替代性大，可以争取到欧洲方向的支持，且注定无法获得这方面的高新技术。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经济的全球化给全世界人民都带来了双赢的利益，但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产业带来的冲突也是巨大的。虽然其实在高端技术方面他们仍然占着优势，通过贸易获取了高额的利润，但是从从业于传统产业那部分人的民怨越来越大，民族主义情绪在西方社会也日益高涨，所以排外的反自由贸易的倾向也会由此变得严重起来。

从贸易理论角度看，过多的贸易黑字其实是有害于贸易正常发展，有害于资源在全球的合理配置的。因此中国也应在减少贸易黑字方面作出努力！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1）国内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扩大内需，振兴实体经济，实现经济增长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

（2）继续实行渐进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问题应避免对美亦步亦趋，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留下余地。

(3) 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提高对美贸易双向开放对称程度，主动化解摩擦风险。强化与其他经济体的多边贸易关系。加快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与自由港的建设。

(4) 加强在细分行业领域的相关研究，做好应对性和报复性措施的研判，提前制定精准报复清单。

(5) 真正了解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困难，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激活企业家精神，提升企业发展信心，如真正的大规模减税，切实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 (1) 分析能够影响美国决策的核心产品来应对，农产品和一些高技术领域是首选；
- (2) 打好美国国债牌，华尔街在美国有较强游说能力；
- (3) 通过各种国际机构宣传反贸易保护，尤其是寻求发展中国家的支持；
- (4) 中长期，要减少对美国贸易依赖，尤其是贸易顺差。

方勇（南京大学）：

特朗普所挑起的这场贸易冲突，本质是为了在美国国内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因此我们的反制商品选择应着眼于消除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政治基础。

(1) 尽管 WTO 面临着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的挑战，但它仍然是当前唯一能被多方所接受、相对公正的争端解决平台，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信赖的贸易自由化促进机构，因此必须把中美贸易争端上诉至 WTO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利用全世界支持自由贸易的力量约束美国的贸易摩擦行为。

(2) 进一步加快全方面对外开放步伐，全面降低商品进口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

姚志勇（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1) 目前中美贸易态势有点像当年日美贸易态势，可以从历史中获取经验教训。

(2) 以压促变，加快改革开放。应从理性角度思考美国言行，包括川普言行。对等开放、对等关税，反补贴、公平贸易等等，对我国不一定是坏事。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 坚定贯彻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在民生改善中夯实内需基础，在市场取向的制度创新中激发发展动能。同时，加快落实刘鹤在达沃斯论坛所做的扩大开放承诺。

(2) 强化反击的“武器储备”，从贸易到投资到金融做全盘谋划，视美方的举措不断升级反击力度。

(3) 坚定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持通过多边机制传递中国声音，向世界传递反贸易保

护的声音。将美方以国内法取代多边制度安排行贸易保护之实的做法诉诸多边争议解决机制。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利用贸易战刺激与鼓励本国企业的技术创新，逐渐摆脱对美国在汽车、航天，工程机械等领域的核心技术依赖；通过降税等措施激励我国企业提高效率；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完善我国市场机制的各项制度。

孙国民（南京大学）：

（1）研究主动应对主要贸易大国贸易摩擦的“菜单”或者“中央厨房”，从容出击，做好应对准备。

（2）扩大中国贸易朋友圈，建立最广大的国际贸易统一战线，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维护全球多边体制和开放经济格局。

（3）持续推进深化改革，特别是减负降本、服务业领域的改革等要有一定的突破。

胡钟中（对外经贸大学）：

（1）加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试行消费者集体诉讼制度，降低创新制度成本，提升国内消费者福利，提高最终品价格减少顺差。

（2）增加对制度欠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和并购，整合价值链，解决套牢问题，增强上游定价权。

（3）鼓励国际化人才流动，对在国内投资及创新且全球缴税的个人或企业给予减免，对美进行风险投资的 VC/PE 做培训帮助他们更好获得国内资金和生产企业资源，提高在美投资谈判能力。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1）进一步完善落实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2）减少对一些低效率企业的产业政策和其他政策扶持；

（3）坚定不移落实金融服务业和电信服务业的改革开放。

张远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大幅开征大豆、玉米、部分小麦及豆油关税。

（2）对美飞机征税，在华市场占有率太高。

（3）宣布尽快履行加入 WTO 全部承诺，加速对外开放。

（4）把对美产品增加关税额度相对于美国对我国征收的一半即可，向世界表明我们不想

打贸易战。

(5) 先局限于贸易本身，就事论事不搞扩大化。不减持美国国债，不运黄金回国。

陈长江（南通大学）：

坚定的扩大开放，放开国内服务业扩大内需，让自己的高端制造全面占据发展中国家和部分发达国家的市场。

在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减少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从经济稳定性出发扩，加大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稳定增长，专心发展内需市场和友好国家贸易关系。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 利用美国商会反对的声音，使之不至于太过分；

(2) 利用华尔街大鳄的力量到国会游说向特朗普施压，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不利于美国经济；

(3) 万一贸易战开打，对特朗普传统票仓的农产品，比如玉米、大豆等减少进口，进行精准打击，逼特朗普到谈判桌。

踪家峰（南开大学）：

(1) 继续扩大开放，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

(2)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3) 大幅度减税。

二．政府人士观点

梁 凯（江苏省纪委）：

美国提高关税，打击中国应该只是副产品，根本目的应该是推动资本回流，提升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促进就业。中国应对不应该只局限于贸易对抗，应该从争夺资本入手，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降低国内营商成本，让在中国的资本比在美国的资本回报率更高，可以采取包括降低税率、开放市场等手段。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贸易战一般在贸易形势较好的时期，金融危机时期不会打贸易战。这次贸易战也是在国际经济上行、贸易往来升温的背景下。因此，贸易战是一种抢夺“胜利果实”之战，是争夺市场份额之战，贸易战不会影响世界贸易大局。

贸易战打响可能促使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自由贸易港的布局和建设可能加快，也许近期就会出台。服务业开放也会加大力度，一是被美国逼的，另一个方面也许是一种应对。今年 11 月召开首届进口博览会，估计在进口政策上会更加积极主动。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

- （1）做好国内高质量发展的事，尤其是高科技原创性自主开发，真正实现赶超；
- （2）集中和团结全中国全社会的一切资源，有些民营企业在美国是有威力的；
- （3）运用 WTO 的法则，克服困难落实好，执行好。同时联合对美不满的国家，齐心对付美国的专横；
- （4）利用美国内民众家庭消费额陡增产生的不满，做好大外宣工作，使美内部对川普使加压力。

王亚利（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

- （1）发展新兴产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强高新技术研发、开放制造业，通过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产业结构升级，严格知识产权保护。
- （2）启动应对措施。对美国中国的汽车和进口农产品，如鸡禽、牛肉等进行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 （3）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沿线与不同经济体的贸易自由化建设，深化与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多边贸易关系。

刘昌伟（江苏版权协会）：

- （1）加大国产产品采购支持力度，对高科技产品、汽车加大关税，这是对美国政治有影响的领域；
- （2）国内区域经济发展提速，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关中城市群、雄安新区为龙头的京津冀等的发展；
- （3）扩大内需，减税让利。

三．企业家观点

王以丹（南消股份）：

- （1）取消出口退税的同时，减少进口关税。人民币同时适度贬值。出口退税的社会管理成本过高。人民币贬值可对冲取消出口退税对出口的冲击。取消出口退税所得税收，可用于降低进口关税。降低进口关税，可对冲人民币贬值对进口的影响。

(2) 做打持久战的准备,把精力放在国内市场上。通过改革减少国内市场的交易成本,进一步活跃国内市场。

(3) 美国总统对中国的好产品说不,我们坦然接受。只要美国货是我们需要的,又便宜,照样进口。缺美元,可抛售美国国债。

(4)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给予一带一路国家低利率的人民币贷款,促进相关出口和产能输出。

(5) 加强对我国自己的企业在我国自己的市场上的知识产权保护。

马步洋 (Metalink 新材料):

特朗普上台是在美国经济全球化之后部分社会阶层利益受损的情况下发生,代表了这种具有广泛性的社会思潮与阶层利益。今天,贸易战的开打,除了特朗普本人的意识形态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利益至上的思想潮流蔚然于当今美国。所以,特朗普执政团队采取激烈措施确保美国经济利益至上的政治信条得到落实、兑现其竞选诺言,其经过周密盘算已经准备了一系列激烈程度不一的措施,使得今天的贸易战不是通过传统的双边谈判、一次简单的让步清单就可以应对。

应对措施:

(1) 针对特朗普的软肋主要是其政治支持者的蓝领工人和农民在飞行器、汽车、农产品等领域,宣布针对性的大幅增加关税等措施;

(2) 预判美国政府后续将采取的措施,系统梳理准备跟进的有关措施,做好贸易战进一步升级的思想和物质准备;

(3) 积极呼吁和开展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期待控制贸易战的负面影响程度、防止进一步发酵成为全面和长期的经济拖累;

(4) 寻求在国际法、贸易法、全球各种贸易协议基础上,迫使美国政府让步的法律依据,考虑在 WTO 争端解决机制等国际经济公正救助方面的法律措施,建立符合法律共识乃至纳入诉讼机制应用的综合性法律措施;

(5) 通过谈判、让步、经济利益的交换首先破解目前形成的美欧日在中国贸易问题上的联盟,为中美之间直接谈判达成最终求和协议铺垫外部环境;

(6) 积极准备应对因为可能的中美贸易战升级带来的对于经济的直接和间接冲击,形成可操作性的系统性措施,主要是防止对于国内部分产业的重大冲击而形成的企业倒闭和居民失业,维护社会稳定、避免影响大局;

(7) 从此次中美贸易战的来龙去脉深度分析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内省和外迫的双方推动下,进一步完善国内的改革开放。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 （1）分低中高三个烈度去做好应对的预案。
- （2）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沉着应对，避免“毕其功于一役”的冲动。
- （3）充分利用广阔的国内市场，有效的消化和应对冲击。
- （4）发挥一带一路倡议的联合作用，积极的转化释放国内过剩的产能。
- （5）积极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应对冲击。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 （1）在知识产权方面规范产品商标注册和使用，避免损失；
- （2）支持创自主品牌、创优质高新产品、让中国标准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
- （3）减少国内市场各项规费、促进内贸流通盘活市场；
- （4）鼓励企业在周边国家设立分公司作为销售渠道，避免贸易壁垒造成损失。

王建青（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

“贸易阵地战”层面，在判断贸易战无法避免的情势下，有声色、有梯度、有进退地对发动贸易战的美国政治力量给予基本政治支持的区域、人员所从事的出口品种实施精准反制裁。

“贸易诉讼”层面，联合国际上与中国有共同贸易利益的国家 and 相关部门，充分运用国内外两个专业化应诉资源，积极运用 WTO 规则机制，协力展开强有力的专业化多边双边诉讼。

“构筑经济安全体系”层面，树立“治本经济安全观”，多维度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维护中国国际贸易合法权益提供强大的经济安全战略纵深。

进入新时代为什么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018年04月02日

编者按：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这一表述中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这一根本性、历史性的变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主要标志。对此，有社会思潮认为进入新时代，经济建设不再是中心工作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也不再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认为，这将模糊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从而可能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他组织专家、学者们，针对“进入新时代为什么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也没有改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因此，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的战略方针。

具体来说：

（1）从需要方面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虽然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但是不仅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且，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美好生活，离不开丰富的物资基础，需要有更高的生产力来支撑。

（2）从供给方面来看，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虽然代替了落后的社会生产，但是“不平衡不充分”，其实说明了总量矛盾转化为结构性矛盾，生产力发展处于非均衡状态，是一种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有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对后进状态。

（3）从现实和比较的角度看，中国生产力发展不仅总体上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距，而且结构上呈现出高度不均衡，如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城乡差距很大。再如从较为原始状态的农业和手工业，到世界领先的航天航空产业技术，我国的产业技术体系呈典型的梯度分布。因此，我们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是解决有无问题，而是要解决好坏问题，解决结构升级问题，解决高质量发展问题，解决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问题。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习近平同志所说的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事关我们能否引领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潮流、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事关我们能否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不仅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为跨越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关口的迫切要求，也把它作为实现创新引领、协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过去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都提出过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由于曾经对这一问题的错误认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都经历了重大挫折。这表明，从实际出发，科学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从而认清中国国情，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表明，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件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伟大事业。

当前，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没有变。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判断是由经济基础决定。中国经历 40 年的经济腾飞，人民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供给短缺也已转为供给过剩，但没有改变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根本事实。我国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农业就业人口，工业化仍然没有完成，经济服务化也才刚刚起步。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也是由初级阶段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会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将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的时间提前到 2035 年，但距今仍然有漫长的 17 年时间要走。

孙建波（家族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秘书长）：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中，有着不变的因素，那就是矛盾的经济属性。过去，中国社会主要是要克服短缺，因为对主要矛盾的表述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的需求的矛盾；如今，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但发展的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体现在供给端就是不平衡不充分，体现在需求端也不再是简单的需求，而是美好生活需要。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矛盾本质仍然是生产力的矛盾，不过是从简单的扩大再生产，变为高质量的充分、平衡的生产发展。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经济建设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这是人类繁衍生息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建设也是一个经济体的主要任务。没有物质财富的生产，再伟大的社会发展蓝图都不可能实现。更何况当下的中国，远未实现财富自由，产业发展处在关键的转型时期，还有大量的贫困地区与贫困人口，城乡差异显著，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限制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其实现。因此，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国才有可能实

现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

刘昌伟（江苏版权协会）：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民对于经济生活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中国与发达国家整体社会经济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主要体现在：人均 GDP 目前属于中游水平，在先进制造、信息技术等科技水平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一些领域一些地域对生态环境破坏比较明显，这与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尚有差距；三大产业比重依然与发达经济体存在一定差别，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业比重，尤其是科技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等与社会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比例。

（2）国内发展存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尤其中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不仅是收入水平，还体现在生活水平、生态环境、产业结构上。

（3）目前，我们准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在清醒认识到我们要实现共产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此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发展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位一体的方针策略。

谈 镇（江苏省委党校）：

（1）全面决胜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建设这个基础上。

（2）马克思说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社会发展的最基本规律。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地位。

（3）基于历史性成就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判断我国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确立新思想，进行新斗争，实施新战略，就必须突出新经济，才能完成民族复兴伟大的梦想，国家强，经济必须强。经济强，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需强。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我们可以通过排除法来论证要不要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从“五位一体”看，如果以政治建设为中心，就会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以文化建设为中心，回到无休止意识形态争论中，错过发展时机；如果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再好的设想必将因为经济支撑力不足而难以为继；如果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中心，那就将只有绿水青山而无法摆脱贫困，最终恐怕连绿水青山也保不住。从“四个全面”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法治保障和政治保证的。所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是“四个全面”中心，而小康的核心还是经济建设，是从温饱向现代化的过渡。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从 2017 年数据看，中国人均 GDP 不到 9000 美元，不足美国的 1/6；人口老龄化处于加速阶段，离不开经济建设的强力支持；总体性社会保障依然处于底线保障，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城乡区域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严重。各种挑战与问题内在地规定了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必然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与此前相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必须同步更新，即要走高质量发展的新道路，特别是对发展速度的要求已经从高速阶段进入到中高速阶段。这本身就是对新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新内涵的体现，必须转向质量与效益，转向发展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 30 论坛华东组委会）：

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经济成就，让发展的结构更加平衡、更加充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内容不再是速度，而是建设高质量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这才是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内容。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 （1）五位一体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演进。
- （2）贯穿五位一体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包括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各环节。
- （3）经济建设的新时代新阶段的任务是建设现代经济体系和推进高质量发展，以及公平的公配机制。
- （4）坚持党的领导、五位一体建设，目的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也就是以人民为中心。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决定的，但不同时期内涵发生着明显变化，由原来追求经济速度和总量的粗放式发展，转变为追求效益和质量的高质量发展。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解决不充分不均衡发展的需要。经过 40 年的改革开放，生产力得到大力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产力水平仍处于中等水平，不平衡不充分的状态并没有根本改变。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人民美好生活不仅包括好的教育、稳定的工作、满意的收入、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舒适的居住环境、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物质文化类型的“硬需要”，还包括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尊严等主观色彩的“软需要”，这些都需要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包含“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的”，两者是前者包含后者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集合，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首先是要保障后者。人民的“更高要求”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这些目标的实现更不是独立于“经济建设”的，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有这些更高的要求。只不过这个阶段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是低水平盲目的建设，而是高质量的经济建设。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有可能既满足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也满足人民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层次的需要，否则，如果以其他为中心，就可能既达不到更高水平的目标，反而会连基本的目标都丢失了。

张少军（厦门大学）：

从农业来看，中国大多数主粮价格均高于国际主粮价格，未来如何缩小二者之间的价差，减轻政府贸易保护的壓力，又可以发展特色农业提高农民收入，需要在三农的发展中解决。

从工业来看，中国在大推力发动机、集成电路、高端机床等领域还没有核心竞争力，依然需要长期的、大规模的投入。

从服务业来说，优质的教育、住房、医疗等服务依然短缺，仍然需要通过发展供给性价比高的服务。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经济建设依然必须居于中心位置，因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始终在路上，而现代化大厦最坚实的基础和最关键的支柱，必须依托高度发达的经济。

进入新时代，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赋予新内涵。当前以及今后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主攻方向必须是建设一个以创新驱动为主动力、以未来产业为引领、以先进制造业为基础、产业结构更加完善、价值链完整且高端的高质量经济体系。

新时代处于中心位置的经济建设，必须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是为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经济建设；五位一体的经济建设；是速度、质量和效益有机协同的经济建设；是国家创新能力不断取得突破的经济建设。

王建青（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

（1）普遍性上讲，经济建设是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动力源泉，是最为基本的平台支撑。

（2）特殊性来讲，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无论从量还是从质上都有不小差距，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任重道远，这都需把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去推进。

(3)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就是经济建设。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理论维度看，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建设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带领人民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也是人类社会制度更迭的本质所在。

逻辑维度看，要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经济发展是过上美好生活的基础。发展不平衡则说明区域发展有后进和先进之分，发展不充分则表明经济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没有得到最大程度地解放。

目标维度看，要实现十九大报告中全面小康及现代化发展的两步走战略，我国的经济增速必须保持相当的速度。我国同先进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差距，经济建设仍不能放松。

时空分异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更加开放包容的市场经济取向，要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位协同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逻辑和现实看，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实际上包括了问题和目标双重导向，即过去的经济运行机制和模式尚存诸多问题，同时人民群众的需求水平进一步提高，从而对经济建设的目标要求更高。

解决新时代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各领域面临的问题，都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同样，实现“两个一百年”中远期目标，也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基础。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从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看，仍然体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点，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仍呈现较强的二元结构，而且将在短期内持续存在。而二元结构又是发展中国家的最核心特征。因此，应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比起世界发达国家来说，我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从人均收入看，我们只能算中等偏上的国家，我们还存在着地区的差异、城乡的差异、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异、行业之间的差异，等等。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要立足中国的国情，制定实事求是的目标和计划，脚踏实地地解决好本国的事情，改善民生发展经济。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是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边疆地方人民依然经济落后，人们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环境、社会保障等不断增长的需求，所有这些的实现都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才能实现。

崔卫东（蓝鲸咨询）：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然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逐步消灭贫穷，达到共同富裕，在生产发展和社会财富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部署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托底型三大战役，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想：

（1）脱贫攻坚战。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2）乡村振兴战。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3）小企创新战。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提高小规模纳税人标准，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扩展普惠金融业务、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宏大的课题，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下一步要更加注重加强对小微型企业的支持，当前，应注重从三个方面加以扶持：

未来，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环境下，应加大对具有科技“单打冠军”潜质的科技型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

通过精准扶持有地区特色的小微企业的发展，实现区域人力、资源、市场和环境的最优结构，实现乡村振兴。

通过加强小微企业和精准扶贫对象的对接，加强产业扶贫的支持力度，将产业发展和长效精准扶贫有效结合起来。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

2018 年 04 月 16 日

编者按：本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同于以往，不仅涉及中国传统产业的出口，更涉及到众多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出口。特朗普依据所谓 301 调查的结果，拟对大约 5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额外征收高额关税，这些加税的领域大部分集中在《中国制造 2025》中计划主要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与此同时，美国拟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收购。因此，本次贸易战被认为可能对中国产业升级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这一专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分析了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若干加快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总的来看，对产自于我国的某些新兴产业的产品提高关税，直接地提高了该产业产品的销售价格，从而遏制了其需求。这是从市场方面影响我国新兴产业成长速度的最大因素。从供给面看，限制我国企业在美投资尤其是并购高技术企业，也会抑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速度。但是问题也可以反过来看，这类针对中国新兴产业的贸易摩擦，对我国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新兴产业来说也不全是坏事。其实它只对新兴产业发展具有短期的不利影响。

从长期来看：

（1）我们可以通过开拓其他市场领域，或者通过扩大内需增加国内对新兴产业产品的使用和消费来回避。

（2）进一步提醒国内生产者要增强对别人包括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优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从而为建设创新驱动国家奠定更好的基础。

（3）刺激我国加大对某些新兴产业如芯片等投资力度，从而加速某些依赖进口的新兴产业的进口替代进程。

另外，中国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服务业方面，还具有广阔的开放空间，贸易战将会促使这些领域加快开放从而加速发展。如制造业中的汽车、钢铁，高端服务业的金融、旅游、建筑设

计、医疗、电信、互联网、新闻出版、广电等领域，大多处于对内对外的垄断状态，在降低关税、放开股权比例限制、进口配额限制、打破国企垄断、放开行业管制、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开放空间。建议这些产业在对外开放之前，首先对民营企业开放，加大对内开放有利于民营企业把这些产业的竞争力迅速提高，以防止对外开放急促使这些产业丧失竞争力。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谈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应区分本轮中美贸易摩擦将如何收尾，这取决于美方发起贸易战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那么美方的目标是什么？个人认为，美国借助关税惩罚手段，是希望迫使中国在国有企业、跨境数据流、技术转让要求和知识产权等的国际交往方面完全按照西方主导的市场规则行事。仅就这一目标而言，我认为这是无理的要求。原因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在国际上开展涉及知识产权国际贸易和投资时，尽管可能与美国国内的相关法律存在一定冲突，但是遵循了现有国际经济规则。而且美方高科技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资或向我方进行技术转让时，是遵循企业自愿的互利的市场化行为。更重要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的定义，除了和发达国家的“新兴性”要求有共同之处以外，我们更强调一般新兴产业所没有的“战略性”特征。也即，所谓战略性新兴产业，它不是一般的新兴产业，而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和长远影响的战略地位的知识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其发展路径，在市场化 and 政府扶持这两种共生互补关系中，由于发展阶段不同，我们在WTO 多边框架允许的范围内扶持了部分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但美方发起贸易战，可能会促使我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扶持加快向技术研发环节倾斜，而非继续沉溺于技术引进。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中美贸易纠纷涉及美国打压中国新兴产业问题，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几点：

（1）在部分新兴产业的某些技术水平要求中等的环节，中国已经建立起一定比较优势，并且美国担心这种优势会逐步延伸到高端环节；

（2）中国新兴产业的市场与传统产业一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需；

（3）外资企业占据中国新兴产业出口的相当比重，还不能说本土企业在新兴产业上国际地位就有多高。这说明虽然出口产品层次有所提高，但是中国制造、西方消费的经济循环模式尚未打破，尽管中国制造仍然高度依赖于在华跨国公司，如果到中高端产品也由中国来生产，这种模式西方是难以接受的。因此，提高中国居民消费占经济当中的比重是中国产业升级、全球经济平衡的关键。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

中美贸易摩擦需要辩证分析，尽管诸多负面影响难以避免，但如果加强内部调整，有可能转危为机，倒逼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技术及零部件领域的产业高级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我国急需

或需求前景广阔、但现阶段国产化率较低的领域。比如芯片，中国已经在封装测试等环节具有一定的布局，在手机、物联网、新能源等领域的下游应用中已经有大量的应用，并成为每年进口占比较大的品类。贸易摩擦可能带来具体产业在产业链分工的不同环节出现一定程度的割裂，供求关系及产业生态关系遭受破坏，但这主要表现在短期现象，从中长期而言，可能催生和倒逼产业结构重塑，从终端产品的进口替代进一步向纵深推进，倒逼关键零部件产业的国产化。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影响中性。国内战新产业，在技术来源、产业体系与市场空间等主要维度上，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核心技术外部依赖性较强的，在增加技术引进困难的同时，会获得国家更大力度支持。市场外部依赖性较强的，可以转向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国内市场。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美国发起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动机是限制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无论贸易战的结果是什么，都将对我们通过兼并收购或直接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实现赶超产生负面影响。目前，高端芯片等核心技术还没有突破，这个时候通过国家战略加快突破很有必要。对于企业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依托强大的内需市场，加大研发投入，完全有可能在一些领域实现重大技术进步。当然，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保障，否则“创新驱动”无法实现。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在价值链分工模式下，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意义即在于依托新兴技术形成由价值创造活动串联而成的产业体系，进而推动高质量发展导向的经济转型。新兴技术和市场需求是两大战略支撑。美方将制裁目标对准中国制造 2025，其负面影响主要在于抑制中方借助全球资源推动技术创新，同时也势必抑制中方在创新过程中构建全球价值链。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这次美国主要针对我国与发达国家处在并行水平的产业领域，在这些领域我国并非承接产业转移，而是需要自主创新。美国主要是从压缩我国国际市场空间和加大技术转移壁垒两个层面来遏制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这次贸易摩擦，从前一层面看对我们有负影响；从后一层面看会迫使我们加大自主创新投入，和引进高端人才力度。

孙 军（淮海工学院）：

中美贸易冲突既给我国战新产业带来了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挑战在于，模仿式创新逐步走到了尽头；机遇在于，在创新驱动深入人心的背景下，给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

给了我们转型的紧迫性。

二.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加快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张 慧（新疆经信委）：

贸易之争下的战略新兴产业，思考几点：

（1）国家层面上战略指针由对国际调整为对国际、国内，重心转向高质发展，启动高质内需，应对国际贸易压力；

（2）利用深改，彻底放弃科研依托院校模式，继而走企业实体一统科研前沿模式，并引导由企业人才领军科技，还创新平台植根企业正常模式；

（3）地方战略收紧口径，应在倡导防风险的大战役下舍去大尺度融资或举债项目，顺势肃清恶意 3P 项目，使健康增长和契合国家战略成为地方战略发展方向。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

引入新机制，激活企业家精神及组织创新能动力，鼓励包括 PEVC 在内的市场化资金积极投入，发挥其承载于资金之上的投后服务能力，从整体上推进创新与需求的结合，助推产业整合重塑产业核心竞争力。

在制度环境方面，一方面要增强扶持政策的针对性、连续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向科技创新企业倾斜，最大限度激发企业的创新热情和活力；另一方面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中介服务体系，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打击力度，形成创新 - 收益的正向循环，从微观引领激活产业创新态势。

在人才吸引、资金投入、产业链生态构建等方面三管齐下，以资本为纽带，促进风险投资机构与产业龙头企业与创新企业的协同发展。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美方制裁及时地给了我们警示：

（1）在全球化背景下，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极为重要；

（2）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必须要立足于强大的内需市场支撑。因此，一方面我们要以保护知识产权为前提，在加强自主创新的基础上谋求多边技术创新合作；另一方面要以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为突破口，为有效扩大内需夯实基础，同时对创新发展形成正向强刺激。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开拓新的国际市场。假设此次贸易摩擦缘于修昔底德陷阱，则需要努力开拓其他国家

新市场。

以更加开放和谦卑的态度审视、改进我们的创新环境。从思想上要达成一个共识：我们已经从模仿创新阶段转向了自主创新阶段，对应的制度设计和创新环境都应与之适应，以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孙 军（淮海工学院）：

- （1）继续放权让利，为创新型企业减负；
- （2）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落地性；
- （3）打通科研与产品研发商业化之间的断层；
- （4）打破垄断，为创新企业的发展创造机会；
- （5）持续发扬企业家精神；
- （6）打破国内壁垒，构建国家价值链，形成全球价值链；
- （7）最终形成市场主导，政府配合的良好氛围。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美国 301 调查和关税壁垒将使得中国航空航天、信息及通信技术、机械等战略性产业受到影响，影响最严重的包括机电、通讯及信息技术、金属制品等高技术产业。

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积极应对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

- （1）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 （2）减少国内低效率企业直接补贴，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通过减税或研发补贴，扶持新兴产业研发活动，降低对进口技术和资本品依赖，而这并不违反 WTO 规则。
- （3）加大金融业开放，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 30 人论坛）：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战略新兴产业主要波及高效能医疗器械、生物医药、新材料、工业机器人、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航空产品和高铁装备，虽然影响并不会很大，但也要有应对之策：

- （1）加大产业扶持力度，重在提升相关企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即使与美国差距短期难以缩小，也可以提高产品在其他国际市场上的独到优势。
- （2）在金融、财税方面采取创新举措加大扶持力度。在去杠杆的背景下鼓励创新企业股权融资，鼓励、包容金融机构创新，科技金融重点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倾斜。
- （3）提前预防风险领域，如海外贸易政策变化。如新能源汽车产销、风电装机会不会不及预期，特高压建设推进是否今不及预期，尤其是提防国内新兴产业“泡沫化”。

(4) 改革开放，开放更要包括对内开放，为战略新兴企业创造更好的人才、技术等多方面自主创新的环境。

王建青（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

中美贸易摩擦，从市场阻滞、技术封锁、产业链斩断等多个维度，对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生负面影响。我们除了从市场维度加以应对外，还应从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内生动力和核心竞争力上下功夫。

将“军民融合”、“国企混改”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把军工企业、大型央企利用国家优质资源业已开发形成的技术储备，通过技术市场交易与技术股权形式的合资合作项目，嫁接到具有市场效率优势的民营企业上。

将“新型产学研体制”引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把国家公共科研院所、大型企业内设科研机构、学校内部科研机构、企业型科研实体、小微技术企业，以具体的市场化产业发展项目为合作纽带形成“产业科研综合体”。

中美贸易纠纷进入微观冲突阶段 和中国的应对

2018 年 04 月 23 日

编者按：继中兴通讯涉嫌向伊朗出售包含美国商品和技术的产品，并 2017 年 3 月与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司法部达成支付 8.9 亿美元罚金的和解协议后，华盛顿时间 2018 年 4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官员宣布：因违反美国政府的制裁禁令，禁止美国企业在未来 7 年内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销售元器件。这次美恢复制裁中兴事件，对中国的 IC 产业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际影响上都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近日，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中美贸易纠纷进入微观冲突阶段和中国的应对”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针对美国从微观上制裁中国高科技产业，对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影响和未来中国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对策建议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美对中兴通讯下手，从对中国高科技产业零部件断供开始。其实打乱甚至毁灭的是中国参与国际代工的产品内分工循环体系。从中可以看出：

- （1）中国确实深度地融入了产品内国际分工；
- （2）中国融入的是高科技产业的低端生产加工制造环节；
- （3）中国对生产者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技术创新“链主”依赖性很大；
- （4）这次“贸易战”上升到了“产业链”排挤战，因为核心技术的缺失，以及国内市场需求刚性，中国估计会做出更大的让步；
- （5）产业链排挤之战提醒中国人，要加快建设独立自主的现代产业体系，要加速关键核心技术的进口替代。

丁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 （1）要想彻底解决制造业空心化问题，需要深度总结三星，华为等后发企业成功实现赶超的经验。
- （2）享受经济全球化红利，积极整合发达国家技术资源。三星半导体雇佣了大量日本技术人员，华为的芯片研发过程，有 IBM、台积电以及大量海外实验室的深度参与。
- （3）加大投入，长期积累。三星半导体从上世纪 90 年代，华为海思芯片从 2000 年以后

就开始布局。长期亏损，始终不放弃，最终修成正果。

(4) 立足国内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华为、三星的主要营收都在海外，是在没有产业政策保护的情况下，在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成长起来的。

(5) 进一步强化在下游整机市场的优势。三星、华为在上游元器件领域的突破，均源于他们在下游整机市场的强大竞争力。产业链下游稳定而高质量的需求，会大幅降低上游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领域的风险。

刘昌伟（江苏版权协会）：

制裁中兴既有中美贸易摩擦的现实背景；也有中国产业升级和核心技术、先进制造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由下游应用到上游技术和解决方案提供者的角色转变，包括 5G、高铁走向主导或成为标准引领、人民币全球化的大背景，美国企业不愿看到中国企业由买方市场跃升到产业链高端的卖方市场，美国政府举动本质是企业资本代理人的意志。

针对这种情况：

(1) 中国 IC 产业坚持开放包容与自主创新两条路，一方面要缓解到解决核心技术之痛，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力度，不能受制于人；另外一方面要保持开放大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产品，通过竞争提高国内核心技术和创新企业的竞争力和创造力。

(2) 政府要营造市场氛围，让国内核心技术企业有生存发展的生态空间，主要是市场空间，引导产业链形成，并密切合作，良性循环。

(3) 对 IC 产业发展要有清醒的认识，承认我们的不足，包容并协助解决现有问题，在市场引导下加强良性竞争，激化企业核心技术创新意识和危机意识。

刘晓昶（华泰证券）：

中兴事件不仅仅是芯片问题。美国更加关注的是对未来 5G 赛道的争夺，即未来 5G 国际标准是以美欧中哪国版本作为主要标准，这不仅涉及巨大的经济利益，更涉及未来国家信息安全。在这方面，中兴作为中方 5G 主要集成商和规则制定者早已成为美的眼中钉、肉中刺。现在 5G 竞赛刚刚开始，中方主力队员便被红牌罚下场。5G 之争结果会怎样？

邵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1) 我们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低技术环节，中兴、华为在技术集成和市场研发方面走在前列，但仍未掌握核心技术，是靠一大批吃苦耐劳的现场工程师打下的天下。

(2) 面对这个实际要有两手战略。根本是要发展核心技术。但当前更要注重处理好产业链关系，要遵守契约精神。

(3) 以市场换技术是可以谈判的，关键在筹码。不要轻易放弃。

(4) 在创新人才方面，要注意保护海外华人专家。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影响：

(1) 增加芯片采购成本，增加技术授权使用成本；

(2) 制约产业规模扩张，恶化产业体系生存环境。

对策建议：

(1) 在多边体制框架内，推动 TRIPs 相关规则修订，遏制单边规则的适用；

(2) 对接多边规则，强化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供给，健全技术开发、授权使用、违法惩治等方面的制度设计；

(3) 重视市场在自主创新中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新技术的市场应用和检验；

(4) 加强对内开放，使民企在创新中的机制优势和国企在创新中的体制资源优势充分协同；

(5) 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推动面向全球创新资源的开放协同创新。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从小规模的贸易摩擦到小规模局部贸易战，实施对中国经济的软肋 ICT 产业精准打击，对中国芯片及集成电路产业企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及损失。

对新时代国企改革与发展目标产生重要影响，或许需要大幅度优化、调整。尤其是担负着一带一路及要建设成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的企业，特别是对冲击世界 500 强的国有企业或许产生的影响更大。

建议对策：

(1) 国有企业落实国家战略及国际贸易，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仍然要讲规则守规则，更需要有大国担当与智慧。

(2) 沿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补足短板，尤其是 ICT 产业的短板，加大研发投入和管理，争取在芯片及集成电路上取得一些具有核心竞争力成果的突破。

(3) 中国政府及部委机关等切实拿出可行的应对措施和机制，并认真研判中兴案例，绝对不能出现第二个中兴。

(4) 对新时代推进的 14 项战略也需要优化调整，比如军民融合战略，切实尊重与保护知识产权。

夏网生（江苏省商务厅）：

中兴事件将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标志性事件，可能成为对外开放思路调整的转折点，要研讨检视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做法，包括成功的做法，如产业链招商，要培育和发展有控制力的

新兴产业。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1）我们这么多年嵌入 GVC，攀升上主要是右端攀升，但核心技术的左端攀升成效不显著，特别是关系“神经”系统的芯片技术和“心脏”技术的发动机。

（2）美国向中兴开刀，主要原因是，中兴的技术依赖性更强，中兴的市场规则遵守更差。而中兴是国企，华为是民企，这也说明进一步扩大开放前扩大向民企开放的重要性。

（3）美国的核心技术来自于 NASA 军用技术转化，相比较这个有效体制，一方面我国关键军用领域长期不向民企开放限制了活力，另一方面技术转换渠道不畅、资本平台几乎不发挥作用。

（4）我们目前从 GVC 攀升，主要还是转向 NVC 阶段，在国内培养完整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虹吸全球先进要素。这需要举全国之力，营造好的营商环境。目前超预期改革需要重点放在在这个上面。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必须要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研究方面做好长期战略规划，积极跟踪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趋势，推进技术创新，对关键技术提出科学可行的国产化目标，打造安全的产业体系。

在扩大开放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构建起以内需驱动的国内产业价值链以及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掌握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用竞争政策促进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鼓励高科技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搭建起高效的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遵守国际规则。同时，要加强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意识，特别是要保护好涉及国家经济安全的商业秘密。

认真总结和汲取全球化中我国企业长期形成的投机取巧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对以往国内产业界所形成的“以市场换技术”的产业发展思路进行彻底的检讨与纠偏。

张明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影响：

（1）动摇高科技产业升级的核心技术基础，中国高科技产业核心技术和关键生产环节，严重依赖进口制裁，会产生釜底抽薪的效应。

（2）推升下游产品的生产成本。

（3）阻碍中国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进程。

政策建议：

（1）短期来看：寻求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替代产品；支持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协同研发。

(2) 长期来看：调整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思路，确定自主研发的主攻方向，加大战略性技术的研发投入，给予适当的政策倾斜；借鉴发达国家科技创新经验，尤其是日韩的一些企业，在高科技产业的制度设计和机制创新；改革科技创新体制，破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为评职称而进行所谓的创新，在学科建设上加强针对性；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熟知并遵守国际贸易服务贸易规则和商事法则。

谭蓉娟（广东工业大学）：

中兴是中国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中兴是国内在一些底层基础设施（如 5G）相关的技术投入和研发中最重要的几家公司之一。目前，中兴两大类核心业务对美国具有高度依赖：一是对美国核心技术和上游元器件的依存度非常之高，30% 的组件要靠美国的高通、英特尔、微软等提供。特别是核心组件中的高速 AD/DA、调制器、高性能锁相环、中频 vGA 等产品，目前还没有国产芯片厂商可提供替代品。二是中兴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了集中研发和投入，其核心基础是基于美国 NVIDIA GPU 等构建的芯片集群。可见，本次美国的制裁对中兴具有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制裁范围扩大到更多厂商，包括但不限于华为、海康等，那无疑是直插中国高科技制造行业的核心。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中兴事件暴露了中国在全球化中权力与能力两方面的缺陷：就权力缺陷而言，还不具备绝对自主选择贸易伙伴的能力。就能力缺陷而言，基础性、核心性的技术依然受制于人，尽管产业体系大而全，但是却不够高而精。

特朗普政府对中兴的新制裁，对于中国来说，解读出来的信号，极可能是进一步放弃所谓的比较优势理论，更加痴迷于国产化程度的提高。因为一旦依赖于人，无论是高端产业，还是低端产业，只要在短期内无法自给，同样都会带来短期灾难。甚至仅仅是细分行业中的隐形冠军，都会成为套在脖子上的绞索。这一评估，会增加中国的不安全感。受此刺激，为了绝对安全，中国采取的应对之策，无非是国产替代，而这会形成连锁反应，伤害命运多舛的全球化。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

(1) 贸易摩擦是对中国经济软肋 ICT 产业的精准打击，中兴是中国芯片及集成电路产业企业的典型代表。现在找差补短还来得及，关键是发挥全社会的整合力。

(2) 对新时代企业改革与发展目标定为具有核心竞争力，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有不可替代地位。这样才能真正保护国家利益。

(3) 要有全人类的眼光，这个前提是讲人类文明的规则并守规则，这就需要有大国担当与智慧。

(4) 找准 ICT 产业的短板，动员全民攻关，透明择优提高研发费精准利用率，深挖中国

企业自有内在潜力。

(5) 对新时代推进的各类战略切实优化路径，抓手是切实尊重原创人才，让保护知识产权成为全社会常态。

常士杉（康庄金融）：

从发动中美所谓的贸易战征收 500 亿商品关税，到口水战升级为 1000 亿。从限制高新技术出口中国，到具体封死中兴北美生意。川普挥舞制裁中国之剑最后目标是什么？我认为是为了维护正高处不胜寒、摇摇欲坠的美元霸权。近期中国连续推出石油、铁矿石全球期货交易单品，全面启用人民币结算，借以在国际商品市场发出中国声音，拥有中国定价权，结束单边挨宰的被动局面。这触发了川普美国永远世界第一的霸主地位，所以才通过发动贸易战扼杀人民币或中国金融资本的全球主导权的快速崛起，才是矛盾核心。

王建青（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

在日益数字化的时代，IC 产业居于全球产业链的核心位置，对于各重量级产业竞争者来说，都具有战略意义；通过国际贸易的方式采购核心零部件的方式，会在产业竞争、贸易摩擦加剧时被竞争对手卡住脖子。

由于 IC 产业是技术密集、资本密集、人才密集的战略产业，使得进入该产业的门槛非常高。因此，中国发展 IC 产业必须有战略耐心，绝不能只寄希望于依靠资本力量在短期内就实现产业化。

将 IC 产业链的发展有次序推进，对于产业链中牵动性强的装备、设计等环节要重点突破，对于影响产业能力生成的研发、企业家、技工等人才要素要打破常规多渠道配置，对于制约产业协作效率的体制机制壁垒要坚决打破，对于业已形成的国际标准、代码等技术壁垒要在合作的基础上积极参与标准制定予以有效破解，营造良好的产业生态。

如何理解“大保护下”的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018年05月07日

编者按：2018年4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主持召开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新形势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关键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强改革创新、战略统筹、规划引导，以长江经济带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还要不要开发？如果要开发，在此前提下怎么开发？以什么办法达到这个高质量发展要求？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理解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这一专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若干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深入理解“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要在设定前提下开发。这个总前提是要能把开发造成的污染，控制在长江能够实现自洁功能的范围内，保护好我们的母亲河，让世世代代受益，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邵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长江作为自然资源，目前已处于开发过度的状态，而长江经济带整体上工业化城市化水平已较高，有条件反哺长江，修复生态。

不搞大开发，主要是针对长江资源本身，包括河流和岸线。全流域经济，完全可以统筹利用各种要素，实现高质量发展。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要大开发，不要不计后果、不惜代价、不算总账的大开发。对长江经济带而言，共抓大保护，就是长江沿线齐心协力共同保护好长江这个母亲河，把不向长江排污、不加剧长江的污染作为开发的底线，并尽可能地为提高江水质量作出贡献。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不搞“大开发”，就是不要在长江经济带再上大钢铁大化工大冶炼项目；代之以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主要是面向未来的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产业。“不搞大开发”，但“要搞大项目”，特别是战略性新兴大项目，依然是长江经济带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项。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

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树立生态优先的理念。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开发不是竭泽而渔式的，能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来开发即可。或者对开发给予立法，清晰界定开发的边界和程度。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不要大开发”是指不是“大”开发带来长江流域的不良后果，而是“小”开发保护长江经济带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产业多样性发展。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

不搞大开发还应有对已开发且不符生态的项目进行拆迁之意。建议我国可引入碳交易机制，对长江流域生态良好的区域进行补偿，力争惠及百姓。这也是即将进行流域 3 公里拆迁的基本原则。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长江从头到尾的区域经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可以理解一定程度上开发过度，不易再搞大的开发，但仍需要优化调整，局部的和区域的开发和调整，仍然需要。

包 卿（江阴发改委）：

大江大河、沿海地域以及生态敏感地域本身不宜“大开发”，这些地域是生态敏感区，是维系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区。但不是不要开发、不要发展，而是要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走创新驱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1）立足于当前的国情，特别是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背景下理解大保护。

(2) 以发展为保护的目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就是发展。

朱建平（建行江苏省分行）：

跳出“靠江吃江”模式，向“靠江护江”发展转型，打破沿江不同区域行政藩篱束缚，用建设生态长江“激活”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崔卫东（蓝鲸咨询）：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倡导自然生态与产业生态协同发展，处理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既不能对自然生态搞破坏性开发，也不能对产业生态搞破坏性关闭。

刘晓昶（华泰证券）：

长江经济带“不搞大开发”，不是不开发，恰恰是指要进行高质量开发，在立足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类资源，发展高知低耗型产业，摒弃传统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进行传统产业升级，提升该区域产业人才、知识、专利密集度，打造新型产业生态链。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经济还是要的，开发还是要的，但不是不惜代价，要以生态绿色，经济绿色为前提，优先考量。除了生态的考量，提升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还要注意区域的平衡发展。不惜代价、不算总账的大开发已经成了过去。

二、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把长江经济带看成是一个运输带、用水带、资源消耗带，看成长江开发就是运输功能的开发。这样从成本的角度考虑必然要大力密集布置重化工业。而应根据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落密布、人口众多的事实，将其看成是一个宜于人居的经济聚集带，即把长江流域人口、市场、产业、城市集中的优势，变成宜于实现战新产业、高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经济带。

马野青（南京大学国贸系）：

(1) 加强区域协调，做好功能区的划分。重点考虑省内按照各地优势及绿色、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划分，实行特色发展、差异化发展；

(2) 实行一定区域发展整体规划，制造业集中、进区，严格限制各类工业区及开发区的新增、扩大，盘活、提升现有开发区的功能；

(3) 树立环保自觉意识，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工业污染集中处置、达标排放；严格限制长江中上游地区化工等重污染产业的新建、扩张，加强下游与中上游地区的结对发展，建立基于内在经济联系的利益共同体；

(4) 实行创新驱动，依靠科技进步，大力发展现代绿色高效农业、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减少对环境资源的消耗。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1) 统筹全流域做一个多规合一的主体功能区规划，进一步划定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生态经济区和禁止开发区四类发展空间；

(2) 在产业发展上统筹制定一个负面清单，消除产业污染源；

(3) 明确长江经济带的岸线规划和堤防规划，突出长江两岸的防洪防灾的安全底线要求；

(4) 统筹做好长江经济带的水域规划，提高沿线污水排放标准，做到全流域统筹保护，并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杨建中（加凯集团）：

(1) 根据各区域的生态特色合理统筹规划，进行行业迭代发展，不搞重叠重复开发；

(2) 根据水资源的特点，上游的严禁各种重工业（含生物，化工）开发，中下游关停重化工业，离长江岸 10 公里内禁止开发化工产业，保护水资源。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尽力避免长江经济带由于发展不平衡引起或增加的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耦合成本，如产业结构、生态和制度等三个层次上的耦合成本。

孙军（淮海工学院）：

共抓大保护，除了各地政府严格环境保护、合作治理外，要进行长江带顶层制度设计，发挥媒体监督的力量和市场化定价机制，对排污实施严格的市场化倒逼；不搞大开发，就是要实施创新、绿色、协调发展，其中的关键是市场化机制的完善和实施，放权让利，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城市群落的力量。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长江流域横贯东西，自然资源禀赋多种多样，各地应当依据禀赋特征开发相应的产业。沿江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在发展仍是以行政区为中心竞争和集聚资源的阶段，协调发展的难度同样极大。

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沿江建设生态旅游、文化体育、渔业为主宜居城市群，串联发展，打破区域隔阂。

唐德淼（无锡市环研中心）：

（1）区域城市要统筹规划，根据自然禀赋，差异化发展，实现大区域内异质同构发展，打造开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生态链；

（2）长江经济带区域城市的生态保护的制度供给和执行力度要基本一致，导致生态治理跨区域执行难问题，可以成立长江经济带生态综合保护协调监督“管理局”；

（3）长江经济带区域城市开发，应该摒弃粗放式的开发模式，实现集约开发，制定产业发展规划，高标准严格控制开发时污染源的总量增加；

（4）科学变革长江经济带农业生产方式，发展规模化生产的现代农业，减少小农业对生态长期的不良影响；

（5）长江或支流沿线发展要划定红线，严控过度开发。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各方应扩大对内开放，以沪、浙、苏等技术实力、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为引领，构建基于区域技术创新、区域市场和区域资源的区域价值链（进而向域外和国外开放扩展），从而创新并深化区域分工合作，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从国资国企角度，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与举措，首先是认真落实四个发展理念，实现全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协同。其次是发挥国有资本的带动力、影响力，在港口码头在国有资本配置上可以实现优化调整。最后实行严格的环境保护，发挥环境保护税的调节作用！

包卿（江阴发改委）：

（1）要推动互联网的开放，以虚的开放，推动实实在在的经济开放与创新、转型与升级。推动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上海加快改革试点、加快开放创新。

- (2) 进一步推动资源的流动性，继续放开人口流动的管制。
- (3) 基础设施建设上，建议进一步放开民营经济体的进入，提高运营管理的公开度。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 (1) 优化现有的长江流域产业布局，淘汰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落后产业，将其打造成为中国高端现代制造业经济带。
- (2) 落实全流域综合治理的大保护措施，实现区域间的经济合作与环保合作。
- (3) 实行严格的环保目标管理，鼓励传统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以减少排放与污染；鼓励重化工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优化产业链及其空间布局，实现集中化环境治理。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 (1) 大保护就是大发展，全面实施沿江生态环境保护和提升工程，实现在保护中发展，落实新旧动能转换。
- (2) 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通过政策性银行的投入，为生态保护提供低成本，长期性信贷支持，中央和地方共同实施贴息补助。
- (3) 以“产业 + 地产”的形式，打造特色园区或特色小镇，构建长江经济发展珍珠链，集中实施污染防治，促进经济发展，开源与节流并举。

朱建平（建行江苏省分行）：

- (1) 遵循长江经济带自然规律，不容许他人破坏，做到人与长江和谐相处、共同发展；
- (2) 因地制宜，根据长江经济带的地域特色发展长江；
- (3) 以当地生态环境为基础，结合当地特色与文化，发展更丰富更全面的环境。
- (4) 妥善处理好产业发展和工业园设置问题，依托产业促进城镇化，同时有效控制生态污染。

王建青（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

长江沿线的环境资源保护的方式方法上，要构建上中下游协调联动机制；力度上，要形成强大合力，实施高效能可持续的管理；程度上，要达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效果。

资源开发上，依据环保、生态、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一方面优化存量，坚定淘汰生态破坏力大的项目，持续实施的生态修复工程；另一方面，要严厉管控增量，以建设现代化长江航运体系为大动脉，形成生态型长江产业经济带体系。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长江经济带大保护、不再搞大开发，根本的方法不是封闭不搞生产，而是不搞破坏生态环境的大污染行业，制定目标与方案，整治与改造原有的污染企业，特别是重化工产业，引进国外先进治理环境技术，优化产业与产品，鼓励企业转型升级改造。

孙东（南京市审计局）：

共抓大保护需要处理好几个协同：

（1）产业规划、地方法规等相关政策的协同，避免在经济发达省份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转移到沿江，特别是上游欠发达区域重新布局。

（2）沿江各省市加强环境执法的协同，避免跨省市非法倾倒、运输案件的发生；发生相关案件后，要对污染源省市相关单位和领导进行追责。

（3）相关职能部门的协同。无论是中央部委，还是地方职能部门，在环境执法中一度出现“九龙治水”问题，水利部门管不了岸上的环保违法，环保部门又下不了江河湖泊执法；因此，要加强生态环保、自然资源、水利、农业等职能部门之间工作协同，加强纪委巡视、环保督查、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等相关工作之间的协同，信息共享、成果充分利用，形成监督合力。

（4）加快“多规合一”工作的推进，纠正现有的违反“多规合一”的存量问题，严控新发生增量问题。

如何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2018年05月14日

编者按：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确立的重大发展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与此相应，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不仅是中央的要求，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理论指导。当前，长三角各省市之间竞合关系进入新阶段，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和深入推进背景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专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对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行了深入解读，并提出了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何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在高速发展阶段，区域内各政府主体为增长而竞争，如何把资源虹吸到自己的行政区域范围内服务于高增长，才是第一位。这种发展阶段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把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机制改造为“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在其行为目标函数中嵌入高质量复合因子，尤其是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因子，才有可能建立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保障机制和支撑要素。

一体化不是一样化，也不是统一化，更不是合并化，一体化是指各行政区域主体的相互竞相开放，尤其是地方政府之间的主动拆除各种明的行政壁垒，消除各种暗的潜规则，大力推进要素在区际之间按市场规律流动。从此意义上看，由于只有政府才有超经济强制能力制造壁垒，所以一体化的重点是政府的自我革命。那种一说一体化发展就要合并地方区域，就要收走地方政府的必要权力的做法，是违反一体化内在要求的，是会受到抵制的，也是不能成功的。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一体化”，就是像一个身体那样有机、协调、整体运作。身体可以分为结构与功能两个部分：结构，行使功能；功能，成就结构。一体化，不是一样化，而是在结构分工的基础上，各个组成单元实现结构与功能、局部与总体的协同。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区域一体化的要义在于区域各方形成合理、高效的分工合作关系，促成各方在专业化分工基础上联动发展。因此，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逻辑要点即在于创新分工演进的体制机制。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1）制度供给层面，构建经济一体化的基本制度；

（2）市场开放方面，开放各类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特别是鼓励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杨建中（加凯集团）：

长三角一体化不仅仅是产业、市场的深度融合，协同，而且政府也要打破政策壁垒和区域潜规则。而非“统一化”“合并化”“同样化”。只有产业、市场、政府等多维的相互深度融合，才能达到一体化的市场深度。

闫浩（江苏经信委）：

关键是打破行政区划对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让生产要素按照经济规律自由流动，实现资源在空间上的优化配置。不论是以行政区划为主的基础性专项领域一体化，还是以国家战略为主的对标世界前沿、先行示范、领先国内发展的一体化，都必须以要素自由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为前提。

二、如何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上一波全球化浪潮中，竞争主要标的是 FDI 以及各个产业项目，竞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恶性竞争”，也存在明显的同质化和产业同构倾向；当前，竞争标的物宽泛得多，从之前的争 GDP、争产业项目的“恶性竞争”转向争人才的这种本质上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积极竞争。合作在不断推进，合作的层次更高、深度更深，形式更加丰富、灵活。总体看来，竞争依然存在，但竞争的主题和方向正在转向为积极的竞争，旨在推动长三角地区内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而合作的领域则越来越广泛，合作的姿态也越来越主动。

未来长三角地区一体化的推进策略：

（1）鼓励积极竞争的领域；

（2）市场主体之间的正常流动和空间布局，只要在合理的制度和政策框架范围内，并且

排除各地方政府的超规制干预，就应当视为正常的市场现象予以认可。

(3) 合作领域应更为广泛，其中产业合作、资本流动、信息交换等，应更多地交予市场；但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生态环境的联防联控联治、民生工程共建共享等，可以建立多层次的合作机制：省际合作机制和城市合作机制；国家层面的高位协调机制，形成最充分的上下信息沟通机制，建立重大事项的快捷而有效的协商与解决平台。

王建优（朗姿股份）：

要解决所谓的高质量发展短板，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好企业家担忧的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创新的动力来自何处？二是持续的创新动力如何保障？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是，创建好一个鼓励创新和保障创新成果的制度、体制、法制和文化环境。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长三角一直是一种基于竞争与合作网络的一体化关系，但协同效应并不明显。197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是产业分工层次上的竞合网络，1990年代中期以来是生产要素层次上的竞合网络，未来走向如何？恐怕是价值网络层次上的竞合了。

价值网络，可以避免长三角内部产业链之间的同构及其纷争，可以避免生产要素的过度竞争，而实现基于不同地区产业集群效应的协同，建立知识、创新和人才流动基础上的学习效应（创新扩散效应）。

王建青（河北联宇集团公司）：

以国家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国家高协同性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和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区为行动纲领，充分释放市场性活力，激发经济发展张力，做到有机融合，优势互补，协调联动，发挥对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创新经济的“价值观与技术标准输出”作用，从而使长三角经济区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区。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 (1) 对组成单元进行宏观结构安排，确立各自的主功能属性；
- (2) 构建统一的中枢神经系统，以协同不同结构之间的行动；
- (3) 构建属于长三角在世界范围城市群中的一个共识性目标，以让各个结构单元在差异化行动的同时，指向统一化的目标；
- (4) 尊重各组成单元在结构上的天然差异，进行必要赋权，调动各单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与能动性。

邵军（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强化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尊重历史、地理的经济联系，城市的布局、交通的设计等等，都要方便人民生活的需求，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事项，具体的办事制度，要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从长远来讲，要改变频繁区划调整的劳民伤财之举，尽可能在不调整行政区划的情况下实现区域资源的合理配置。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尽管高质量发展并不单纯追求速度，但长三角经济占全国的份额只能扩大，不能缩小，否则就不能彰显长三角的优势。因此，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首要问题是稳住江苏、重振上海、加快浙江复苏，从而为全国经济行稳致远作出应有的贡献。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在公共产品或服务领域，长三角各地政府可以联合统一向市场公开招标，要求中标方在两省一市采取相同的产品或服务标准，向区域内消费者提供同质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以保证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体化。

在私人产品领域，打破区域发展中各种阻碍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政策等人为障碍，实现区域市场的充分开放和自由竞争，鼓励区域内企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产业的兼并重组。

沈晓杰（报人）：

淡化政府行政的影响和力量，真正让市场充当配置各类资源主体。中央政府的各类扶持举措和优惠政策，要按照长三角不同地区发展，用到最能发力的地方去，为真正建立统一高效高质量的长三角一体化市场提供公平有效的政策平台。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

（1）行政推动的机制不可或缺，但应突出社会化发展方向的三个明显属性：公开性、自衡性、公益性（社会利益优先）。

（2）站在全球高度协调城市群发展。对外，尤其是“一带一路”中“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中国制造（智造）中，长三角城市群可以成为优中选优的品牌。

（3）城市群的最高境界就是“便利”，要突出宜业、安居、乐活。

（4）改善公共服务。实现大数据的互联互通不仅能推动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发展，也是向新型智慧城市高质量演进，更是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精细化管理能力，挖掘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优化分工演进的目标导向：以“生态优先，绿色创新”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目标；定位于引领长江经济带乃至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区域开放协作标杆。

（2）完善分工演进的体制环境。转换政府职能，真正落实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健全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形成对微观主体合理、高效的激励约束。

（3）重塑分工演进的内生机制。聚合区域各方的创新资源，合力打造区域共同市场，构建各方共享共治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

（4）其中，政府职能转型是前提，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是基础，内源性分工动能塑造是关键。

包卿（江阴发改委）：

（1）提升区域全球化通道水平，着力在自贸区、沪港通、国际化论坛组织等方面的提升提高；

（2）提升本地化互动水平，促进各类组织平台建设和交流，建立共同基金，扶持和激励各类组织的发展；

（3）政府力、市场力和社会力协同，尤其重视和加强社会力。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1）通过互联网信息化打通供需平衡；

（2）利用各地区的成功经验分享借鉴，增进彼此；

（3）根据不同的地域与资源优势，最大程度的发挥优势互补。形成透明、互补、共享的新格局。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打造虚拟化的跨区域空间治理平台，利用先进的公共服务形态引导区域一体化；

（2）融合传统与现代，形成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多种产业共生发展的优良生态体系；

（3）加强空间上的资源部署与优化，如基础设施的统筹等，促进区域要素流动。

司增焯（江苏师范大学）：

一体化过程中要素流动，会形成增长极与中心城市和边缘城市与地区。要保障边缘城市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的统筹提供，否则会形成新一轮虹吸现象，形成新的或许更大的地区经济社会差距。

孙国民（南京大学）：

（1）管理协调机构要足够权威。

（2）围绕市场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服务型政府、改革引领型政府，科技、人才等高质量发展的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统一市场。

（3）构建世界级城市群，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链主基地和总部基地，构建以我（长三角）为主的全球共赢价值链，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龙头或重要一级。

唐德森（无锡市环研中心）：

长三角各地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政“分割”，导致了产业发展的重复建设和资源利用不经济。在政府主导下，产业发展同质同构严重、结构雷同和地区严重不合理逐利；区域市场分割、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依然存在，加重了产业同质化问题；大多数工业园区内产业混杂，产业配套不完善，低效产业集群乱象严重。从产业结构看，长三角是以发展制造业为基础，以生物制药、电子通信、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为支柱产业，产业结构同质同构进一步扩大；核心城市综合辐射和影响力不突出，缺乏高效合作；产业分工更加模糊，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空间布局将带来了资源环境的过度消耗和经济发展过度集中、分布失衡及产业运营出现“叠加成本”的不经济。

建立长三角企业控制的区域价值链，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对接国家价值链，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不断攀升 GVC 的高端环节是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主攻目标；有助于破解长三角产业同质同构问题，促进在区域产业价值链“异质互补”发展。

宋常铁（中国电改 30 人论坛）：

政府驱动要强力，但施力应在当处——公共服务、制度供给、省际利益协调及央地关系，产业规划、资源配置等交由市场内在逻辑解决。

各地产业集群升级固然重要，但更应正确认识原有产业的此生彼灭。除了国家给予政绩考核、人才政策的特殊安排以外，根本上还是四省市一体遵守共同制定的竞争政策——财税、金融、贸易、投资、人力资源与社保福利一体化协定。

区域一体化是四省市全面深度融合的进程，必须着眼历史文化传统、资源配置体制、社会治理的同步协同。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

（1）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各城市在高质量协同发展中的定位，形成城市错位发展格局。

（2）制定与区域规划体系相配套的精准性区域政策体系，实现环境利益、民众满意度、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等多元利益的获得；此外，同城化等区域合作发展机制也需要靠政策推进。

(3) 建立更加有效的长三角高质量协同发展新机制, 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通过改革创新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

陈启斐 (南京财经大学):

一体化的关键在于产业的融合发展程度, 鼓励区域增强产业链条的宽度, 可以适度的出台区域性的产品标准, 一方面强化产品质量, 另一方面提高关键强度。

刘昌伟 (江苏版权协会):

协调层面, 解放思想, 统一思路; 做好顶层设计, 制度供给优先; 建立联席协调机制, 做好各项工作的落地执行、监督协调工作; 形成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先进制造、基础生产、新农业为一体的创新链。

分工合作, 形成覆盖全国的竞争优势。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以产业集群为龙头, 在新时代充分发挥上海金融优势、浙江电子商务和小商品流转优势、江苏科技研发和先进制造优势、安徽生态和农业优势。

董也琳 (南京市委党校):

将地方政府考核机制从原来的 GDP 增长而竞争改变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新机制, 在新机制下地方政府的政绩不在于单一的 GDP 指标, 而更多的会关注就业、收入、消费、创新、公共服务等各个方面, 这就是原来的地方间零和博弈转变为抱团式的互通有无。

杨建中 (加凯集团):

做好长三角一体化顶层设计, 形成政府政策、产业集群、市场引导等多维度的融合, 实现区域经济良性生态发展, 再结合“一带一路”使企业产业将剩余产能“走出去”。

根据区域各省市特点进行区位优势功能合理布局进行分工、协作, 使四省一市相互联动, 提供人财物各类资源流动的竞争政策、快捷通道和利益协调机制, 破除区域政策壁垒。

任保全 (常州大学):

- (1) 大力推进地区间开放, 逐步消除一切阻碍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障碍;
- (2) 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型社会和经济体系, 促进区域内资源有效流动、配置与融合;
- (3) 大力推动基于长三角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异质性分工协作, 降低交易成本和商务成本;
- (4) 制定维护高质量一体化的制度评价监督机制, 对支持和违背一体化的行为建立相应的奖惩措施。

林学军（暨南大学）：

长三角的一体化，关键在于市场一体化、交通一体化、创新一体化和绿色发展一体化。真正做到一体化发展，需要本区域的省市领导，加强沟通与协调，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共同的目标和发展的纲领。同时，一体化并不是要排除竞争，有竞争才有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要做到分工协作，以竞争相结合。

张明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 / 杨浦）：

以上海科创中心为龙头辐射牵引区域协同创新。契合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战略，谋划各地对接方案；发挥上海科创中心的辐射作用，在长三角腹地培育一批高等级的产业集聚区；高度重视全球科技领袖型、先导型企业的引进、培育与专业化集聚，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龙头型”科技创新区域。

构建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体系推动产业迈向高端。协调现代产业体系建设规划，注重产业结构的均衡化发展，巩固制造业强省（市）的支柱地位，为推进工业结构转向中高端创造条件；在人才集聚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形成合力，努力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以吸引更多优质的创新资源；探索设立规范各类引导基金。

苏 健（南京市社科院）：

鼓励地方政府自发成立履行不同职能的区域治理组织，探索建立多元主体组成的网络化管理，注重多元弹性的协商方式解决区域间问题。

探索在地方性法规中制定有关区域发展中地方合作的规定。鼓励地方政府在开展跨行政区域的合作时，可以采取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行政首长联系会议制度、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等方式进行。

赋予地方政府在区域协调问题上具有适当的灵活性和必要权限，通过明确事权、财权使地方政府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一步得到释放。

中美联合声明对我国经济影响 及如何应对

2018年 05月 22日

编者按：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问题的走势成为全球最关心的议题之一。美国时间2018年5月19日，中美两国在华盛顿就双边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中方同意将大量增加自美购买商品和服务，双方保持高层沟通，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并积极寻求解决各自关注的经贸问题。在此背景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中美联合声明对我国经济影响及如何应对”这一专题展开讨论，各位专家、学者针对中美两国19日就双边经贸发表的联合声明对我国下一阶段的经济运行和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相对来说，增加从美进口是减少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最优办法。在可替代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减少从其他地方进口，比如石油、天然气等减少从中东进口，不至于对总体顺差产生较大压力，人民币汇率也不会面临太大压力。

李建平（卧龙湖小镇）：

中美相互进口的商品没有冲突，中国需要的是高技术产品，美国需要的是中低端生活品和工业品。只要美国放开一部分高技术产品，中国减少一部分其他国家的高技术产品，就能够达到双赢。现在问题是中國外汇平衡问题已经渐渐突出，3万亿外汇储备和1万多亿外汇债务，实际外汇可用储备只有一万多亿。

林学军（暨南大学）：

我们首先要改变思维，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前我们极力去扩大出口，争取外汇，高度依赖外国市场，依赖外贸，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出口和进口并重，做到利用国外市场和扩大本国内需共同推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和美国的经济合作、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是一种双赢的做法，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双方应该按照比较优势，展开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

张中祥（天津大学）：

中国能源结构是富煤缺油少气，无论是否从美国进口，中国每年都需要进口大量的天然气，而且进口量越来越多。这个与进口农产品还不一样，进口农产品可能还有一个挤压国内同类产品的问题。当然大量进口天然气对煤炭工业有影响，但煤炭现在本来就处于限制，另外环境因素对煤炭也有制约。把美国的天然气也作为选项，中国就可以在美国、中亚、俄罗斯和中东多渠道购气，某种意义上讲在世界能源地缘政治中掌握了更大的主动权，有助于降低中国多支付的亚洲天然气溢价，也有助于降低进口天然气的平均价格。

中国制造的崛起和高技术领域与美国差距的减小，已引起美国的警觉。然而，此次中美声明并未提及中国制造 2025，意味着贸易战虽然短期内可避免，但长期来看更广泛的冲突未必会有实质性改变。中国一直强调美国通过扩大高技术出口以减少对中国的逆差。但此次双方声明强调知识产权保护，隐含有警示中方不要指望再从美国那儿获取高新技术成分。因此，抓紧难得的缓冲期与机遇期，尽快解决制约中国在卡脖子技术发展的因素，提高这些技术的制造水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由于大量进口原料农产品，国内上游农业将必然遭遇困境。叠加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农发展面临外来市场的巨大冲击。

短期要为三农提供降落伞，减缓外部环境变化冲击的速度与力度；长期，要在保障口粮安全与结构优化之间进行再平衡，按照功能区部署，妥善处理托底与提优关系。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中美达成的相关共识有利于两国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中国获得较为宽松的国际经济环境。但是，第一，共识的落实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需要双方的进一步努力。比如，中国石油等产品的进口来源国本身也体现了政治关系，农业也有粮食安全的问题。第二，扩大进口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可能导致长期经常项目逆差，进而导致外储持续减少的预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一件好事情，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所以，中美贸易问题不是一次能谈妥当的，之间的不断冲突和协调将伴随中国外向型经济转型的整个阶段。

孙国民（南京大学）：

- （1）进口存在国别的替代性，推进进口总量适度提升基础上的结构性优化；
- （2）2000 亿美元削减量是个庞大的数字，不会一蹴而就，且我国会不断强调高科技产品进口，最后很可能在一些大宗商品、能源、飞机等产品进口方面进行一定的贸易“补偿”；
- （3）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减少中美贸易逆差，这是美国人希望看到的，但汇率升值及波动

给中方外贸出口带来很大压力，对“一带一路”、国际外援以及对外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必须加快人民币货币互换以及国际结算步伐。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满足中美就经贸磋商发表联合声明，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我们必须以稳中求胜的方式：

- （1）加大力度引进美国高科技企业与产品；
- （2）适当增加对美各项日常生活用品贸易关税，同时对国内企业减税降费支持；
- （3）扩大内需市场、精益求精、创自主品牌国际化道路。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扩大美国进口是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

- （1）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受到较大影响，连 U 型曲线的生产环节我们有些产业可能都“守不住”，会坠入全球价值链陷阱；
- （2）高端服务业成长会降速，有的甚至成长不起来，不利于服务业转型；
- （3）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渡了需求，压缩了供给侧改革的空间；
- （4）不利于产品品牌的进一步培育，尤其是完全竞争市场的产品品牌；
- （5）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繁荣国内供应，长期来看是压抑了国内比较优势不明显的产业发展，冲击了国家现代产业体系的完善。

方勇（南京大学）：

短期来看，中国将扩大自美能源、汽车、飞机、农产品和软件服务的进口，这将压低中国的能源价格、农产品价格和耐用消费品的价格，有利于提升中国消费者福利。但这将使生产领域的竞争加剧，中国的进口替代产业、农业和受到较高保护的国内制造业（如汽车）将受到较大的冲击。国内供给侧改革的进程将会受到冲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中国的生产领域、设计领域中广泛的使用盗版软件，知识产权标准的提升，将极大地提升这一环节的运行成本，甚至实质性的阻碍我们生产设计活动的顺利进行。

为顺利地度过这一冲击，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促进企业创新，为中小企业使用正版软件提供政府支持。另外我们也要进一步的扩大对内开放，提升民营企业创新创业的热情。

王建青（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

中国经济将从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转向贸易平衡型经济结构。中国要完成经济结构、贸

易结构的深度转型，实现贸易平衡，应从货币源头上入手，实质性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形成现代化的人民币商品结算、投资、国际储备金融价值链体系，从而为中国可持续地扩大进口，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崔卫东（蓝鲸咨询）：

中美经贸达成共识是新一轮全球分工格局调整的良好开端。中国产业界可以利用中美经贸共识契机，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点，主动参与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格局调整，优势企业主动调整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接近并替代链主地位，占据产业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推动产业强国建设。

王美今（中山大学）：

中美贸易谈判达成和解是意料之中的合理结局，但新的挑战随之而来：

（1）向美国多买，会导致向他国少买；减少对美国的出口，就要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出口，这会引来新的问题。

（2）降低关税和出口企业税收减少两方夹击使政府收入减少，如何解决？

（3）如果不能有效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出口拉动的作用减弱，如何保增长？

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我们已经形成最多的中产阶级群体，而且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直营、海淘、代购等消费模式反映出对高奢和轻奢等各种消费品的多样化需求，能否增加更加直接的购买渠道，缩小价格差。

中美联合声明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这能否倒逼本土创新，通过加大违法成本，尊重市场规律，实现共赢发展。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加大进口力度有利于平衡双方贸易；有利于改善我国相关领域的经济结构；有利于激发竞争力，满足高质量民生需求。

要注意防止对进口商品形成过度的依赖，要注重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进行分析和研判，防范路径依赖风险，准备好应对预案。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中国增加对美国商品和购买，有利于世界经济再平衡，助推经济全球化，满足国内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增加我国消费者福利；重视知识产权保护，从长远看有利于增强我国创新激励。

但是，冲击同样不容忽视：增加对美农产品进口，将加剧国内农产品市场竞争，不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对美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尚需进一步谈判。

就目前国内经济而言，近期大幅度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需要引起重视：

- (1) 加大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困难；
- (2) 美元正在步入加息通道，需要管控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的风险，金融业服务业需要对等开放。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主要影响在于：

(1) 经贸博弈显然应服从于双方各自发展的大局，即美方的“美国优先”和“重新伟大”，以及中方的高质量发展和“两个一百年”目标。所以，从中长期和全局看，中美双方应有更多合作机会。(2) 从美国对华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看，不至于对国内生产形成大面积替代，主要的影响可能在汽车产业领域，而且合资品牌和车企受到的影响应该更明显，同时会加速自主品牌和企业提质；另外就是金融服务和信息服务开放，但应该会以不冲击安全为底线。能源和农产品领域的进口，主要应该是对其它进口渠道的替代。所以，应该看到近期对国内生产和消费领域的积极意义。

我们的应对：

(1) 更加坚定地筑牢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底线。主要包括：产业价值链核心技术、农业领域的主粮生产、内需市场拓展、金融系统性风险防控。只有把安全底线牢牢守住，才可能更好地推动开放。

(2) 更加扎实地筑牢内需市场基础。主要包括：落实对内开放，建设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以规则、法治和公平为重点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对企业和居民的减税降负，提供更好的民生和基本公共服务。

(3) 因势利导，在金融业开放大背景下，着力健全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体制机制，使金融与实体经济更好融合，特别重视金融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支持；同时，借助金融开放，更好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对当前各大城市“抢人大战”的 思考和讨论

2018年06月07日

编者按：“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这句14年前葛优在贺岁电影《天下无贼》中的经典台词，已成为当前中国各大中城市“抢人大战”的精彩注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人口红利的衰减倒逼各地政府在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注重对“人才”这一发展支撑的追求；2017年开始，武汉、成都、西安、南京、天津等大中城市纷纷推出“送户口、送房补、送钱”等一系列手段吸引“人才”落户，当前波及全国20多个城市的“人才大战”在如火如荼地上演，甚至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也加入“抢人大战”。在此背景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当前我国的“抢人大战”展开了深入讨论，对当前国内城市“抢人大战”发动的背景和动机等进行了分析，探讨“抢人大战”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更高质量地推动“人才战略”提出相关建议。

一、“抢人大战”出现的背景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经济发展初期对经济增长发挥最大作用的生产要素是土地，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之后，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就由土地转变为人才。中国多年来形成了地区竞争带动经济增长的制度模式，这种模式在高速发展阶段体现在竞争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高质量发展阶段，目前体现在竞争吸引人才。抢人大战的背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区竞争的制度特征。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传统人才高地京沪深，受制于经济成本与制度成本，推动城市发展从积聚阶段进入到扩散阶段，人才流出，就是城市扩散效应的体现。

（2）新一线城市具备了争夺人才的战意与战力，有资源投入人才争夺战中。

（3）当前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起步期，谁能率先抢跑，将赢得先发优势。

（4）人才价值一直被低估。随着市场化加深，人才价值发现机制开始发挥作用。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院）：

当前城市间的所谓人才大战，我看是典型的中央地方博弈。在中央压力之下，多数城市都出台了房地产领域的以户口为条件的限购等政策，所谓的人才大战，主要是地方政府曲线变通突破这些限购政策的手段。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从各地人才大战的标准来看，涵盖了从熟练技工、大学毕业生到两院院士广覆盖的人才序列，其中可能有几个原因：

（1）城市有合适的人口增长率才有活力，才能继续进行新城建设在内的广义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建设，城市显示度才能增强，这一点已经被各地广泛认识到。房地产当然是这一方面的一个副产品。

（2）在高质量竞争阶段，区域竞争将人才等创新要素先于资本的竞争手段，是地方政府显示高质量发展观的政绩体现。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防止人口老龄化结构失衡的问题，如果没有年轻人口的适度输入，房地产就会难以为继，土地财政就会入不敷出，赤字就会难以消化，政府风险增大。

解决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的问题，因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需要高端人才支撑，更需要创新创业人才创造与大胆实践。

贯彻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高质量发展是系统性的全面性的考量体系，目前地方政府“无从下手”略显焦虑，于是就争抢创新要素（人才），不甘落后“一步”。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劳动力市场价格抬高，在现有劳动力供给不变情况下，很多城市人才争夺行为属于无奈之举。当前，城市抢人大战动因大致分为三类：拉动房地产目的型；人才驱动城市发展目的型；无奈之举型。

程鹏（江苏巨和实业）：

“人才”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一端连着供给，一端连着消费。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廉价劳动力优势消失，经济增速放缓，叠加2008年以来长期全球经济危机，市政基础设施、商业地产甚至房地产都有泡沫刺破的风险，这种情况下一些发达城市“抢人”成为必然。

张少军（厦门大学）：

当前中国经济从主要依靠低端要素的阶段，进入依靠规模经济的阶段，人口规模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在放开二孩之后，并未得到有效缓解，各大城市为了自身未来二三十年的发展，加紧了对年轻人和高素质人的争夺。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

为何而战。除了事关房价之外，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优势培育有一定关系。劳动力集聚有利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集聚，有利于工业化和服务业发展，进而加速城镇化，稳定房地产市场和政府土地财政，支持区域公共服务投入。

需关注如何抢。户籍和落户补贴是抢人之战的常见招，前者印证了改革的必要性，打破常规的落户政策就能激发人才流动，优化人力资源配置。

需关注为抢什么人而战。抢人之战久矣，只是这次的抢从高端人才，到普通人才，甚至是人口之战。市场再次证明人口红利消失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痛疾，并非一场可以一笑而过的闹剧。

周 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人才争夺战是一种综合性政策：

（1）缓解大学生直接就业压力，通过产业园区配套政策留住大学生，营造创业创新的环境。

（2）行业内高端人才及团队的争夺，更容易迎合政策彰显城市吸引力。

（3）但是，是否有后续的持续政策来保障创新创业的市场效果？是否有发挥创新创业人才的社会环境？

刘昌伟（江苏版权协会）：

（1）通过人才引进，优化本地人才结构，提高高素质人才比例，为高质量发展赋能。

（2）通过高端人才引入，促进当地创新创业，提升企业、行业和产业竞争力，同时也提升了区域竞争力。

（3）提前布局，缓解中国老龄化日益扩大趋势，加大青壮年人口的引入，对于区域社保、医保和社会经济稳定有着重要的中流砥柱作用。

二、“抢人大战”带来的影响

柯杰（正善资本）：

抢人大战，在供给侧，是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需求侧，是解决房价虚高缺少后续购房生力军问题。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人才争夺战能够胜出的城市一定是重视产业和教育的城市，否则留不住人才。虽然地方政府争夺人才有破解限购之嫌，但也会产生一些积极作用。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增加高技能劳动力供给有利于地方转型发展和长期繁荣，关键是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配置好人才资源。短期看，地方人才争夺战增加了房地需求和卖地冲动，是否干扰新旧动能换新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从抢人才转变到抢人口，根本的原因还是现在实体经济劳动力短缺非常严重，成本上升很快。人口进来后，劳动力充足、成本下降、消费力提升。在当下的城市竞争中，有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但应该注意三个问题：

- （1）现在的抢人，像当年的抢项目一样，有重规模、轻结构的趋势。
- （2）加剧房地产市场供求矛盾，增加城市的生活和运营成本。
- （3）各地的政策竞争使很多企业的人心不稳，影响企业正常经营发展。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地方政府在降低人才门槛的前提下争夺人才，隐含的意义就是户籍这一计划经济的标签在一线城市之外的地区实质性放开了，从自由看待发展的角度这是很正面的。

体现了城市靠人口来做大的思路，在经济系统里面形成新的扭曲，以增强创新能力为目标的人才争夺效果需要拭目以待。

孙军（淮海工学院）：

在人口红利消失的大背景下，这个态势仍将长期持续下去，而吸引人才留住的标准会不断发生调整，但最终将会落到体制机制的竞争，这有利于地方竞争模式和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最终

形成，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马春阳（国都期货）：

- （1）人才不好定义，人多了自然有人才，有人才生长的土壤，所以放低学历标准是对的。
- （2）争夺人才，总体具有积极意义，倒逼北上广深及其它城市改革户籍制度。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政策争抢人才有几个现象：大城市，低门槛，速度快，青年多。不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有一个明显的益处是，解决了农村大学毕业生的一个心结，给了他们新的梦想。争抢人才是一个进步的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如果持续下去，意味着户籍制度将取消。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抢人大战，实际上是城市之争。本轮人才大战，无论结果如何，都会让各大城市认真反思城市建设与发展规划，想想过去赋予了城市怎样的竞争优势，是否留得住人才，是否能够对人才产生长期持久的吸引力和吸附力，从而进一步优化软硬环境，为城市的未来积蓄更加强势的人才资源。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从人才引入地的角度来看，以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特殊化吸引外地人才涌入，加剧了本地存量人才与引进人才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不利于留住并发挥既有人才的作用，也加大了引入地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从人才流出地来看，人才净流出会加剧当地经济发展缺乏后劲的矛盾，人才流出地承受了这种不公平人才竞争带来的代价。

三．如何更高质量地“抢人”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抢人大战”有利于人才的价值得到迅速实现，也对于人们切实重视“工匠精神”“创新精神”发挥重要的激励作用。但是，需要不断完善人才吸引的标准，切实吸引到地区发展真正需要的人才，而不是在“囚徒困境”式的竞争中为了抢人而抢人。

孙国民（南京大学）：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注重高端的、创新型人才的引进和培育，方向是全要素生产力提升以

及创新创业形成新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量贡献。

现有的人口结构同现有经济发展不匹配，需要通过人口结构校准适应现有经济结构的内部优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现有的人口结构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标具有很大差距，需要通过人口结构优化去达至生产力提升和改善。

抢人大战需要警惕的误区一方面在于不能做到人尽其才，最后出现“人才低价值红利”；另一方面需要警惕人才存量一定情况下，人才流动对区域人才存量起平减作用，此外一般性人口导入也有可能延缓区域人均收入增速，影响全面小康及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 （1）科学甄别什么是人才，使引进人才“能来之、能战之，关键能胜之”；
- （2）营造引进人才的使用与成长的生态环境，发挥真正人才的作用；
- （3）创新变革经济、社会、产业和教育等方面适合中高端人才发展的体制与机制，构建完善的立体多维的人才结构体系。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各地的人才争夺，在人才流动、人力资源氛围营造、人才价值发现等方面有积极意义。但本质是政府之手进行的资源配置，可能加剧资源配置扭曲，从而强化不平衡矛盾。因此，政府加强统一开放的人才市场建设，废止不合理的人才流动门槛，应该更为重要。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目前，抢人和抢人才还是要区分，真抢和伪抢也要区分。因此，需要从供需两个方面认真研究，对人才供给方的个人，要仔细规划自己的人生未来，要仔细分辨政策背后的实质，不要为了一些利益而做冲动性决定。对政府来说，还是要重点从提升发展环境角度出发来做政策决定，任何短期突击行动，或者夹带房地产等私利的政策，都不会长久。

张少军（厦门大学）：

虹吸了年轻人和高素质人的大城市，应该通过深化改革来提供就业岗位、公共服务等，进而成长为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极；而不是将外来人口作为房市的新增购买力。

人口争夺客观上对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形成了虹吸效应，因而，建议通过都市圈和城市群等，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抢人才也好，抢人口也罢，都是在现有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对特定人群制订的“优惠政策”；

地方政府应该在保障国民的自由迁徙权利的原则下，为所有在本辖区定居的国民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务。

对地方政府来说，努力扩大就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是其职责所在，这些就业岗位应该平等地向居民开放。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人才争夺要与产业发展相匹配，人才争夺要与企业战略、弘扬企业家精神相匹配，人才争夺要与创新研发、绿色发展相匹配，人才争夺要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匹配。

人才争夺关键在于切实加强党对人才的领导，各级组织及组工干部，制定好人才评价与标准体系，尤其是人才强国战略。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中央政府要从全国均衡发展的角度出发，赋予人才更大的自主流动的权利，同时鼓励人才往欠发达地区流动。特别是对各地高校之间的人才竞争，教育部应加强规范与引导，防止西部等欠发达地区高校坍塌式地人才大规模流失。

林学军（暨南大学）：

人才是生产力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现在各城市的抢人大战，反映了对人才的渴求。要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就必须按照市场机制，进行人才配置。我国营商环境差，最主要的就是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最关键的就是人才不能自由流动。

建议我国要形成法治化的人才流动制度，鼓励科技人员自由流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把科技人才配置到创新最需要的地方去，发挥人才的创新效率，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

王建青（河北省联宇集团公司）：

城市人口、人才争夺战，国家层面要根据全局和前瞻的考量，不能形成各城市间的恶性竞争，科学引导人才有秩序有效流动，造成全局的人才效能浪费。

人才引进方，要有更大的视野，将国内国际、高中低端、不同年龄结构、学历与技能、企业管理与国际贸易谈判等不同层次、类型的人才，进行科学搭配，形成与城市功能、前瞻发展相匹配的人才引进良性态势。

城市要在深刻认识自身特点和人才成长规律的基础上，整合大教育资源，持续性投入各种要素培养人才，切实尊重人才创新精神，营造人才能够发挥最大化价值的大环境，形成人才环境品牌效应，吸引广大人才持续而有效能的流入。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

（1）人才争夺能显示全社会重视创新要素重中之重的人的因素，关键是落实常态化的人才战略和使用、激励、评判相关基础制度的优化；

（2）用好已有人才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仅靠外来人才不是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唯一路径；

（3）制度完善和营研环境趋优是各级政府更应下大功夫的着力点和真功夫。

去杠杆化解金融风险：怎么看、怎么干

2018 年 06 月 19 日

编者按：化解金融风险是三大攻坚战首位任务。但是，如何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精准去杠杆却有不同观点。近期面对系列债务违约风险的暴露，有观点认为以资管新规为代表的全面去杠杆政策导致大量表外资金回归表内，不利于信贷合理投放和经济稳定，易产生流动性风险，而且误伤了民企，原本该去的国企僵尸企业杠杆反而没去掉，因此认为当前金融去杠杆的政策应当适当调整。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结合中美贸易战背景，针对当前我国当前去杠杆化解金融风险应该怎么看、怎么干的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相关建议。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无论如何，无论什么背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杠杆应该坚定不移地进行，但是具体方法可以灵活运用，不必强行人为地制造风险和刺破泡沫。简单地算一个账：现在中国有超过 200 万亿的债务总规模，按年利率 5% 计算，光利息支出就超过 10 万亿，而 2017 年的新增货币供应量 M2 仅为 12.7 万亿，新增货币绝大部分用于债务扩散，不能有效进入实体经济建设。再如，现在国家一年新增的 GDP，也不过六七万亿人民币，不够支付利息，长期以来，企业怎么积累财富实力？

解决办法：

- （1）全部关闭僵尸企业，救员工不救企业；
- （2）重新焕发民企信心，让其承担发展大任；
- （3）限制某些低效率的国企规模和范围的不合理扩张；
- （4）界定和限制地方政府过度膨胀的职能，按事权和财权对称的原则进行央地财税体制改革。

刘晓昶（华泰证券）：

去杠杆需在正常或偏好的经济状态下审慎进行。如果在美国加息收紧货币、贸易战、金融科技战的背景下进行，造成国内信用、流动性紧缩效应叠加，则对国内企业、特别是民企伤害巨大。

去杠杆需要优化节奏，给优质企业留有自行降杠杆和缓冲喘息余地，而不是持续、递进地不断推出新的叠加措施，造成很多企业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度过难关，产生误伤。

(3) 充分利用市场手段,完善相应制度和机制,以市场方式进行优胜劣汰,避免直接行政操作。

(4) 对去杠杆前后的各种影响利弊需事先估计完善,统筹协调企业直接融资、间接融资方式及相应市场、投资者的承受能力。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地方杠杆负债的过高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共基建过度;二是“人才价格比拼”等政府低效率竞争过度。要意识到某种意义上,我们城市的高楼大厦基础设施超过发达国家是负债超前建设形成的,并不一定符合经济规律。

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解决地方政府负债问题:

(1) 只有事实求是的将地方公共产品的基建水平降到量力而行的水平,真正承认经济增速下降到中速水平,才能实现杠杆不增加。要妥善处理已经开工项目,严格控制举债新建项目。

(2) 对政府融资平台这一特殊国企形式考虑一揽子的制度安排,在中长期目标是杜绝隐性债务形式,全部纳入债券范围。中央政府要提供一定的帮助,适当中央政府增加杠杆,适当增加中央政府投资项目。

(3) 增加土地供给满足居民居住升级的需要,稳定地方政府收入,防止房价大起大落,在一定时期内为政府去杠杆提供一定空间。

王美今(中山大学):

所谓“宽松环境”是指保证必要的流动性,“去杠杆”先要“稳杠杆”。2018年6月1日决定扩大MLF担保品范围,表明政府要发展债券市场,允许企业提高企业直接债券融资占债务的比例,以长期债来缓解到期债务压力。当前股票市场萎靡不振、企业直接上市融资困难重重,债权融资不失为保证必要流动性的重要举措,但要注意调与控。

坚持促进资金脱虚向实,优先考虑制造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融资需求,创造条件支持真正体现国力与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定向扶持。

努力按国际标准进行公司债券评级,不仅要规避央企债券等级高于地方国企,地方国企高于民企的“所有制”误区,而且要防止以做大做强为由,放任无效国有企业债券融资扩张和发展。

技术层面上,不能机械地以“总资产负债率”判断负债率的高低,要考察总负债的构成,切实降低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张晔(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去杠杆的主体应该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去杠杆的手段应该是市场和经济的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政府使用行政手段去杠杆,必然不是效率最低的被淘汰,而是逆向淘汰。

王建优（朗姿股份）：

政府要真正回归到如何支持实体经济、支持民营中小企业发展的正确路径上来，大力支持民营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尤其要支持那些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上市融资。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去杠杆，主要限定在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但其实政府部门的杠杆最大，后果最凶。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去杠杆，与政府部门的继续加杠杆，这种撕裂，才是最大的风险敞口。

未来，在具体落实时，采用结构化方式：政府部门稳步推进降杠杆，但不宜过急；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适度放缓降杠杆的速度与力度。

朱建平（江苏省联社）：

去杠杆的基本思路是结构性去杠杆，优先推动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降低杠杆率。从管理部门去杠杆的实践来看，当前去杠杆具有统筹兼顾、突出重点的特征，尤其是通过金融监管加强影子银行的抑制、约束地方政府举债以及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等措施有效促进特定领域杠杆率的降低。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还要通过政策协同，流动性尺度掌控，监管协调，对制造业、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领域以及养老、健康、文化等新消费领域加大支持力度，防止金融机构因“特定领域的去杠杆”出现想授信的对象不准放、不想授信的对象催着放的二元现象。

宋常铁（中国电改 30 人论坛）：

关键杠杆在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需要抓紧落实制度配套；要为民营经济创造宽松的成长环境，尤其是中小微企业。

杠杆形式有许多种，更要关注各类隐性杠杆的治理，尤其是把财税、人力、就业等方面的政策性杠杆考虑进来，一体治理。

孙军（淮海工学院）：

我国市场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政府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国有企业和银行在其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使得市场化紧货币去杠杆的模式很难发挥应有效果。因此，有必要政府出面去杠杆。但由于国企的天然属性，去杠杆很难直接落到他们头上，因此一刀切肯定会误伤民营企业，在紧货币背景下尤其如此。

因此，去杠杆一是要建立国有企业硬约束和市场化取向特征；二是在货币适当宽松情况下去杠杆，避免误伤真正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三是直接融资。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去杠杆化解金融风险的根本指向，应在于增强经济运行活力、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高质量发展转型，这是转型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

在坚持去杠杆防风险的大前提下，应注意：

- （1）不能在去杠杆过程中制造增量风险，尤其不能严重冲击经济活力，预防“次生风险”；
- （2）找到真正的高风险杠杆，重点是地方政府、僵尸国企和居民住房消费或投资领域的杠杆，以及房地产开发过程中形成的杠杆；
- （3）去杠杆的同时不断健全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发挥资本市场优胜劣汰功能，为企业、居民融资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
- （4）政府真正回归监管职能并科学提升监管水平，真正落实金融机构和各类企业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地位，形成真正助推经济活力的杠杆。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搞清金融风险潜在领域，分类指导，把控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国有企业债务风险、房企贷款风险以及居民个人房贷风险是我国金融风险的主要领域，需要针对其不同成因予以处理。

实行分级风险管理，有序释放风险压力。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债务融资规模，排除存量债务风险的情况下，控制新增债务融资风险；对于国有企业特别是僵尸企业严格实行关停并转，硬化国企贷款约束；房企贷款提高开发商的自有资金，限制土地抵押贷款比例；居民个人房贷提高首付比例以及贷款门槛。

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型民营企业，适当放宽贷款条件，支持其渡过难关，尽可能化解中美贸易战带来的风险。

楼稼平（宁波布衣）：

所谓“误伤民企”，是必然的，接下来还有极大的可能“误伤居民”；民企与居民之易于被伤（无论正误），关键在于他们都是“有限责任型”的。“国企僵尸企业的杠杆”去不掉，而且杠杆还在无限制地加长，原因在于他生存的环境是非市场经济型。

这几年地方政府的举债，越来越多地以“项目”本身（地方融资平台）的现金回流或盈余作依据，杠杆的支点在项目。但所谓的“依据”或“支点”，大多是“可批性研究报告”虚构的。民企萎缩、对外贸易变数增大，未来会有不少的地方政府将靠举债度日；最终，地方政府的杠杆不但去不掉，还会不断加长，原因在于他的支出是刚性的。

目前该去杠杆的主体，是国企（央企）、地方政府（包括地方融资平台）；但去杠杆而不伤身，唯一的办法是重新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

盛文军（人行杭州）：

经济转型时期往往是金融风险的易发期。当前，我国金融风险总体可控，但仍需高度重视防化金融风险：

（1）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长期以来，政府债务负债端和资产端期限错配所形成的“借短投长”，容易酿成流动性风险与债务违约风险。稳妥处置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存量、有效遏制增量，当前显得尤为迫切。

（2）高度重视金融乱象风险。当前，部分领域和地区的“金融三乱”问题仍较为突出。从去年全国各地陆续暴露出的同业业务案件来看，同业业务层层嵌套，资金在金融体系空转，产生较大的风险隐患。

（3）高度重视房地产金融风险。房地产行业融资在全社会融资比重进一步提高，居民杠杆率的过快增长，局部地区消费贷、经营贷等信贷资金违规流向楼市加剧了市场投机性风险。如何防范诸如此类的房地产金融风险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4）高度重视金融科技风险。金融科技在改善传统金融市场融资难、投资门槛高、投资渠道匮乏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安全与信息科技风险，对传统金融秩序引起冲击，使得跨行业、跨国境的金融风险传染性更强。关于“去杠杆”的时机选择问题，类似于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是在经济周期的上行期还是下行期的问题，这个问题无论在学界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一个定论。当前“去杠杆”已不是一个要讨论的问题，应研究的是如何“去杠杆”，如何在“去杠杆”的同时，不损害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力；如何提升“去杠杆”的效率，把握好“去杠杆”的节奏；如何在“去杠杆”过程中，分辨“好的杠杆”和“坏的杠杆”等问题。

对策建议：

（1）加快金融改革步伐，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金融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协调一致，内外资同等享有国民待遇；提高资金供给能力和效率，提升各类市场经济主体按照市场原则的资金获得率；适度渐进开放垄断性行业和领域，引导社会各类资金进行投融资，提高投资回报率。

（2）把握好“去杠杆”的重点、方向和节奏，“去杠杆”和“加杠杆”有机结合。

（3）不断拓展金融市场改革深度，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信号在防控金融风险中的积极作用。

构建江苏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

2018年06月28日

编者按：江苏作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发达省份，省委提出未来江苏产业发展着力点要放在控制力和竞争力上，把丰富的产业、科技、人才资源整合起来，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也是对十九大提出的构建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江苏贡献。因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对“构建江苏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分析了自主可控的内涵与特征及江苏当前发展的基础条件与重点领域，并从突破口、关键举措等角度进行了针对性建议。

一、自主可控的内涵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自主，就是自己作主，不受他人支配；可控就是指事物的发展在我们能够预期和把握的范围内。因此，自主可控就是不仅自己可以对某事独立地作主决策，而且还能够把它的发展演变控制在自己可以预期和把握的范围内。建设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就是建设不受外国支配、而由我们自己独立做主决策的、由我们自己把控的产业体系。自主可控产业体系的一般特征：

（1）产业技术对国外的依赖度要低于30%以上，即技术的自给率达到70%；

（2）对产业里的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关键环节的公司，在产权上要能够处于绝对的控股地位。

田伯平（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有效的自主可控。联系江苏实际，当前紧迫风险恰恰就是对外需和外资的过度依赖。进一步推进市场化，加快结构调整，在市场供需上形成自主可控，降低风险，同时加快科技创新，加速新旧动力交替。

（1）有限的自主可控。自主可控必须有度，要防止政策曲解走样，变成全面控制；进一步厘清那些应该让市场自主，那些可以通过市场实现可控，千万不要都由政府来自主可控。

（2）有层次的自主可控。在省和市级层面实现，不要层层都搞，县区要倡导分工合作。

孙建波（家族财富管理 50 人论坛秘书长）：

自主可控，是一个供给侧概念。在供给领域，要做到不怕技术封锁，不怕服务封锁；在需求侧，则是不怕贸易壁垒，但这并非主要矛盾。对于自主可控，也并非单纯的国家价值链分配问题，而是离开了国际的技术、原料、设备，能不能维持生产。

中国民营企业在很多产业的集约生产中形成了集群，形成了特定零部件制造的“隐形巨人”，虽然需求在外，但基本掌握了核心生产技术和工艺，这就是一种自主可控。例如，浙江服装业中的纽扣生产。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 （1）生产和服务体系门类齐全；
- （2）核心技术和尖端仪器设备有自主研发能力，最好能国产化；

在不具备国产能力和条件的关键产品设备生产 / 不准备依靠国产上有供货商备份能力，虽然技术不一定要求达到世界顶尖，但要能够应对市场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情况。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在关键领域、重点行业，不再受制于人，拥有相对独立性。核心特征就是要拥有一批原创性自主知识产权，占据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性节点。

李 锋（江苏省经信委）：

自主，是多培育本土创新性领军企业。与广东和浙江相比，江苏本土自主企业偏少，尤其是带动作用大的终端产品生产企业和新经济企业。

仅仅所在不所有的企业，往往会遵从企业的发展战略，对地方政府的转型升级结构调整战略响应度低。比如在江宁的上汽，并没有把最先进的车型放在江宁生产，上汽在全国有很多的生产点基地，在生产车型上各地都在和上汽博弈，上汽也因此争取更多的利益。长江经济带战略要求对沿江的化工企业进行改造升级搬迁，但对金陵石化和扬子石化这种决定权不在江苏的企业来说，其下一步发展战略也是不可控的。

刘晓昶（华泰证券）：

自主可控不是闭关锁国，不是自己埋头苦干，而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学习创新，动员国际、国内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充分利用人类文明的智慧和成果，通过较长时间的努力和奋斗，对关键产业、关键环节、关键技术进行联合突破，将这些核心要素掌握在自己手中，共享知识产权。对非关键产业、环节、技术可以继续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化分工。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立足江苏产业、实业、企业与江苏人精神文化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现以我为主具有风险掌控力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经济现代体系！自主可控体现区域特征、体现研发能力、体现创新性、体现自主知识产权、体现风险可控、体现核心竞争力。

陈琛（机工智库）：

关于自主可控，目前大家关注的主要还是一些战略性关键领域，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阵地争抢中能否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并非要在所有技术中都占据先导，但一定要尽可能掌握更多的技术门类和具体技术，再形成我们自己的制造模式，打造以产业集群为主的制造生态，从而在新革命中占据先导。

关注两类技术：

- （1）基础制造技术，例如一些先进的基础制造工艺、零部件制造技术和精密的制造装备；
- （2）数字化制造技术，例如 3D 打印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工业控制技术等等。

蒋青云（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 （1）在特定产业中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对价值链的主导能力，或者对核心模块的制约能力；
- （2）在跨产业层面，实现对国内价值网络合作体系领导力，或者在全球价值网络中占据重要节点乃至中心地位。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自主可控应该是开放型经济发展新阶段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而不是要封闭起来搞产业发展。简单地说，就是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强调产业的价值竞争力，使国内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被卡脖子。

吴福象（南京大学）：

自主可控，类似于价值链的链主，要么有自主品牌，要么有核心技术，抑或制定标准。比如，在 U 型价值链上，应能主导整个价值链的治理；在 W 型价值链上，则可以通过平台和集成技术，提供一揽子问题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在何种价值链上，都掌握了核心专利，并处在专利前后向引用的关键节点上。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 （1）自主知识产权，有独立自主的技术体系，对外技术依赖度较低；
- （2）关键技术生产体系要在产权结构上要具有控制力，从而破解现有关键产业的产业链

链主的控制；

(3) 研发和制造环节是开放的，但必须有控制力。

刘昌伟（江苏版权协会）：

自主可控产业内涵在于现代产业链、尤其是在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关键节点的核心技术要做到可控，不能被人卡脖子，阻碍转型与发展：

(1) 掌握信息技术领域核心技术；

(2) 加大工业领域核心软硬件产业投入；

(3) 通过产学研推动建立自助可控现代产业标准；

(4) 加快建立自主可控评测体系，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及载体产品进行第三方评价，建立准入门槛；

(5) 保持包容与开放，对于符合评测评价标准的产品产业，无论来自哪里都给予同等支持；

(6) 与北京、上海做好协同与配合，优先发展工业领域核心软件及相关硬件产业，引入产业链关键节点核心技术，利用江苏已有软硬件基础，形成产业闭环，面向全国提供产品和服务。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培育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过程，也是建设自主品牌和培育相关产业的隐形冠军的过程；当然，也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迈向先进制造业的过程。

郭进（复旦大学）：

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需要处理好自主与开放的关系：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在国家层面可对标前苏联，封闭的技术线路和区域分类协作发展的模式，确保了产业体系的高度可控和绝对安全，但导致科技创新缓慢，产业发展严重失衡。在企业层面可对标苹果封闭的技术模式和产品模式，虽然也是高度可控，甚至能够取得市场的成功，但仍难以撼动 WINTel 的开放体系。而开放体系的弊端，可以对标日本，虽然其有大量的贸易保护壁垒，但日本的产业体系牢牢绑定在美国的全球贸易体系之下，导致日本无论是在国家利益、战略安全还是产业发展方面，都与全面受制于美国，当然这也与日本本身严重缺乏资源有很大关联。

陈长江（南通大学）：

自主主要从技术角度说的，指的企业的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生产的关键环节不受制于人，尤其不受制于国外企业；可控主要是从价值链角度说的，指的企业能够掌控价值链，掌控上下游的生产投入以及市场，不受上下游价值链的控制和制约。

朱建平（江苏省联社）：

产业领域的自主可控并不是一定要拥有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是对这个产业链要有一定的话语权，至少得掌握产业链条上某些环节的关键和核心技术，这样才能避免受制于人。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可控，就是能将产业发展控制在生态优先的路径上。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即建立以绿色创新为动力，绿色产业发展为产业主体，绿色金融和绿色经营管理和科技人才为支撑的协同产业体系。

二．江苏当前发展现状与重点领域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企业过去在出口导向战略性下，长期处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加工装配等生产环节为跨国公司代工，大部分做的是高技术产业的低端环节。目前虽然很多产业规模在国内外做得很大，如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等，但这些产业往往大而不强，离建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还有很大的差距，缺乏像台湾地区的“台积电”那样的行业隐形冠军。大到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小到圆珠笔笔头的球珠、高铁的螺丝钉、电子产业的芯片、微电子链接用的导电金球等，都是我们在产业链上的痛点。

未来根据战略性和紧迫性，江苏某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电子如芯片、机械人核心部件、原药研制、碳纤维等新材料等，都应该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依靠政府的支持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培育全球价值链上的隐形冠军，专注于链上的技术知识密集环节，把技术和工艺层层往上做专、做精、做强、做大，把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发展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否则，制造强省的战略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的，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 （1）拥有雄厚的科研实力；
- （2）拥有强大的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应集中于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信息产业，集成电路等上。

刘晓昶（华泰证券）：

江苏科研教育发达，在信息技术与服务、高端装备制造业（含机器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等都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可以进一步发挥优势，围绕上述产业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重点突破。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 （1）江苏制造业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抓住优势把制造业做强做精；
- （2）结合沪浙皖产业发展制造链，提高现代制造服务业；

江苏同时还是长三角中心地区，可根据交通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产业；集成以制造、服务、旅游一体化的生态经济，逐步形成自主可控现代化产业体系。

三．建设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突破口及关键举措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建设自主可控产业体系的突破口，在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隐形冠军造就上。这次中美贸易摩擦美方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痛下狠手的事实说明，建设制造强省强国，必须高度关注那些在关键时刻对我国产业安全可以发出可置信威胁的这些隐形冠军。这些隐形冠军不直接与终端消费者发生联系，但却因掌握细分行业中的关键知识和技能，享有其他企业无法替代的优势地位，因而往往是具体产业命运的真正控制者。打造关键产业中的隐形冠军，不能根据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去扬长避短，放弃对价值链上游的某些高知识技术密集环节的追赶，而应该以动态竞争优势理论为指导，实施扬长补短策略，努力拓宽瓶颈部门。考虑到国际分工，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既没有可能也没必要在诸如芯片、精密仪器、飞机发动机、传感器等等所有领域和环节都取得绝对控制地位，企业目前欠缺的技术不可能都由政府来不惜代价地组织追赶。

因此：

- （1）扬长补短最要集中力量补最短边的那些板，由此边际收益更高；
- （2）充分发挥民间、市场和中小企业的作用。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发挥科教优势与制造优势的结合，形成一大批基础性、系统性原创性专利的技术；前所未有地重视专利，重视知识产权保护。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学一附院）：

自主可控目前看非常困难，医院所有有技术含量的机器全部是进口的。自主可控要求很高，要有前瞻性的思维、反复的研究创新和认真踏实的工艺。

孙 军（淮海工学院）：

- （1）传统制造业利用最新商业模式和技术改造升级；
- （2）做强创新平台载体、利用包括全球在内的优秀人才；
- （3）构建价值链相关环节的隐形冠军；
- （4）重视江苏品牌建设；
- （5）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王宜森（金埔园林）：

自主可控，应该是在核心领域，要强化国企主导地位，在创新和服务行业要发挥民营经济的作用，让市场主导，政府引导，有些行业还需要政府扶持！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自主可控产业体系要求重视基础研究，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相融合，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 （1）认识到自主创新是个渐进过程，不是否定引进创新，而是在引进创新基础上突出关键核心技术上自主创新能力；
- （2）自主创新要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企业是创新主体，政府只能提供引导性作用；
- （3）完善自主创新的法制氛围，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规，形成社会上尊重保护自主技术氛围。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包括许多因素，简单地理解是指关键技术由自己掌握和以工匠精神生产高品质产品。江苏可选择若干新兴技术领域，以建立全球可控为目标，设计一个 30 年的发展路线图，培育集科学 - 研发 - 创新 - 规模化生产于一体的生态系统。

王阿忠（福州大学）：

从目前中兴通讯背景事件看，自主可控主要指技术方面的自主可控；能够形成产业的生产力技术，多半是成熟的应用技术。从短期看，就是要去挖掘行业龙头企业或隐形冠军企业，并加以保护、资源倾斜政策大力扶持发展；长期看，要强化技术等知识产权保护，鼓励企业研发投入。

目前，最好的捷径就是通过企业间的兼并重组做大做强企业。美国市场经济已经有五次大的兼并浪潮，它们企业基本都是通过兼并重组成为具有自主可控的跨国公司。如美国思科公司就是通过 173 次兼并重组从小企业而成为大的跨国企业的。中国目前经济体量与基础，要发展

自主可控的、具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企业，必须要有一次大的兼并重组浪潮发生。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从全球价值链分工原则和治理机制看，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必须建立在以自主知识产权为特征的技术基础和以内需为特征的市场基础之上，其基本思路可沿区域价值链→国家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实施。对江苏而言，要立足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的区域开放合作，聚焦区域营商环境塑造、知识产权保护，为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提供高质量的制度和公共服务供给。

陈长江（南通大学）：

通过技术创新实现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上的自主性。这个难度较大，需要高级要素和研发持续长期的投入。

通过价值链的升级掌握链主地位从而实现价值链可控，包括一个是全球价值链上的升级，也可以通过建立国内价值链实现链主地位，从难度来看，后者要略小一点并且应该是趋势。

林学军（暨南大学）：

自主和可控，就是要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让市场机制自主的发挥作用，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政府弥补市场的缺陷，控制市场风险。当前我国面临的严酷的国际竞争环境，加强政府的组织引导，提高我国的竞争力，是十分重要的，但也要注意，政府的引导，应当尽量多的采用市场手段，经济的手段，避免采用行政干预，更不要代替市场机制。

朱建平（江苏省联社）：

以应用驱动带动技术驱动和投资驱动，通过顶层设计、统筹管理、分工合作、资源共享、单体创新等方式解决好基础项目的研发以及衍伸产品的创新和应用，从而推动高精尖产业领域的自主可控。

四．建设自主可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政策建议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在扩大开放的基础上，立足于自力更生。但在产业政策设计上，应与国际社会合规性接轨，放弃直接支持形式，转变为间接支持，如成立以政府牵头的混合所有制基金进行引导。

刘晓昶（华泰证券）：

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离不开基础研究支持，应加大高中、大学教育体系对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等基础学科的重视，培养一批适应新时代需求的高端科研技术人才，支持现代产业体系发展。建设一批普及型科技馆，免费对青少年、大学生和市民开放；建设一批科技实验平台和科技实验中心，普通市民或企业经申请通过后免费或优惠使用；少量高端科技实验中心可以省际间联合建设，企业或科研单位申请后免费或优惠使用。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1）梳理全省产业体系发展现状，找准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和关键产业，以市场化引导方式，培养产业“小巨人”和“单打冠军”。

（2）从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四个方面，打造江苏新一轮改革开放新高地。

（3）近几年江苏教育过多培育“技能型”技校生，高考改革又不利于理工科生，导致潜在人才流失严重。需要立即进行教育改革。

（4）以部分案件为突破口，抓紧恢复一些影响企业家精神的不利因素，进一步加强企业家精神培育，让苏商精神再放光芒。

高春亮（南京财经大学）：

- （1）梳理江苏能够做和国家迫切需要的技术；
- （2）成立以大学（南大东大等）主导的创新团队；
- （3）设立行业协会筹集资金，由省和行业共同投资；
- （4）技术成果行业共享。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 （1）培养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
- （2）进一步解放思想，仍需明确和定位江苏民营企业的作用；
- （3）重视技术研发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把他们的智力技术作为重要资本要素参与企业利润分配；
- （4）发挥政府在现代产业顶层设计作用，创新创意策划一批在新经济中的独角兽、瞪羚企业，也可以使用国有资本作为领头引领。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1）知识产权局全面梳理全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专利储备，画出江苏省前十重要的细分产业中，江苏企业所拥有的专利树图。

（2）全面调研该十个产业，每一个细分产业的全球专利分布，建立一个技术跟踪搜寻系统，弄清楚江苏省该产业努力的方向，由技术贸易促进机构寻找机会购买相关产业江苏省产

业所需要的专利。

(3) 科技厅设立该十个产业的“源创新研究基金”，向全省各大学和科研院所投入，进行科研攻坚，获得专利后授权江苏相关细分的产业联盟免费使用。政府“科技三项经费”应该给大学及科研院所，而不是给具体的企业。

(4) “可控”的空间范畴，是江苏省可控，还是中国可控？能不能跟上海、广东共享？

孙国民（南京大学）：

一方面在创新智造、高端装备、现代化工、环保新能源等领域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寻求科技创新链条上重要节点上的创新，培育单打冠军，在全球价值链链条上的某一个环节做到以我为主、以我为标准。

在优势集群领域嵌入世界顶级创新资源，对不能嵌入的核心创新资源，建议通过凝炼国家大科学工程、国家实验室等方式，破除顶层创新瓶颈；推动人才资源、科技资源、金融资源在区域空间上的集聚。

宋常铁（中国电改 30 人论坛）：

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不是一个短期见效的事情。基础是思想的自由，是国民对科学、创新和理性的推崇；核心是科技和教育工作的全面改革，尤其是对幼儿、中小学早期教育的全面参考科技领先国家做法，对高校管理体制、知识产权保护、科创中心完善、创新创业企业扶持等方面全面、无条件地服从于创新的成长。

对周期长、回报率低的，一定是政府扶持，不能推给市场；对应用性研究，除核心机密科技，都应交给市场；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相信市场的力量，企业家的创新动力和能力永远是最稳定的，我们该考虑的只是如何扶助、引导。

踪家峰（南开大学）：

- (1) 继续提升全民教育水平，实施 9+5 全免费，3 年高中再加上大学前 2 年；
- (2) 引进更多世界一流大学到江苏办分校；
- (3) 创建 3~5 所世界一流的医学学院和生命科学中心；
- (4) 创建南通科学城和扬州科学城，从制造之省转到科学之省。

马步洋（Metalink 新材料董事长）：

打造适合自主可控现代产业体系的制度环境，保障企业家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包括并不局限于真正落实的法律环境。

省级产业政策形成具有追求和体现江苏长期竞争优势的中长期规划，进一步聚焦于先进制造业，有意识地培育可形成核心技术、世界原创技术的研发与中试，大力支持突破可能对于该

产业类别形成重大冲击或卡脖子技术环节、形成自主的技术体系、有效掌控有关先进制造业产业类别的技术主动权。

市场的交给市场，让企业家去主导和实现具体技术创新过程；着力提升政府主管官员的现代产业知识认知水平，形成省内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条、价值链的有机组合；引导江苏率先建立具有全面的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现代制造业相关产业类别核心技术落地生根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主要是现代化的制造业产业体系。

大力发展现代化生产服务业，降低江苏省内企业获取各类先进制造业生产要素和服务的成本，形成具有突出竞争优势的生产服务体系，推动江苏率先成就自主可控的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

崔卫东（蓝鲸咨询）：

加强高端产品或服务的研发设计、试验测试、检验检测、过程装备、技术工艺的全过程投入，整体提升江苏产品或服务的形成能力和质量水准。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基地和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基地，培育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导型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主动组织和积极参加全球产业治理，在事关国家重大利益和国计民生的若干领域发挥自主可控作用。

杨建中（加凯集团）：

（1）厘清江苏有多少有效自主可控的产业和核心技术，是否与当前十九大江苏“实体经济、现代金融、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源”相融合。

（2）建立科学有效有层次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避免夸大、曲解自主可控的限度。

（3）将主导的产业集群与自主可控的产业如何利用现代 AI 智能技术进行有效融合。

（4）结合省市相关部委与著名高校科研院所建立的科研基地孵化高新技术和科技人才，促进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等的高效优化配置，激发创新成果，有效地实现市场转化。

（5）根据江苏企业“一带一路”走出去政策，引导江苏可控的产业集群（包括传统产业）走出去，避免原有代工企业所走的弯路再度发生。

（6）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规和自主创新的法制，加大打击利用知识产权骗取国家补助的力度。

赵正宇（南京市园林局）：

厘清产权纠纷中的偏差，出台强有力的保护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政策措施，降低创新企业的产权保护成本。对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产业进行摸底梳理，加大扶持力度，尤其要加大对草根经济的支持力度。

支持各类企业设立研究机构，政府基金配比投入。对自主知识产权企业的高管和科研人员，

在医保、社保、教育、住房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

对自主研发 VC 项目，社会基金投入的，省市两级财政可奖励该项目未来所得税收之留成部分；出台政策鼓励银行等金融支持自主研发 VC 项目贷款，在信用等级评定、设备租赁等方面给予更优措施。

整合各类科技平台，充分利用江苏高校科研资源，对自主研发项目提供更优质优惠的公共科技平台服务，组织企业积极参与标准化建设。

柯杰（正善资本）：

（1）对江苏产业体系做产业价值链研究，分析出未来 5 年内哪些产业的企业大概率可能成为隐形冠军；

（2）针对潜在隐形冠军，组建省级专项委员会，定向支持；

（3）组建省级专项基金，发挥科技金融的创新作用，投资潜在隐形冠军企业。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选择有前景、潜力大的产业部门，对这些部门的发展提供高质量的产业基础设施；

（2）提高行政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3）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创新环境，比如建立知识产权法庭、提高创新融资、技术遴选等服务；

（4）政府创新采购，借鉴德国、瑞典等政府创新采购的方式，提高企业创新动力；

（5）公共服务要更加开放、先进，引入国际化的医院、学校、媒体等，提高江苏公共服务的开放程度。

糜万俊（华奥高科）：

（1）落地鼓励大胆投放的详规细则，出台投资的容错容败机制！

（2）由省级层面牵头，联合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加，一盘棋创新，一缆子实施，不求全面开花，但求局部突破，做世界的江苏创新品牌！

夏海力（苏州科技大学）：

建设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仍然是制造业，应该从江苏收入规模排名全国第一、第二名的制造业 14 个细分行业中寻找，提升江苏制造业这 14 个细分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促进“江苏制造”向“江苏智造”方向转型升级。

江苏仍然面临着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推动新兴产业发展这两大艰巨任务。建议制定相关政策措施，一方面切实做到帮助传统制造业企业渡过难关，特别是通过减税降费、降低企业综合运营成本；另一方面要花大力气围绕这 14 个细分行业促进江苏新兴产业和新经济的发

展，加快培育和引进独角兽企业。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国际分工是必然的，所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不可能每样都做，每个层级都要自主掌控。什么部分是只有单一供应者，断供就没有任何替代者，而且是关键的，产生严重影响，那就非得必须有预备方案，必须自己搞，发展自主可控的替代方案。

国家安全，中央认定重大战略相关的，需自主可控；产业的就交给企业自己去操心就可，只要不是重大安全相关的，商业问题商业解决：

（1）国家队（含中科院 / 社科院）：政府组研究机构，专项重大项目投入。

（2）高校队（含省市研究机构）：政府以专项重大项目，委由高校联队承接研究，但需要有效监督。

（3）企业队：只要有商机，有利润，未来有发展潜力，可交有实力企业招标承接。但机密问题要严密监控。

中国经济：如何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2018 年 07 月 12 日

编者按：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无法避险地开始了。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 and 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两国贸易摩擦的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且这种伤害对两国都是全方位的。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冲击短期内很难直接得到缓解，我国要有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必须从提高中国经济效率进行中长期整体考虑，做好有理有据的应对之策。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如何缓解中国经济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到的影响？如何防止下半年可能的经济下滑？”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专家、学者们深入分析了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并对如何缓解贸易摩擦及防止中国经济可能的下滑等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一、如何缓解中国经济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受到的影响？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提出两大四小对策。核心是要掌握两个大方向：第一、无论如何，寻求在谈判桌上解决贸易战的初衷不能变：（1）应就美国对我加征关税向世贸组织申请仲裁或者申请国际贸易诉讼；（2）应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直接威胁特朗普 11 月中期选举的涉中出口贸易商品品类，通过对这些精心挑选的美国出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精准打击特朗普票仓，给特朗普施压；第二、预防和化解贸易战可能带来的资本市场和房地产泡沫风险和经济滞涨局面：（3）采取降准和加息的货币政策组合，稳定货币供应量，保证市场流动性，严控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出现崩盘风险；（4）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既定的下半年政府投资项目施工时间前移。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1）中美贸易摩擦是迟早要来的，早来比晚来好，虽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我们大可不必惊慌。

（2）任何已有的和谐都可能被打破，只有不断强身健体，苦练内功，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3）我们不拒绝与美国做生意，但在美国提出新的交易规则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转而加大与其他国家贸易往来的力度，来对冲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冲击。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 （1）在知识产权方面，规范产品商标注册和使用，避免损失。
- （2）短期取消对美各项日常生活用品贸易补贴退税、让美国人民呼吁互相停止贸易战，同时对国内制造企业减税降费支持，放水养鱼、营造适宜企业发展营商环境。
- （3）扩大内需市场、盘活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新格局，精益求精、创优自主品牌产品、逐步让中国标准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
- （4）鼓励企业在周边国家设立分公司作为销售渠道，避免贸易壁垒造成损失。
- （5）减少对外投资与资本输出、快速启动自我造血机能，在危中寻机。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主要波及范围集中在中国制造 2025 上：

- （1）成本上升；
- （2）产能过剩。解决成本上升的手段，不建议采用专项补贴的形式，而是代之以更大幅度降税减费。解决短期产能过剩问题，一方面要引导企业适度压缩产能；另一方面就是拓展新的市场，不仅包括国外替代市场，也包括国内替代市场。此外，采取果断行动，向国际社会看齐，收窄存贷款息差，让银行回归社会平均利润率，把超额利润返还到实体经济，返还到居民口袋，以降低成本，提振内需。

孙 军（淮海工学院）：

- （1）与美国的冲突要理性看待，更多通过对话谈判解决，争取以更大开放、更广领域合作化解争端；
- （2）以“一带一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支撑，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
- （3）以内需为根本，精兵简政、放权让利、减税降负、激活经济动力；
- （4）逐步解决老百姓养老、医疗和教育问题，解决后顾之忧，持续扩大内需；
- （5）以央地财税体制改革为契机，现代经济体系构建为抓手，推动地方政府新型激励机制建立。

张启祥（南京市信息中心正高级经济师）：

我国有面广量大的各类企业（国企、民营和小微企业），已经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走向国门了，它们中有的已融入当地国家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氛围，有相当的经验和成就。建议国家给予更大的优惠与宽松政策，尤其是将监管弱化服务强化，充分尊重这个群体，充分发挥好这股力量。不仅仅是国企、央企，民营、小微企业更需要优质国际化社会化服务。以国家的力量，社会化的评价体系，让这些多如牛毛的企业发挥作为（莫以善小而不为）。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1）在中美贸易摩擦无法避免的情况下，尽量将贸易摩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避免摩擦的升级；

（2）控制住固定资产投资的冲动，避免 2008 年我国“4 万亿”投资计划的重现，减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通过对内开放调动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3）进行大规模减税，严格控制房价，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通过扩大居民消费来抵消出口受阻带来的不利影响；

（4）构建新型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性。

王亚利（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

打破地方板块的区域限制，通过税收等杠杆撬动地方梳理并整合产业链条，打造我们优势互补的产业体系；

围绕一带一路、东盟构建依托我们产业优势的产业合作及走出去战略，加强与这些兄弟国家的融合与发展；

对“卡脖子”的核心技术，以钉钉子的科技攻关策略，严格知识产权保护、针对美国等国高科技产品布局外围专利，实施专利围剿战略；

推动财税改革，对出口型、科技型企业给予税费返还，利用加征美国进口商品税费收入和其他专项经费鼓励和奖励企业推动机器换人、设备升级改造、技术研发投入、人才引进、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投入。

周 斌（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

掌握规则很重要，积极利用我们所能参与的国际组织来影响和制定规则，如 WTO，一带一路、亚投行等；

强大的经济体必须努力外交上要打破规则，类似市场经济地位、人民币国际化作为经济外交的重点解决，可保中国经济三五年内无忧；

正视存在问题，不能因反制措施而沾沾自喜，如芯片等产品高科技化不足、5G 标准国产化不足、海外纯产业投资不足与国内外向经济转移等作为经济和产业改革重点内容解决之。

陈 琛（机工智库）：

（1）商务部要加强和发改、工信等部委联系，加强政策一致性。

（2）在关键战略性技术上做好备份，形成多源供给；在进口补贴，关税政策上为一些“容易受到伤害的企业”提供倾斜。

（3）深入研究美国贸易政策的机理，趋势。为下一步决策做准备，防止贸易战进一步

扩大。

钟永一（江苏社科院）：

（1）承诺遵守 WTO 游戏规则。

（2）对内政府真正精兵简政让市场起决定作用，给民营企业和“双创”者选择的自由和权力和保障他们的选择权利。

（3）应对重大问题决策程序严格化，不能把随意看法特别是情绪化表达看成是“顶层设计”。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高附加值服务业。美国不惧怕与中国的贸易战，原因之一是，经济的主体是服务业，而非制造业。在美国，制造业的就业量和增加值分别占相应总量的 1/10；在中国，制造业是经济的主体，服务业不发达，对美国的进口替代不强。

张远鹏（江苏省社科院）：

（1）如果美国接着推出 140 亿美元商品关税，中国不跟。因为 340 亿美元已经是史上最大贸易战了，我们第一次针锋相对已经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如果川普没下一步最好，有的话再跟不迟。把球踢给对方争取时间。

（2）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首先落实对港台资本、欧洲资本、内资的开放，刺激美国资本家到眼红。

（3）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又出口美国的尽快转移产能，保住在美市场份额。

（4）扩大国内市场。尽快提高所得税基数，推出所得税减免房贷利息、学费利息等措施，对住房装修、购买家电、汽车、农机等进行补贴。

（5）对贸易战严重影响的养猪等行业从对美征收关税中转移补助。

唐德森（无锡环研中心）：

（1）有策略地向 WTO 组织申请仲裁，促使启动对美国单边贸易“征税”合规性调查，提振我国维护国际贸易规则的积极形象。

（2）多方努力，使美国回到中美双方就“贸易摩擦”问题的谈判桌上，提升谈判成果的执行力。

（3）积极寻求贸易摩擦相关产品的替代产品或替代国贸易替代，尽量降低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

（4）寻求国际贸易核算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因为现行的核算规则，可以对我国贸易顺、逆差的平衡性不利。

(5) 客观评价我国的发展位势，结合国际格局趋势和历史演进规律，不偏不倚地定位我国成绩，防止国际误判。

程 鹏（江苏巨和实业）：

(1) 降低税率，放水养鱼，做大税基。

(2) 在社保方面，政策制定给企业在解决社会就业方面增加沉重的现实负担和扩大用工的心理负担，征收费率可以先降低 1/3。

(3) 既然住房公积金助长了房价上涨，手续繁，时效差，不如在不增加税收负担的前提下，将其货币工资化。提高社会运行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4) 抓住机会调整汇率与出口退税组合。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1) 调整出口业务的出口退税政策，加大退税力度。

(2) 积极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抓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全产业链降成本。

(3) 探索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减少公务员总额。

(4) 加强消费税改革，尤其国际贸易中含有的消费税都要有不同程度的，降低税负。

(5) 进一步优化财政补贴、贴息制度，受到严重伤害的产品，可以加大补贴。

林学军（暨南大学）：

如何应对这次贸易战？首先，应该做好三个链：国内价值链，形成全国的合理的分工协作机制，良好的产业结构；区域价值链，就是要以一带一路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经营好中国的大周边；全球价值链，就是要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扩大合作伙伴。

(1) 搞好本国的价值链是根本。利用庞大市场，扶持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利用政府的产业引导政策，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掌握核心技术减少对外国技术、产品的依赖。

(2) 努力维护多边的贸易体制，在 WTO 框架底下对美国进行起诉，反对美国经济霸权。

(3) 采取对应的关税措施进行反制，尽量避免有更大的损失。

(4) 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减少对美元的依赖，防范金融风险。

二、如何防止下半年可能的经济下滑？

陈 东（安徽工业大学）：

在贸易战背景下，除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等，还需要进一步保护小微企业的创业环境：

在园区规划上，单独给小微企业开辟生存发展空间，让小微企业也能在园区积聚，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不能在企业进园区过程中只接纳税收高，规模大，“产业新”的企业，失去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毛细血管。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1）刺激消费可以增加我们的内需与经济的成长。从发放消费券等多方面刺激群众的消费意愿，增加内需。

（2）从减税、退税、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渠道等方面，刺激企业投资。

（3）给予受贸易战影响的企业适当减税补贴损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减少失业的冲击。

（4）对于受贸易战影响失业的民众，规划以工代赈，工作可以是协助社区安全巡逻、交通秩序维持、维稳、地方建设等。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30论坛华东组委会）：

（1）对国内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适当调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振市场信心。

（2）对政府大型建设和无效或长期性项目严控，对国企、事业单位中享受补贴的酌情中止、压缩。

（3）切实加强对内开放，破除不合理的市场壁垒力度，促使社会资本在公平竞争中迅速增值。

（4）严防信用崩塌，尤其是居民、企业、政府的债务危机，地方债、资金空转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5）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土地制度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激发农村活力。

（6）辅导国民科学理财，避免在经济形势多变的今天使用风险较大的理财方式。

周 斌（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

货币政策应该要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进一步推进外部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内部的利率市场化；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改革导向的引导，尤其结合中国还存在的改革开放中一直未解决的深层次问题而推进；同时，通过税收改革进一步激活民营经济。

以中国目前近期及长期最关键的“十大要事”经济问题为抓手，推动国家、部委、省市地方体系化改革和措施到位：不仅有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更需要各地方的具体行动方案。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确立防范系统风险之底线思维，重视而又不放大损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相关企业和行业列出预警清单，以是否符合转型发展为标准有保有放。

拓展内需不是应急之举，而是统筹近中远期发展的根本方略，是应对外部风险、提升开放水平的根基。聚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优化市场发展环境，确立内需的基础性地位。

实质性地深化对内开放，推动区域转型发展，重点是明确长江经济带在区域协调和高质量转型发展中的全局和样板意义，同时推动长江经济带与泛珠、京津冀等区域的开放合作，着力构建基于对内开放的经济内生循环机制。

针对当前贸易战核心技术和农产品“双重卡脖”困境，一方面要坚定自主技术创新的思路，激发科研院所基础科学研究和各类企业应用技术开发活力；另一方面要建立切实可行的农业特别是主要农产品种植的激励机制。

在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前提下，坚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对外开放，坚持以多边体系应对单边主义。

唐德森（无锡环研中心）：

（1）进一步简政放权，激活市场活力，扩大内需，搞活国内市场。

（2）适度扩大基础投资，抑制房价，增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定资本市场，增加民众对投资和经济发展后劲的信心。

（3）促进国有企业、行政机构和事业单位开源节流、减员增效，提高社会运营效率。

（4）改善人口结构失衡，尤其是人才结构失衡问题，改善教育失衡，尤其是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失衡问题。

（5）立足当前、立足实际、立足国际、立足比较优势，科学建立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打造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经济体系。

刘晓昶（华泰证券）：

（1）维持人民币适当贬值及严格的资本管制状态，维持出口和保持外汇储备。

（2）保持货币流动性合理充裕，去杠杆节奏适度放缓，给大部分企业生存空间；鼓励社会向各类“痛点”进行投资；减税降费，降低创业门槛，降低投资壁垒，降低交易成本。

（3）在大病、养老等方面加大政府政策兜底和社会互助帮扶的制度设计，解决民众不敢消费的难题。

（4）提倡“藏富于民、扩大内需”，让民众掌握更多的可支配收入，提供高、中、低各类消费供给，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形成国内市场从投资到消费的良性循环。

姜德波（南京审计大学）：

美国针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必将缩减我国的净出口，为了经济增长目标，可能的途径是

增加国内消费和政府购买；或者想方设法用增加对他国的出口抵消对美出口的减少，同时，设法增加国内消费和政府购买以保证经济的一定幅度的增长。

任保全（常州大学）：

（1）在大幅放宽外商投资准入的同时，同等制定和压缩民营资本投资的“负面清单”，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增强民营经济活力。

（2）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搞活国内市场经济，消除国内的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降低国内的交易成本。

（3）在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时，允许人民币适当贬值，抵消贸易战的影响。

（4）引导中国走出去的跨国企业，通过国内外生产的重新布局，合理避开美国征税。

（5）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结构升级，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孙国民（南京大学博士后）：

（1）通过税费减缓免的方式综合降低企业税负成本，切实改善营商环境。

（2）着力在提升高质量、高效率服务方面强化政府人力资源供给，在非直接面向公共服务领域精简行政管理岗位，减轻财政支出压力，并把精简的人员支出部分用于成立政府引导基金扶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3）完善产权制度，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在保护企业家创业创新方面推动实质性改善。

（4）积极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出口结构。

（5）持续扩大内需，为未来更大贸易摩擦和逆全球化发展未雨绸缪。

刘昌伟（IT业者）：

（1）完善自主可控产业体系建设，加快核心技术研发和国产化替代，以市场带动产业发展。

（2）推动供给侧向高质量转型，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要求；加强顶层设计，引导需求侧需求转化，实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3）针对受影响出口贸易尽快制定应对措施，通过转口贸易或者第三国合资合作解决贸易摩擦和纠纷应作为长期策略考虑。

（4）扩大自贸区范围，给予自贸区企业更大灵活度和政策，推动自由贸易主要输入输出国之前业务嵌入。

（5）实质性降低税率，进一步激活民营企业，鼓励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6）有序发展现代金融服务业，增强金融产业活力，资本与实体产业形成良好互动关系。

经济学角度的中国疫苗监管问题讨论

2018年07月26日

编者按：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披露，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记录造假等行为。由长春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记录造假引发社会强烈关注，也引发了各界对中国医药产业和医疗监管体制等方面的深入讨论。社会各界的众多讨论涉及到对以下问题的判断：要不要以国有化的方式来防止医药行业的败德行为？是否能通过推进市场改革的方式解决屡见不鲜的医药造假？实施更多更严厉的管制会不会有效？从这些角度看，生物疫苗行业的发展和管制是典型的产业经济学问题。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对上述问题进行讨论，并对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行思考。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 （1）国有企业并不比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平、更低的道德风险。
- （2）关键是监管制度，民营企业并不比国有企业更难监管。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国有化并不能防止这个问题。
- （3）呼吁透明化，强化舆论监督是重要一环。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主要由私人提供疫苗的发达国家，同样能够高质量满足人民群众对生命健康的保障。疫苗问题，折射出来的是法治化严重扭曲问题。疫苗接种，经历了从中间代理商模式到卫生防疫机构政府直接购买模式，但却引发了更大问题，国家直管的整个疫苗防疫机构全面沦陷。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政府管制，而在于有效的监察。未来的出路，就是监管的归监管，生产经营的归生产经营。即，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再清晰化。政府不越界，监管才能不失位、失效，法治才能落到实处，法律的威严才能树立。

李新颜（方正和生投资）：

国有化了还需要个人去实施，委托代理关系没有有效监督的话，更容易寻租和腐败。

彭本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区分疫苗领域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哪类该国有化，哪类该市场化有予以明确；理顺监管体制，防止管制俘获；最重要的是透明化，公众知情权，媒体监督权应得到应有保障。

唐德森（无锡环研中心）：

疫苗事件与所有制经济形式，即国有化和民营化的关系并不大，而是跟市场监管法治化、透明化、有效监管及执行力高度相关。推进疫苗等公共产品有效、优质和安全供给刻不容缓；推进市场深化改革是大方向，不然创新和质量堪忧；要推进更严厉的法律管制，大幅提高疫苗相关违法违规成本。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从合约理论的角度，哈特等 1997 年关于美国监狱私有化的论文指出，从平均意义来说，相比私营企业，国有企业靠偷工减料赚黑心钱的激励确实更低，但进行创新的激励也更低。复旦大学王永钦教授和我的研究认为比较好的安排是让两种所有制并存竞争，发挥各自的优势。

疫苗事件有可能和地方政府中的利益相关者对于卫生监管部门的干预有关。更有效的监管可能需要给予相关监督和执法部门更大的独立性，特别是相对地方财政的独立性。

我们现有的一些疫苗通过学校发售接种的方式可能是有问题的。虽然这种方式可能为孩子和家长带来方便，但很容易造成责权不明，甚至一些本不应涉案的学校教工被药企俘获。我们应进行工作流程的改进。对疫苗实行由防疫部门统一决策和负责的统购统销，落实安全责任。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 （1）政府监管体制，多环节、多层次的监管防线，形同虚设，被层层击穿。
- （2）亡羊补牢，为时不晚，但前车之鉴不起作用，问题企业一错再错，显然笼子没扎紧。
- （3）违法成本太低，没有深挖根源，没有痛入骨髓的教训和代价，助长违法侥幸心理。
- （4）技术跟踪存在短板，物联网、大数据应用技术更应在疫苗企业发挥作用。
- （5）市场作用发挥不足，企业利用错综复杂的关联关系，影响市场、甚至是操纵价格需引起高度重视，要从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入手，进行破解问题。
- （6）新闻媒体热点问题持续追踪作用发挥不到位。两年前的问题又重演，公共安全问题，要持续关注，形成老鼠上街，人人喊打之势，逐步实现“不想为、不敢为、不能为”的效果。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疫苗的特殊性，以及零差错的要求，不等于出了问题后转而通过国有化来解决。监管有效的美国疫苗产业并没有国有化，而我们的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甚至是普通产品不照样出问题吗，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管和管理体制更是个老大难问题。

疫苗的使用预防接种是比较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政府保障安全是底线，也是基本责任。但是不要混淆公共产品的提供和政府专营、赤膊上阵去生产的关系，公共产品的提供不等于就是需要政府设立企业来生产。从很多疫苗事件看，可以看到药品的政府采购机制没有健全或出现失灵现象，原因可能是玩忽职守，甚至可能是官商勾结，并非是谁来生产疫苗的问题，更不是国有化所能解决的。

疫苗产业是个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风险大的特殊产业，其发展更应该在符合严格标准、严格监管、信息披露公开透明基础上的发展，国有化解决不了安全监管问题，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思路。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 30 论坛华东组委会）：

国际上涉及国计民生的产业并非一定指定由国企专营，美国、香港都有健全的市场机制，有足够严厉的政府管制。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离开了科学的治理体系，彻底的法治变革，都会畸变。

这次事件不同于以往假药事件，一定要彻底反思政府和市场两只手都失灵的原因，如何提高社会组织、媒体监督力度，保证权力制衡，而不是仅靠传统反腐手段，这才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根本保障。

周彩霞（南京理工大学经管院）：

基于监管者（国家药品监管部门）与被监管者（疫苗生产厂商）的动态博弈，可推出以下可能结果：

（1）若监管者始终严管，则被监管者违法成本很高，守法是占优策略；若监管机构始终不监管，则被监管者违法是占优策略。若监管者经常威胁却没有实质性行动，监管者的威胁将被视为“不可置信威胁”，结果与不监管一样，被监管者违法占优；同时使监管机构的话语成为“不可信”，信誉受损。

（2）若监管者没有一个稳定的策略选择原则，时严时松，或对某些对象严而对某些对象松，被监管者会根据前期的经验来调整行为，如在检查运动来之前守法，“风头”过去后再违法的“猫鼠游戏”；并极有可能通过贿赂谋求对自身放松监管，“俘获”监管者。国家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信誉同样会严重受损。

（3）监管官员个人的最优行为选择取决于其自身的净收益权衡。如果监管者经常收受贿赂且被处处的概率很低，腐败体制就会诱发产生。只有当认真执法收益大于不作为或受贿的收益时，监管官员才会真正履行监管职能。要让监管者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就需要对其施行有效的“激励 - 约束”机制。对尽职保障疫苗供应的监管者要给予奖励，对渎职、腐败的监管者要坚决依法惩处。

(4) 要保证疫苗质量,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是关键。在强化自上而下的外部监管的同时,建立健全自下而上内部人举报的“吹哨人”制度,同时应鼓励横向的舆论监督,聚合社会各方的监督力量。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疫苗问题的几个谬误:

(1) 疫苗国有化。疫苗出现问题不是因为私有化,而是因为私有化的监管不力导致的恶果。国有化没有好的监管,问题仍然没有办法解决。

(2) 取消进口疫苗关税。多数疫苗生产并非高尖端技术,而是因为企业缺乏良知,进口疫苗本身不应该存在优势。另外,很多家长没有给孩子接种进口疫苗,并非因为疫苗价格,而是进口疫苗无法进入库存。即使进口疫苗再价廉质高,依然解决不了问题。

疫苗事件再次发生,政府该干什么:

(1) 追踪涉事疫苗流向,全面收回问题疫苗,集中销毁。并及时通报回收情况,集中销毁公开直播,以重树公信力。

(2) 全国立刻启动疫苗免疫检测,短期及时补种,以免因问题疫苗导致儿童出现相关疾病。地方政府应及时报道相关进展,国家直接设对应工作小组接受群众监督。

(3) 全国大范围检查所有疫苗企业情况,对近年来的样本加大批次检查力度,一经发现,立刻取消相关企业所有疫苗生产许可,即可强制破产清算,终身不得进入该行业。同时,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重刑判罚。

(4) 对监管不力者即可就地免职,终身不得进入有关生命安全相关行业,同时追加经济和法律处罚。

林学军(暨南大学):

对于疫苗这种产品,应该是国有企业,加私营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制约,可能会更好。国有企业主要生产一些基本的,保证人民基本健康需要的,基本型的一些疫苗。私营企业更多的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生产一些比较适合市场需要的,有特殊性的功能的疫苗。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有一定的分工,又有一定的协调,共同的满足全国老百姓的需要。

疫苗应该属于高科技的产品,要了解这些产品的功效和价格,要有一定专业的知识,所以这个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对疫苗的监管,一定要做到信息透明,努力解决信息不对称这个问题。

由于这个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以就存在着做假,以次充好等不良的行为。政府应该做到严格监督,严格检查。要加强企业的信用,资格的审查,对于一些失信的企业,应该加大惩处的力度,让相关企业不敢做假。

向发达国家学习,在食品,医疗,药品,等监管的法律,以及规章制度,努力提高监管的水平,

堵塞漏洞，防止出现类似的案件。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在一个监管制度齐备、组织体系严密的社会中，只有当所有环节全部、并且同步失灵失效，假疫苗才能够顺利完成从工厂到孩子身体的完整链条。按理说，这样跨部门、跨地区、多主体的违法违规的共谋，其难度远远要大于遵纪守法的合作，其成功的概率应该是极低的。但恰恰是这种高难度的违法违规的共谋，居然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成功了。

无论其发生机理如何蹊跷，但结果只有两个：

（1）对无数儿童身体健康的戕害已经造成，能否补救，要看每个儿童受害的程度，更要看政府的后续补救措施；

（2）对政府公信力的又一次巨大耗损，事实上，经过这些年各种花样翻新的人为公害事件的耗损，政府公信力的盈余已经严重不足，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断然措施不足以扭亏增盈的时候了。

针对假疫苗事件，必须两条线同时并进：

（1）依法查处、层层追责、从严执法；

（2）采取一切补救措施，由于目前尚未进入规定动作，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必然不会采取相关行动，需要国家层面迅速启动紧急补救方案，具体建议：

（1）对过去 15 年内，所有已经向儿童注射的疫苗，进行疫苗批号、生产厂商、进货记录、流向记录、注射记录的核对和补登。各级政府、疾控中心、负责接种的社区与公安部门，必须协同工作，借鉴城市网格化管理办法，定点定位，与每个适龄儿童和每一个相关家庭进行复核和补登。应限期完成此项工作。

（2）对于接种了问题疫苗的儿童，各级疾控中心应全面安排儿童、到定点的权威医疗机构，进行相关病种抗体和病毒的检查。

（3）依据检查结果，对接种了问题疫苗的儿童，视具体情况，给予免费补种合格疫苗、免费治疗，甚至免费提供相关病种的全额医保和生活补助等措施，予以补救。

楼稼平（宁波布衣）：

疫苗产业乃至生物医药产业要不要国有化？①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三。一是疫苗产业乃至生物医药产业要不要企业化经营？答案是要，因为事业制比企业化更低效；二是疫苗生产企业乃至生物医药企业是不是可以国有化？答案是可以有，但应解除所有基于身份性的保护；三是疫苗生产企业乃至生物医药企业要不要一律国有化？答案是不。②道德底线的牢固与否，跟企业的产权性质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疫苗、生物医药产业、企业之全盘国有化、全盘民营化或者实行亦官亦民亦公亦私的混合制，都不是解决诸如疫苗问题的必由之路。

要不要继续推进市场深化改革？①疫苗需要者是市场主体，供应商是市场的参与者，行政、

司法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这里给出市场秩序维护者的一个定义是：它不可能因供求双方的犯错而得利，否则，它会鼓励犯规甚至创设一些易于逾越的低级门槛或易于跌落的陷阱，通过罚款而谋利。^②循着市场的常识定义，欲继续推进市场深化改革，首先让疫苗的需求者使用者有知情权。

要不要实施更多更严厉政府管制？从文本上看，政府管制已经足够严厉，问题是如何让政府管制严厉得公开公平公正？严厉得保持应有的力度不变？严厉的监管仍然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只要党和政府通过法律、司法来规范市场各方的行为，及时纠偏，让损害民众利益的一方或几方都受到严厉（大于通过损害民众利益而获利部分）处分，要么让他身败名裂，要么让他倾家荡产，同时对受害人、受害家庭给予足够的赔偿，给揭黑幕者足够的保护乃至奖励，那么，疫苗事件所受到伤害的公众利益、政府公信、行业形象，终能修复。

经济学人视野下的疫苗事件

2018 年 08 月 02 日

编者按：长春长生生物狂犬病疫苗记录造假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医药产业安全和医疗监管体制有效性等方面问题的深入讨论。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若干专家、企业家、政府官员等，对疫苗事件的危害、出现的原因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消除疫苗事件影响和完善疫苗监管等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疫苗事件的危害

疫苗是信任品，一般人自愿去打疫苗是因为相信政府监管部门的选择。因为人们相信，疫苗从研发、生产、流通到接种的全生命周期，政府有关部门都已经建立了完善的事前审批、事中管理、事后监督体系，且有规范化的质量检测和日常抽检制度。国家监管和政府信用的背书，让普通民众选择相信自己所使用的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在一个监管制度齐备、组织体系严密的社会中，只有当所有环节同步失灵，假疫苗才能够顺利实现从工厂生产到最终消费。按理说，这样跨部门、跨地区、多主体的违法违规的共谋，其难度远远大于遵纪守法合作；但恰恰是这种高难度的违法违规的共谋，在我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在这就极大地透支了政府的信用，在较大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伤害了现有体制的基础。

对无数儿童身体健康造成戕害。我国每年约 7 亿剂的疫苗接种量，表明了疫苗事件的波及范围十分广泛。这一事件不仅给无数儿童身体健康埋下了隐患，也给亿万万个家庭造成了心理创伤。疫苗的效用存在滞后性，其危害性需等待现实的触发验证，能否补救，不仅要看每个儿童受害的程度，更要看政府的后续补救措施。

对政府公信力的又一次巨大耗损。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在关乎民族利益的大事中丧失公信力是十分危险的。经过近年来花样翻新的地沟油、苏丹红、三聚氰胺和瘦肉精等人为公害事件的耗损，政府公信力已经跌至冰点，塔西佗陷阱已经来临。疫苗事件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次巨大耗损，对此，政府必须采取断然措施，重拾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实现政府公信力的扭亏增盈。

对我国疫苗行业发展的产生严重打击。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够依靠自身能力解决全部免疫供应和疫苗接种的国家之一，反映了长期发展疫苗产业的巨大成绩。2017 年我国签发了 7.08 亿人份疫苗，国产 6.9 亿人份，进口 1800 万人份，国产疫苗占到 97.46%，这种情况短时间不可能改变。但经过此次疫苗事件的打击，民众对国产疫苗更多的是恐惧与不信任，这十分不利于国产疫苗的研发和销售，对整个行业特别是死亡率较高的狂犬疫苗来说是灾

难性的打击。但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如果因为这次事件不信任国产疫苗，拒绝接种国产疫苗，那么就将无疫苗可打。民众面临两难选择。

疫苗风波至此，政府必须对公众舆论加以引导，不仅要严惩造假者，更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制度，否则不仅伤害政府公信力，损害党的声誉，更会撕裂社会，导致社会治理倒退，背离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

二、疫苗事件出现缘由

药品事务人命关天。单纯以利润为导向，必然会出现不管使用者、消费者死活的“突破人的道德底线”的情况。“疫苗事件”的发生，在研发、生产、流通、接种等环节都难逃之责，有的是企业存在无良追逐暴利的伦理甚至是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有的监管缺失或相关部门与企业合谋的结果。

疫苗事件，反映了当下政府部门对市场运行系统治理能力的缺失或不足。利用信息不对称，借助政府的信用来销售自己不合格的产品，就是不法商人会运用的手段。为什么能借助到政府的信用？因为决策这个事情的权利高度集中在某几个人甚至在某个人手上，决策过程不透明而隐蔽，缺乏必要的监督，而且事后出事惩罚太轻。

这背后是两个主体行为动机的差异：企业行为的基本动机是追求的利润的持续增长，政府官员行为的动机是追求权力的持续增加。如果这两种动机不道德地结合在一起，就导致了权力主导的垄断企业出现，在权力护航和利润刺激下，企业的行为就会趋向脱离市场的力量。

“疫苗事件”事件的发生，科学而严格监管的严重缺失，以及问责的“疲软”是主因。社会化的监督机制弱化，降低了民众的批判与自我净化的功能，仅靠政府监管不仅力量单薄，而且政府官员也容易“被俘获”，使我们尝到了恶果；在监管与被监管的博弈中，监管者一旦被俘获，监管不但形同虚设而且往往形成猫鼠一窝。因此，以信息公开为手段，让公众成为监督监管者的力量，方可扎牢权力的笼子，有利于提升监管者责任意识。

“疫苗事件”事件的屡次发生，与事件违法犯罪处置的不到位、不彻底、力度不够及违法犯罪成本偏低有一定关系，这更助长了违法造假之风。每次“类疫苗事件”被曝光，处罚往往高高抬起、轻轻落下、一罚了之，没有深挖根源，没有痛入骨髓的教训和代价，助长违法侥幸心理。更甚的是，作为国有控股的企业，如武汉生物等，其造假更甚，但仍试图以特殊身份逃避社会监督和法律制裁，这与国企与民企之间的不公平待遇有着直接的联系。

疫苗事件除了假药伤人，同样引起民愤的是很多企业在营销上花费甚多，但在研发上惜于投入。很多普通市民都有这样的经历：孩子从学校回来说要收钱打疫苗，家长就拿钱，但完全不清楚这个疫苗是强制的还是自愿的，是学校组织的还是说学校只是代替防疫机构组织。这就很难避免某些药企出于在追求暴利的动机，将大量经费用于“攻关”学校领导甚至老师，并让后者用言语不清的方式要求学生接种那些非强制性的疫苗。而在事后，这种责权不清的组织方式也会造成责任认定和追责的难度。例如，涉事的学校可以以缺乏专业知识为由塞责。

三. 消除疫苗事件影响的建议

从疫苗涉及的生产商、政府、使用者这三个主体，以及相应的责、权、利三个纬度来看，责权利的明晰和平衡状态应该是：①责的方面，生产商提供价格适中、质量达标、保障供给有力的疫苗；政府提供疫苗的预防接种这样的公共产品，同时政府有更强有力和更高水平的监管措施，确保零差错；分散的疫苗使用者支付合理的费用。②权的方面，政府独享监管权。但这个权是为承担的责任而来，是为疫苗使用者集体利益受托而来。③利的方面，民众得到健康，国家社会得到进步，生产商获取正当甚至比一般行业更高一些的利润。

疫苗事件暴露的是我国疫苗行业“责权利的扭曲和严重失衡”。分散的疫苗使用者不仅没有得到健康，反而是健康受到损害甚至生命被侵害。国家名誉受损、社会信任机制建设倒退，政府尤其是食药监局滥权渎职甚至腐败。生产商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甚至勾结不法腐败官员逃避监管或暗箱操作，获取不正当暴利。在疫苗事件面前，一方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诸多个人消费者与家庭。在强弱悬殊的背景下，更需要政府出面，代表民众的利益来妥善处理此次事件：

采取一切补救措施。追踪涉事疫苗流向，全面收回问题疫苗，集中销毁。各级政府、疾控中心、负责接种的社区与公安部门协同工作，对每个适龄儿童注射的疫苗，进行批号、生产厂商、注射记录等的核对和补登。各级疾控中心安排儿童到定点的权威医疗机构，进行相关病种抗体和病毒的检查。依据检查结果，视具体情况给予免费补种合格疫苗、免费治疗，甚至免费提供相关病种的全额医保和生活补助等措施，予以补救。

依法查处、层层追责、从严执法。全国大范围检查所有疫苗企业情况，对近年来的样本加大批次检查力度，一经发现类似问题，立刻取消相关企业所有疫苗生产许可，终身不得进入该行业。同时，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重刑判罚。对监管不力者即可就地免职，终身不得进入有关生命安全相关行业，同时追加经济和法律处罚。彻查武汉生物，让国企在违纪违法后不再有任何侥幸心理，维护国有企业的率先垂范作用，更好地提振市场信心，促进不同社会阶层的互信和共荣。

这些补救措施，看起来程序繁复、工作量巨大，但这是和查处违法违规者同样重要的工作。这是执行为民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更是化“危”为“机”、重建政府信任、提升政府公信力、避免塔西佗陷阱的重要关口。事实上，这样的关口曾多次出现又多次被错失，是此类公害事件轮番上演的重要根源。

四. 完善疫苗监管的政策建议

如果说在芯片、高端装备等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方面，我国应积累动态比较优势以奋力追赶，但对我国技术完备、实现自主可控且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疫苗产业而言，更应该在保持优势的基础上，强化监管，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因此，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维护我国疫苗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完善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人民本位的发展导向。疫苗的需求市场是老百姓，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不仅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让老百姓在疫苗的生产到最终的消费过程中发挥监督作用。这其中关键在于信息完全透明，争取更多的信息对称化，让老百姓具有全流程的完全知情权，让其尽量有能力进行选择。

构建疫苗“研发－生产－采购－销售－质控”全流程的闭环全时、全事的第三方监管体系，为确保客观公正，第三方的监管费用，由政府购买服务支出，监管方式实行异地和轮值监管，杜绝合谋、利益输送，进口疫苗也应纳入监管体系。

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结构水平。充分赋予媒体、社会组织、网络通道的监督权力，让完全依赖政府力量向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协同协调，发挥各自的作用，重视提升社会自组织和自我净化的能力。也要针对疫苗这种高科技的产品的性质，普及科学知识，让百姓普及这些产品的功效和价格的专业的知识。

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强化全流程监管。着力解决好疫苗的质量问题，必须建立从研发－生产－配送－消费－事后监督评价等全链条的质量体系；借鉴为提高仿制药质量，采取一致性评价的做法，有必要在疫苗领域内推行类似于一致性评价的工作，对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可以冠以特定的标识，增加识别度，在临床上予以优先使用；借此形成正向的激励机制，充分做好第三方监督、企业自查与不断提高技术及质量水平的动力。

在供应链系统上进行全流程跟踪，把监督系统前置到研发环节，每一个重要节点都要上系统进行不可逆的记录，包括疫苗动物实验数据，实验报告原始资料数据等。疫苗出厂以后通过冷链物流供应到终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物流配送技术标准，没有经过冷链运输的疫苗一律不准进入市场，建立疫苗使用的可追溯系统，以及疫苗受害者的法律保护机制。加强接种者后期跟踪，用接种者效果的大数据支撑并反馈到研发创新、生产流程和质量改良的关键环节，形成“自我完善”的修正企业内控体系。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以就存在着做假的可能性。政府应加强对企业信用、资格的审查，对于一些失信企业要加大惩处力度，经济利益上要让其倾家荡产，行为处罚上要让其坐穿牢底，真正让生产者知道底线。制定不低于全球平均处罚水准的处罚制度。将政府部门落实项目终生责任制，和实行对政府诉讼两者相结合。企业出了问题，追究项目负责人，有腐败和无腐败的处罚，要拉开差距。加大对食药、医疗卫生体制的官员监管追责，一旦发现利权输送，终身取消公务或事业待遇，终身禁业，不得进入食药、医疗卫生行业。对于触犯食药、医疗卫生行业底线的或重大事故的企业，法人，主要研发人员，实行终身禁业。

凡出现类似本次之疫苗事件，供应商、疾控部门和当事医院，首先得接受刑法调查，仅当司法机关排除了事件当事各方及相关人员的犯罪嫌疑和刑事责任后，才进入制药、运输、储存乃至注射阶段的技术调查与分析，并启动相应的民事赔偿程序。事后的赔偿，是监管的一部分，必须建立以消费者个体为损害索赔主体的制度，以罚代赔制度应予废弃。加大疫苗公共危害违法犯罪的惩治力度，逐步放开集体诉讼，建立受害者“集体诉讼与赔偿”司法路径，允许在特

定事件或行业对企业和政府进行诉讼，用“重典治疫”的重拳震慑。

构建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市场。在生产领域，国有企业并不比民营企业更加良心，而且创新积极性也并不比民营企业更强。用竞争手段发展疫苗产业，打破垄断市场。对一些自然垄断的行业，可能用国有企业来生产会更好些。但是对于疫苗这种产品，应该是各类所有制企业相互竞争、相互制约更好。国有企业主要生产一些基本的，保证人民基本健康需要的，基本型的一些疫苗。私营企业更多的可以按照市场运作，生产一些比较适合市场需要的，有特殊性的功能的疫苗。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有一定的分工，又有一定的协调，共同的满足全国老百姓的需要。

推动部分疫苗的公益化，一方面坚持高质量疫苗研发和供给，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开放的方式，加大合格疫苗进口力度，通过降税或者免税的方式，加大疫苗供给，必要时可以政府出面采取谈判价由企业配套进口，政府进行必要的公益补贴。在疫苗的接种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中的消费者选择权，允许老百姓对同类疫苗不同厂家产品的自由选择权，倒逼国产疫苗的升级。

（本次研讨由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教授发起，南京大学博士生闫东升整理成文，参加研讨的专家学者和企业家主要有：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刘志彪教授、南京大学博士生孙晓露、浙江工商大学毛丰付、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宋凌炎、南京审计大学姜德波、澳洲国立大学沈凯玲、金象投资王文莉、南京财经大学杜运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胡钟中、方正和生投资李新颜、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何雨、武汉纺织大学叶茂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包特、淮海工学院孙军、常州市发改委吴继冈、苏州大学杨锐、中国财政杂志社方向阳、加凯集团杨建中、山东工商学院战岐林、无锡环研中心唐德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彭本红、山东农发行陈岸立、南京理工大学经管院周彩霞、南京审计大学颜银根、暨南大学林学军、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徐琴、深圳独立学者金心异、中国电改 30 人论坛秘书长宋常铁和宁波布衣学者楼稼平等。）

政治局会议首提“六稳”：如何稳？

2018年08月10日

编者按：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在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六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专业性地深入讨论，并对如何实现稳定等提出了若干针对性政策建议。

一、如何认识六稳之间的关系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六稳”中前面五个是具体的问题导向，最后一个稳预期可以看做是方法论。就业是目前中国经济中最为牢固的一环，今年6月份调查失业率创新低，但仍把“稳就业”放在第一位，反映的是未雨绸缪、底线思维。其他的几稳，金融、外贸、外资、投资目前都依次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风险，但另一方面，金融等这几个方面的短期稳定政策某种意义上都是要付出货币增发和债务增长的代价的，因此在这些方面掌握政策的宽紧程度上应当主要服从于“稳就业”的目标。

王文利（江苏省专利信息服务中心）：

稳预期是关键，稳金融是抓手。

唯有增强实体企业和人民的预期，才能鼓励和鼓舞大家携手克服当前出口承压、信用收缩、房价上涨等不利因素。

为了达到稳预期的目标，稳金融应该是最有效的措施，只有在去杠杆的同时稳了金融，才能帮助和引导企业、政府平台防范并有效化解金融风险，服务实体行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企业发展壮大才有可能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实现稳就业目的。

张中祥（天津大学马寅初经济学院）：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增强信心、稳定预期是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基础，稳就业是目标。要守住就业的基本盘，关键靠经济稳定：

（1）要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形成政策合力；

- (2) 切实降低企业税负，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发展，带动就业；
- (3) 发挥财政政策积极作用，增加财政支出强度，做好民生保障和社会稳定工作。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本质上是稳经济，稳预期本质上是预期管理来稳住人心，但是稳预期必须建立在经济持续发展和民生持续改善的基础之上。

解决“六稳”问题，必须系统解决几个重要问题，扭转当前经济不稳和预期不稳的局面：

- (1) 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对于解决稳外贸、稳金融、稳预期，弘扬改革开放发展主旋律很重要。
- (2) 解决好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的地位问题，通过一系列降税减费和对内开放等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增强民营企业的投资预期，对于稳投资、稳就业、稳定民营企业信心和稳预期很重要。
- (3) 通过减税减负等措施，切实解决中产阶级焦虑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这对于稳定预期很重要。
- (4)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和民生为目标，坚定不移实行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才能解决经济不稳的问题。国际代工的时代，已经结束；国际产业竞争的时代，任重道远。中国过去的追赶是帮忙式追赶（对应数量型发展），我们通过帮西方代工，实现追赶。今后的追赶，是竞争性追赶（对应质量型发展），我们今后的发展，是要挤压欧美的市场的。中国今后的“产业升级式”发展，必然要遇到欧美竞争。这个转型的过程，绝不是5年10年能搞定的。一切政策思路，都要基于这个新时代的特征来考虑。追求稳定应当是长期的稳定，要少用短期斗争思维来应对当前的问题，也不可应用应急式的维稳思路来解决。正如保罗·菲利普所言，当泡沫破灭到最低点时，经济回报就慢慢出现了，正是企业家们开始利用新技术与泡沫遗留下来的廉价资金、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相结合，使他们探索新技术方向的成本更低，新的订单完成起来更有效率，从而推动新科技和新产业的繁荣。如果不计成本让该清算的企业都稳住，是不利于产业升级的。

刘瑞翔（南京审计大学）：

稳就业实际就是稳增长，只要中国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就业应该能够得到保证；稳金融和我国长期货币超发以及形成的资本泡沫有关；稳外贸和稳外资除了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之外，还与中国要素成本上升及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有关；稳投资主要是稳民间投资，和稳预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六个稳”背后的影响因素是不同的，采取的对策也有所区别。

从短期看，主要是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力度，同时防范金融风险，来达到稳增长、稳就业以及稳金融的目标。

从长期看，还是要通过市场化取向的改革来稳预期、稳投资、稳外资，具体包括加大对内

和对外的开放力度，缩小政府规模并改变当前政府职能错配的现象，切实减税减费，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等。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六稳中，金融、投资是政策可控性变量。外资、外贸、就业以及信心是政策作用效果的市场反馈变量。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当前最大的投资瓶颈就是制造业营商环境不佳，而制造业营商环境不佳主要表现在企业经营成本高企以及国内、外市场需求萎靡不振。当前，改革的破题点在垄断型国企改革以及金融市场改革。通过开放这些垄断性企业长期占据的市场资源，让生产要素价格回归合理水平。通过市场化的改革培育和增加金融市场服务主体的数量，优化金融服务市场主体结构，实实在在地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需求侧改革方面，要降低医疗、教育以及住房等老百姓基本生活方面的支出成本，以政府投入代替市场竞争性投入，让公益回归公益，让老百姓买得起房，看得起病，上得了学。

郭进（上海社科院）：

中央提出“六稳”是对当前经济、外交、社会发展趋势的正确判断，体现了中央对今后数年总体形势的基本态度。

影响稳定的外部因素：①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尤其是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贸易战，对中国开放发展的稳定性构成重大冲击，是影响稳定的首要外部因素。②贸易战带来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如何应对美元回流对中国改革成果的收割，是影响当前外贸稳定的核心因素，必须保持必要规模的外汇储备。③国际油价的持续上涨，很可能形成输入型通胀，对国内的企业生产、居民生活稳定造成冲击。④美国对中国台湾和南海问题的干涉。在以上三个外部因素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不排除外部势力借助台湾和南海问题挑动军事对抗，这对中国最为不利之处在于中国仍处于军事斗争的准备阶段，过早与外部干涉势力摊牌将面临着无法有效吸收胜利成果（或者暂时失利）的风险。

影响稳定的内部因素有：①经济下行造成企业赢利能力减弱。稳定企业正常的生产——消费循环是“六稳”的关键。②高房价造成的堰塞湖隐忧。通过贸易战刺穿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美国的一个选项，建议继续严格控制房地产价格继续上涨，逐步消除房价泡沫过高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威胁。③国内新增就业的压力。在企业赢利能力持续下行的情况下，新增就业的压力仍十分巨大，长期以来的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建议国家暂时扩大职业技术学校、高中和专科类大学招生比例，延缓就业压力。④粮食供应的安全。中国已将进口美国大豆等农产品作为贸易战的回击对象，这也会对中国居民的副食供应带来一程度的影响。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六稳的提出是在国内外环境动荡起伏，经济下行压力条件下提出的，目的就是正视目前面

面临的困难，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突破，持续前行。六稳也说明了近期困难与远期发展问题，六稳就是目前面临的六大困难，在这六稳基础上，我国才能突破经济下行压力和国际环境的束缚，在经济社会环境稳定的基础上，推进改革开放，推进政府管理提升，推进民生保障工作。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六稳的起因是六不稳，而本轮六不稳的特点是：

（1）不像以往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不是未雨绸缪的防汛需要，而是险情已经出现的抗洪需要。

（2）主要是由中美贸易前所未有的剧烈摩擦引起的。化解本轮危机，一要增强紧迫感，把六稳当成头等大事，尽最大努力减少经济损失和可能带来的其他损失；二要从保存改革开放40年来来之不易的成果这个大局和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定位出发，制定更加稳妥的战略战术，尽最大努力减小摩擦，缓和中美关系，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二．六稳具体稳什么？

稳就业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首先应该稳企业，企业稳了就业就稳，就业稳了消费需求提升，消费促进市场，市场稳盈利了就会促进投资，投资盈利了就会促进金融，然后出现繁荣昌盛的景象。对此，要减轻民营企业负担，让更多的企业留在国内，从而吸引外资企业促进发展；另外加强对金融监管，提高造假处罚力度。

盛文军（人行杭州）：

稳就业的前提条件是保增长，否则无从谈起。

激发投资，提升投资预期和信心，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各类限制性行业和领域，内外资同等享受国民待遇。

进出口即外资外贸方面，尽管净进口的贡献率在下降，但对优化进出口结构及带动国内相关产业转型升级作用仍然较大，因此稳外贸外资重点应在结构上下功夫。

推动消费升级，拓展内需市场宽度和深度。一方面要切实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不断优化消费产品 and 市场结构，促进消费品和公共服务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从金融视角看，关键是逐步恢复金融在市场配置各类资源中核心作用，发挥资金价格的市场信号和引导作用，恢复扭曲和失真的价格信号：

（1）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更好地发挥结构性功能和精准调控效应。

(2) 财政政策要适度宽松，要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避免互相掣肘削弱政策效果。

(3)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得经营和发展所需资金，重点是发挥好资本市场功能和作用。

稳金融

孟楠（徽银南京）：

关于六稳，多方面多维度是紧密结合，不能割裂开来只强调某一方面。更要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和行动，要有时间表和阶段性目标，尽快实施落地。作为银行人，我觉得稳金融还是要放在第一位，希望国家尽快拿出有效举措：

(1) 针对实体经济，国家几百亿的扶持基金何时成立？如何运作？

(2) 针对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能否结合战略布局，通过内部减免印花税，外部国家舆论占领制高点对股市发声，提振股市信心等方式稳预期等等。

稳外贸

岳中刚（南京邮电大学）：

中美贸易战的关键是美国希望借此让制造业回流，这些年国内出现了对外资作用低估的氛围，内外因素导致外资制造业部分回流，部分迁移至东南亚等国家。为此，个人认为“稳外资、稳外贸和稳投资”是优先选择，尤其是稳外资是重要抓手，重视外资的技术外溢。外资趋好，外贸和投资会随之向好，就业、预期也解决了。

稳预期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在六稳中，稳预期虽然是排在最后一个，但并不意味着最不重要，而恰恰是最重要的。当前社会心理预期处于复杂、多变的敏感阶段，稳定预期可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预期稳，信心增，有利于激发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的新投资热情，增强市场主体的活力，进而转化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其中，明确的、稳定的政策信号和抓铁留痕的坚决落实是稳预期的关键。应当看到，党和政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明确的，对外资和民营企业支持的政策并没变。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写进宪法的。中央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没有变，保护民营企业产权方针没有变，坚持对外开放和利用外资政策也没有变（最近还有巨大进展）。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稳预期确实是“六稳”里面最重要的。我认为，中央需要对近年的大规模移民趋势进行全面的认真调查研究，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要“跑”，才能对症下药修正政策让他们不要跑。

沈晓杰（报人）：

稳人心首当其冲，至关重要。它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未来国家和自省命运的预期。

（1）对内，要理直气壮大张旗鼓地宣传 40 年来已被实践证明成功的改革开放经验，不提出冒进不切实际的口号和举措，让广大人民群众安心稳心顺心。

（2）对外，在保证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基础上，经济行为向国际惯例靠拢。

王 起（澳大利亚工业科技部）：

稳预期确实可以起到缓解社会波动的根本目的。我觉得具体还要问几个问题：稳谁的预期？针对不同的对象这个有不同含义。稳哪种预期？短期，中长期，不一样。中国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民众对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充满了焦虑和不安。因为大家深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维系于改革的成败。但是，中国的改革绝不是“顶层设计”出来的，而是真正一步一步探索出来的。中国很多成功的改革，都是顺应历史潮流、顺应民间首创精神的成果。尊重老百姓，这是过去领导人最伟大的地方，也是中国改革最成功的地方。

何 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宏观层面的“预期”，包含了对国家前途、当前形势、政策走向等方面的认知；微观层面的“预期”，主要体现为对个体命运、职业前景、人身安全等方面的认知。目前，就业尚稳，金融、外贸、外资、投资与预期，波动较大。原因又可分为两类：

（1）外部环境变化引发的不稳，主要体现在外资、外贸上；

（2）内部政策调整引发的不稳，主要体现在金融、投资上。

对策而言，主要包括两方面：

对外，稳妥处理对美贸易摩擦。主要措施：降低紧张强度与烈度，为对话与沟通创造氛围；强化知识产权保护，集中查处一批侵犯知识产权的典型性案例，树立形象；系统重组产业补贴政策，变直接补贴为间接引导。

对内，在“强政府”与“强市场”格局中，进一步把“强市场”做实：以全面减税代替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和市场主体创新代价；尽快平反一批企业法人冤假错案，为法治市场树典范；尽快形成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错位发展格局，为民营企业留足市场空间；吸纳重大政策的民间声音，不要搞出其不意性政策来干扰市场、破坏市场自身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机理。

马春阳（国都期货）：

短期看，稳定民营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的预期最为重要：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减少各种隐形管制、税费，营造一个相对公平正义的竞争环境，是稳定外资、投资的关键所在；切实降低中产阶级税负，提高基层政府的办事效率，是稳定中产阶级预期的关键；适当放开信息、言论管制，共同推动社会进步，是稳定知识分子预期的关键。

长期看，要在稳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建立起公开、公平、公正的宏观环境。尊重法治、对传统民风习俗有敬畏之心，适当管理预期，再起焕发企业家、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信心。

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稳预期的根本乃稳定经营环境，一手严打违法骗局，一手鼓励、助力个体、私营企业发展，让企业如鱼得水。

张云逸（上海鸿逸投资）：

六稳首先是稳预期，稳预期关键是政府信用。当前经济领域的部分乱象与政府自身信用缺失开始的。党和政府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法律法规，对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和作用，除短期性和强制性的外，其他的都需要民众的自觉自发行为来实现。不解决政府公信力的问题，再好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会走样打折扣，从而与政策预期的效果大相径庭甚至适得其反。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稳预期”虽然较为“虚”，但却异常重要。目前预期出现较大波动，尽管有各种外部因素，但对预期动摇最大的依然是国内政策，而国内政策对两类群的预期影响最大：一是民营企业群体；二是中产阶级群体。国内政策方面，着力点应在两个层面：

核心理念层面需明确两点：扩大“对内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保障全体人民集中精力投身于经济建设和各自的职业发展中。

中观的具体政策和导向层面，也需明确几点：科学、理性管理房地产市场，稳定楼市政策；改善民企运营环境，切实减税，让减税真正惠及企业；尽快减少并最终杜绝各类运动式治理，例如环保的运动式治理、社保的运动式治理。

王运陈（四川农业大学管理学院）：

当前，中国正在由大国向强国转变过程中，已经不可能让他国“不知不觉”了，内部“不急不躁”了。六稳之所以提出，主要是由于经济社会运行“稳中有变”，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其中，“六稳”是就当前需要紧紧抓住的主要矛盾，采取针对性强的措施加以解决。“六稳”重要的是稳“心”！

郑江淮（南京大学商学院）：

稳短期预期，就是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降低居民高质量消费成本，减税幅度至少使得税收增长与 GDP 同步。

稳长期预期，要指定合理的环保标准，给企业努力达标的预期，从而维持正常的生产和产品供应体系完整性。高质量产业体系构建是稳长期的预期的根本保障，其中高质量服务的有限供给是关键。原来的市场化生产体制只是解决了商品短缺，解决不了人的发展需求短缺。因此，要在这些需求满足上进行改革开放，增加和吸引高质量供给资源，充分降低居民在这些需求上的消费成本。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六稳”之中稳预期可能更为重要。

取决于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当前的要点在于公平竞争、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能与国际规则完全对接的制度供给，真正建设以制度和规则为基础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取决于经济和民生领域重大决策的落地效果，当务之急是以“减税富民”为导向调整财政政策着力方向，让企业和民众的生产生活负担真正下降。

在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则应强化信息披露机制，让这两个市场的参与者更多基于翔实、准确的信息做理性决策。

易志高（南京师范大学）：

“六稳”的关键是稳预期，而当前对稳预期影响最大的是中美贸易摩擦及其带来的可能后果，这也直接关系到当前的金融市场波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等。实际上，其他几个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贸易摩擦而言的，旨在降低贸易摩擦对预期的不利影响。当务之急，除了直接采取相关措施或策略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之外，更应从科技创新、财税体制到市场开放等，多环节多方位切实改革，方有可能稳预期。

三．其他政策建议

张程（江苏证监局）：

出路在于改革、根本性的变革，而不是开放，开放倒逼的改革只能是技术层面的，基础性的革新不是开放能倒逼出来的。所谓根本性的变革其实也只是建立一个尊重常识、尊重规律、符合人性的制度。这也和党的宗旨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1）扩大民企准入，有助于稳预期，预期的稳定对于另外五项具有重大作用：扩大民企准入能够释放清晰的信号，向市场表明一个坚定的市场化方向；在扩大外资准入的同时扩大民企准入，避免市场将扩大外资准入理解为暂时的国际谈判策略。

（2）扩大民营企业的准入领域能为六稳提供有力支撑，支付的政策成本更小一些。

（3）扩大民企准入能够即时创造经济活动，扩大经济活动规模，提供更多的就业。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30论坛华东组委会）：

（1）稳就业是最直接的稳民生，为保证就业形势稳定，一定要优先确保吸纳就业最多的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稳中向好。

（2）稳金融，根本是控制住各级政府和大中型国企的政绩冲动，货币供应量不宜过度宽松。

（3）稳定国际形势，关键在重整对美关系，着眼经济稳定，给国际社会重塑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

（4）稳投资，重在为国内创造更多就业和投资机会，与扶贫攻坚相结合，形成贫困地区、人口的后续脱贫能力。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1）稳就业的前提是稳增长，这就要求想方设法扩大国内需求，切实实施减税降费，发展实体经济。

（2）稳金融方面，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要重视股票市场的规范与建设，稳定投资者的预期；另一方面，要防止房地产泡沫的继续膨胀或泡沫短期刺破带来的金融风险。

（3）稳对外贸易方面，积极拓展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同时，通过主动的汇率适度贬值策略，稳定对美贸易。

（4）稳外资方面，继续推进以自贸区为核心的吸引外资改革试点，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方案。

（5）稳投资方面，一方面要谨慎推进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投资，管控好投资风险；另一方面，国内投资要继续实行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战略，打破某些行业国有经济的垄断局面，降低投资的行业门槛。

（6）稳预期方面，要稳定民众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对中美贸易战的负面影响要有预估，做到心中有数，应对有方。实行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稳定预期。

朱菊平（江苏社科院泰州分院）：

去年以来，随着史上最严环保政策的实施，大量小型养殖场、食品加工企业等被关停，对保护生态环境发挥积极作用，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期盼的。但是，对部分地区不顾实际情况“一刀切”的做法对基层创业就业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打击基层创新创业积极性。保护生态环境固然重要，但从稳就业角度来看，政府应给予经营者整改时间，在安装治污设备、技术、土地、资金等方面给予支持，帮助经营者度过转型升级难关，从而营造良好双创环境。

刘昌伟（IT 业者）：

扩大内需，激活经济发展活力。对内降低企业税赋，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经营活力；加快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关于自由贸易协定，刺激进出口贸易，对冲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影响。

扩大落实改革开放措施，增强世界贸易中的磁聚效应。放开重要领域资本限制，引导向实体经济倾斜，用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带动高质量发展。

保持政策的持续性，稳人心。确保各种改革开放措施和制定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的持续性和有效性，稳定和强化各利益攸关方信心，老百姓消费信心。

于晓华（哥根廷大学）：

（1）对外要稳定和美国的关系，这是一切对外关系的基础。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做到依法治国和科教兴国，所有企业主体平等；提高科教人员待遇，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3）减少对外不必要的援助，向美国学习减税减机构和减监管，增加民生支出，建立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系统。

姜丕军（嘉华资产首席研究官）：

（1）与 08 年金融危机下，出口塌方式的下滑使得当时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方式挽救经济不同，当前中国已经是内需型国家，即使中美贸易战极端的情形出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是塌方式的。

（2）中国没有系统性风险，不会“硬着陆”，但结构性问题非常严重，比如国企和民企盈利严重分化。

（3）从短期看，要通过减费减税把民企稳住；另外“一刀切”去杠杆政策要进行调整，以更有诚意政策措施促使 PPP 项目落地等。

（4）中长期来看，如何充分调动和发挥企业家精神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5）中美贸易战方面，中国当下已经难以“韬光养晦”，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6) 中央务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改革契机，中国有勤奋的人民，广阔的市场，非常完整的产业体系，高执行力的政府行政体系等，这些都需要通过改革来进一步激活，改革是最大的红利。

文传浩（重庆工商大学）：

- (1) 稳方向，就是国家的改革方向，延续一直以来的改革大方向，深化改革；
- (2) 稳政策，调整过去宏观政策变化太快的节奏；
- (3) 加强系统性建设，不要一搞环保一窝蜂上，严重影响就业和创业。

孙国民（南京大学）：

坚持和统领以“两个中心”为一体的高质量发展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改革，摸排贯彻这个价值取向的短板，特别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短板，切实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生产力取向改革：围绕搞活市场主体，积极推动减负降本和融资保障；总结改革开放40年经验与教训，坚持、深化和扩大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启动以内需为重点的需求改革，重塑经济发展新动力。

沈凯玲（澳洲国立大学）：

所谓“稳”不是没有原则笼统的“保”。考虑到这次贸易战之后，回到以前依靠国外市场发展的局面可能性很小。该出清的出清，可以适当干预出清的速度，避免大起大伏。但终极目标是一个更加以我为主导，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是大国，只有实现这样的模式，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长期主动。

周建（南开大学）：

全面贯彻深化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机制的精神，最大程度将市场机制融入各类经济组织，补充和完善法制体系，进而深化法治意识和思维。

持续深化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在地方大型国企和经营性央企层面上推进，真正推动分类治理和对国企进行管资本的新型监管政策的确立。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基础性的工作，还是对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要优化，要把政策文件去落实。营商环境有丰富的内涵，既包括企业与外部的关系，还包括企业自身行为和担当。当前，营商环境依然不乐观：去杠杆导致很多银行提前收债，企业流动性出现困难；结构性减税并没有有效落实到民

营企业上，而且税赋稽查日趋严苛，税负压力增大；环保和安全一票否决，缓冲期少，政府配套政策没有跟上，小微企业受自身条件限制，难以完成；基层的政策随上级的文件随时会变，各个部门政策不配套，“一张蓝图绘到底”依然遥远……所以，民营企业在这样的营商环境中能生存下来，绝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张建华（上外经贸）：

现在提出六稳的背景是：过去几年特别是今年以来，国内环境的急剧变化，过激的政策措施以及应对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挑战，打破了人们改革开放的预期，造成了人们不知所措和逆向选择。要做到六稳，需要真实地贯彻十九大设计的改革开放路线图；各项政策要实事求是，不搞运动式的落实政策。

孙军（淮海工学院）：

六稳的主体除了政府层面适当有为和国企加快改革之外，稳的关键主体力量是民营企业和老百姓。（1）对于前者，要通过减税降费、逐步放开行业进入壁垒、严格产权保护等手段稳企业家；提高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降低相机抉择比重，加快央地税收分成体制改革，有效推动资金进入实体。（2）对于后者，要不断增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功能，尤其化解老百姓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提高个人所得税税基，增加内需。

崔卫东（蓝鲸咨询）：

县级地方是六“稳”前沿。建议加大市场改革取向力度，通过县级地方党委和政府的传导作用，采取积极财政措施，让企业和人民群众感受真正的改革。

确定县级税收收入增长目标的上缴上限，增收部分全部留给县级“六稳”工作：帮创业促就业，创业者和创业企业员工3年内缴纳个人所得税全额返还；帮企业稳就业，企业新增税费部分，全额用于企业新增员工工资、员工新增工资、员工新增社保等福利开支。用企业发展的上缴税费增量，弥补企业人工成本上升差额。

王建国（日本中京大学）：

关于求稳，我认为正确的理解应该不是回到旧有的均衡状态，而是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动态均衡。根据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一个系统能够走向有序的必要条件在于它的开放性，而旧有均衡的打破，正是系统实现相变，走向新的均衡的开始。由此看来，打破旧有均衡秩序的中美贸易摩擦或贸易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挑战与压力，也带来了促使我们改变就有秩序，实现走向新常态的重要机遇。在这个机遇面前，只有进一步扩大系统的开放性，才能获得更多的负熵，有利于达成新的秩序与动态均衡式的稳定。增加开放性，意味着要更为积极主动地在更多的领域导入市场调节经济的机制，并应维护好它的良性发展。对内，这是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必由之路；对外，这也是一个有责任经济大国所应担负的不可推却的责任。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 （1）提高决策质量，真正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 （2）创新人力资源改革，把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尤其是政府公务员改革，进一步完善优化德才兼备标准。
- （3）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加大技术研发强度、力度及频度，改变仿制、模仿甚至偷盗的不良形象。
- （4）大力推进科研体制改革，坚持反对撒胡椒面似的经费使用及各类不合理的补贴、贴息、退税等制度。

田伯平（江苏社科院）：

“六稳”是应对当前严峻形势的短期政策，目的是防止出现系统性风险。因此，推进“六稳”不宜大动干戈，只能逐步推进，关键是方向正确。稳了以后再积极推进改革。

“六稳”的核心是稳预期，当前预期不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口号变化太多太快。因此，充分发挥原有政策的作用，根据情况适当突出或微调。稳定政策才会有稳定的预期。

“六稳”关键是落实。按能力和手段分层次落实“六稳”任务：县市层面重点放在稳就业（稳民生），实事求是稳投资稳外贸稳外资；省级层面重点稳投资稳外贸稳出口；稳金融稳预期应该主要在中央层面，特别是稳预期（稳市场），必须有中央的坚定态度。

王辉龙（南京党校）：

（1）稳就业，关键在激发企业投资意愿和生产积极性。当前需要给予特别关注的是民企和外企，需从保护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入手。

（2）稳金融，需要从规范市场秩序入手，对去杠杆工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3）稳外贸，需要平衡好中低端传统优势与中高端新优势的关系。

（4）稳外资，现在改变的约束条件主要是成本。但我们形成的产业配套能力、熟练技术工人、交通基础设施、通信网络等是与我们进行低成本竞争的东南亚所不具备的。当下需要做的就是坚定开放，坚定市场取向改革。

（5）稳投资，就减税。

（6）稳预期，对外，中美贸易摩擦更讲究政策的务实和灵活性。对内，强化法治，去糟存精，提振信心。稳定预期首先要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续性。

包特（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关于稳就业，我认为应以一种更审慎稳健的态度处理发展、能源和环境的关系。面对不确

定性暂时增大的经济背景，有关部门也许可以在严格要求排放标准的前提下，暂缓一些能源替代过程，并尽量减少以停产和限电的方式进行干预。

稳金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化是金融稳定的巨大威胁。各地目前推行的干预政策一方面对稳定价格起到一些作用，但另一方面面临方法手段过多且自由度过大，且干预机制过于复杂的问题。其中，过大的自由度意味着效果的不确定性和预期的难度。建议在房产税推出以后让其政策能退出的退出，不退出的也以制度形式固定其实施时间长度和力度，减少一些地方政府频繁变更的空间。

稳预期的重要前提是信息发布的及时透明，防止地方或有关部门“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潜在问题的即时发现和处理是改革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楼稼平（宁波布衣）：

稳就业的根本，还是稳创业。当前及可预计的未来两年内，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由于经营环境面临剧变，企业家数及其规模已经并继续在减少、萎缩，由此将析出大量劳动人口。重新激发创业意愿，是稳创业的关键。

稳金融，应将重点置于把前些年超量发放的货币如何妥善地回笼，以免而引起严重的通胀。同时要减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冲突，稳金融，在政策层面、操作层面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同时，在此也建议把“稳物价”列入政策目标序列。

稳外贸，要探索新模式，总体上要采取减少管制的思路，宏观上取消出口退税制度、主张进一步放开汇率，适当管制外汇，提高结售汇效率与速度，不能对汇率和外汇实行双管制。总的来说，要相信企业能找到出路，不要指手划脚。

稳外资和稳投资，其实与稳就业稳创业是一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对内开放的问题。对内开放不彻底，对外开放也难以迎到心诚的外商；民营企业不安心经营、无意愿投资，那么现有的外资企业也会如惊弓之鸟。“投资”不应仅指政府驱动的铁公鸡之类的项目。稳投资，不是数量上的不变，不是政府投资替代企业投资的过程，即使是未来两年内企业投资下降，政府投资也不应强行实行数量替代。

稳预期，是最关键的。纯粹的预期，是对竞争市场信息的预期，它是企业经营决策的一部分，有预期错误而失利、失败，但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预期正确而获利、而成功。

现在的确要共克时艰。当前最需要形成的预期就是：政府没有自己的投资，没有自己项目的融资，他将切实减税，他将宽容且真心倾听民间的各种声音，他甚至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调皮也认真对待，最终，人们看到，政府是真的相信民间的努力，一定会让这个国家克服种种险阻，这才是最大的最魔力的预期。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稳就业，要分析哪些产业有可能是就业不稳的来源。根据就业不稳的产业，检讨是需求面还是供给面处理。

稳金融，让银行快速的认列坏账 / 呆账，在年内快速的打消呆账，稳定或降低不良放款的比率。

稳外贸。在进口方面，分散进口的来源，尤其是民生物资，能源及基础建设的物资。部分有关民生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可以考虑部分、有期限的补贴。在出口方面，可以改成用其他海外境外投资的子公司来接单，这样透过我们国内生产组装制造的部分不受影响，降低贸易顺差的问题。

稳外资，争取几个标杆企业，作为对外资的宣传。当然另外一个配套措施就是智慧产权的保护。

稳投资，目前做实业的可能对投资的意愿会降低，应该鼓励产业升级，对于购买固定设备提升生产率的一些项目，可以给予补助、税负的减免。股利所得税的延缓缴交或优惠。

稳预期，到底要稳预期什么呢？首先，政策面要稳定，不要短期内频繁的出政策。房价，汇率，通货膨胀，这些要通过供给面与需求面两方面来讨论。针对来源，做检讨，用案例做出成绩才能够宣传它的效果，达到稳定民众预期的作用。

张 鹏（内蒙古发改委）：

中央判断经济运行稳中有变是提出“六稳”的背景。下半年，做好“六稳”工作，总体讲：一方面妥善处理中美贸易摩擦。中美经贸摩擦是今后一个时期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这也是做好“六稳”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加强“稳”政策的统筹协调。下一步对影响发展预期的政策，要多方评估后再出台，既要形成政策合力，又要防止效应叠加。

从近期看：

（1）稳就业。加强就业形势监测，摸清中美经贸摩擦影响的就业人员数量及结构，对受到影响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实行精准帮扶、减少裁员。

（2）稳外贸。重点是加快推动贸易多元化，逐步降低贸易顺差的对美集中度。

（3）稳投资。关键是简政放权，完善市场监管，提高政务诚信，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4）稳预期。要重视引导舆情，释放更多的积极信号，让企业放心、群众安心。

林学军（暨南大学）：

经济稳是根本。

对外的稳，要稳外贸，稳汇率。努力扩大经贸合作伙伴，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努力消除贸易战的影响。

对内的稳，稳金融，要稳住中小企业，要稳物价，要稳就业。首先，要控制政府的债务，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加强金融系统的监控，避免发生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其次，要鼓励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支持效益优、需求大的实体经济发展，改善供给侧。再次，要以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努力扩大就业。最后，要鼓励创新创业，增加科技研发的投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鼓励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兴办科技型公司的创业。

中美贸易战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影响

2018年10月15日

编者按：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对于世界经贸格局的平衡与重构具有重要的影响。特朗普执政以来，始终将“缩减贸易逆差”作为“美国优先”原则在经贸政策上的重要体现，并频频出台针对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中国的多项贸易保护措施，给中美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影响。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中美贸易战对当今世界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带来的重大影响进行了专业性地深入讨论，并对如何应对这一影响等提出了若干针对性政策建议。

一．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影响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1）GVC上的“发包—承包”关系将被改变，出现贸易转移效应：①发达国家的外包订单，首先转移的可能是在要素禀赋上与我国相似度高的越南、马来西亚、南美等国，它们可能首先成为贸易转移的受益者；②我国将沿“一带一路”转移自己丰富的有竞争力的产能，形成向西南方向延伸和开放的新的GVC，如纺织服装、家具、消费类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或者一部分机械、重资本工业的生产链。

（2）GVC上的资金流动关系将被改变，产生投资和产业的转移效应。随着特朗普加息、减税加快，随着贸易战深入延伸：①已经在我国投资的FDI企业，将可能会把企业向本国搬迁，或者向具有区域协定的成员国转移；②我国本土企业为了规避贸易制裁和获取资本利益，将会想办法把投资和产业向这些国家转移；③上述资本和产业转移，会带来进一步的大规模的投资和产业的转移，原因是产业链有配套转移的需要。

（3）GVC上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变，传统的GVC链条上可能出现“脱钩效应”：①过去中国顺应WTO的自由贸易规则，我们成了最大的受益国；②奥巴马时代搞TTP、TTIP，要我们服从和顺应公平贸易规则，如环境标准、劳动标准、竞争中立、国有企业等，要我们从单一经济标准，转向反贿赂、反洗钱、反避税等价值标准或者社会标准；③现在特朗普不管这些了，搞“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反过来，我们现在要敦促其遵守WTO游戏规则；④游戏规则改了，

在传统的 GVC 链条上，中国就可能与其出现“脱钩效应”，利用这种 GVC 加快我国转型升级的可能性空间就变小。

(4) GVC 上的产业国际分工格局将被改变，倒逼中国对内开放、产业升级效应：①产业升级，随着我国要素成本的迅猛上升，相对低端的产业会发生猛烈的“外移”，而不是就地“转移”，这将迫使我们机器换人；②扩大内需，利用自己的市场发展国内经济循环；③重新寻求新的 GVC 或者建立 NVC。

但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会有曲折性，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会改变，有四个根据：①科技的发展；②互联网的发展；③中产阶级的壮大；④服务贸易的跨境发展。崛起的中国将会高举经济全球化的大旗，以“命运共同体”理念重构全球价值链，形成自己独到的全球化战略体系，包括一套完整的战略理念、模式、体制和举等等。可以预料，中国以低端制造业切入 GVC 经济全球化模式将会发生重大转变。过去争夺来的工作机会可能随着外资外移和产业转移逐步消失，产业升级进程如果内闭，也将受到严厉的抑制。启动内需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战略到了十分紧急的关口。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全球价值链形成需要较长时间，同样改变也需要较长时间，也不是贸易战一下子就能改变的。未来全球价值链走势主要看有没有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形成替代，因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确实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认为 2-3 年内不会有太大变化，3 年以后就不好说了。

孙国民（南京大学）：

(1) 价值链嵌入的网络发生新的变化。在难以嵌入欧美产业链的条件下，倒逼中国构建以我为主的价值链，特别是 NVC 以及以一带一路为价值链支点的带路价值链。

(2) 发达国家加大了掌控高端价值链的力度。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展现出来的对高科技行业和知识产权的强有力保护，引发发达国家高科技知识向中国的溢出障碍，短期内影响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新兴产业发展。

(3) 预计形成 GVC 和 NVC 并存的价值链形态。一方面，在部分高度国际化及已经形成全球竞争力的个别领先领域，继续推动 GVC 方向上的结构优化发展；另一方面，在被打乱、打断的全球化价值链系统，我们在不断探索 NVC，并试图尝试通过以我为主的 NVC 形态向 GVC 形态的融合发展，从价值链的双轨制向单轨制转变，而在此之前双轨制在相当长时间存在。

金自力（川思特软件）：

目前的影响主要是企业家的信心，对未来的预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出口型企业接短期订单比较多，转欧洲市场的多，对于人民币汇率看法不乐观，基本能不兑就不兑，企业销售这块大都要求加速回款，投融资的需求增大了很多，估值下降很厉害。

关税增加会导致外资的信心下降，导致大的巨头的撤离，逼迫国内的配套体系破产或者转移走，如电子行业，大家都是靠苹果吃饭，苹果没了就全军覆没，靠华为和小米，整个配套体系是活不下去的。

丁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是东亚和美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2000年以后，东亚形成了日韩台东盟销售中间产品给中国大陆，组装成最终产品，出口欧美的分工格局。受贸易摩擦的冲击，中国对美制成品出口会减少，产能会对外转移，但不会大幅度超出东亚的范围。一部分制造业会回流日韩台，大部分将向要素成本较低，工业基础较好，并且中日都在着力经营的东南亚转移。

在这一进程中，有两个动向值得关注：

（1）与传统 GVC 不同，中国本土的主导企业将脱颖而出。现在主要手机品牌在东南亚市场的热销以及设厂，都是明证。

（2）受贸易摩擦的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将加速。RCEP 今年底将基本谈妥，中日韩 FTA 谈判也将迎来重大突破，这些都是非常积极的信号。

张月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中美“贸易战”促使全球分工的“北-北”模式回归和“南-南”模式加速，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南-北”模式遭受重创甚至破坏。具体表现为，GVC 条件下的自由贸易协定获得新发展：

（1）发达国家采取 GVC 高端水平型自由贸易协定战略，而中国被迫采取以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典型形式和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主要内容的 GVC 垂直向下型自由贸易协定战略。但都致力于以零关税、消除贸易壁垒和取消政府补贴措施为主要内容。例如，欧美日在不久前签订了没有中国的“零关税”贸易协定，而中国也与东盟 10 个成员国、巴基斯坦、智利、冰岛、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 2018 年进入零关税时代。

（2）过去以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划分的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世界经济垂直分工格局，可能重构为以美国为首的“北-北”自由贸易区与以中国为首的“南-南”自由贸易区两大集团国际贸易区的竞合格局。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1）国内生产链的分化，表现为进一步升级改造与落后产能的转移，同时国内低端劳动力将面临失业问题。

（2）贸易形势与供应链布局进一步发生变化，对东南亚与非洲国家的产业链形成有巨大推动作用。

（3）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规范，中高端制造业将在全球范围内分工更加明确。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产业链将不再具有优越性。

鞠昌华（南京环科所）：

（1）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下，由于就业体系需要和安全担忧，中国将更加努力构建更完整（非完善）的国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将建立在全球价值链之上，但二者之间的脱钩趋势是显然的。

（2）我们在新的价值链上中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比重努力增加（可能是链拉长，但产值比重难以提升），中低端资源密集型产业会保持稳定，资本密集型产业可能会有所增加，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大幅下滑。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社会中美贸易战，美国提高进口门槛，可能导致我国以往劳力密集、技术层次不高的产业生存空间更小，原本已经外移的趋势加速。由于这些产业分工长度短，外移后我国可能分不到产业链的角色。因此，技术层次门槛向上一点的分工，是我们短期需要填补的部分。例如：韩国及台湾地区过去在电子业的模式，制造、代工。

由于出口美国的商品中，量大但利润不大的部分产业可能外移东南亚或非洲，我们往上发展，他们可能需要进口我们这一层的半成品或技术，以便继续加工。我们进出口的结构对象或许可以得到调整。

在产业链中间的重要角色，可以降低贸易摩擦（程度差异），避开最终出口的直接冲击。我们的工作完成后往下一个产业链条送，他们再加工，我们不会直接出口到欧美去。这一层有很多细分，技术层也差异大，可以有很大发展空间与机会，对国内产业与经济可以有效填补，并提升往高质量发展。

孙军（淮海工学院）：

（1）反向倒逼我国更加注重挖掘国内市场和沿“一带一路”走出去，构建 NVC 和“一带一路”价值链体系。不过由于我国在 GVC 中的地位仍然较低、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尚在孕育，再加上贸易冲突会导致我国在发达国家掌控的 GVC 中的学习能力降低，因此，以我为主的价值链体系的构建过程将会比较漫长。

（2）中美贸易冲突的加深和产业向东南亚等国的持续转移，会导致中国嵌入 GVC 网络的程度降低。如果中国价值链自我构建的能力慢于与美国等国家的脱钩速度，则在新一轮的全球化过程中将会处于极大被动中，失去新一轮全球化机遇。

林学军（暨南大学）：

十九大中美贸易战，美国用关税壁垒，非关税壁垒，筑起一道道贸易和投资障碍，切断了，或者是阻碍了原先的全球价值链的正常运作，因此，贸易战肯定会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影响，并引起 GVC 进行重构。这场贸易战，对中国，是机遇也是挑战，它将倒逼中国，加强自身经济

体系的建设，提高中国在全球竞争中，抗风险的能力。

贾晓峰（南京审计大学）：

从对 500 亿美元较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到 2000 亿美元纺织等消费品征税，表明我国高中低端产业链产品皆属美国限制范围。因此，我国应将产业链向高端升级，并继续优化中低端产品，这是我国大量出口、关系到大量民营企业及就业的产业。

进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的影响不能只看净出口，还要看到进口对经济的影响。我国生产中消耗的不少中间产品是国外进口的，生产出最终产品或又作为中间产品的需要在我国国内市场销售，这也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这也是最近我国降低最惠国待遇的国家进口税率原因（美除外）。应对中美贸易战，从我国自身来看，要采用降低企业负担如税负、适度调整人民币汇率、扩大对其他国家出口和进口市场、促进再就业、提升优化产业链、对高技术产品进口替代等综合措施来解决。

包卿（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

（1）由于逆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产业价值链所参与的分工空间尺度受缩，产业集聚出现转移和集聚规模出现下降，一些集聚甚至出现解体。

（2）中国产业所参与的全球价值链调整向参与或主导区域价值链，价值链在研发和设计功能上将趋于弱化。

（3）中国企业的全球创新链发生重构，欧美动力减弱，在有条件的“一带一路”国家进行创新布局。

张少军（厦门大学）：

低端化。若中美贸易战长期持续，中国则丧失了加入全球价值链对接国际技术前沿的机会，难以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自身的价值链就可能陷入低端化困境。

南南化。中美贸易战，使得中国会更多的依赖发展中国家，依赖一带一路，中国现有的南北型价值链将更多的转向南南型价值链。

缓慢化。中美贸易战，以及今后可能的高标准的区域性贸易组织，使得中国会更多的回归本国市场；但当前中国内需的扩大，以及发展战略的调整困难重重，使得过往高速成长的价值链将缓慢下来，甚至会出现萎缩的情况。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中美贸易战不会改变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发达国家主导技术创新以及品牌渠道等高附加值价值链分工，发展中国家集中于生产制造等低附加值链分工的国际分工总体格局。从本质上讲，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意图不是要切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垂直型 GVC 分工体系，

而是要发展“去中国化”的 GVC 分工体系。该体系与当前国际分工体系唯一的区别是中国在现有 GVC 分工体系中的角色将逐渐被越南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所取代。

(1) 短期影响。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相对于传统国际分工具有更强的精细化和组织模块化特征，中国不仅仅以“点”或“线”，更多以“模块集成”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整个 GVC 分工体系中具有稳定性。中美贸易战给中国出口造成打击，同时对美国市场也会带来冲击，由于美国还难以在短期内“培育出”与中国类似的“模块集成”，征收高额的关税最终会以抬高出口产品价格的形式转嫁给美国国内市场，从而损害美国消费者福利。

(2) 长期影响。由于中国已经深度渗入 GVC 分工体系，美国能否通过贸易战成功切除其主导的 GVC 中所包含的“中国成分”，关键取决于中国融入现有国际生产网络体系的广度和深度及与中国展开价值链竞争的其他国家复制中国这种“模块集成”的难易程度。中国融入 GVC 程度越深，“模块集成”越复杂，被模仿的难度就越大，被替代的可能性就越小。因此，中国能否有效遏制美国“去中国化”意图，将是打赢中美贸易战的核心和关键。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按照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原则，货物贸易顺差体现在中国，利润顺差则在美国。

(1) 未来，GVC 上的游戏规则将被改变，或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2) 同时，要反思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能否真正“双赢”的格局，或者兼顾各方的诉求。

楼稼平（宁波布衣）：

(1) 脱落。被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摘除，然后我们自力更生。

(2) 弱化、边缘化。中国因素在这个网络中不再像现在那么重要了，这个是脱落的必经过程。这种趋势似乎正要发生或者正在发生。

(3) 如果可以期待全新网络的生成，则“弱化、边缘化”可以视为中性的甚至是积极的，但这涉及到上述“什么是我们既想要而且是可以要的？”。

(4) 成为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主导者和中心节点。

崔卫东（蓝鲸咨询）：

中美贸易战改变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进程的性状、速率和路径，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性质、方向和流向。

(1) 改变性状不会改变性质。一些具有直接或间接输美市场的电子线路板、机械零部件、纺织材料企业，本来就面临产能过剩、市场低迷、被终端商挤压的局面，在雪上加霜的中美贸易战中，促使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转变、从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和商务运作转变。

(2) 改变路径不会改变流向。全球价值链分工由两个最大经济体间的直接分工路径，改变为间接路径。间接流动的路径使全球价值链分工碎片化。以先进技术和高端商务为代表的高

端产业经由日、欧、加、以等发达国家流向中国，以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为代表的一般加工制造产业经由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流向美国。

(3) 改变速率不会改变方向。中美贸易摩擦，降低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效率，加剧全球产业链低效化风险，全球产业链分工的速率暂时下降，减缓新技术扩散，国际或经济体分工的方向没有也不会改变。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国民营企业更加顽强地摆脱价值链底部的困惑，向价值链高端奋进。在细分领域由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到初步引导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会更加明细、明晰。

王阿忠（福州大学）：

(1) 全球范围内的产业链，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中美贸易战首先对在华美跨国公司造成打击，美国政府希望他们回归美国本土。

(2) 中国在机械装配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环节中，具有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的优势，加上中国生产管理人员与工人的生产管理、劳动技能、学习曲线与勤奋等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美贸易战无法改变此比较优势，关税提高的是销售成本税费，无法改变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中我国的比较优势。

(3) 中美贸易战会降低中美之间企业生产价值链条上的价值与利润，该价值链会停滞甚至萎缩，当然其影响程度也取决于汇率、我国国内降税措施等的对冲。价值链分工网络其他链条会因中美贸易战而获得各种优惠政策而得到强化，其他国家会在中美博弈中获得好处，包括俄罗斯、非洲、欧洲与日本等。

二．应对策略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国内企业整体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是较为复杂的，举一些例来说：轻工产品（内外资全面代工，如玩具纺织）、机电类产品（组装部分及部分投入品环节，外资为主内资为辅，如手机产业链、汽车配件等）、装备制造（终端产品为主，部分关键投入品进口，如建筑装备以及汽车整车等）、高技术产品或者高技术环节（存在技术封锁，核心技术和投入品进口，如芯片和大飞机等）。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对不同产业的价值链影响是不一样的，比如，轻工产品不是美国遏制的对象，但我们仍然要以 GNP 的思路加快产业转移；受贸易摩擦较大的 FDI 占比较高机电类产品，可能回流转移到发达国家或中等收入国家，需要我们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提升供应链的竞争力，更要培育中国的链主企业；芯片大飞机等虽然面临技术封锁，但仍要按照国际产业分工规律和开放的路径选择重点环节突破，与国际主流接轨，不可走封闭路线。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立足于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的国内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积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携手非洲、东南亚、中亚等发展中地区，一方面携手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共同推动WTO改革。

孙军（淮海工学院）：

（1）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全力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给予其在国内公平竞争机会，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全力推动我国各类企业占据GVC中的某一核心位置。

（2）破除国内区域间各种壁垒，推动要素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全力培育NVC，并鼓励其沿“一带一路”走出去。

（3）将贸易冲突尽量维持在一个可控范围内。

林学军（暨南大学）：

（1）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安排产业布局，形成产业结构合理，东西部协调发展的良好格局。

（2）紧紧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中国区域性的产业链，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扩大中国的海外商品市场。

（3）把整合全球价值链，转移到整合全球创新链的战略上来，引进全球创新人才，学习吸收全球先进的技术，不断增加我国的知识积累，提高我国的创新能力。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1）应放开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市场准入，用庞大的中国市场吸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减少该领域的贸易壁垒，给予外国企业实质性的国民待遇；鼓励我国企业，特别是实力较强的民营企业对发达国际先进制造企业进行逆向并购，学习并掌握核心技术，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2）在容易被取代的劳动密集型GVC分工领域，我国企业应该加快从生产制造环节升级到产品设计与品牌营销等非制造环节的价值链管理活动中，并通过“一路一带”战略，建立“以我为主”的新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将“中国成分”隐藏在“印度成分”、“越南成分”当中，通过加大对周边国家制造业对外投资，继续融入到发达国家的GVC分工体系中；加大对内开放，通过消除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培育国内市场，形成以国内需求驱动的本土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让本国市场抚育和壮大“中国制造”。

关于中国科教资源与实体创新分离现象的讨论

2018年11月01日

编者按：教育与实体在创新上分离，在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如位于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深圳，具有较强的实体的创新和发展，但由于本地大学的匮乏而基本没有大学的创新和发展；相反，南京、武汉和西安等城市高校林立，但在实体的创新和发展方面与深圳存在明显差距。这个问题尤其值得科教资源丰富但产业创新不够的城市关注。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实体创新和发展，与大学创新和发展的协同出现分离现象的因素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基于对深圳成功经验的分析，为更好地推动我国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出了若干针对性政策建议。

一. 实体创新分离的因素分析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本地大学与本地创新的协同是纵横交错的问题和矛盾的堆积：

（1）大学运行是纵向管理体制和机制的作用，而本地创新是横向的地方政府－企业－流动的科研机构和人员的交互作用。这个条块管理的模式天然存在无法有机衔接的缺陷。

（2）大学的使命、目标和行为是产出科学技术基础知识，培养人才，不是产出财富，后面一个任务是实体产业的使命和目标，也是企业家的终极行为。知识创造和财富创造这两个阶段的衔接，需要企业家精神来创造有机结合的机制。

（3）在行政管理和控制体制下，本地大学的科研和人才培养优势，不一定与本地产业和体制吻合和配套衔接；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创新链是全球分布的，本地大学的水平和成果不足可以通过创新资源的流动来解决。

（4）本地大学支持本地实业创新，是立足于资源观来分析本地创新战略的实施问题。核心是认为，城市的科技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其所拥有的独特的科教资源的基础之上的。这是基于资源观点的竞争战略思想，强调竞争优势来自于资源的拥有，我有什么我就做什么。因此，竞争主体应当从自身系统的内部寻求竞争优势来源。这种竞争理论存在很多的缺陷。如即使是深圳这类过去缺少科教资源基础的新兴城市，也可以在市场化原则下广泛地吸收来自国内外其他地区的科技精英为我所用。其实，本地创新战略的实施效果，不取决于一个竞争主体拥有什

么样的科技资源禀赋，而实际上取决于它所采取的一系列具体行动，真正去做事情，才具有竞争优势。这强调的是行动力。

徐天舒（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从发现到发明创造到产业化是二个转换过程，实验室做第一个转换，商人做第二个转换。现政府以为科技领军人才才能做好这二个过程（不排除有），但绝大多数不行。所以要进行商业模式创新促进二阶段转换的顺利生成，而深圳做的比较好，是因为有许多制度能促成二阶段的转换。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本地研究表明，创新更多是市场驱动而非技术驱动。因此，在城市经济对创新产生需求的初期，创新要素最初更多可以通过“贸易”的方式获得，比如引进人才，此时创新要素的供给地与需求地不一定靠近。而当经济发展到对原始创新产生足够需求的阶段之后，对创新的需求会内生出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供给，这样的大学和科研院所更有可能对创新产生实质性的推动，也才会实质上促进大学和科研院所的地理位置与创新城市相靠近。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1）大学与企业对科技创新评价体制不同。对大学来说，科研项目能获得经费支持、能申报专利和发表文章就行了；对企业来说，科技创新要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

（2）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与实际成果受现实条件约束，大学科技成果往往是实验室成果，科技成果缺乏中试基地和条件。

（3）企业受利润影响，不愿承担尝试新科技的风险。

（4）大学和企业缺乏有效沟通，找不到合作的切入点。

翟太煌（山西证券）：

高校云集地如武汉、南京、西安等地，更多属于历史和传统政府行为及其积累，有其传统性和继承性。创新，更多地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实体经济的创新，更是与新型企业和创新政府行为相联系。高校云集是一种资源禀赋，在资金人才物资大流动的背景下，不必与城市创新相依存。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教育与实体在创新上的分离与否，根源于区域城市产业的国际化嵌入性程度。凡是城市产业国际化嵌入性程度高的，创新的动力与水平就强。

（1）当前的所谓创新，基本是欧美发达国家引领下的创新，是模仿与追赶型创新。

(2) 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分工, 既为创新提供了技术源头, 也为创新提供了外部需求, 更重要的是, 让创新嵌入全球化产业体系之中。

(3) 西安、南京、东北等城市, 不是没有创新, 只是创新出来的成果, 无法被整合进国际产业链与创新链中, 自然就成为自娱自乐的游戏。

孙国民（南京大学）：

(1) 高校追求的创新创意, 并不考虑市场需求问题, 一些研究成果虽然处于科学前沿, 但不一定能转化（兑现）成产品, 且部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或兑现）为产品的时间严重滞后, 也说明创新的技术转化为市场可接受产品的风险性。

(2) 有些科研成果本身就是个创意导向的概念性东西, 作为研究的创意成果可以, 但一旦接受市场严格的适用性和实用性检验, 就不一定能通过。

(3) 反映出南京、西安、武汉等地创新生态环境尚可, 但创业环境仍然是短板, 这种短板一方面同营商环境有关, 另一方面同科技金融支撑不足也有很大关系。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

大学的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还有较深的计划经济烙印, 对市场上人才需求的反映不敏感。在实体经济发展中, 工科较文科和理科更加实用, 大学的专业设置和招生计划应该与实体经济发展相适应, 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和干预应进一步下降。

金自力（川思特软件）：

国内大学是实体企业先进技术的转移对象, 大学的创新和发展与企业完全不同步, 目前的模式大多是企业先有创新技术和 idea, 再通过项目合作把思想和技术转移给学校, 带动学生的教育。在工程这个领域, 学校知识老化严重, 老师与高精尖企业的先进理念与技术脱节的很厉害。这一块的深层原因我认为还是体制问题, 大学和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性极低, 大学老师去企业的有, 但企业的人才去大学的极少。创新的关键是人, 打破大学人才双向流动的枷锁, 让更多的企业人才去大学任教, 让更多的年轻学者到企业去工作。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1) 中国企业还没有成为创新主体, 而高校既提供知识（公共产品）又提供研发（私人产品）, 但高校的研发必须通过技术转移才能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由于科技中介机构作用缺失, 特别是专利实施许可不到位等原因, 势必导致教育与实体在创新上的分离。

(2) 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直接服务于价值创造, 大学在创新中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基础知识, 一些专业技术院校与企业合作从事新产品开发, 这取决于高校的定位。同时, 企业的创新活动也有一个定位, 是以企业自身研发为主, 还是以产学研合作为主。大学提供基础知识是

面向全社会的，地区发达的高等教育并不一定导致本地区较好的企业创新。

(3) 深圳市场经济很发达，企业已经成为了创新主体，对产学研合作不存在路径依赖。相反，南京、武汉、西安虽然是大专院校集中度较高的地区，但由于企业尚未成为创新主体，产学研合作也不显著，所以从现象上就表现为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企业创新活动反而不活跃或者创新绩效不高。

二. 经验的分析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深圳科技制造业的崛起背景，是中国与全球 IT 产业存在着巨大的技术落差，深圳前 20 年通过承接美日韩港台产业转移，承接了 IT 产业的技术转移与扩散。而当时的中国大学，由于落后于世界水平太多，根本不足以为产业提供研发支持。深圳最近 10 年，则主要依靠企业的研发，进行应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而且利用了深圳之外地区的大学研究力量。深圳建立了自己的大学和科研院所，以推动源头创新，对未来产业提供帮助。

但个人认为中央政府应该有更积极的投入和改革科技体制。IT 产业比较特殊，它形成了全球创新网络，而不依赖于地区创新网络。

丁可（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

实体的创新和发展，与大学的创新和发展出现分离，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大学、科研机构，现阶段基础研究水平较低，难以做出从 0 到 1 的前沿科技成果。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圳能够脱颖而出，源于打造出了能够快速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也就是从 1 到 100 的创新生态系统。

硅谷企业成长为独角兽的平均年数是 5.6 年，而深圳只需 2.8 年。全球独角兽的最快成长记录也出现在深圳。这个生态系统有两点特别突出：（1）地方政府通过招揽海外科技人才的方式，吸引从 0 到 1 的前沿成果来深圳孵化。这些人才和团队，成为深圳科技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2）电子产业供应链特别完善。和智能硬件相关的所有厂商，在深圳 2 小时车程内都能找到，这一优势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供应商早期是珠三角的外资企业培育起来的，是全球价值链的产物，现在却以一种意料之外的方式，反哺来深圳创业的初创企业。

田为兴（国家开发银行江苏分行）：

（1）创新的系统性带来的分离。教育是创新的某一因变量，东北以前也是名校林立。

（2）创新分类带来的分离。基础科研创新、市场应用创新等等，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内涵不同，前者多外部性，那些具有外部性特征、不经济的创新未必是直接面向市场。

（3）创新主体的分离。深圳创新的主力军还是企业。

（4）创新环境带来的分离。包括市场机制的土壤，企业家的引领、产业发展的优势，源

源不断地吸纳了全国的创新资源和人才资源，深圳成功靠的主要不是本地人。

孙 军（淮海工学院）：

（1）当前我国目前的大学和科研院所相对于商业化创新，是外生变量，前者是纵向存在、后者是横向协同，两者交叉性较低。而深圳面向的是世界最开放前沿，其功能主要是解决好当前世界已有成果商业化转换和利用已拥有的价值链网络不断攀爬即可。

（2）目前我国大学仍然以培养人才为主，商业化、市场化发展不充分但科教资源丰富的地区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当地无法最大化实现自身价值时，自然会向深圳等世界前沿地区集聚，这促进了深圳繁荣的同时也造成了其他地区人才相对“匮乏”的局面。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深圳、南京、武汉、西安等城市的案例比较，反映了特定发展阶段教育创新与实体创新分离现象，同时反映了发展新阶段教育创新与实体创新协同融合的趋势要求。前一发展阶段的创新分离，既缘于实体创新主要基于输入型的国际市场和产业，重心在从1到10的应用创新，对国内基础性创新的依赖度不高；也缘于传统教育发展体制和教育资源布局下，教育创新对市场 and 产业发展的响应度、融合度不强。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1）深圳是一个外地人来奋斗的地方，所以造就了冒险创业拼搏的城市；像西安南京这些古都，已经有了既有的城市文化，要建立一个新的创新的基因，比较困难。

（2）当初政府在这里创建一个特区，而且给予很多的支持，加上接近香港感染到了一些自由化商业化的气息，接受新观念的风气比较强，所以能够创造出冒险创新的精神。

（3）跟大学的关系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大学可能只是提供人才而并不提供创新，美国创新的气息确实比我们浓厚，因此，他们很多大学老师出去创业，但我们这种情形就少很多，所以也并不是大学不创新，而是有没有那个土壤。因此是有了创新的环境气氛，造就了这些大学提供相关的人才，而不是这些大学引发的创新的基因。

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毛深圳是个新兴城市，因制度创新而诞生，没有历史包袱和传统制式约束，人们带着梦想来深圳，以创业创新求生存，而改革开放的制度为他们的创业创新提供了保障和激励。深圳的创新演化到今天，已经与香港一体化了，那些顶尖的企业也布局了全球研发网络，即使本土有大学也不会指望它们。

传统城市和它的大学与深圳相反，历史包袱沉重，旧制式约束和规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尽管从80年代以来，一次次的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在推动产学研结合，出现了一些创新型企业，

但对城市的创新绩效影响不大。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对高校云集并不是城市创新的必要条件。深圳的创新驱动主要来自于民营创新企业的驱动，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提供有利于创新的土壤和环境。深圳当地政府深谙创新必须依托企业，并在企业需要困难时提供各种帮助；其他时间则退居幕后，绝不对企业创新活动进行干预。这种制度和文化在中国其他城市包括广州等一线城市都难以做到。

鞠昌华（南京环科院）：

（1）深圳实际是利用全球化直接对接了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地，而南京等城市的高校并不能发挥全球创新要素的中介或者发源地作用。

（2）深圳所发展的也并非原创性的高科技企业，但是对不完全开发有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而言，腾讯等这样的次生性创新企业已经足够发展壮大。

（3）深圳的产业是国际先进技术与中国市场的嫁接，而南京等更多是国内先进技术与区域市场的结合，层次上深圳更高一筹。

（4）深圳的科技企业在产业链上，前端有更多科技金融投资公司，后端有更多电子信息基础产业等支持，产业链更为完整，南京等城市这些似乎也都有，但相对不足。

（5）从政府的包容性、服务能力上深圳也明显优于南京等城市。

三．创新型城市的启示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对于南京来说，创新名城力度空前，但结果未必如预期：

（1）转移型创新。通过政策洼地与红利，吸引其它地方的创新资源转移过来。这部分创新，不仅忠诚度低，而且与产业结合程度也不高。

（2）激励机制出现异化。从“为创新而补贴”，变成了“为补贴而创新”，且这一现象呈现愈演愈烈态势。

建议：正视创新由发达国家引领、需整合进国际产业链的现实，加大区域城市产业的国际化程度，才能接收先进产业的技术溢出性创新，才能成为全球创新链的有机组成部分。

赵顺群（丹阳发改经信委）：

（1）创新是企业家主导的系统工程，科技、高校等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企业家才是创新的决定性因素。

（2）深圳的企业家拥有更高的个人平均素质和眼光，因为能去深圳的人应该大部分是内

地有一技之长者或者怀才不遇者。

(3) 我们以政府为主导、以科技人才为中心的思路注定难以取得像深圳一样的成功。

王洪亮（南京审计大学）：

鼓励高校老师理论联系实际，进行创新创业尝试，鼓励大学与高科技企业进行合作，共同培养实干型人才，大学内部也可以成立更多的服务社会的公司企业，直接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实现产学研良性互动，而不是现在相对独立的局面。

贾晓峰（南京审计大学）：

(1) 完善科研成果评价奖励制度，要给教育与实体相结合的参加企业研发的课题、写出的实践性很强的论文等，在成果认定、评定职称上足够重视。

(2) 从制度上让教师定期到企业实体进行锻炼、去创新，鼓励到企业兼职。

(3) 改善大学师生比失调的状况，让教师能有时间精力去企业实体联合攻关等。

黄志军（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

(1) 通过经济激励来熨平两者的落差，通过市场对创新的竞争和价格发现去引导教育科研成果向实体经济的传导。

(2) 实体经济企业对教育科研成果的不敏感，一方面反映中国实体经济层次偏低，与学科前沿有很大时间落差；另一方面，企业自身的逐利动机的异化与扭曲，导致资源攫取型、政商勾结型企业横行，不注重长期的永续经营。

(3) 实体企业人力资本储备太低，人力资源定价偏低或扭曲，一流的人才基本不会去实体经济企业，自然不会把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带进企业。

(4) 社会阶层的割裂引致体制内外两种身份的隔离，人才无法流动，体制外的实体经济自然无人才优势。

(5) 高校评估体系中对教师获得企业经济回报的天然保守，是对研究成果货币化的最大禁锢，由此可能产生的原罪，是进步最大的障碍。

林学军（暨南大学）：

要发挥高等学校科技人员的作用，创建创新型城市就要打开这堵无形的墙，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科技人员与企业相结合。让科技人员以市场需求自主确定研发的方向，以市场机制筹集研发的资金，鼓励科研成果市场交易，支持鼓励科技人才，资金，成果发挥最大的市场效用，这是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最佳策略。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国内大部分地区存在着一个常态：办企业就一定是盈利，而且是开办之时起就必须盈利，这种春天种树秋天就要收果的想法对企业创新影响极大。要建设创新型城市，最主要还是适当调整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体制，创造一个更开放、自由、包容留得住人才的空间。另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和发挥高校资源，中国高校人才很多，但是实际转换利用率不高，如何把各大高校潜能充分挖掘出来转换为创新动力很关键。虽然深圳没有很多知名院校，但是深圳企业却吸引了国内众多知名院校人才。创新还是需要环境，要达到企业渴求人才、人才也愿意加入的共同利益。

包 卿（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

要深圳的创新是产业科技创新所主导的，南京、武汉、西安、成都、合肥的创新是以“科研院所”为主导。前者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而后者是“科研院所”与“学者专家”。

建设创新型城市需要从“创新生态系统”的视角进行分析思考：首先，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其次，创新生态系统的四大要素是“金融”、“人才”、“科技”和“制度（文化）”；再次，需要从“全球化与地方化”两个维度来考察“创新网络”。建设创新型城市，要鼓励制度创新、要弘扬企业家精神，要推动金融资本、人才、科技资源集聚的体制机制创新。既要推动全球化、国际化的进步，也要积极推动地方化互动、营造区域氛围、建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施 康（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是公共品的创新，实体的创新是私有产权的，人才的可流动性，导致实体可以在城市竞争的早期对公共品搭便车，也就是深圳不必在乎教育投入和创新。但是竞争加大以后，深圳必须自我的投资公共品，兴办教育。这也是现在深圳的发展趋势。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武汉的光谷之所以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创新中心，不仅仅是因为有高校的云集，更多是光谷开发区政府的创新服务意识，要比武汉市其他城区官员的服务意识先进很多。创新型企业才能聚集创新要素，包括创新人才，风险资本、企业家创新精神等。而创新型企业只有在具有服务意识而非官僚意识的政府文化中才能培育和发展壮大。

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

就建设创新型城市而言，深圳和内陆城市各具特色，可以相互取长补短。首先，要完善创新的制度文化人才等体制。其次，发达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理工科专业技术院校对于加强产学研

合作、提高企业创新绩效有一定支撑作用，但仍取决于其它条件支持。再次，建设创新型城市势必要有一大批创新型企业，而硅谷的经验表明，大学知识创造和产学研合作是企业创新的充分条件。

上海如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018年11月12日

编者按：不论是2018年初国务院批复的“上海2035”城市总体规划将上海的城市定位从“四个中心”转变为“五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还是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提出的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都体现了科技创新在未来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长江三角洲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推动我国更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战略意义。在此背景下，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针对上海如何全面提升它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即上海是否具备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如何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一、上海是否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条件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科技创业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不用说硅谷、深圳这样的依靠科技创业促进城市繁荣的典型案列，就是像伦敦、纽约、上海这样的世界级老城市，也都纷纷在给城市以重新定位，并积极采取措施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如英国提出伦敦要成为创业之都，成为创业企业遍布的城市；纽约现在每年新增万人以上的科技类就业岗位，这种创业速度已经可以与硅谷相媲美。上海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全新要求，提出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这个科技创新中心与以前提出的“四个中心”功能协同化，将把上海真正建设成为具有世界重要影响力的全球性节点城市。

上海城市的最大优势，不在于单项专业化竞争力，而在于综合性的竞争力。比产业创新，不如深圳；比制造业和出口贸易，不如苏州；比科教资源和创新，不如北京；比互联网金融贸易，不如杭州；比交通枢纽地位，不如武汉；比生态环境，不如厦门等国内许多城市。但是国内没有一个城市在综合竞争力方面比得过上海，这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优势。上海提升它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就是要不断地提升它在服务于企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地降低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交易成本，服务于长三角其他地区国际制造中心建设的目标，整体提高长三角地区在全球的综合竞争力。

翟太煌（山西证券）：

从历史发展轨迹和当前发展体量和势头来看，上海是全国最有可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历史上上海就有东方巴黎之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上海一直位列国内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和领头位置。从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到第三产业，再到金融服务业，以及对外开放和交流方面，上海的综合实力毋庸置疑。

王辉龙（南京市委党校）：

上海就像一个平台，为周边甚至更大范围地城市提供交通枢纽、人才支撑以及其他高端服务。上海原来定位地四个中心，就说明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像杭州、深圳那样的产出导向，而是为产出导向的城市提供一个平台。阿里巴巴虽然没有落到上海，但它其实对上海有很强的依赖性。上海优质的公共服务、巨大人口所形成的消费体量和消费能力、以及对全球创新要素的集聚能力，都为阿里巴巴这样的位于周边城市公司的发展提供支撑。上海的创新中心也许用指标检测不出来，它可能像个司令部一样，漂亮的战役发生在周边，但它的作用是关键性的。上海只有 6300 平方公里，比南京还小一点，所谓“提高城市能级”不是说别的城市能够做到的，上海也必须能做到，而是能够带动、引领周边地区发展。

从长三角一体化的角度看，上海不宜出台政策与周边城市抢资源，而是坚持做服务创新型城市。周边城市都建成科技创新型城市了，那上海就是这一群科技创新型城市的中心。这大概是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站姿”。

林学军（暨南大学）：

上海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城市有很多优势：（1）交通便利，生活便利，服务业发达。（2）名牌高等院校众多，人才济济，科研实力雄厚。（3）产业体系完整，工业基础完备。建设上海科技创新城市就必须利用这些优势，充分的整合全球的生产要素和创新要素，构建全球的创新链。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上海作为科技创新城市有得天独厚优势：（1）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和对外交流的窗口，具有科技信息交流的优势；（2）上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发展科技创新比其他城市更有优势；（3）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推进，高铁网全面覆盖，优秀人才也将涌进上海为科技创新服务。

但是，科技创新更需要一个开放、自由、分享、包容、共赢的环境，如何进一步开放是首要问题。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将上海打造成世界科技创新中心，具有较大可能性。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主要优势有：

（1）国际化程度高，具有吸引全球创新要素的良好基础。

（2）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和容量都十分巨大，国内一流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众多；市场化和开放度高，跨国公司、国际机构云集。

（3）金融业发达，对创新活动形成有力的金融支持。

（4）拥有全中国最好的腹地，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两翼地区，产业基础雄厚、产业集群庞大、产业链条完善；人才资源丰富，不仅各个层次的研发人才充裕，而且劳动力素质高。上海作为研发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周边城市和地区作为产业基础和人才基地，探索区域合作新机制、形成协同创新态新格局，前景很可期待。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此目前，国内北京、上海、深圳以及杭州等能够成为全球创新城市。

上海的优势在于：

（1）在中国的经济金融地位，能为创新带来资金支持；

（2）上海有着很好的产业基础，有着全球 500 强子公司带来的知识溢出；

（3）上海的创研基础一直不错，张江和漕河泾一些研创和孵化发展走势良好，这为未来的进一步研创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上海相对杭州和深圳的劣势：

（1）研创成本高，上海的租金、工资等成本过高限制了发展；

（2）城市缺乏活力，上海与其他两城相比城市不够包容，对新技术人才的吸引力不足；

（3）城市制度不够灵活，难以支持研创企业的发展需求。

方 勇（南京大学商学院）：

上海能不能成为全球科创中心？答案在于我们需要的是统计意义上的全球科创中心，还是科技界产业界投资界所公认的科创中心。如果是前者，上海有很大的希望，因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创新层出不穷的发展时期，上海已经具备了科技创新所需要的人才资金，再叠加相关的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政策倾斜，一定会进一步吸引更多的科技人才和创新创业基金进入上海，开展科创中心建设活动。

但是，如果是建设业界心目中的全球科创中心，上海应该没有可能。真正的全球科创中心应该充满着创新创造创业的氛围，在这个区域内创新创造创业是最优美的职业，对不可知的探索、对科技工程问题的创造性解决、对人类经济社会问题的探索处理，这是社会本能的价值观，而为此承担可知甚至不可知的风险是区域社会内最值得敬仰的壮举。上海这类大城市，优秀人才的机会太多，诱惑太多，可能的选择太多，而且错误选择的惩罚成本又太高，不大可能形成

创新创业的氛围。但是中国已经到了出现创新中心的阶段，它会出现在一个靠近全球城市的地方，全球城市为创新中心提供人才、资金和服务支持，并承担收留创新失败人员的功能。所以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中小城市有机会，可以开始建设科创园，赌一赌自己的运气。

徐天舒（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

上海不缺人才，不缺资金，给足政策或者说以市场机制来运营，也许能成。

参考纽约湾区的经验，上海可成为金融中心，但拷贝不了旧金山湾区的经验，要成为科技创新中心，上海科技创新后商业运营这块成本太高。但可以考虑就近辐射的苏州，但苏州又归江苏管且江苏绝对不会放弃。

姜彩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城市的塑造受到产业的影响很大，反过来，城市的功能、文化和节奏也会影响产业的发展。（1）金融中心、商业中心会抬高租金，但是科技创新起步艰难，对成本很敏感。就像苹果，一开始是在车库里面。（2）科技创新源于旺盛的产业需求、完善的产业配套。需求侧的支持很重要，上海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很有名，科技型产业似乎不如苏州和深圳突出，建科创中心要克服的困难比较多。

周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上海成为全球科创中心，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柔性化的产业创新持续能力和科技人才网络构建。上海更适合成为宽松的创意中心，融合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

陈长江（南通大学）：

如果创新中心被狭义地定义为原生性技术或 idea 的发现中心，而非广义的创新创业中心，那我理性地认为，上海有可能成为创业中心，但很难成为创新中心。

Romer 曾坚称，软件实际就是 idea，而这一称谓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我认为，软件除了 idea 之外，更重要是产生 idea 的环境，自由思维、独立思考，甚至胡思乱想的技术思考，包括材料结构、部件组合模式以及貌似不切实际的理论体系，所有这些都是上海所不具备的。但客观上，上海拥有最密集的风险投资和最大胆的创业团队，他们善于孵化已有的专利或者技术，但对于最原始的创新型前沿技术的开发缺乏最基础的土壤。

相对而言，深圳似乎骨子里具备“另类”的基因，40年前的特殊化以及40年以来的特立独行，使得深圳似乎更有可能成为创新中心。

王阿忠（福州大学）：

若是类似于美国硅谷的创新中心，首先要有创新产业集群，才能有效应；其次，要有一大批优秀人才。创新人才基本是没有钱的年轻人，有钱人没有动力去搞创新创业了。上海的房价太高，很难吸引高科技人才，上海成为金融中心可以，但难以成为创新中心。

王世文（苏州科技大学）：

谈科创中心早了些，看看国内企业使用的高端设备，上海制造的比重是明显下降的。再看全国各地招商引资，来自上海制造业自有品牌的企业也并不突出。简言之，当前上海自有技术上海自有创新对全国的辐射带动作用还难言龙头，欲带全球创新中心之冠恐难承其重。

竞争力在竞争中竞争出来的，不是优惠政策的虹吸效应中垒出来的。深化体制，强化竞争，加速行业整合，倒逼创新，才会培育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和优秀企业。先解决自主可控，再谈全球竞争。先提升国内市场的带动作用，再谈全球影响。

二．如何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汤凯（意昂船舶设备）：

成为全球科创中心，最重要的还是吸引人才。人才多多益善，可以尝试对人才进一步开放户口。（1）在长三角地区利用杭州－上海－南京－合肥城市带，进一步加深产学研紧密一体化实践。（2）吸引全国的优秀人才，用丰厚的经济待遇和准入户政策。（3）筛选全球优秀人才，引进带有一定科技成果的海归，鼓励他们回国就业或创业；特别引进熟悉甚至本身就是国际政商资源的杰出人才。（4）除了吸引人才，在管理上尝试改革政府官员考核标准，如区域内各地方政府作为一个球队，实行个人成绩和球队成绩协调考核，增加不同行政区间通力合作的可能性。

翟太煌（山西证券）：

要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上海需要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更加有竞争力的知识创新产权保护；更加有竞争力的创新人才与创新企业的吸引力；更加有竞争力的营商环境，等等。

金心异（深圳独立学者）：

（1）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应该是三个层次兼备的全能型选手：“知识创新”应该为全国服务；“基础研究”为整个长三角经济区服务；“应用技术研究”则可能会限于上海市及周边小范围（三个圈层：主城区，总部及基础研究；上海郊区，应用技术开发及高端制造；周边工业城市，诸如苏州、无锡、南通、湖州等，配套制造业。

(2) 重点抓两点：科技金融；知识产权保护造假，主要是因为政绩导向，造成了弄虚作假的形式和作风。

张建忠（国开行江苏分行）：

上海努力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需要创造一系列条件作为支撑：

(1) 利用已有的条件，在上海周边、长三角范围内发展高端制造业集群，形成生产者需求支撑。

(2) 通过高校、科研院所、研发机构主动实施的人才战略虹吸全球创新型人才，形成人力资本支撑。

(3) 打破行政性壁垒，疏通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形成市场一体化支撑。

(4) 改革资本市场使其日趋完善，通过风险投资、研发联盟、股票融资等支持长周期、高风险的技术创新活动，形成金融支撑。

林学军（暨南大学）：

(1) 利用上海的优越条件，吸引全球的创新人才。人才是创新最关键的因素。

(2) 构建官产学创新体系，跟踪、学习、吸收世界的知识和先进技术，提高本地创新能力。

(3) 加强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合作，实行开放创新战略，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加速创新，提高创新效率，规避创新风险，降低创新成本。

(4) 建设创新基础设施，提供创新金融保障，为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

(5) 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创新者利益，激励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唐德淼（无锡环研院）：

(1) 强化上海作为全球城市的战略定位，要上升为国家战略，在政策创新供给方面要突破，拓展更大的科技创新的政策、制度空间；

(2) 上海要在创新资源禀赋优势明显的领域，进行顶层设计，主动构建和世界可以协同的产业链与创新链，同时，协同好该优势领域与全国范围的优势要素对接，使世界科技创新链与以上海为“链主”的国内科技创新链有效协同，凸显上海科技创新的资源的集聚与整合能力；

(3) 上海要依托长三角区域的创新资源，推进“政、产、学、研”的深度合作，构建产业化创新体系，加强共性技术研发，引导成果产业化落地应用，提升科技的创新效用与市场影响力；

(4) 进一步优化人才（包括产业化运营人才）引进和“共享”制度，以全球视野打造“上海科技创新协同平台”激发科技创新内生活力与应用能力。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在开放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分工优势可能主要在于后发大国高速增长带来的经济系统集成优势，而不再是单一要素禀赋优势。对上海而言，需要立足国内开放，推动产业、要素、市场、制度等因素的系统集成，塑造体系性的分工优势。其发展思路是：紧扣区域分工合作主题，打造以其为龙头的区域分工体系，构建面向国际国内市场的价值辐射中心。

（1）上海应探索现代金融与实体经济互动新机制，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标杆，增强龙头牵引效应。

（2）上海应主动加强区域合作，特别是围绕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寻求战略腹地支撑，增强分工体系的扩散效应。

（3）作为中国对接全球的窗口，上海还应该紧盯区域和多边体制改革趋势，加强并引领对外开放的制度创新。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上海还是有希望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但要打破个体英雄主义迷思，依托长三角科教资源密集、产业基础雄厚的优势，树立创新链思维，推动创新在区域内的协同，并在此过程中，争当创新链“链主”，为区域创新体系提供方向、技术、资金、人才支持。

当前，上海正在致力于推动区域城市与之对接。创新，应该是对接的一个重要方面。打通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苏州的科创资源诸侯割据格局，构建跨区域、一体化的创新资源互联互通与共享共用体制，可以成为未来政策考虑的一个方面。

上海现在的定位是全球卓越城市。没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支持，全球卓越城市的目标，恐怕总有不足之处。此次提出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当务之急是把科创板做起来。以科创板为载体，汇聚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助力上海迈向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1）在长三角经济带一体化中发挥龙头作用，尤其是自贸区的职能作用；

（2）抓紧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民营经济及企业比重，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经济比重要明显提高；

（3）严厉控制过高的房价、房租及其他生产要素价格；

（4）成为世界人才的高地，成为中国人力资本的集聚地，成为世界级科学家、企业家的乐园；

（5）进一步优化和巩固原来的优势产业，如汽车、金融等；

（6）积极对标、镜鉴世界超大城市，如纽约、东京；

（7）积极稳妥推出科创板，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目标是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

徐 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提将创新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创新能力，关键取决于上海能否真正对内开放，特别是对长三角地区的开放。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当下，上海和周边地区的协作水平、对周边地区的开放程度，数十年来并无明显突破，有些方面甚至明显收缩。这极大地限制了上海能量溢出对周边地区的带动；更限制了上海对各种创新要素的集聚能力，压制了上海的创新活力。

创新来自于要素的高度集聚和充分流动，上海要尽力破除一切阻碍要素集聚和流动的障碍，方能培育成世界水平的创新中心。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2018 年 12 月 22 日

编者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年来都是市场关注的重中之重，它将重度影响明年经济的发展。12 月 19 日至 21 日，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了 2018 年经济工作，深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了 2019 年经济工作。如何看待本次会议对 2019 年的经济定调，以及它将更加深刻地在哪些方面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从自己感兴趣的角度对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行了深入解读。

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这次会议对于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出了新要求。认为要更多采取改革的办法，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新八字方针下下功夫。具体是三个途径和办法：

（1）提升产业链水平。中美贸易战事实表明，当前全球竞争已经深入到产业链上的竞争，早已超越了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游投入品的竞争力不强，下游制造企业的竞争力将受到重大创伤。为此必须补短板去形成更多的“隐形冠军”企业。

（2）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这指出了形成竞争优势的两个手段，前者是通过创新驱动形成产品差别化，后者是通过规模化发展降低成本，刚好对应战略管理中的“差别化战略”和“低成本战略”。要求尽快形成激励科技创新和品牌建设的激励机制，同时鼓励企业兼并做大企业。

（3）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要求，这次会议继续强调它，说明新的产业集群的建设，关系到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和任务，也关系到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形成。当前中国企业的竞争形态，已经由单体企业之间单一的竞争，演变为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原子式竞争、集群与集群平台之间的竞争、集群与非集群之间的混合竞争，以及本国集群与国外集群之间的全球竞争。产业集群的竞争使得价值链内容越来越复杂，竞争程度越来越激烈和充分，竞争效率越来越高。未来应该鼓励和支持这些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这样这个集群内部就是一段产业链，要让这一段产业链成为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不仅在要素技术的创新能力上要过硬，更要在系统技术和组织协调方面有足够的力量。它们是制造强国战略的基础。

杜宇玮（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明年的重点工作任务之一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强调以创新驱动制造业发展。个人理解，其具体内涵至少可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1）在发展目标上，强调要加快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 （2）在发展动力上，不再是依赖国际代工制造业发展，而强调依靠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
- （3）在创新方式上，强调既要注重技术创新，也要重视企业和产业组织形式的创新；
- （4）在创新内容上，强调产业共性技术和基础技术的研发；
- （5）在创新载体上，强调构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培育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以及高技术、承担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的创新型产业集群或创新集群；
- （6）在创新机制上，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产学研一体化，强调创新的产业化和市场化导向，注重创新成果的转化和落地；
- （7）在创新主体上，强调以企业为主体，特别要重视广大中小企业的创新；
- （8）在创新政策上，强调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重要性，以更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来激励企业创新。

唐德淼（无锡环研中心）：

作为市场微观主体的制造业，中央的政策举措传导到制造业的效用，需要科学考量，制造业政策的激励效用，决定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成败。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现路径是：

- （1）构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标准“体系”，大致确定，何为高质量？不同产业制造业高质量的目标及标准又是什么？
- （2）构建支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政策、法规和要素供给等多维的外部环境体系。
- （3）提升制造业参与价值链利润分配能力，尤其是国际分工的利润分配能力及国际产业链的控制力。
- （4）大力培育制造业高质量的“舵手”企业，支持“舵手”企业进行核心创新，使其成为制造业创新主体，促进成为行业的“隐形冠军”，提升舵手企业的附加值，可以采用研发补贴或政府购买应用等方式支持转型升级。
- （5）激活企业主体高质量发展的动能，打消企业主体高质量升级改造的顾虑，支持化解高质量转型风险。
- （6）健全保护企业家高质量发展的产权法律体系，确保“恒者有其产，方恒之”。
- （7）加强培育具备“工匠精神”制造业高质量的工人、技术人员和职业经理人队伍。

胡春阳（江西财经大学）：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八字方针作为一个环环

相扣的有机整体，共同服务于供给侧改革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重要战略机遇期为应对世界变局而作出的重要部署。将“巩固”排在首位，且着重提及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和核心内容——“三去一降一补”和行业去产能，表明自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供给侧改革作为2016年首要任务以来，供给侧改革这一主线没有变。

从企业层面而言，“僵尸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僵尸企业”处置工作将继续加快推进。而辅以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布局国家实验室、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构建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一系列激励产学研创新的举措，同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其目的均在于激活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生产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力，但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开发、共享以及营商环境优化仍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开发、共享可借鉴美、日、韩等国经验，采取官产学研合作模式，政府完善行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导向名录，投入专项基金引导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展研究，重点建立共性技术共享平台和激励相容的技术创新长效机制，营商环境优化则重在为企业营造规范、公开、公平的法制环境，并切实减税降费，减少企业经营成本。

二．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

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今后中国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居世界前列的市场规模，它的意义不仅仅存在于需求侧，更在于供给侧。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有利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将全球最优质的资源吸引过来，在于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同时，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有利于帮助一些“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生产性服务产业在中国形成“本地市场效应”，促进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利用全球资源来提升竞争力，从而进一步与中国的制造业相融合，提升制造业质量。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明年第一项重要工作中所提到的。

在当前互联网技术推动全球价值链不断分解的背景之下，“产品质量标准”甚至已经逐渐成为一个可以单独存在的产业链环节，贸易成本的下降使得“质量标准”也面临全球竞争，当一国国内产品质量标准无法满足消费者需求时，消费者就可以想办法绕过国内产品质量标准而采用他国质量标准，近年来国内消费者通过跨境电商的方式去购买“国外销售”的“中国制造”的产品，就说明了这一点。全球化以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得中国在很多方面是有能力制造出好的产品，但是如果产品质量标准得不到提高，就会产生“逆向选择”，从而使高质量产品即使可以在中国得到制造，也无法在中国市场上生存，而到其他国家市场上销售。因此无论从国际竞争和国内市场环境的要求看，提高国内产品质量标准都是当务之急。

翟太煌（山西证券研究所）：

我国的行政区域划分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再下一层次还有市、县，州等等。强调促进

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包括以下三层含义：（1）重要性。长期出口导向型发展，导致效益递减，摩擦递增。（2）可能性。无论以人口数量，需求质量，以及土地纵横面积“规模位居世界前列”。（3）困难性。行政区划划分，由来已久，地方保护地方竞争，及其导致的诸侯经济，对形成统一国内市场助力相当之大。从中央几次三番的强调中可以看出中央的决心，如12月21日的新闻联播播出江苏安徽等高速公路省界拆除消息。

可以预见，未来凡是阻碍资金、人员以及土地流转等省际政策规定的地方保护壁垒，将逐步拆除，极大降低交易成本。

包 特（南洋理工大学）：

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一般比较注重为企业和居民的生产消费活动提供物理上的空间，平台和互联，而新型基础设施则更强调提供信息上的空间，平台和互联。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传统基础设施和生产体系建设已经能在很大程度满足大众消费在数量和基本质量的需要。而要进一步发展消费市场，满足消费者日益丰富多样的个性需求，更为灵巧先进，能满足定制化高质量需求的新型基础设施和供应链就显得非常重要。关于如何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在方法上与传统基础设施有何不同，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比如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是地方政府引领推动的，对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鉴于一些互联网企业和制造业企业已经积累了不错的经验和资源，是否可以更多采用公私合作或其它更能发挥企业主动性的方式？政府的角色是否可以从管理者和投资者更多向协调者和监管者转型？此外，地方政府本身是否也可以利用新型基础设施改善行政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比如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将更多服务纳入网上平台，并提高行政审批速度？

三．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黄敦平（安徽财经大学）：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明年七项重点工作任务，其中印象较深的为第三项任务“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第四项任务“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中提出的“推动城镇化发展”，将乡村振兴和城镇化建设作为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有效路径。这两项工作任务部署将重点解决我国当前农村居民、农业转移人口、城市居民等“三类人”发展的问题：

（1）农民要富裕可以通过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县域城镇化等途径，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二三产业，实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带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富裕。

（2）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仅提出了近期目标，即到2010年实现1亿人城市落户目标，也明确提出对此类人的重点问题要放在解决市民化后的就业等民生生计方面，如果此问题无法解决，将会导致城市新的贫困人口的产生，会导致新的社会问题。

（3）增加城市居民幸福感，尤其是要解决大城市的高房价、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问题，

实现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张立冬（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1）注重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把他们引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十九大报告提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要求，这次会议继续强调它，说明各地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中对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接轨面临的困难重视程度不够。未来要更加重视培育家庭农场，要清醒的认识在当且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小农户仍是我国农业的主要经营主体，而且世界农业的发展历程也表明农户家庭经营是适合农业生产的有效方式；更加重视农民合作社，是要进一步提高小农户的组织化程度，籍此提高小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能力并合理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2）重点解决好实现“两不愁三保障”面临的突出问题。“两不愁三保障”是我国“十三五”期间脱贫攻坚的目标，更是中央从多维贫困维度对提高贫困人口“基本可行能力”的凝练总结。在脱贫攻坚进入收尾的决胜期，各地要充分认识到现行扶贫标准是“收入主导型”的多维贫困标准，除关注收入这一关键贫困标准外，要精准施策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的“三保障”，确保在全面小康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3）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等新问题。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贫，最重要的是要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既要坚持脱贫不脱政策，也要提升健康扶贫的效果以进一步解决因病返贫这一突出问题。研究解决那些收入水平略高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群体缺乏政策支持的新问题，就是要求加大对临界贫困群体的关注，制定政策以切实消除贫困与临界贫困两个群体之间待遇的悬崖效应。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1）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中央提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一项全局性、战略性决策。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都会强调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性，体现了中央一以贯之的精神与态度。

（2）引导农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在保障粮食供应安全的基础上，提高优质绿色农产品的供给。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数量的大国，粮食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社会稳定，要立足于自身的生产能力，切实抓好粮食储备，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合理调整“粮经饲”结构，着力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更好地满足城乡生产以及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3）鼓励优质生产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要培育新时代的新型农民，即具有现代农业科技知识、懂经营会管理的知识型农民。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新型农民的积极参与。知识型农民也是建设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主力军、领头羊。同时，要吸引有志于农村农业发展的城市居民，为其在农村创业、就业提供便利。要鼓励城市资本对农业的投资，

给予税收优惠政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允许土地经营权转让或出租，实现农业产业化经营。

（4）利用好互联网技术，解决小农户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把他们引入现代农业发展大格局。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农产品销售提供便捷服务，实现供求的精准匹配，提高农民收入，而且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为农业发展提供产品供求与价格信息以及农业技术相关培训服务，更好地解决农业生产问题。

（5）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新农村建设。要加大对农村水利建设、道路建设、电网改造、集中供水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的投入，要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对垃圾污水集中处理，引导农村厕所革命，建设公共健身场所和设施，建立文化娱乐休闲活动中心等。要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养老、救济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做到“少有所学、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济”。

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颜银根（南京审计大学）：

会议围绕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包括：以城市群“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力”以及“城镇就业的农村转移人口的落户工作”。对此，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

第一，城市群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截止2018年3月已经形成了19个规划城市群中的9个城市群的规划批复。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为代表的城市群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间一直是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在经历产业结构调整后能够更好地引领中国产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

第二，中心城市抑制了外围城市的发展，需要实现区域联动发展。中国的城市体系中形成了9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和若干个区域级中心城市，除上海等个别中心城市外，目前我国的城市普遍“虹吸效应”大于“溢出效应”，中心城市的发展以周边城市的牺牲为代价，背离了区域协调发展。

第三，大量城镇就业的转移劳动力亟待落户，实现市民化待遇。接近于3亿的城镇就业的转移劳动力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同等待遇，面临着医疗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以及社会养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户籍制度。城镇就业转移劳动力“实现2020年落户1亿人的目标”是城市化高质量的关键，同时也从劳动力供给的稳定性等角度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孙军（淮海工学院）：

区域经济发展源于区域之间富有活力创造力的贸易联系以及据此启动的即时创新。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是思考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逻辑起点。有以下两点建议：

(1) 从省际层面有选择性地设计跨区域协调的制度安排。一是我国需要在省际区划层面设计跨区域协调的制度安排,如此才能从行政的角度,实现跨区域战略协调和跨区域系统(比如创新系统、基础设施系统、医疗卫生教育系统等)的协同效应;二是所设计的跨区域制度安排,除了进一步扩大区域之间现有的贸易联系进而知识溢出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区域之间现有的贸易联系,启动或增强区域之间的合作创新;三是跨区域制度安排的设计,可以依据两个原则来选择可合作的潜在区域:区域之间地理距离的相对可达性和区域之间发展水平差异。目前,作为可以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的基础设施密度和网络化程度比较高,这些区域可以考虑与区域贸易联系水平高、地理距离相对可达性高、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其他区域,率先启动跨区域合作创新的战略框架。

(2) 依托跨区域产业集群之间的贸易联系,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机制,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抓手。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表现为资本品联系、中间投入品联系和消费品联系,这些贸易联系大多是由产业集群来承载。以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的产业集群为抓手,通过跨区域产业集群的贸易联系,激发集群之间的跨区域合作创新,形成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三股动力源:一是对以中间投入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产业集群,依据省市之间的中间投入品联系程度,逐次与国内其他区域的进口产业集群,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机制;二是对以资本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产业集群,依据省市之间的资本品联系程度,与地理距离相对可达性高且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其他区域的进口产业集群,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机制;三是对以消费品为主要特征的出口产业集群,依据省市之间的消费品联系程度,与地理距离相对可达性高的其他区域的进口产业集群,建立多主体参与的跨区域合作创新机制。

孙华平(江苏大学产经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强大城市精细化管理。因此推动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是新时代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提升大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处理好三个协同关系:

(1) 把存量的当前城市户籍人口与增量的农民工市民化及每年的新增大学生就业等协同起来,注重以人为本,把握好节奏与速度。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落实2020年1亿人落户目标,因此应科学合理规划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等,并做好相应的就业社保等制度供给。

(2) 做好城市各类产业的合理布局与规划,高质量的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服务业是大城市精细管理的重要依托,但也要处理好制造业产业向城市外转移与生产性服务业动态升级的关系,协同推进先进制造业及各类服务业有序发展。

(3) 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与大城市精细化管理协同起来。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产业兴旺,而产业兴旺的需求点往往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如从乡村休闲旅游、食品安全等多维度来看,消费的人群多是大城市居民,因此应该在土地规划、人口双向流动等各要素层面推进乡村与大城市的协同发展。

五.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国有企业要完善治理，聚焦主业，强化激励，加强集团管控，积极组织变革，提升资本效率，提高决策质量，做优做强做大国有资本，为改善和保障民生、为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提供极致的产品和服务、为加快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做出国资国企贡献，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可、尊重和满意！

2019年，国有企业应当抓住契机，大多在集团层面应改组为国有资产投资公司；按照产业板块，子公司层面组建成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并积极探索这两类公司的管控模式，成为有企业管资本为主的综合性改革的鲜活样本与标杆旗帜！

孙军（淮海工学院）：

会议指出，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大幅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这表明：（1）会议进一步强调了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能够减少效率损失，降低债务，充分挖掘市场潜力；（2）政府要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强化放管服改革，对于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市场上出现的一些不良现象并非是民企参与的结果，而是事中事后监管不到位的结果。

应该说，会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准定位，有利于进一步完善习近平总书记民营经济大会精神，有利于调动包括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和参与的动力。这也要求政府必须按照会议精神落实改革决议，把市场能够决定的事情完全交给市场，有争议的方面可以通过试点进行实验。也要求政府能够真正按照法律办事，违规的企业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应该严峻刑法，维护广大民众根本利益。另外，也要求政府能够精兵简政，把可能对市场过分干预的部门或政策进行缩减或取消。

陈东（安徽工业大学）：

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民营经济发展给予了重点关注，直指民营经济发展“痛点”，重点提到三个方面：

（1）在宏观政策方面，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解决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2）在2019年的重点工作方面，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把这项内容归纳到经济体制改革方面。

（3）在文末强调，要深化财税金融、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坚决破除民营企业发展障碍，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推测出2019年中央在解决民营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着力点：

(1) 中央仍然高度重视民营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并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会保持货币政策合理流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向民营经济倾斜；会重点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有融资需要的民营企业进行“精准滴灌”，破解融资“肠梗阻”和“最后一公里”问题；会更加重视直接融资比重，预期上海科创板会对有创新性的民营企业有所倾斜。

(2) 中央高度重视民营企业家的产权保护问题，并且把人身权和财产权提到了极高的位置，预计重点做两方面工作，一方面将会坚决杜绝侵害民营企业的类似案件再发生，另一方面可能会继续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甄别纠正甚至会大规模摸排纠正历史上的产权纠纷申诉案件，给民营企业家以“定心丸”。

(3) 内涵着财税金融和国资国企一定程度上是导致民营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重要障碍，下一步，在财税金融改革，国资国企改革上，可能要重点结合民营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方面通盘考虑改革，而不会是在单一所有制范围内闭门改革，改革可能会对民营经济大幅让利，对民营企业的投资领域可能会大幅度放开。

“强政府”就是要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切实发挥政府的制度保障作用。从企业角度来看，民营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现实难题，迫切希望政府给政策；党和政府也积极回应企业的诉求，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也都积极出政策、给优惠、抓落实，民营企业真正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我们认为，下一步，各级党委政府、各个工作部门，应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打折、不走样、不僵化，不搞短期化，不追求形式化，不允许片面化，而是扎扎实实的把政策送到企业手里，把温暖送到企业家心坎上，让这种良好的趋势保持下去，给民营企业对未来的预期能从悲观到乐观，并长久地保持下去。

朱建平（江苏省联社）：

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对农商行来说，就是要坚决杜绝业务发展偏离主线、风险防控不到位的情况，坚决杜绝在同业业务、信贷业务、票据业务等业务违规以及违反审慎经营原则，在服务三农、普惠和实体经济方面久久为功。

(1) 一是坚持“立足县域、服务社区、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以城乡居民、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等客户为重点服务对象，切实加大有效信贷投放，将有限的信贷资源向辖内小微企业和农业企业倾斜。

(2) 坚持支农支小的市场导向，深耕细作本土市场，履行精准扶贫责任，发展绿色普惠金融，结合农商行所在区域的发展特点，加大对绿色、民生、消费、供应链、物流等产业支持力度，着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升级、精准脱贫攻坚，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积极引导信贷资源向500万元以下特别是100万元以下农业贷款倾斜

(3) 坚持“社区性、零售型”的市场定位，贴近城乡居民，致力于为其提供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形成一批贴近社区、服务百姓的金融便利店，社区金融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4) 不忘惠民利民，践行普惠金融责任，将妇女、大学生、退伍军人、进城创业农民工、残疾人等纳入扶持对象，为更多群体创业、就业提供有力的信贷支持。

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作为国家年度经济工作的最高会议，其重大决策和部署必须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但是，总有一些职能部门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出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不仅损害了中央政令的权威性，客观上也成为加剧当前经济困难的重要原因。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三次提出要“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营造法治化制度环境，保护民营企业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如果相关职能部门继续熟视无睹不作为，那么就会演变为预言中的狼来了故事，进一步伤害人民信心，破坏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与环境。必须要有抓铁有痕、踏石有印的勇气，在平反法人冤假错案、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上迈出坚实步伐，取信于民、凝聚信心、鼓舞士气，让我国经济更好地应对外部挑战，增强发展的战略定力与内生动力。

陈志龙（财经专栏作家）：

金融体系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到信心和信用，金融市场的诚信和公众对市场的信任对于资本市场健康运行至关重要，健全的市场体系依赖公平交易、监管者的信托责任和信息透明度三大原则。有了这些，即使遭遇困难，公众也能与政府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但过去这些年，资本市场的失败使得各方深陷“塔西陀陷阱”。2015年那场暴力去杠杆引发的“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深度折射了“不成熟的市场、不成熟的监管和不成熟的投资者”齐心协力酿成中国股市最惨烈的下跌，参与各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资本市场异常敏感，政策出错瞬间血流成河，如果没有有效的在线修复机制纠错机制，就像没有刹车装置的高速行驶的列车，倾覆翻车、铸成颠覆性错误是大概率事件。一轮又一轮的“异常波动”警示各方，要非常小心，要懂得谦卑，要敬畏市场，敬畏基本的经济规律。

面对当下的困局，必须对资本市场重要作用的认识有一次发自灵魂深处的深刻而伟大的觉醒。必须切实加强市场基础制度建设，加强信息披露加强预期管理，监管当局要坦诚地学会与市场正确沟通。监管者要有边界意识，这种沟通是建立在尊重并敬畏市场的内在规律，真正保护最广大投资者利益，真正实现“三公”为前提的多做些工作，比如托儿所，小孩上学等。

刘晓昶（华泰证券）：

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要通过深化改革，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希望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均衡市场投融资力量，引导形成投资者理性投资——融资者获得长期资金助力的正向良性循环，使资本市场成为我

国打造产业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内在发动机。“推动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尽快落地”，显示了国家对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支持，值得提醒的是，科创板的设立需考虑到对目前主板和创业板市场的资金分流压力等，需要进行相应的统筹安排。

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资金），另一方面可以让投资者获得持续的投资收益，增强消费信心和消费能力，有助于启动国内内需，打造强大的国内市场。可以说，资本市场确实是我国经济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心枢纽。搞好了资本市场，我国经济将会迎来再次腾飞！

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

资本市场的运行牵一发而动全身，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完善交易制度，吸引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

（1）信息的透明度。让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提高。目前上市公司的披露信息比较不规范的，信息披露质量高低，似乎并没有得到任何的奖励或惩罚。要建立规范制度，怎么样叫做高，什么叫做低？不符合规范的适当的处罚，比如说对于负责人和财务长，予以罚款，刑事责任，禁入资本市场等。

（2）强化内幕交易的监控以及处分。目前的大股东的内幕交易没有得到适当的监控，这部分政府是应该做得到的。对于任意的停牌应该适当的规范，提高投资人的保护。增强投资人的信心才有可能吸引更多资金进来。

（3）协助与建立投资人集体诉讼的制度，减少上市公司负责人牺牲小股东的权利的情形。这个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外资以及投资人的保护以及信心的建立。

（4）吸引中长期的资金必须要能够保护投资人的权利，中长期的资金才愿意进来，因此要对上市公司的负责人，可以要求更高的责任，如果信息不实，内幕交易，给予刑事处分，资本市场进入的处分。

（5）简化上市的流程，就像目前上交所设立的科创板，注册制尽快落实，如果能够有效的带动起来，并且制度化获得投资人的信心，再进一步推进到主板。

（6）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机制，必须具有自偿性，也就是说项目将来能够有现金流收入的才能够举债。如果不能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央适当的补贴协助。避免地方政府举债，而没有要偿还的迹象，扩大了地方债务风险。

徐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民营企业遭遇的困境，除了税费负担重、融资难等众所周知的问题，还应特别注意各种运动式治理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对民企信心与活力的冲击。

（1）部分专项治理行动，在具体实施时需要考虑历史延续性。很多民企的投资增资决策，是在特定时期的地方政策框架下作出的，地方政府关于一些税费减免的承诺，应取信于民企。

由各部门设立的各种专项治理，要与地方政策相衔接，或者建立多方协商机制寻求更合理的解决方案。

(2) 一些专项治理行动应避免扩大化。一些专项治理同时兼有维稳目标，多采用公安联合执法，特别是 2018 年进入爆雷期的 P2P 和类似的非法金融活动，对于此类非法金融活动进行严厉打击无可置疑，但部分地区出于维稳考虑，往往“过度治理”，误伤一些无辜的行业和企业。专项治理既要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又要保障守法企业能够依法依规正常经营，需要精准化，避免因扩大化而误伤守法企业。

六．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过去 40 年的中国增长奇迹，得益于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得益于在对外开放中分享战后经济全球化红利。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准确把握住了当前经济全球化转型发展的大势。重要战略机遇的新内涵，其要义即在于世界经济和全球秩序面临深刻变革，中国需要携手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参与并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上一轮全球化发展机遇相比，抢抓本轮经济全球化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必须树立“做好自己，服务全球”理念，需要特别注意：

(1) 正确处理“虹吸与外溢”关系，在虹吸全球先进要素和资源的同时，更要促进自身发展红利向全球外溢，实现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更高质量地协调互动。

(2) 充分认识多边和区域规则变革在经济全球化转型中的先导和决定性作用，响应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和欠发达经济体的诉求，从自身的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着手，推动 WTO 框架下的制度变革。

(3) 深刻把握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国际竞争合作的实质和特点，以国内统一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通过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区域协调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市场升级战略、产业集群战略，培育并做强“技术—市场—制度—资源”系统集成的大国经济体系优势，努力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源发地，塑造多中心基于规则竞合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构建涵盖各类经济体的包容增长格局。

林学军（暨南大学）：

就克服外部严峻的经济环境，对稳外贸，稳外资提一些自己的看法。

(1) 稳外贸。稳外贸应该坚持开放的基本国策，要努力办好“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增加中国的外贸伙伴，加强世界各国尤其是周边邻国的经济合作。要以 WTO 平等、互惠、非歧视的原则与世界各国友好协商，签订双边或多边的自贸协议，互相减让关税，扩大双方的贸易额。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我们应该要有正确的态度，争取在互利共赢的框架内，平等协商解决。

我们不但要扩大出口也要扩大进口，以双向贸易加强与各国的互利合作，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2) 稳外资。我认为，我们要搞好自贸区建设，总结好的经验，以及可以复制的、推广的制度，以法治化、公平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要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简化审批手续，还要降低营商的税收、电力、人力、资金和物流等成本，保护投资人利益，保护知识产权，努力吸引外资和人才。另外，我们也要加快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利用“一带一路”，鼓励企业走出去。如通过与外国政府签订投资保护协议，建设海外产业园区，支持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办企业。充分利用各国的比较优势，构建中国的全球价值链，形成中国合理的全球经济布局，确保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继续提出“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与之前提法不同的是“要适应性形势、把握性特点，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一方向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开放经济的重要内容。TPP 提出了很多新的贸易与投资规则，由于特朗普的退出，没有能够进入实践，但随着 WTO 改革被提升日程，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将会面临重构。我国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参与新规则制定，并更多体现中国元素：

(1) 积极参与此轮 WTO 改革，尤其是涉及规则制定方面，挖掘广大发展中国家成员国的共同利益，防止规则制定被发达国家完全主导。

(2) 通过签订更高质量的双边优惠贸易安排，既可以实践一些新规则，也为未来新规则树立标杆。中国和新加坡升级版双边自由贸易区已经签订，后面要多密切跟踪研究美加墨自贸协定、欧日自贸协定等，将新规则融入中国自贸区战略。

(3) 可以将一些新的贸易与投资规则在国内的自贸试验区先行实践。

(4) 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探索实践新的贸易与投资规则。

七．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

陈伟贤（南京医科大附属医院）：

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最关注的是第二条，关于民生方面的表述。现阶段老百姓对于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健康，养老，教育，医疗都十分关心。希望中央进一步重视关注民生工程，让人民对美好生活有个美好的期待和盼望，在比较贫困地区投入较大的资金和人力。用实际行动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要把有限的经济资源真正投到民生中去。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缦毛毯）：

学习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我发现之前中央政治局提出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在这次中央经济会议进一步提出六稳，提振市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同时在会议后面重点强调：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完善制度守住底线，精心做好各项民生工作。要把稳就业摆在突出位置，重点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群体就业。说明中央领导对基层民生问题的高度重视，同时我们可以理解为如何支持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企业以保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近年来全国房价总体是在提升的，70 个大中城市房价整体上呈现出从低档向高档涌浪式前进的状态，前三档群体城市数量逐年增多，后两档群体城市数量逐年减少，尽管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推进速度明显快于二手住宅，但两种住宅价格的基本面均为后三档。国家层面据此采取的以“六限”、“一约谈”为代表的因地制宜的差异化住房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既防止了住房泡沫的发生，又提振了房市信心。从发展趋势上看，如果在现有住房政策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未来几年我国住房市场总体上还将继续保持慢热势头，房价涨幅略高于 GDP 增速。但是，我国原有住房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城镇住房市场长期保持稳定的问题，必须立足当下国情，建立一套更为科学的住房制度。为此我提出了几点建议：（1）因地制宜，坚持一地一策，防止住房政策的简单化和一刀切。（2）突出重点，坚持多管齐下，缓解热点城市的住房供求矛盾。（3）适应需求，坚持精准投放，以租赁住房的合理布局来推进租购并举的有效实施。（4）稳定预期，坚持控大调微，防止房价因政策因素而大起大落。

我很欣喜地看到，这些建议与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的新要求，是完全吻合的。

张传勇（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

2019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房地产和住房问题，强调坚持“长效机制”与“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等对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住房的基本定位，但与以往（主要是 2018 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内容相比，有三处明显的提法差异：

（1）从口径上首次将房地产和住房问题纳入“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重点工作范畴当中，而不再像以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单独将房地产或住房问题作为年度重点工作之一，这凸显了中央将住房定位为保障和民生属性的总基调。

（2）强调“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而不再像 2018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多主体供应”以及“支持专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这既赋予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权更强调

了其应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暗指住房租赁企业理应规范化、常态化发展而不应滋生新的市场问题。

(3) 对于不同区域和城市的房地产调控和住房问题，用“因城施策、分类指导”代替“差别化调控”，这与“夯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是一致的，表明中央尽量避免“一刀切”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将更加精细化，地方政府在应对房地产问题上有更大的自主权。

高传胜（南京大学）：

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经济下行压力明显的当下，加强民生保障与改善，加快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服务行业发展，不仅事关社会稳定大局，而且对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亦大有裨益。

(1) 不断完善社会救助体系，改革优化社会保险制度和住房公积金制度，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并在增加资金投入的同时，优化资金使用结构，提升资金使用绩效。当前，一方面要增加对学前教育、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等方面的投入，另一方面在继续加大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的基础上，切实有效降低“五险一金”缴费水平，减轻企业与职工负担。

(2) 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让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有公平机会与宽松环境，投入到医疗、养老、教育等民生领域，实现营利性服务产业、非营利性服务事业和政府公共服务分类协同发展与治理，在更好地满足民众多层次、多样化民生服务需求的同时，亦促进就业、增加内需，从而既减轻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又推进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

八、更多解读

汪德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回顾历史，十八大以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有三次提到“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一次是2012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需要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机遇做出高层研判。第二次是2014年，时值“经济新常态”概念首次提出，同样需要中央领导层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景做出科学判断。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第三次即是今年。2018年国际风云变幻，中美贸易摩擦压力渐增。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看，经济下行压力渐显，民营企业发展困境成为年度内焦点事件。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上各种声音并存，对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前景的怀疑、困惑不绝于耳，迫切需要中央综合分析，给出科学判断。

中国经济是否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科学分析外部环境的利弊，如公报中指出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更重要的是搞好自己内部的事情，要深化、加快各领域的改革

步伐，提升市场活力，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特别是民营经济主体的发展信心和动力。这就是“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的深刻含义：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性放产假，可以3个月，并且可以选择休假时间。

巫强（南京大学产业经济学系）：

这次会议进一步强调“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这是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通过提高竞争政策在国家经济政策体系的地位，实现以发展为导向的产业政策向以公平为导向的竞争政策转变，这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政策抓手。具体而言需要积极推进以下方面的工作：

（1）加快完成《反垄断法》的修订工作。目前《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已经完成，已被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期待尽快完成立法程序并推出相应的配套立法，尤其是我国《反垄断法》迫切需要将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等诸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下的垄断行为纳入监管。

（2）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领导下，加强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为主体的反垄断执法体系与队伍建设。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先分散在三个部委的反垄断职能部门合并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强化了对反垄断执法工作的统一领导。但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还需要进一步扩大队伍规模，提升专业人员能力，加强执法机构独立性。

（3）强调经济学与反垄断法的交叉与相互借鉴。与世界范围内领先的反垄断法实践相比，我国产业经济学领域专家对反垄断案件的参与度相对较低，现代经济学工具方法在反垄断执法过程中的运用还不够充分。

（4）贯彻竞争中性原则，切实在《反垄断法》执行中做到对于国有、外资与民营等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一视同仁，加大对各级政府相关的行政垄断的治理力度。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转变以往讲三大攻坚战，主要讲目标导向；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讲目标，而且着重讲了方法和尺度。其中，防金融风险要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打好脱贫攻坚战要一鼓作气；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除了要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同时要统筹兼顾，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这说明，一方面三大攻坚战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年重大任务方向是坚定不变的，同时总结了三大攻坚战推进一年以来在方法上的经验教训。以往不少“一刀切”的做法减少了政策制定的难度，却在政策执行时大大增加了社会成本，本次会议对三大攻坚战的提法是要努力把政策细化，提高政策的精准度思路重视人口质量。人口数量会对经济造成影响，而人口质量则会促进经济发展。

陈岸立（山东农发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较大幅度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的基本思路，防范金融市场异常波动和共振，稳妥处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到坚定、可控、有序、适度。”在当前宏观经济不乐观，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必须切实采取措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控：

（1）确保地方政府债务可控。坚决堵住地方政府债务“政出多门”的问题，明确凡是政府主导的项目举借的债务均属于地方政务债务，严格按照《预算法》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要求，纳入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防违规举债。

（2）明确政府主导和政府规划或政府引导的关系，在相关领域，政府引导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和行业，引领社会资本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

（3）界定政府债务的界限，给金融机构以明确的信号，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4）根据实际，综合施策，避免“一刀切”或者直接“切一刀”，因城施策，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

（5）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培育和发展新动能。

宋常铁（中国电力改革发展 30 论坛华东组委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是提振市场信心，回归经济理性的重要契机，一定要珍惜，信心是市场情绪之基。建议：

（1）减税应该以民企切实感受到利好，从而激发事业动力为目标，应与融资、社保、环保等方面政策一起出台，同步实施。

（2）对中国经济的信心除了源自政策刺激、培扶，更来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法治环境。务必对“消灭私有制”、“民营经济已完成历史使命”、“李嘉诚别跑了”、“民企实行职工民主管理”一类蛊惑人心的违法言论及时追责，追惩相关个人和组织破坏稳定、危害经济安全的责任。

（3）东北的乡村振兴有全国共性，也有其个性。人口流失严重，并且在加快，乡村凋败严重，加上东北作为北方环境及生态屏障的压力加大，应加快东北产业集聚和人口城市化，让东北休养生息，逐渐弱化央企对资源、政策利好的垄断，让民营经济自然发育、壮大，同时，在重点区域、有条件的乡村推进新农村建设，建设美丽乡村和现代农业。

（4）努力确保股市、楼市、汇市稳定，外汇管制灵活、有度，中美及国际关系灵活、务实，以免形成社会恐慌。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今年的中央会议指出明年要针对突出问题，打好重点战役，其中的一个重要战役是“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如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上，提出“要坚守阵地、巩固成果，聚焦做好打赢蓝天保卫战等工作，加大工作和投入力度，同时要统筹兼顾，避免处置措施简单粗暴。要增强服务意识，帮助企业制定环境治理解决方案。”会议还强调了“要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

此次会议提出以上任务，我认为这是由于我国在污染防治还同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部分地区政府仍然认为经济发展高于环境保护，尚未摆脱唯GDP的发展观念，实现向绿色发展路径的转变；

（2）部分地区政府虽然认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但未能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在治理措施、手段上还存在简单粗暴问题，影响了企业经营环境和地方经济发展，例如部分地方政府，忽略区域产业链生态特征，和环境整改需要时间等问题，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关闭污染企业；此外，部分企业虽然意识到实施绿色生产方式的必要性，但缺乏实施绿色生产的能力，需要外界给与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正是基于以上问题，本次会议在最后部分强调了“要协同推动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

（1）我国当前仍然处于重要的历史战略机遇期。中央对这一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极为重要，表明中美之间的经贸摩擦是两国关系长期“斗而不破”的一个缩影。所谓“斗”体现在两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将长期存在。美国重振制造业并非一朝一夕，将国内制造业萧条归咎于中国并采取强硬姿态是特朗普政府赢得遭受经济困顿之苦的美国中下阶层选民支持的政治策略，当前美国即将面临国内资产去泡沫化的加息周期，经济有可能再次陷入衰退，打“中国牌”仍然是特朗普政府的执政“刚需”；所谓“不破”，就是中美两国都无法承受彼此彻底“决裂”所产生的严重后果，中美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只有在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全球治理层面携手合作，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共同面临的各种威胁和挑战。

（2）在外部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的宏观背景下，必须练好“内功”。练内功需要进行“固表”、“去病”和“强体”等三个阶段。所谓“固表”就是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通过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投资、稳预期来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使经济增长保持合理增长空间；其次，所谓“去病”就是要针对国内市场“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等问题加快改革步伐。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关键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建立高效、透明、公平的营商环境，调动微观经济主体活力。

（3）国企改革由“管国企”向“管国资”转变，国有资本不仅可以投资“国企”，还可以投资“民企”，淡化企业的所有权性质，使“国企民企化，民企国企化”，真正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在需求侧改革方面，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改革户籍制度让农民工市民化，享受城镇化的发展红利，同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打破区域条块分割，建立统一国内市场，培育庞大中产阶级消费人群。最后，所谓“强体”。一是加快政府自身执政能力

建设，加强社会法制化水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减少政府行政手段干预，给企业家以安全感和确定性预期。二是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与国际市场接轨，借助外部压力倒逼内部改革；三是要增强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挖掘资本市场在培育创新生产要素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利用市场机制孵化创新企业。

“错峰生产机制”下的博弈：倒逼地方政府职能转换

2018年01月24日

编者按：政府规定的水泥“错峰生产”政策，频频被省内的企业违反，政府和企业玩起了猫捉老鼠游戏。什么是“错峰生产”呢？2016年10月，工信部和环保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水泥错峰生产的通知》，决定在2016年—2020年，对我国北方15省的水泥生产线实施错峰生产。也就是每年一到供暖季，水泥企业就停窑，供暖季结束才能开窑，恢复生产。“错峰生产”可以降低水泥产能和污染物排放，特别是冬季避免供暖和水泥生产的污染叠加，可谓利国利民。

据水泥企业高管说，前些年由于北方产能过剩，价格低迷，“错峰生产”还是很受行内企业欢迎的。但2018年入冬以来，因市场需求回暖、水泥价格不断上涨。这样很多企业就不愿意再服从“错峰”的命令了。根据辽宁省政府文件，水泥行业本应该2018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停产5个月，可是却有15户企业未及时停窑；11月8日，省工信厅下发《紧急通知》，并约谈、通报违规企业，到11月底才勉强让所有企业停产。可惜禁不住利益诱惑，没过多久，又有企业重新开工了。

据了解，辽宁水泥企业对“错峰生产”基本分为两派。一派是“停产派”，主张严格执行政府文件，坚决停窑；另一派“生产派”则认为，“错峰生产”没有法律约束力，即便执行，也应该是差异化错峰，大家不必统一停产，可自主决定停产的时间，只要每年停够5个月即可。

对此，政府部门很为难。首先，上级文件没有说可以差异化错峰，另外“停产派”也不答应。可政府除约谈、通报外，执法手段有限。它们一边受到不作为，执行上级文件不力的投诉，一边又遭受执行政策太死板，搞“一刀切”的质疑。

一些企业为何不愿停产？原来，入冬以来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水泥价格居高不下，辽宁因临近港口，水泥便于下海，长途运到江浙销售还有利润，这拉动不少企业冬季生产。另外竞争对手反映，主张停产的主要是全国大型水泥集团的辽宁分公司，它们在全国多地都有布局。而“违规”生产的，则是辽宁本地的民营水泥企业，它们只在省内布局。

“停产派”之所以捍卫“错峰生产”，是因为它们在南方也有分公司，即使在辽宁的分厂停了，也不耽误其在南方的分公司冬季继续生产赚钱。而让辽宁企业全线停产，反而更有利于它们的南方分公司提价赚钱。而那些不守规矩的“生产派”，只不过是为了争抢南方的市场空间。

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政府该怎么“解”？对此，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刘志彪教授组织群内专家、学者们，对政府如何应对辽宁省水泥行业的“错峰生产”困境进行了深入讨论。

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1）无论“一刀切”错峰生产机制，还是“差异化”错峰生产机制，本质上都是一种以限制产量、减少排放为目的的垄断“卡特尔”。

（2）既然是“卡特尔”，就必然在运作中表现出它的一般特性，即在利益一致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而在利益冲突时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如案例中所说，前些年由于水泥产能严重过剩，产品供过于求，价格跌跌不休，企业不赚钱，这一举措便会受到企业的欢迎；而今冬因水泥价格回升，企业可以赚到钱了，就不会愿意停窑了，就会加足马力生产，也就是让“错峰生产”机制受到挑战。

（3）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组建这种“错峰生产”机制的垄断“卡特尔”，在限制产量提高价格的意义上是没有法理依据的，是违反我国反垄断法的，但是在环保意义上是有法律依据的，不过实施的手段要重新选择；二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任何经济政策都要建立在顺应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的基础上。政策调节的方向与市场主体的利益一致，就很容易得到执行，否则就会失败。

（4）我的基本建议是：对水泥生产的政策的重心要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既尊重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也要求遵守环境保护的法治。公平竞争、政策的平等性是市场竞争的根本大法，所有其他与其违背的经济政策都是违反经济规律的。具体来说，就是放开生产，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同时，为了行使政府的环保职责，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自然环境可以自洁的程度，制定最大允许的排放总量指标。向那些多生产的企业多征收排放税。

陈柳（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一项政策能够得到执行，要么靠激励相容，要么靠法律法规和行政执法。

（1）需要考虑东北市场的水泥市场停产是要激励相容还是靠行政命令，吉黑地区的停产企业自身有激励，所以不需要行政命令也停产了；

（2）如果辽宁市场的停产需要靠行政执法，那么就要有个公信力的标准，除非按照《指导意见》搞“一刀切”，否则政府来指定谁停产，谁不停产，何时停产，需要有明确的执法标准，比如明确的环保标准；

（3）《指导意见》效果有限，甚至名存实亡。因为即使没有这个指导意见，吉黑地区的企业也没有动力生产；即使有了这个指导意见，辽宁企业照样有动力生产。可见靠行政推动成本之高。

孙华平（江苏大学产经院）：

这是典型的市场失灵叠加政府失灵。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能，而保护环境并促进节能减排属于政府的公共责任。关键是如何科学设计有效且合理的规则。目前的“错峰生产”本是个双赢的创意，但此机制规定的限产时间（五个月）与区域（北方十五省）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平等

竞争之策。

根据双强理论（强政府 + 强市场），首先应先罚，在可罚范围内就高，体现强政府。其次，构建缓冲机制，推出包含环境定价的配额进行拍卖，体现强市场。同时，建立双强体制的协同机制。

王思彤（江苏省统计局）：

（1）这些都是合法企业，不是关停并转企业，都有合法生产经营资格。

（2）这些企业以往自愿接受政府冬季停产建议，一方面是因为需要减少冬季污染排放，但另一方面更是因为产品销售进入淡季，短期停产也无关痛痒。

（3）现在产品销售形势好，继续短期停产无形中会流失很多利润，错过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良机，政府也会减少税收。

（4）政府应因地制宜，一地一策，一企一策，允许愿意继续生产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开足马力生产，并通过增加企业税收来改善环境或补贴百姓损失。同时，也应该允许不愿意继续生产的企业维持停产状况。

赵建（西泽研究院）：

设计一套机制：向“生产派”征税补贴“停产派”，因为停产派虽然不生产，但实际上供给了公共产品——环境。

汤秀平（昆山律师）：

所谓产能过剩与否判断，交给企业自己去决定。只要企业环保达标，无违法违规之处，企业可以生产，市场要起决定性力量。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

行业协会内部协调（内部协议可能是没有南方分部的企业适当生产一点），最后政府认可行业协会的内部协议。

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政府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更适合通过制定公平竞争政策来解决。建议地方政府对冬季污染排放征税，或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环境问题。

翟太煌（山西证券）：

政府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蓝天白云），企业是逐利的。当企业与政府意见相左，以

政府代表大多数意见为准。所以应该强硬执法，保护蓝天白云。至于企业因停产所受损失，按照规定通过转移支付手段解决。

宋文阁（上海财经大学 500 强企业研究中心）：

根源在于强政府及行业协会，用看得见的手去干预企业正常经营。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用经济手段，强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

采用“错峰生产”方法，也是不得已为之的过渡办法，本质还是政府的手伸得太长，这样会带来更多僵尸企业，让企业用这种过渡办法苟延残喘。

孙 军（淮海工学院）：

《指导意见》的出台一是不利于北方五省中小水泥民营企业，二是也有鼓励他们走出去建立分支机构的激励。不过，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后者很难实现，这实际上对于北方五省的水泥企业是非常不利的。当初大家都能够接受，估计原因在于这些企业过去也没有能力走出去。但是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去产能导致价格上升，使得北方中小民营企业复产，这是正常情况下的市场行为。

建议：（1）撤销《指导意见》；（2）利用环保标准和竞争政策替代政府去产能行为；（3）利用协会自发力量来处理行业内部问题。

赖红波（上海理工大学）：

这种情况不是简单的机制设计问题。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还是要面对实际问题去沟通解决。如何做到多方利益目标兼容，需要权衡和具体走访调研，也几乎是环保配额制遇到的新问题，或许需要多管齐下（含政策沟通说服等）。

金自力（川思特软件）：

建立以类似碳排放为标准的配额制，划一个地区能接受的排放总量，然后按单位产能计算，分给企业，让行业协会负责成立区域性的小型交易市场，不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如果在淡季想生产可以购买配额，而符合环保要求排放少，配额多，淡季可以生产，也可以转卖给非环保企业赚钱。

市场价格会慢慢发挥作用，企业会转向建设自己的环保设施，工业上所谓的高污染其实都是相对的，大化工其实不见得就是高污染，德国和美国也有很多大型化工企业，关键还是技术先进性和环保投入力度。

包卿（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

（1）此次事件是辽宁塑造和改善营商环境的一次契机，分清法治化与行业自律的界限，更好地定位好政府服务，提升立法、执法、守法环境。

（2）如果为了保护冬季空气质量，实现区域性限产，那么行业指导意见建议上升为地方立法，这样实现制度性约束。树立政府权威，通过法治化的途径更好地维护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法治化水平。

（3）“停产派”与“生产派”都有各自利益诉求，需要通过“第三方”加以协调，且增加公开、透明、公正、法治和公众参与环节。

刘根荣（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行政化去产能是一种低效率高成本的管制措施，违背经济规律，也违背竞争中原则，很可能演化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政策工具。

如何使外部性内在化，使水泥企业产量决策符合社会最优原则：一方面可以考虑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另一方面，可以鼓励水泥企业间兼并重组，利用资本市场交易，解决问题。

王庆山（扬州国资委）：

（1）法治原则。企业的设立合规合法，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合规合法，那企业有权自主选择生产或停产。

（2）市场原则。只要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可以依据自身发展战略选择生产或停产。

张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水泥和钢铁行业类似，普通基础设施资本密集型行业，产业组织上属于市场型，个体之间竞争惨烈，目前国内企业集中度比较低，几家最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不高，中小企业特别民营企业数量多。环保整治导致过去二年中小企业关停或无法运营，一些大中型企业（主要国企）受益于此。目前若放开政策，其实有可能类似2009年宽松政策导致河北地方中小钢企群起，以致目前尾大不掉。当前应该学习浙江经验做好行业协会内部协调自律，其次可能混改重组是一个方向。

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作为一种“权宜之计”，“错峰生产”具有以下危害：

（1）“错峰生产”是一项温和“权宜之计”。即便如此，仍会严重削弱一切法规的执行和契约的履行，稳定的预期难以形成，抑制长线投资和百年企业的出现。

（2）“错峰生产”出台的背景是近年来空气质量问题社会和政治热度的上升，尽管没有法

律依据，但这项干预明显地对企业产生了重大影响。违规企业要承受政府约谈和违规通报等压力，曾经有效施行了一段时期，只是今年冬天南北价差太大，诱惑超过了来自政府的压力。

(3)“权宜之计”带来明显的不公平。违规企业和守规企业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公平，守规企业认为自己吃了大亏。在政府层面，如果某些地市取得工商、税务、环保、消防等部门的配合，采取一些“权宜之计”，在本次“错峰生产”规定执行之中，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4)不公平会破坏一切秩序，既包括现在的，也包括未来的。对现存法规而言，民众会将一切法规都视作“权宜之计”。对未来的法规而言，如果立法者坚持以当前问题的解决为导向，便很难推出稳定的法规。后者是民众稳定预期和社会良好秩序的建立的基础。

楼稼平（宁波布衣）：

建议试行排污权交易。排污权允许在水泥生产厂家之间在错峰期内进行使用或交易，停产派可以出售排污权，生产派可以购入排污权，价格随行就市。由于排污权的使用，涉及到错峰期内的实际产量，这个产量控制，可由行业协会操办，政府有关部门监管。

王宇（南京大学）：

辽宁省政府层面：（1）如果环保部和工信部的意见是要求严格停产，那么地方政府只能严格执行，同时考虑对那些在南方没有分支企业的本地水泥企业进行事后补偿；（2）如果中央的精神是对冬季水泥生产进行限产，那么政府可以考虑从其他停产省份购买生产限额，并以拍卖等机制在本地企业中进行分配；（3）如果和中央存在政策交涉的可能，可以考虑申请在当前放开生产限制，并且在一年的其他时间进行限产，相当于由本地政府和本地企业来自由决定“错峰生产”。

中央政府层面：限产政策是违背“经济规律”来推动环保，不仅执行成本高，并且会让地方政府承担过多压力。环保的终极目标是为了减少排放，一刀切的政策会造成激励扭曲，不如利用市场机制，通过提高环保标准或者允许企业自由交易“排放权”的方式，来奖励那些环保水平高的高效率企业，既保护了环境，也实现了更大的经济效益。

鞠昌华（环境部南京环科所）：

(1)取暖季在保民生前提下的确留给工业企业的排污量有限，尽管环境规制方法很多，或许也可以选择提高排污标准来砍掉部分企业，但那样更残酷更低效。

(2)环境治理的困境在于我们事实上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辽宁水泥企业环境治理中同样存在两个失灵。

(3)市场机制可能是更好的机制，但其要求的政策和社会环境较高，且传导过程需要一定时间，政府行政机制可以在相对较短时间里完成排污量削减。当然，排污权交易及充分发挥协会行业协调作用都是方向。

(4) 政府的法定权限确实不够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四条对达标规划可以采取的措施未明确。但参照《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实际为保护公众健康,在重污染天气对达标排放企业及机动车都是有不同限制措施的,在预防原则下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

(5) 这种争议还与排污许可制度尚未完善有关,未来可考虑取暖季大气容量限制精准分配年度内排放量。

在北方,取暖季整体上确实没多少环境容量,但仍存在区域间不均衡,辽西北大气有一定容量的应该少限产,容量少的可以多限甚至可以整体限产;从工艺角度,也可以对一些工艺相对落后的提更高限产比例。总之,要根据环境质量数据和当地的水泥生产规模和工艺精准限产。当未来,随着部分产能在新的环境约束条件下失去生存能力,自然淘汰,产能基本与环境容量匹配,就不会存在“错峰生产”了。

张小兰(西南民族大学):

政府可以在水泥行业污染排放上制定标准,完善法律,不应该由政府告诉企业何时生产或停产。

方向阳(中国财政杂志社):

近立足工信厅谈几点看法:

(1) 执行角度。在当前体制下,作为地方政府应当无条件落实好中央政府(工信部和环保部)的决定要求。

(2) 目标角度。当时设置“错峰生产”机制有多重目标,其中最重要的还是代表大众利益的北方冬季取暖季的大气污染防治目的。因此,还不能说完全是辽宁一个省份水泥行业的自律问题。

(3) 公平角度。“错峰生产”机制产生困境主要是市场形势发生了变化,对生产布局、运输成本等不同的企业影响不同,从而导致企业行为发生变化。但在“统一停产”这一决定做出改变之前,个别企业的违规行为,必然会产生省际水泥行业和企业之间的不公平。

(4) 完善角度。可以对市场形势变化情况和企业的诉求上报工信部和环保部,做出修改“错峰生产”机制的建议,采取更加精准有效的环保监管措施而非采用“一律停工”这一简单粗暴的方式。

林学军(暨南大学):

(1) 政府管理应该以法律为准绳,法无禁止就可为。

(2) 政府的管理应该是提供公共产品和纠正市场失灵,鼓励市场公平竞争。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按照市场的机制运行,政府不应该强制干预企业合法的经营行为。

(3) 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市场竞争应该一律平等。我国一些产业产能过剩是

个市场问题，就必须用市场的方法来解决，行政干预，只能造成市场失衡加剧，危害经济发展。

(4) 中国市场情况十分复杂，在制定法律法规时要有前瞻性，要考虑到全国的市场情况，甚至是全球的竞争情况。要根据现实情况，定期的修改法律法规，堵塞漏洞。政府行政的时候，要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既要考虑企业生产的发展，宏观经济的稳定，也要考虑到民生问题。

宋凌炎（江苏精诚 & 精缙毛毯）：

辽宁水泥生产案例其实也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我觉得应该从三个方面看：

(1) 不管哪个行业哪个企业，前提条件要保证是有合法排污许可证，各项手续齐全，符合一般性环保要求；

(2) 政府与行业协会一起制定一个标准，排放达标的企业不用刻意用行政手段限制企业发展，达不到标准的采取相应的限产措施同时让其进行改造；

(3) 考虑冬季大气污染，生产过剩的情况，政府和协会应该加强监督管理，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实行区域限产和“错峰生产”模式。企业经营的宗旨是创造利润，利润的前提是生产效益最大化，不论是区域限产还是错峰生产，给企业效率都带来致命打击。“一刀切”会造成好企业效率低下最终赚不到钱，僵死企业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状态。

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

(1) 政府的角色定位。在企业经营利益与公众环保利益之间，政府的角色都应是执法者，包括对违法行为的惩处，也包括对合法权益的保护；

(2) 政府的行为边界。法律法规是政府行为的边界，而不是政策甚至通知或意见；

(3) 政府的决策机制。决策机制应凸显合法性和科学性，从立法环节开始，政府应积极引入行业协会、居民代表以及业内专家参与相关事项决策。本案例中，地方政府首先应从源头上厘清自己的行为依据，进而确立自身的行为边界，并构建起“职能部门—行业协会—居民代表”三位一体的协调机制。

闫浩（江苏经信委）：

(1) “错峰停产”的依据是国办的《指导意见》和两部门的《通知》，关键是要有权威部门判定这两个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有，企业必须停产。没有，打官司政府要输。

(2) 即使文件具有法律效力，政府出台文件应该研究对各方面的影响，对利益受损方应该有补偿措施。停产的北方水泥厂利益受损，可以由获利的南方水泥厂给予补偿，或者由政府给予补偿，或者由中央政府提出各地的排放限制指标，各企业（不限于水泥厂）申购排放指标。如果利益补偿机制健全，此类问题可以避免。

(3)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由政府与企业谈判解决。强势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解决（政府规

制企业的办法还是不少的），“弱势”的政府可以用资金补偿解决。

（4）依法行政，对行政主体是“法无授权不可为”，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有型之手到处乱伸，政策缺乏稳定性、连续性，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扫一扫
关注“长江产经智库”

